

内江市
市中区

文史资料选辑

晏济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委员会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

政协内江市市中区
第十一届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
成 员 名 单

主管副主席：李显文

主 任：钟道洪

副 主 任：王德润

委 员：傅曾阳 朱本昌 唐容川 周 丹

政协内江市市中区
第十一届《文史资料选辑》编辑委员会

顾 问：邹作圣

主 编：钟道洪

副 主 任：王德润 黄永发 傅曾阳

编 委：王德润 石永寿 刘泽森 任世俊

宋子麟 张克纯 阴钧陶 官简贤

陈国光 徐智广 黄江陵 温余波

蒋政伦 傅曾阳 叶自明 张天津

杨国钦 曾 健 陈红英 赵国恒

内江市 市中区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江市
市中区委员会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
2002年10月 内江

目 录

张大千纪念馆	汪 毅 (1)
张大千先生和我	曹大铁 (5)
百余图片八十诗歌, 发掘另一个张大千	冯俊锋 (7)
张采芹与张善子、张大千的深厚友谊	李永翘 (8)
张大千浪游海外的隐衷	民春秋 (12)
张大千诗多是何时	梅英 (口述) 德润 (整理) (17)
海外寄情	
——寄给内江名厨杨国钦的信	张心瑞 萧建初 (18)
张氏“大风堂”名由来	王德润 (19)
中华男儿志气 书画百年人生	
——读晏济元老人一封书信想到的	
.....	张 麟 张平中 (21)
学古要敌古 创新要破新	
——访世纪老人书画大师晏济元	陈自学 (33)
世纪老人故乡行	李伯廷 王德润 (35)
难忘画家曾鉴清	任世俊 何舒杰 (39)
文企结合促发展 书画之乡产业兴	尤再清 (46)
翰墨书盛世 丹青绘宏图	陈祥远 德 润 (54)
内江大洲广场	(执笔串辑) 王德润 (57)
应市建委征求新建广场命名	邹作圣 (58)
新建广场命名会	蓝代发 (58)
赵贞吉与大洲坝	邹作圣 (60)
大洲广场赋	魏明伦 (64)
大洲广场行吟	李静晔 (66)

大洲广场新联	罗锦文 (67)
内江十二景新咏	甘光地 (文) 林大如 (摄影) (67)
内江名胜旧游	萧绥莱 (文) 德润 (整理) (76)
“膺屎坵”与“科始坵”	任世俊 王德润 (83)
清末内江城街街名小溯	
——《内水阳秋》之七	洪 若 (84)
玉皇观被批准为道教活动场所	廖至鸣 王德润 (90)
空军军士学校的热血青年	
——为纪念抗日战争六十五周年而作	胡锡珍 (92)
淡笔浓情的“抗日”画展	
.....	梅英 (忆述) 德润 (整理) (100)
范长江与冯玉祥二三事	范长城 王进坤 (101)
范长江首倡筹建江油李白纪念馆	伍丕庆 (103)
革命烈士粟立森	闵昌其 (供稿) 蒋正伦 (执笔) (104)
从内江走向朝鲜战场的邱少云	郭安民 (112)
五十年前的一场军民联欢晚会	向汝君 (120)
联谊小记	徐智广 (123)
这就是沱江	黄建军 (126)
内江市首届运动会市中区代表队战绩辉煌	
.....	曾晓平 杨 峰 (128)
巫丹, 我们为你自豪	周梦蝶 (130)
一方沃土育英杰	王德润 (132)
名师李大方	邹光明 (134)
忆内江川剧团演现代戏的一些情况	刘泽森 (140)
解放前夕的川大内江同乡会	张学成 (142)
“红、勤、巧、俭”活动中的“半边天”	
.....	吴鸿禧 刘泽森 (146)

怀念拙老	邹作圣 (149)
赵熙晚年的一次生日	拙老 (述) 德润 (整理) (157)
记拙老追忆一古联	王德润 (158)
对《新梦影录》的修、补意见	沈元加 (159)
诗、书、画兼擅的梅晓初	杨祝康 赵延禄 (160)
寒梅岭上溢清香	王德润 (170)
家先严陈鸣鸾遗作及事略补正	桂湖长子 (172)
我对内江县第二次产糖高峰糖产量作了一次核查	邹作圣 (179)
建国前内江杂糖糕点业概况	黄江陵 (188)
上世纪四十年代前后内江的酒精工业	徐智广 (197)
内江市中区乡镇企业发展检索	李静晔 (202)
内江刊刻行业的兴衰	李文馥 (205)
内江餐茶旅业的兴衰	黄心明 (220)
内江警方侦破陈再涉黑团伙案	曾晓平 (228)
续谈 1950 年内江县三区征粮剿匪重点乡 凤鸣乡的“雷五爷”	严茂修 (231)
官简贤、田光灿二老相继辞世	文史委 (233)
挽联、挽诗	邹作圣 张起荪等 (233)
痛悼严茂修先生	文史委 (237)
更正	编者 (238)
小讯	编者 (239)
封三	(晏济元寄余农治信) (张麟供稿)

张大千纪念馆

汪 毅

内江市的地形图上，标注着一个让世人注目致礼的亮点：圆顶山。它之所以光耀夺目，是因为一代国画大师张大千的纪念馆坐落在这里。当人们朝圣这里，便可以穿越时空隧道而走近张大千，走近张大千的世界。

张大千纪念馆占地 31.46 亩，于 1987 年奠基，1992 年 9 月开馆。参观这个属于名人性质的纪念馆从市中区出发，过西林大桥（或摆渡过江），顺东桐路沿江西行约 1 公里便抵圆顶山脚下。拾环山曲起的石阶而上，迎面便是张大千纪念馆的外大门。

进入外大门，眼见的便是约千平方米的广场。信步前行，两侧的雪松挺拔葱郁，让你感慨它的勃勃生机。广场南侧是艺术墙，全长 36 米，高 2 米，由 21 块黑色大理石碑和 20 块空花隔窗构筑，既显古朴，又不乏现代感。驻足艺术墙，流连石碑上镌刻的张氏兄弟的画作，凭栏沱江，你会感觉这 21 朵艺术之花香气扑鼻。接着，迎向你的便是张大千先生的石刻像。瞻仰一番，高山仰止一番，你会领悟到大千先生通天接地的情怀，你会感慨到大千先生如椽画笔挥响的风雷。

穿过广场，拾阶而上，便是张大千纪念馆大门。门额的黑色大理石上镶嵌有“张大千纪念馆”五个大字。细细读来，字里行间流溢出张学良将军对大千先生的一片挚情。门两侧的青藤扶摇，闪亮一路翠翠绿绿，喻示着大千先生艺术生命的常青。

细细而观，张大千纪念馆（第一期工程，占地约 5 亩）建筑采用的是仿古木钢筋混凝土结构，既注重内部质地的坚固，又注意外形的中国传统建筑工艺。主体建筑分东院和西院，系三合院、

四合院组合而成的几重几进院落。其构建布局以四川民居为主调，但也恰如其分地兼容了大千先生曾客居苏州、北京、台北等地建筑的一些特点，使之庄重、古朴、自然、亲和，犹如一件值得玩味的艺术品。

体验过纪念馆的建筑艺术美，便可以步入东院领略它的园林之美了。东院由大门、两侧厅和西厅所围合。院中间是一个约百平方米的天井。其间有无数盆栽集合的一个花的世界，时时放出馨香，沁人心脾。院的厅侧置有无数盆景，集林泉山石于一体，浓缩出大自然的秀丽与雄浑，院左侧的修竹等植物青翠交加，是一方绿色天地，茂密得竟让一些儿童在里面做“藏猫猫”的游戏。

围合园林之美的是三个展厅，按序为“棠棣联辉”、“大风堂”、“艺坛宗师”。这里是张大千纪念馆馆藏品陈列的主体，所展示的是大美，是崇高之美，是震撼心灵的美！

如果说，台湾张大千先生纪念馆是以陈列张大千先生生前居家的园林、用具为特色的话：那么，内江张大千纪念馆的三个展厅则以图片、物、资料、书画作品见长了。这里，陈展着 600 余件（幅）实物、图片、资料、书画，其数量洋洋大观，其内容几乎囊括了一代宗师张大千先生的生命历程和艺术历程。

让我们先领略“棠棣联辉”展厅。展厅建筑古朴、明快，两旁花红木疏，正面的横匾“棠棣联辉”和外仿木石柱上的联语“细注虫鱼笺尔雅，广收草木续离骚”均出自著名作家李准手笔。门柱的联语“山川自逊神工笔，魂梦长悬故宅心”则是启功书家的手笔。咀嚼这些联语，你会体验到中国文人的相亲相敬的清雅滋味。展厅窗明几净，宽大高朗，陈列品均布置在展橱和展柜里。展橱正中端放馆主张大千的铜像，系旅美雕塑家陈哲敬先生所塑并捐赠的。凝视着栩栩如生的张大千先生铜像，你会觉得一股难得的灵气油然而起，铜像两侧是大量珍贵的图片，分别形象地概述着馆主的生平事迹、姻亲关系、艺术风采、生活情趣等内容。展

柜中陈列有馆主曾使用过的金石印章、绘画扇面、石绿颜料、纪念墨砚、特制毛笔、定制花瓶、“大千纸”等，使人感慨永恒的张大千，永恒的张大千艺术世界。

穿过“棠棣联辉”回廊，移步便抵“大风堂”展厅。横匾“大风堂”及外仿木石柱上的联语“学业日惟不足，精神养则有余”均是集的馆主张大千的手迹，其笔意酣畅隽逸。门柱的联语“四面云山谁作主，一声长啸振雄风”则采撷的是大风堂的另一位主人、大千先生的二哥张善子先生的手迹。“大风堂”是张氏昆仲共同拥有的画室名。由此延伸，这里象征着大风堂的策源地，更展示出大风堂主人超迈的气概。这里是人们憧憬的地方，前来拜谒的书画家，特别是大风堂门人无不高山仰止，神驰千载，喟叹“五百年来一大千”。展厅的展墙和展柜里陈列着张氏兄弟各时期的书画代表作复制品。张大千先生的书画作品有：“长江万里图”、“庐山图”、“吉祥天女”、“飞天”、“麻姑像”、“王母像”、“南极仙翁”、“荷花”、“柿子”、“翔龙山诗碑”、“赠大将军喻君培伦传”长卷、信札等，形式和笔法纷呈各异可谓气象万千、云蒸霞蔚。张善子先生的画作有：“上山虎”、“下山虎”等虎图，使展厅壁荡雄风。欣赏这些作品，你会感到大风堂主人艺术生命的气息，你会感慨大风堂的魅力和永恒。

瞻仰毕神圣而流芳千古的“大风堂”，移步便是“艺坛宗师”展厅。“艺坛宗师”横匾及外柱联语“毫穿铁卷，丹青幻化惊海域；江开石壁，云帆鼓荡梦神州”均出自作家穆青手。门柱的联语“大千世界归禅眼，精舍摩耶酌髯翁”由王学仲书家题写。联语巧妙地将“大千世界”与“精舍摩耶”嵌于对联，蕴意悠邃。步入展厅，琳琅满目的展品扑眼而来，令你目不暇接，更令你感慨“说不完的哈姆雷特，道不尽的张大千”。这些陈展品把“名满天下，心属艺术”的张大千先生的艺术成就展示得淋漓尽致。陈展品有世界各地及历年出版的有关张大千及其艺术的画册、书法集、

年谱、传记、纪念册、诗词集、摄影集及大千先生情系桑梓而题笺的“内江市志”、“内江县志”，有记录大千先生关于丧葬、海内外纪念大千先生活动的等内容的图片。此外，展厅最后一部分展示了大风堂门人何海霞、慕凌飞、萧建初、晏伟聪、黄独峰、梁树年、谢伯子、张正雍、刘力上、俞致贞、郁慕娟等的画作。从这些画作中，你可以感受到大风堂艺术薪火传承，宛如蜿蜒东去的沱江汇入了无垠的大海。

紧邻东院的便是西院。西院静谧典雅、花红树绿，回廊悠悠，整体建筑风格与东院协调并独立成章。西院为会议（接待）室、库房、办公区域，四周有回廊，中间有天井，总计面积近 300 平方米。西院后门匾上刻有“未完院”三个醒目大字，是集的大千先生的墨迹。其意为张大千纪念馆的总体工程（第二、三期）尚待努力完成。

踱步西院后门，便是新辟的芭蕉园、荷花池、百梅园、绿色乐园、望江亭及新建的大千味苑。芭蕉园约 800 平方米，内置有镶嵌花岗石碎片的桌凳，可供游人品茗休憩；筑有假山和芭蕉井，芭蕉井是模拟大千先生旧居的，以供游人在雨打芭蕉的意境中倍思张大千这位为桑梓赢得殊荣的乡亲，呼唤他的魂兮归来。荷花池傍芭蕉园，约 500 平方米，池深近 2 米，地面高度约 40 公分，周边植有树，不规则池壁面镶嵌花岗石片，典雅别致。池中荡漾荷花，游弋红鲤，营造出大千先生诗中“荷花世界梦俱香”的意境。百梅园与芭蕉园相隔数米，由大风堂门人何海霞先生题匾。梅园内，植有红梅、腊梅计百株，占地约 1 亩。在此赏梅思人，你会感慨梅的意志、梅的精神、梅痴张大千爱梅的博大情怀和无数的咏梅诗。沿百梅园蜿蜒而上便是绿色乐园。该园约 800 平方米，建有望江亭，筑有绿色通道。这里是张大千纪念馆最高处，极目天舒，凭栏看江，别有一番惬意和情趣。大千味苑位于绿色乐园之下并紧傍荷花池，一楼一底，约 500 平方米，由大风堂门人慕

凌飞先生题匾。在此建大千味苑，意在宏扬大千先生吃的艺术和艺术的吃……

张大千纪念馆还在建设发展中。当你循着它的建设的轨迹巡礼，我想你会由衷感慨：张大千纪念馆美哉，张大千纪念馆的明天更美！

张大千先生和我

曹大铁

我在 1936 年拜张大千为师，成为“大风堂”弟子。之后在很长时期内与大千师有接触。兹记其逸事二三，以告读者诸君。

“挽”刘湘

抗战初期某一天，大千师将他一薄本诗稿送给我，稿内夹一张纸，上面写挽四川军阀刘湘的挽联，上下联约三十多字。他说：“大铁你看我这挽联做得可好？”我看了不敢回答。他说：“好不好你只管直言，为何不答？”我说：“好是好的，但对仗上好像不合。”他说：“正要你说这句话。谁高兴去挽他！这是某某人（指张群）强要我挽的。刘湘这家伙对不起我们四川人，我就对不起他。”我说：“那是你有意这样做了？”他说：“是啊，这就叫‘牛头不对马嘴’，妙的是我写的这副白竹布大挽联还悬在刘家的大客厅里，可见军人都是老粗，不懂文墨，只重名气，还个个叫好，我却暗暗发笑。”

妻弟的学识

大千师摆“龙门阵”是出名的。最爱说笑话，他说的笑话不

知有多少，已见诸报刊的不写了，在这里我只写两则。一则是：他对我说：“我娶曾夫人后要回门会亲，曾家是旧家，我知道小舅子读过多年家塾，想他一定读过不少古书。当他同我初次交谈时，他说‘姊夫，你是留学生，读的书很多很多，有一些书你可读过？’我听慌了，心想定是一部古奇之书，听他再说：‘你可读过《乾隆下江南》？’到此我才平静下来，原来这位舅爷的学问如此‘高深’。”另一则是：他对我说：“抗战前我到嵩山路吴湖老（湖帆）寓所，敲门出来一个小娘子，她倒认识我的，她就举头喊：‘少老爷，张家老爷来了。’吴就下楼迎接，一见面，我对湖帆说：‘依要叫声我爷叔，依是少老爷，阿拉是老爷，依勿叫，阿拉就勿进依屋里去。’我的一口四川上海话，让彼此大笑一场。”斯时吴的母亲沈太夫人还在世，所以小娘子（小丫头）称他“少老爷”，又看到大千师的大胡子，自然要叫“张家老爷”了。实际上海派国画大师吴老比大千师要年长五岁。

错 怪

1946年冬天，上海的一位银行家忽然邀我晚宴，要我转求大千师在他购入的大千师所绘的仕女画上加个上款。在我请求许可后，我电告他把画径送师寓，我没有过目。当天晚上，大千师打电话叫我去吃夜饭。不料才进房门，见到他怒气冲冲直走到我身边，莫名其妙猛击我左肩两下，并骂我：“你好大胆子，竟把我的画乱涂乱抹！”到此我才明白他叫我吃夜饭实际上是吃拳头。我知道此中有误会，但忍着不发一言，由他打骂。过了一周，大千师叫其知友张葱玉来电话唤我去见他，见面时只见大千师满面笑容，佯作打自己巴掌的样子，边说：“该死该死，我错怪你了。这个家伙今后再穷我也不送他画了。你怎么不喊一声冤枉的呢？”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大千师为了接济一个穷朋友，送他一张水墨仕女画，让他售出后做个过年盘缠。这位朋友转托画商寻主顾，画商为使

仕女“漂亮”，对画上回头背立的仕士，在她外罩的背心上加了一层石膏颜料，石膏渗出背心外周，嘴上也加了胭脂，是半内行上的色。上色者确是把画面弄坏了，我却代人受过。这大千师打错、骂错我的事当时传遍上海画林，引为笑谈。（本文由金戈协助整理）

百余图片八十诗歌 发掘另一个张大千

冯俊铎

享誉世界的国画大师张大千，人们知悉最多的是他的画坛生涯和崇高的艺术造诣。张大千研究专家、省地方编志办副编审汪毅倾其6年多心血，足迹寻遍大师生前踪迹，试图从生活、情感、精神等方面还原大师的另一面。近来，汪毅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有关“艺坛宗师”张大千的传记、小说、画册不胜枚举，研究者大多注重他笔重奇逸的绘画作品。汪毅在研究中发现，大师在众多艺术领域都有非同凡响的造诣与浓厚的兴趣。汪毅以诗歌与照片结合的独特形式，展示大师83年生命历程中丰富的生活、情感、精神世界。每首诗后均配有1至4幅照片，这些诗和照片，着重展现大师在园林、建筑、摄影、治厨、书法、鉴定、表演等艺术领域的才华，充分反映了大师的情感与情趣世界。

据了解，如此全面、完整地反映大师丰富多彩的人生与生活趣事，在张大千研究中尚属首次。还有10余幅张大千生活照片在海内外也是首次公开。

张采芹与张善子、张大千的深厚友谊

李永翘

张采芹，原名张学荣，四川江津县人，清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十月生。早岁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返川后曾创办四川女子美术学校，并任教务长，先后还曾在四川美术专科学校、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等校执教美术。几十年内，张采芹专攻中国画，擅长画花卉蔬果、禽鸟翎毛，尤擅长画竹，为蜀中名画家，素有“张花鸟”、“张竹子”之称，在川中书画界甚有影响。

“蜀中三张”有盛名

早在上世纪二十与三十年代，张采芹就已同著名画家张善子及张大千兄弟二人，彼此间先后结下了极为深厚的友谊。张采芹平时除了常同张氏兄弟研讨艺事，注意向他们虚心学习外，还常陪他们一起出外旅游、写生，把巴蜀大地的锦绣山川和美丽的自然及人文风貌，尽皆纳入自己眼底，以荡涤胸襟，扩大视野，增长见识。同时，张采芹还利用自己是“老成都”的有利条件，朋友多，门道广，路子宽，曾积极为刚返川或刚来成都的张善子、张大千兄弟俩，或牵线搭桥，或介绍朋友，操办了许多具体事务，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如一九三八年秋，张大千由北平沦陷区冒险逃生，经香港辗转返回大后方后，旋赴灌县（今四川都江堰市）青城山中居住，此期间张大千为了全家生活及为了赴敦煌的旅费筹款，而在成都城内举办的几次画展，就是张采芹帮助或策划联络，或具体操办的。而一九四四年初，张大千由敦煌回来后，在成都举行的规模浩大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张采芹亦为之付

出了大力。而在此展进行之中，因展场场主见参观人多，突然擅自宣布加租，地方税务部门又突然派人来征收巨额“展览税”，由之引发出的种种风波，曾经搞得张大千昏头胀脑，最后也是经过张采芹的从中转圜，冲突乃息。以致事后，张大千曾深为感激地说：“这次我的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得以在成都顺利进行和最终取得圆满成功，皆是多亏了采芹道兄！”

由于张采芹的个头和张氏兄弟俩的相仿，都是矮矮胖胖的，又都喜欢常穿一身中式长袍，加之大家都姓张，因而当他们三人站在一起时，在不知底细的人看来，常常误以为他们是“三兄弟”，对他们互相间的亲密态度和高超艺术，人们常称为是画界的“蜀中三张”。

首悼善子为国死

一九三八年底，张善子受当时国民政府的派遣，携自己及弟大千的画作，出国进行抗战宣传与抗日募捐。在外虽才仅仅一年多，但因为张善子的忘我工作，却使得成绩极为美满，收获甚钜，仅他个人的画虎义卖和募捐就得款达二十多万美元。张善子将这笔巨款全部汇给了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以救助抗战难胞，他自己未从中染指分毫，而且生活也自奉甚俭。亦由于此，张善子在外因积劳成疾，健康恶化，甫返国门，即在半月内病逝于重庆歌乐山，时在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日，年终时仅五十八岁。

张善子为国捐躯的消息传来，画坛震惊，成、渝的书画界、艺文界等社会各界，都为之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沉痛悼念这位为国家为民族鞠躬尽瘁的真正爱国大画家。当时正在成都的张采芹闻此噩耗，顿足大悲，哀伤欲绝，他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引用诗圣杜子美的名句，亲自恭书了隶书挽联一副，以悼念这位他敬仰的爱国画家与挚友。该联曰：

天地为之久低昂，挺身巴蜀，写照山林，扬虎威而厉人壮志，

大长精神，看今日遗墨淋漓，悬壁能惊风雨；

丹青不知老将至，遨游外邦，伸张正义，凭兔颖以济国多金，未私囊囊，待他年敌尘净扫，论功应图凌烟。

张采芹悼张善子的这副挽联，不仅词句贴切，对仗工稳，而且言真意切，感情深厚，豪情壮志和爱国热忱倾于满纸，活脱脱地高度概括了张善子那英武壮烈与爱国爱民的杰出一生，表达了张采芹对于张善子的无限追思和无比崇敬。

万里之外频思君

时过九年之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张大千离开成都，到了台湾，旋经香港赴印度展画，后又携家远赴美洲，先后侨居于阿根廷、巴西、美国等地，于一九七六年后又搬回台北定居。从此他与亲如手足的张采芹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见过面，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间的通讯，彼此间也渐渐断绝。

自张大千离开大陆之后，张采芹不久也离开成都，先回四川隆昌县，作了一段时期县中学的美术教员。后来，他又被调回成都，被任为四川省文史馆馆员、成都市文联委员等职，并成了成都市画院的专职画师，专门从事国画艺术的创作。张采芹每每拿起画笔，都常常不禁想起了他以前和张大千在一起切磋画艺的情景，想起了这位目前在外音讯全无的亲密友人。每当此时，他往往就止不住喟然长叹，或眼泪婆娑，思绪万千，但又别无他法，他只默默地停在窗前，遥望东南，在心中祈祝千万里之外的手足朋友，身体康强，艺事精进。

就在这样的“相思源源无处诉，载将离恨过时间”的情形下，二张天各一方，各自渡过了漫长的三十余年。

老友忽赠花枝来

一九八二年农历四月，张大千在台北家中，忽听到由成都赴

美国省亲的女儿张心庆从越洋电话中告知，老友张采芹还健在成都，并时时问及“大千兄长”的消息时，张大千真是悲喜交集，一时旧情旧事，齐涌心头。张大千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当即作了一幅老幹新花、满园春色、思念绵绵、含情脉脉的《垂丝海棠图》，托女儿回成都时将之转赠给张采芹。张大千还在此图上题了一首诗与跋，表达了他对家乡故国与旧雨亲朋的刻骨思念及魂牵梦绕，以及他对于“相思催人老，泪垂不胜悲”的沉重感慨。当张采芹在成都收到这幅张大千由台北辗转捎来的诗画时，睹物思人，既喜且悲，慨叹万千，不及细述。从此，张采芹将张大千的这幅《垂丝海棠图》珍同拱璧，钟爱万分，不时展阅细细披览。张采芹还曾经想过，如果将来有一天，他和已分别长达三十多年的老友大千，若能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再相互见上一面，那又该有多好。

锦水江畔又招魂

但不料，就在张采芹收到这幅张大千的亲笔画后不久，他忽听到张大千在台湾病重入院的消息。张采芹心急如焚，曾急急致电台湾张宅，表达他对大千老友的亲切慰问，并衷心希望“大千兄”能早日康复。谁知时过不久，张大千即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八三年四月二日病逝于台北，张采芹痛定思痛，恭笔书写了一副挽联，哭悼大千长兄。

是画苑大宗师，别开生面，绍往继来，兄弟情数十载间，写意花枝还赠我；为中华文明使，遍历他邦，扬声播艺，日月潭三千里外，招魂锦水遽哭君！

张采芹在成都，先后两次分别为张善子、张大千兄弟俩写挽联悼词，其心中的悲痛惆怅，可想而知。而就在此一年之后，一九八四年八月，张采芹亦因病逝于成都，终年八十四岁。

张大千浪游海外的隐衷

民春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名画家张大千羁留海外，为世人诟病。故园情浓，乡思无已，其实张大千自有一番隐衷。

1948年12月，筹备已久的“张大千画展”在香港举行。张大千带着新娶的四夫人徐雯波去了香港。

张大千夫妇在香港迎来1949年新年。翌年1月底，内地传来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当他听到古都完好，未受战火破坏，欣喜不已，佩服共产党的高明决策。

2月底的一天，一位贵宾来到九龙亚皆老街张大千的临时寓所。来者是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寒暄后，何香凝说明来意。新政协即将在北平召开，她应邀出席。去北平时准备带一点礼物馈赠毛泽东。考虑再三，一般礼物都嫌俗套，只有带一幅大千先生的画最为珍贵，不知先生肯挥毫否？

张大千听了慌忙离席一揖，忙道：“您就是大画家，却青睐大千，实在有愧。恭敬莫如从命。何况润之先生素为我所敬仰，正无由表达，只怕拙作有污法眼。”当下言定，3天后即交卷。

一幅《荷花图》如约交卷。画为纸本。高132厘米，宽64.7厘米。画面茂荷两叶，白莲一朵掩映于荷影中，给人一种生机盎然、万象一新的印象。此画后经何香凝持往北平，亲手赠给毛泽东。毛泽东甚喜爱，悬挂于他的办公室中。原件现藏于北京中南海毛泽东故居。

相隔不久，全国文联与全国美协相继成立，文运昌盛，北平一片新气象。素来倚重张大千、誉他为“五百年来唯此一人”的徐悲鸿，托人带来他的亲笔信，邀张大千去北平工作。

初接徐悲鸿来信，张大千欣喜万分。经深思熟虑，他又躊躇

难定，如果一人悄然成行，留在四川庞大的家族及弟子们恐遭国民党荼毒。而如果携家带眷而走，显然也走不脱。北行之事就此搁置。

转眼到了9月，张大千曾接受印度方面的邀请去办画展。当年他在敦煌临摹时，就有心愿考察印度阿旃陀壁画与敦煌艺术的异同，有这样的机会自然不放弃。几个月来忙着作准备。临行时，他除了带着自己的作品外，还有中国古代名画，以及敦煌壁画56件（带走的仅为部分，尚有200余件留在家中）。离家这天，他神色忧郁地对家属及门徒说：“此次我出外展画，会像往常一样去去就归，只是对你们放心不下，四川的局势不稳呀！”儿子张心智以家中所剩敦煌壁画如何处置动问，他默然不语。张心智再问，他才说：“这200多幅当年我耗尽心血，来之不易。多次有人高价求购，我都拒绝。因为这是祖国的文化遗产，日后总要交给政府的。此去我万一真的回不来，你就把它交给当权的政府来保管，只要他们真心热爱艺术，重视祖国文化遗产。”

出川后，张大千没有直接去印度，在港澳暂留，又应友人之邀，10月间到台北举行画展，顺便游览台湾秀丽景色。

多年的历史渊源，张大千与国民党的一些元老与上层人士都有往来，交情也非一般。如于右任、张群等。

当时于右任已先到台北，张大千去拜访时，得知局势急转直下，四川也行将撤退。张大千忧心忡忡，深怕四川新旧交替，局势混乱。张大千坦言心事，很想接出眷属，只是插翅难飞。陈诚倒也爽快，立即打电话要空军派机送张大千速回成都。

张大千突然回到成都，事属意外，家人惊喜交集。原认为全家都可带走，然因机票发生难题。张大千找了当时还在成都的张群，虽立即安排机位，并交代派官车接送机场，但只有3张机票，同走的是四夫人徐雯波与一个小女儿，其余家属都留在成都。赴台湾当天，去机场途中，顺道到杨宛君（三夫人）处与众人洒泪

相别，凄惶之状，难以言述。从此直到离世，他终未回到故乡。

张大千飞抵台北后不久就到香港。1952年8月，他又从香港移居南美阿根廷。这离祖国更远了，家乡情浓的他，怎会作出这一举措呢？

是年2月底，张大千去阿根廷展画并游览，夫人留香港。4月间，得夫人家书并附徐雯波近照，他感慨万端。曾在一幅人物画的画跋上记有“故国春酣，此邦已是金风送爽。天南地北，离索何堪”等语。5月回到香港，就作出移居阿根廷的决定。

据大千先生自己所述移居海外的理由是：“远去异国，一来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应酬繁嚣，能于寂寞之乡，经营深思，多作几幅可以传世的画；再者，我可以将中国画介绍到西方，中国画的深奥，西方人极不易了解，而近年来偶有中国画的展览，多嫌浮浅，并不能给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谈不上震惊西方人的观感；另外，中国的历史名迹，书画墨宝，近几十年来流传海外者甚多，我若能因便访求，虽不一定能合浦珠还，至少我也可以看看，以收观摩之效。”（据台北资深记者谢家孝先生所述）于是，决定举家远迁南美！

张大千居阿根廷期间，在成都的二夫人曾正容与儿子张心智，按照他离川时的嘱咐，把放在家中未带走的、当年临摹的125件敦煌壁画全部交给四川博物馆保存，完成了他的心愿。

1953年，张大千从美国回阿根廷途中，在巴西停留访友。在圣保罗市附近，看到一块地方极像故乡成都平原，正准备出售，巴西又欢迎移民，圣保罗的华侨朋友又多，在朋友的劝说下，他买下这块地，决定移居到这里。为纪念故土，他把圣保罗音译为“三巴”，四川古时分为巴县、巴东、巴西三郡之意；又将“牟吉”镇音译为“摩诃”。自己园称为“摩诃山园”，纪念我国唐代诗人兼画家王维（字摩诃）。不难看出他怀念祖国与故乡之心的深切。

园落成之后，张大千全家即迁巴西，一住 17 年之久。

在张大千身居巴西怀念故乡的同时，祖国大陆的友人也在思念他。50 年代初期，文艺界的思想斗争接连不断。“批判武训传”开其端，接着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继其后，又有“反胡风”。这时虽然还未触及中国画界，但对张大千却有种种议论。有说他“破坏敦煌文物”，有说他有三妻四妾，生活糜烂，也有说他去国外是叛国……总之都是不利之词。但了解张大千为人的几位朋友，根本不信这些人的说法。

1956 年 10 月，北京画院在京成立。庆祝画院成立，美协副主席叶浅予与谢稚柳、于非闇、刘力上一起在“思成居”吃饭。四人中除刘力上是张大千的门人，余三人都是大千的好友。谈起大千在海外，举座为之不欢。饭后，叶浅予建议于非闇以老友身份写篇《怀念张大千》的文章送到境外发表，后来真写成了，发在香港《文汇报》上。文中谈到他们四人的聚会，谈到座中缺大千的不欢之态，临风怀想，希望他能回来参观，看看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

新成立的北京画院，仅任命副院长，于非闇就是副院长之一，空缺着的院长位置等待张大千来补阙。所以友人们劝他回来。于非闇这篇文章传到海外，张大千可能是看到了。1957 年春天，张大千托一位印尼华侨捎口信给中央一位领导人，说他想回来看看。这位领导人把消息很快转告美术界的负责人，叶浅予也听到此事。大概是答复还没有作出来，“反右”就开始了，海外为之震惊，张大千由迟疑到最后断了回国的念头。叶浅予曾不无遗憾地说：“并不是张大千不想回来，而是我们的政策多变，政治运动不断，吓得他不敢回来。”有人接着问：“如果张大千当时回来了，结局会怎样？”叶浅予无奈地笑了笑，那就难说了，结局不妙是可以肯定的。即使他能躲过“反右”也躲不过“文革”。

张大千去国远游，又是 20 多年过去了，已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何处是家处处家，其实他是周游世界，他的画展曾在二三十

个国家巡回展出，几乎是一年一个国家。足迹遍及欧、美、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着实地宣扬了中国文化。而他那挽袖挥毫、落笔拂须的神态，确也堪称一位表里相符的中国“文化大使”。

还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张大千周游世界各国，在有些国家又住得那么久（如在巴西），但他从未向居住国提出过入籍要求，他始终保持着华夏子民的身份。

张大千住巴西“八德园”期间，虽园林宛如故乡山水，但他总觉得是寄身异域，心境不佳。他曾告诉台北报人谢家孝说：“巴西好地方，可惜太寂寞！”流露出海外游子的孤凄情绪。

张大千自1969年自巴西移居美国后，7年中频频去台湾、香港，以此稍解故园之念。他曾向友人坦言：“在国外我并不快乐，就像大海里浮动的木块，不知此身系于何处！”台北老友蔡孟坚到美国去看他，他又畅谈心事，说：“我住在美国这几年，总觉得身体不舒服，可是一回到台湾，即精神百倍，就没有这里不舒服那里不爽快的害病感觉，有人说我害的是‘思乡病’，我从来不否认！又有人说台湾太热，对我这个怕热不畏寒的人不适合，请问我们中国大陆气候，哪一省夏天不热？多是又湿又闷！我在台北过夏天，热季是较长，可是如今生活水准高，家家有冷气，我也感受不到热有什么威胁。”这番话显然是他想去台湾居住。

“梁园虽好，决非久恋之家。”祖国大陆也一时回不得，终于决定去台湾定居。1976年1月下旬，张大千偕夫人徐雯波由美飞抵台北，正式申请移居。台北当局自然欢迎。他亲自选定台北双溪附近，一块荒废的养鹿场建造新居，取名“摩耶精舍”。房屋在建过程中，1977年5月1日，张大千就率全家离开美国前往台湾。当日到台北，老友张群等人到机场迎接。甫下飞机，他就对众人说：“我好想家乡哟！回到台北真好！”

1978年8月，“摩耶精舍”落成，张大千一家喜迁新居。

1982年3月初，一位美籍人士从长江三峡入川访问后，到台

北来访问大千，赠送了一份他渴望的珍贵礼物——一包“故乡成都平原的泥土”。手捧泥土，他热泪纷纷下，并把泥土供奉在先人灵位前。一勺水、一撮土，只要来自故乡，无不牵动张大千的心。80年代初，张大千已临人生大限。他已过了80高龄，这些年常有子女或子侄从大陆出来到香港或到美国，想到台湾拜见老父，可是不能如愿，只能用越洋电话互诉思恋之情，常使他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伤心欲碎。大陆也常传来一些老友过世的消息，如1982年4月，张伯驹的去世，他伤心不已。

张大千的人生之旅，终于停止在1983年4月2日，终年85岁。

大千诗多是何时？

梅笑（口述） 德润（整理）

古人有“人穷诗愈工”之语，亦有人曰“人到穷愁诗更多。”张大千先生何时诗最多呢？

1950年2月当大千赴印度，5月到达大吉岭，于德里缺粮、夫人临产、画展无门、售画无着，面临进退维谷境地。而临在这时，他却得诗最多，达百余首。他在一幅《山水人物图》上题有诗句：“江南莺乱草如茵，正有观河面皱人。对此茫茫真百感，当时亲见海扬尘。”又在《看山图》上题云：“檐前树包垂荫重，屋角溪流涨岸新。只是闭门无好句，斜风细雨过残春。”在《拄杖听泉图》上有诗曰：“松云影里涛千尺，杖屐人扶花一丘。长物随身浑已尽，看山留得两青眸。”正应验了“人到穷愁诗更多”的哲语。其中还有一首自嘲诗云：“穷年兀兀有霜髭，癖画浮生老复痴。一半自嘲还自喜，断炊未废苦吟诗。”另有一首题《觅句图》诗曰：“乍引清商梧叶秋，凉飈吹裹发吟讴。寻常摘句雕虫事，归去西窗下玉

钩。”（此诗脱化于李贺“文章何事老雕虫，残月西楼下玉钩”句。）其诗后跋：庚寅岁，自春徂秋，卜居大吉岭，登眺为乐，闲作小诗，聊以自唱，偶点奚囊，得诗百余首，因写《觅句图》，以记其间一段因缘耳。由此可证，正是此时作诗最多也。

也正是此时，大千先生对家、国的沉思，心境是极其复杂矛盾的，曾有枕下隐诗曰：“泣露飘霜堕月疏，鸣虫回梦四更初。家书压枕啼痕满、客鬓摇灯病废除。”家书为啥压枕？可见其心绪沉痛矛盾。一个飘零异乡的画家，饱受生活鞭打、别乡离愁，岂止是“啼痕”而是“伤痕”。他面对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高峰凄怆吟出：“浓绿堆鬟尚嫩寒，春来何处强为欢？故乡无数佳山水，写为阿谁着意看。”更衬托出他眷恋故乡春天的沉笃深情。

海外寄情

张心瑞 萧建初

（杨国钦，被四川省和内江市人民政府授予“川菜大师”、“内江名厨”称号。现为全国餐饮业国家级评委、国家级裁判员、高级技师。他编著的《张大千风味菜肴》一书，多次荣获省、市、区三级科技成果奖。再版时，定居美国的大千先生长女张心瑞、长女婿萧建初，特给该书为序。其亲笔书法，又成为大千美食艺术中的一幅珍贵艺术品。现将原文志录。）

国钦先生将先父大千风味菜肴整理成文，公诸于世。兹将再版属为之言。先父一生致力于祖国绘画艺术，不饮酒不吸烟不玩牌，唯饮清茶。笔砚之余，或自制菜肴与家人并二三知交共食，不喜赴大宴，不喜去一般餐馆进食。在京时常与亲友家人吃谭家菜，冬季亦去西单安儿胡同吃蒙古同胞经营之烤牛羊肉。先父一生好

游名山大川，足迹遍祖国大地，所到之处既以笔墨摄取风物之胜，复品尝当地风味菜肴，久之吸取各地风味之长，以更适合自己口味，形成大千风味菜肴。先父调羹要求色、香、味、形四字，曾有一长辈之夫人善美食，一日以肝膏享先父，问何如？曰味则美矣，惜貌欠佳，问何故，曰蒸肝膏之笼或系金属盖，蒸气上升盖上，凝成水点滴於肝膏表层，遂成凹凸不平雨点状，如以两层纱布覆盖内，即可免去。又如制香酥鸭要求酥脆而嫩，然每易酥脆而枯，并以生菜垫鸭身，四周不另加花、生菜。与鸭肉同时入口，味尤鲜美。先父制菜肴不喜花架子，因系家人与故旧共餐，非盛大宴会必须以隆重为第一也。

国钦先生精於美味佳肴，享誉海内外，不断培育新人，为弘扬民族文化作出巨大贡献谨志景仰。

辛未年初夏 张心瑞 萧建初

张氏“大风堂”名由来

王德润

张氏（大千、善子）“大风堂”名之来由，众说纷纭。

其一，“大风堂”取自汉高祖刘邦之“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之大风歌。

其二，已逝内江籍老画家廖泽龛生前曾说，张善子之画虎是偶尔受其师一次笑谈的启示。其师湘人曾熙（农髯）有言：“求食者牛不如鼠，鼠不如虎，何也？牛服田力而耕，以劳易食、鼠则窃取仓廩，无人犬之忧，长养其子孙。而虎居深山，踞大谷，上扑飞鸟，下瞰野兽，何求而不得焉？”古人有云：“云从龙、风从虎”。张氏擅养虎、画虎，故画室乃称“大风堂”是也！

其三，张氏仰慕明末清初大画家张风，字大风。张大风，江苏上元（今南京市）人。崇祯生员，明亡弃举子业。家贫、常居佛寺。擅画山水、人物、花卉、亦工肖像。早年风格恬静，晚年笔墨瘦挺放纵，兼工刻印，能诗词。张氏崇敬“张大风”而命画室为“大风堂”也！

近年，笔者走访大千先生四兄长张文修之子——张心端（医生），心端回忆其父生前曾多次为他们摆谈“大风堂”名，是缘于大千弟兄崇敬“张大风”之故而取名“大风堂”的。由于多次走访心端先生，故坚信其三也！

中华男儿志气 书画百年人生

——读晏济元老人一封书信想到的

张麟 张平中

本人可算三生有幸，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收集到晏济元老人的一封书信。这封信有信封、信笺，有头有尾，还有邮戳，可谓完整无缺。写这信的时间是8月5日，盖邮戳的时间是1993年8月6日，此信投向地点是政协“内江市委委员会”，收信人是“余农治主任”，寄信人地点姓名是“重庆晏付”。很有意思啊，这不是一封普通年龄的人的信，这是当年93岁的晏济元老人给当年93岁的老朋友余农治老人的信啊！

晏济元老人是四川省内江市白马镇（原内江县茂市镇）万福场尚腾湾人，1901年生。他童年受教于父，学习诗文书画，并得到内江名人张曲斋、邱特澄书画指教，后来继续深造，毕业于成都机械专门学校，就读于上海中华工学院，后留学日本，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在院校学习期间，书画活动不断。新中国诞生后，受任于重庆民航工程师、重庆工业局工程师。他是重庆市政协委员，重庆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内江分校名誉校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现居重庆。他今年已是102岁的老人；但他精神矍铄，身心两健，笔耕书画不止。他的书画作品在国际国内展出场次颇多，早已闻名国内外，他是全国著名的书画大师。余农治老人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江市委员会常委，是内江市著名的书法家。

1993年，我在四川省内江文物商店工作，在商店的业务活动中，就安排过要设法通过内江的余农治老先生和梅晓初等老书画家，组织晏济元老人的书画作品到内江、香港、台湾和国外展销

的活动，特别是余农治老人，想在内江新办一所“培伦学校”，他与晏老关系很好，想约晏老搞捐献书画作品展销，集资办学。晏老是内江人，对家乡情深，对家乡要办培伦学校，又是老朋友余农治的约请，自然是乐意的。因此，就有余老、晏老为捐献书画展销的通信往来。我曾同另一同仁受文物商店经理的委托，在内江的余农治和梅晓初等先生之间活动，也曾去重庆晏老家活动过。后来晏老从外地来内江，住在内江宾馆，也曾到内江文物商店来看过。还应邀与文物商店工作人员合影（我保存有照片），当时经理不在家，就由我代为操办接待晏老的有关事宜。后由我亲自护送晏老及其随行人员回重庆他家。晏老给余老这封信，是余老亲自送到文物商店经理手中的，经理给我们讲过这封信的事，此信是由何人收存，我不知道。事隔几年后的现在，我才收集得看晏老这封信。我收集到这封信一看，是和晏老在1993年给我的信函一样笔迹，因此，认为是晏老的亲笔手迹无疑，我高兴不已，非常珍爱。

信原文：

余老 得八月二日来示 感甚

关于为培伦学校募捐一事，有台陈某支持协助，是最有利的条件，不过须得有本人信函或支持的意见与办法等，并能够号召落实几位有力的人士从中为力，可作进行的计划，否则要好好考虑。

我的意见，同意余老的指示，前去广广眼界，很好。要在台湾参加义卖展出，可以参考我前次在粤同香港一慧雄集团公司卢中圣总经理协商为希望功成（工程）义卖的方案进行交换意见较可。

其主要条件一，由该公司主办，邀请作者前去义卖展出，所有一切费用包括参加展出的随行人员往返的机票交通和食宿等费用，全部由该公司包干，并包括作品的销售全部办法。二，收

人的金额双方分成的办法和比例定为五比五，作者不负担任何支付费用的负担，特提请参考。

至于文物商店出国展销，似与作者出国展出的情况有所不同，性质和意义都不一样。意思是我的看法。不知尊意以为如何，乞教幸甚谨此不（ ），顺候道安。

晏济元再拜八月五日

晏老的这封信，一共是 357 个字，字字是艺术大家的风度，他虽然是一封普通的信，而不是一幅书法作品，但是，我觉得他正是一封普通的信，才会写得那么自然随意，通过这封自然随意的书信，我们更能感受到晏老书法的功底和艺术特色，才能感受到晏老书法的飘逸洒脱的风格，他行笔自然流畅，神采而富风韵，看起来妙趣盎然，高雅脱俗，这就是所谓“不求工而自工也”，他是“不是书法作品的书法作品”。看着这篇普通书信的书法多美呀。

从这封信的内容看，是晏老回复余老“关于为培伦学校募捐一事”，晏老说：“同意余老的指示”，同时，信中看出晏老要求具体可行和可靠的办法，而且晏老信中提出了一个可以参考的方案，即“我前次在粤同香港一慧雄集团公司卢中圣总经理协商为希望工程义卖的方案……”。晏老在信的最后部份说道：“至于文物商店出国展销，似与作者出国展出的情况有所不同，性质和意义都不一样”。这封信中，晏老为家乡办好事的态度非常鲜明：以革命英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喻培伦的英名为校名他赞成；拿他的书画艺术品去义卖，收入捐献办培伦学校，他赞成。至于文物商店要他拿作品出国展销；“性质和意义都不一样了”，他就不同意了。由此可见晏老是很注重性质和意义的。在这里他讲的性质和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他的书画作品是艺术品，为着家乡办好事，为人民群众办好事，为国家办好事，他就愿意拿书画艺术品去义卖，作捐献。这种一切为家乡、为人民、为祖国的高尚情怀和艺术家的风范是对“性质和意义”的真正诠释。

这封信反映出两位老人，想为家乡做些好事的精神多么可贵啊，特别是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无不体现晏老思念故土，热爱家乡的心情，愿以自己心爱的书画作品义卖捐献办学的崇高精神，真令人肃然起敬，这封信不难看出晏老的思想境界，多么开阔，多么坦然。特别要看到，他是一位见义忘利的人，他一生热爱书画艺术，而不以书画卖钱发财，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可是，他从来就是一位以国家、民族、人民利益为重的人。人们常说，通过一滴血的化验，可知这人全身的血型，从晏老这封信所展示出的精神境界，我们受阅历和水平限制，不能随意提“看晏老一生”，但是，从晏老一生中我们知道的点滴事迹就可以领略到晏老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而捐献书画的可贵精神，也就够我们学习的了。

1921年，20岁的晏老，在成都基督教青年会学习英语时，英国侵略者炮击万县，杀戮焚烧，酿成万县流血惨案，当时血气方刚的晏老，义愤填膺，发动全校同学抗议英方暴行，忍痛放弃英语学习，立即向校方宣布退学罢课，以表示对英国侵略者的抗争。晏老这种敢于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民族精神多么可贵啊。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晏老对日本侵略者极为愤恨，于1932年同何香凝先生以鞭挞日本侵略者为题，合作山水，花卉多幅参加上海抗日募捐展览，为抗击日寇贡献自己的力量。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寇疯狂进攻中国，当时在日本留学的晏老，心情非常沉重。日本一中文教师加藤太郎想诱惑晏老为日寇卖命，借机亲近、诱劝晏老迁住其控制的校内住宿。晏老看穿敌人的阴谋之后，力谋脱险之计，并及时与在北平的张大千先生取得联系，晏老以去北平画展集资，弥补学费，再回校读书为由，拒绝迁住校内，加藤信以为真，于是晏老得以安然回国。舰到天津码头时，大千先生已到码头等候。立即迎往北平罗贤胡同大千先生住地。脱险回国的晏老与老友重逢，心情格外高兴，畅谈脱险经过，大家都欣喜若狂。

1938年日寇占领我北平后的一天，日伪某校派专人为大千先生送来聘书，敦聘大千先生担任主任，实质是日伪势力网罗贤达，支撑局面，晏老得知此事以后，认为事关正义与民族气节，便力劝大千先生及早离平，大千先生深以为然，于是，二人遂商议离平良策。后来他们巧妙的离开了北平，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1938年底，正当全国人民抗日救国如火如荼的时刻，晏老和大千先生，又为抗日救亡，在重庆交通银行，一起参加抗日募捐书画展览，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

1949年12月，重庆解放，49岁的晏老，立即参加到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行列，中国民航重庆局聘请晏老为其所属局的工程师。

刚解放不久的中国人民，正开始重整河山，建设新中国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使中国人民处于唇亡齿寒的境地。为此，中国人民掀起了抗美援朝的热潮，1951年的晏老，以自己的心血和高超的书画技巧，绘成的书画艺术作品三十余幅，参加重庆举办的抗美援朝捐献画展，将参展所得毫无保留地捐献给了国家，这种无私的精神多么可贵啊！

196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诞辰七十周年，为了让毛主席高兴，晏老精心绘制了一幅大山水《红日青松图》，并题：“光佩四表，万寿无疆”。深受毛主席喜爱，并获得了好些中央领导同志和文化界的好评。

1979年，晏老应文化部中国画创作组邀请，作画五十余幅，丰富了中国画的宝藏。

1984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晏老为北京人民大会堂作六尺中堂荷花、山水各一幅，蔚为壮观。

1985年，为四川诗书画院作山水、书法各一幅，获得好评。

1986年，为抗日胜利四十周年，作书法一幅在重庆展出，后由重庆博物馆收藏。

同年，为重庆市灾区义卖，展出作品五尺山水画一幅。

同年，晏老回家乡，应内江县要求，他满怀激情，饱蘸浓墨为内江县政协作书法一幅，为中共内江县委作山水画一幅，并题诗曰：“卅载离家此日还，山色依然景物迁。不辞更酌黄花酒，乡语殷情话昔年”。这诗的乡情多么深厚啊。

1990年，庆祝北京亚运会开幕，晏老为香国诗书画协会写《墨竹》中堂及对联各一幅，获得公众好评，并获亚运会纪念章。

同年，向重庆残疾人基金会捐助作品三十幅，对国家的助残活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92年，晏老去广东清远县作扶贫义展，作书画多幅相赠，推动了扶贫工作的开展。

另外，晏老先后为董必武、徐悲鸿、康有为、陶行知、白居易等纪念馆送书画十幅；为乐山大佛寺、自贡恐龙馆等旅游区和有关单位、部门送书画164幅。

以上的抗日募捐、抗美援朝捐献、助残、扶贫活动义展五次，以及敬献、赠送书画作品，粗略统计是319幅以上，这些作品都是晏老亲手、精心创作的艺术品啊，这些作品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枝一叶，一招一式，一笔一画，一字一句，一点一横，莫不出自晏老的高手妙笔，莫不饱含晏老的心血和情趣，这一次又一次的募捐、捐献，无不反映出晏老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无比憎恨，一次又一次的助残、扶贫、赠送，无不反映出晏老对国家、对人民的崇敬和热爱。一个人的力量再大，总是有限的，但他能够为国家、为人民的事业，尽到最大的努力，就算是了不起的。晏老捐献、赠送的数量是够多的了，是他尽了最大的努力，能拿出来的最大的数量了。要是全国的干部、知识分子都能像晏老那样扶贫、助残，为国家贡献，可就好了。特别是晏老的精神，将鼓舞着广大人民群众，将产生出不可估量的力量。晏老这些艺术品，是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给人们以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1993年，我和一位同仁、代表内江文物商店去重庆看望晏老，晏老非常亲切地接待我们，他把珍藏的字画和文物给我们欣赏，如端砚、澄泥砚、宋代瓷器、昭陵六骏之一的“拳毛騧”雕塑拓片，并有于右任先生171字的题跋，实在弥足珍贵。还给我们看有张大千先生书赠晏老的《尚腾山庄》书法一幅。这时，晏老还风趣地说，我老家的小地名叫“尚腾湾”，这四个字是不能卖的，不能出卖家乡啊！晏老还带我们到阳台和利用别人空屋顶培植的花园参观。晏老培植的盆景很有特色，特别是他饭厅过道边的一件盆景，使我久久不能忘怀。一个椭圆形的浅底花盆，内置一座很别致的小石山，山上长有细细的小草，靠石山旁栽有一窝翠竹，其中一株挺拔直立，其尖端略有一点小弯，枝叶嫩绿繁茂，这盆景的组合物的高度、大小、比例适度，构图非常艺术，我看后觉得美呀，绝呀。晏老1992年的一幅《竹石图》，可能就是源于这个盆景吧。看完后我们回到画案前，我那同仁开口，要求晏老赐墨宝一幅，晏老听后试探我那同仁，是作什么工作的，似乎是好考虑写什么内容为好。同仁说，退休多年的教师，于是晏老欣然命笔，写了一幅七绝行书相赠。

我在参观晏老的家庭时，边看边在想，晏老当年是一位93岁高龄的书画大师，该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吧。水平那么高，作品那么多，书画作品那么精，收藏的字画文物那么多，那么珍贵，送那么多作品去募捐、捐献、助残、扶贫，送那么多给国家、单位去陈列展览，他应该是一位富有者，他的生活应该是与从不同吧，住房该是别墅或什么大厦的。可是，晏老的住房是很紧小的，当年他和夫人潘毅老师加上他们的老大，住在不到70平方米的四楼上，画室摆了画桌，两面就不能对面过人了，画桌也不到三平方米，生活用品，家俱设置，只有我们内江中等偏下的职工家庭水平。穿着也很大众化，晏老不吸烟，不喝酒，不喝茶，三餐饭的要求也不高，平时饿了就咬几块饼干，喝杯咖啡。我们从侧面

听说，他还欠了一定数量的债。实在的，当时我就想起《论语》中，“子曰：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当时我们想到，晏老为国家、为人民，想得太多了，当然也应该，他也心甘情愿。想自己，想家庭，想得太少了，这就不该了。不该又有何法呢？看样子，他心灵上是满有趣味的，那样的生活，他已经满足了。从我们肤浅的观察和了解，晏老的性格是开朗的，豁达的，乐观的，无忧无虑的，涵养是高深的，他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不与人争高低，待人是和蔼、善良，生活上没有多高要求，不冷不饿，快活的过，就已经可以了。今年已进入 102 岁的晏老，以他的思维和体态，只像六七十岁的健康老人那样。晏老的高龄长寿，恐怕就在于他的性格和爱好，加上他会生活而铸成的呢！

晏老自 1930 年 29 岁起，开始参加国际、国内的书画展览，到 2001 年，据不完全统计，参加国际、国内展览 14 场，两人联合举办书画展览 4 场，个人举办展览 23 场。其中在国外展出的国家有德国、日本、伊朗、美国等六个国家。晏老的书画作品，出版发表的单行作品 19 件，发表诗、文作品 2 件，出版发表了第一集《晏济元书画集》，电视台对晏老作电视宣传介绍 1 次，重庆市电视台制作播出三集专题片《国画大师晏济元》。晏老的书画艺术作品的宣传，对我们国家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将起到一定的作用。稍觉欠然的，是内江的乡亲们还没有看到晏老的书画艺术作品在内江展出。

晏老的书画作品，深受国际、国内的欢迎和高度评价。张大千先生赞誉晏老的画“运笔清润，作家士气兼到也”。朱德委员长看了晏老的书画展后称赞道：“海外有个张大千，国内有个晏济元”。老艺术家刘海粟在晏老的一幅山水画上题词，称赞晏老“绝立笔墨畦径，一扫四王习气”的学古敌古创新精神。1993 年晏老的书画作品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展出，效果很好，引起轰动。1997

年，香港回归后，应新华社香港分社之邀，晏老的作品在香港展出，更是盛况空前。1988年至2001年晏老作品先后在上海、汕头、顺德和深圳展出，均获成功。2001年7月14日，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主办的《百岁书画大师晏济元精品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正式开幕。在13日夜间，中国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的消息传来，晏老获悉后异常激动，立即展素挥毫，连夜画出《红日青松图》一幅，送入展厅，以表老人对北京申奥成功的庆贺。这次展出是一次最高规格的展出，轰动全国，享誉世界。展出期间，内江市委、市政府委派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李果青同志为代表，专程赴北京祝贺、慰问晏老，为他送去家乡人民的一片深情。

晏济元老人，在一个世纪的艺术生涯中，同郭沫若、张大千、张善子、于右任、何香凝、谢无量、谢玉岑、启功、华君武、吴作人、陈铭枢、陈铭通、罗国荣、陈宗仁、仇鳌、傅抱石、黄宾虹、刘海粟等交情深厚，他从艺一生，影响甚巨。晏老的书画作品，是诗、书、画、篆刻兼备的艺术珍品，他是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等国画擅长的全能，是开飘逸洒脱之晏氏画风的一代宗师。他的书画不仅在国内（含香港、台湾）影响很大，在美国、日本、新加坡、伊朗等国，也有广泛的影响。晏老的书画作品，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晏老出生在内江书画之乡，是书画之乡润育了他，当然首先是晏老的书画之家养育了他的成长，现在，是晏老以近100年的经历，用精湛的书画艺术和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奉献精神，使书画之乡——内江的美名更加响亮。晏老可亲、可敬、可爱。还有，更值得高兴的，是今天的晏老，身心两健，吟诗、作画，不减当年。至今写字作画、笔耕不止。他还赴外采风，写生集景，102岁雄心不已，还在书画艺术高峰上不断追求，为内江书画之乡作出更大的贡献。

就是晏老给余老的这一封书信，使我联想到我所了解晏老以往的一些事，写了这么一些。可见晏老这封书信的基本思想，基

本精神，和他一贯的思想是一致的。这封信本身，不牵涉张大千先生，但前面写的内容，又牵动了大千先生，甚至还牵动内江这个书画之乡的史实，因此，我还在这里赘述几句。

晏济元老人和张大千先生同是诞生在书画之乡的内江，他们两家老一辈又是莫逆之交。晏老的家是世代书香之家；门庭静雅，楹联绘画满屋，藏书、藏画颇丰，其父辉廷公是前清诸生，长于书画治印，也是书画之乡的名人，经营农耕和糖业生产，经济还算好过。晏老六岁开始读书，受教于父，学习诗、文、书、画。大千先生世居内江县城，其父怀忠公初通文墨，经营盐、糖生意失利，家境清贫。其母曾友贞，是县城中有名的“张画花”，绘画各种花样图案出售。大千先生七岁开始在家读书，也向母亲学习绘画。1909年春末，晏母病重，张母到晏家探望，大千先生随母前往。晏老和大千先生见面后，因同好书画，于是一见如故。从此常来常往，友情不断。晏老随父进城，辉廷公要先把大千家去玩，办完事后又去大千家接晏老回家。大千先生有时去晏家，两兄弟见面格外高兴，一同玩耍，一同研习书画。大千先生比晏老长两岁，玩耍时点子多，常到溪边捕蟹，树上采果，两人玩起来特别有趣。有一次，大千先生的母亲，专为大千学习写字托辉廷公寻师，辉廷公便推荐大千先生拜门于内江最有名的书家谢保南学习书法。后来大千先生的书体均极似谢笔法。1918年辉廷公去世以后，大千先生的二哥张善子先生托好友邱特澄和张曲斋指教晏老的书画。

1928年秋，晏老赴上海求学，到上海后访问张善子、张大千弟兄，他们分别多年的总角之交，突然见面，欣喜若狂，热情异常。后来晏老就迁住在大千先生靠近的一个亭子间。这里，他们又朝夕相见，晏老深得大千弟兄的支持和帮助。在那里，他们交流书画知识，阅读书法、绘画书籍，广识张家来往的书朋画友，于是他们过从更密，友谊更深。在书画方面，共同研究，切磋琢磨，

他们后来同室作画，同场展出。在日寇侵略中国的日子里，他们是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在对付敌人的阴谋诡计的重大事件和危难之时，他们气息相通，患难与共。并共同拿出自己的书画作品，举办募捐展览，帮助国家赈济难民，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工作。

1941年，晏老和大千先生同住青城山上清宫，晏老住上殿，大千先生住下殿。当时抗日时期，书画纸张匮乏异常，唯以“夹江连四”或“对方”以代宣纸，效果甚劣，晏老和大千先生共同商议，设法去夹江利用厂家原有设备，改造生产宣纸，于是他们托公路局的李雅髯，再求夹江县罗县长相助，介绍给当地造纸槽户。晏老是学工的，便自告奋勇去与厂方的技术人员，研究配方加工，试制宣纸。当时住在槽户石子青家，同他一起研究，改良制造，约半月左右，试产了一小批，并用“大风堂监制”的标号，带回试用，结果觉得效果不错，由此，遂稍稍解决了用纸的困难。这就是后来夹江生产“大千宣纸”的来源。

1947年，晏老在成都少城公园举办个人画展，大千先生得知以后，即刻前往观看，看后非常高兴，他们略叙别情后，大千先生即在晏老的《瑶台濯玉》一画上题词称赞：“运笔清润，作家士气兼到也”。

同年，大千先生在成都举办了“康巴西行纪游”画展后去上海。晏老与大千先生二人从此分别，谁知竟成永别。这两位书画大师，总角之交，长达40年，这是多么可贵的四十年啊！

后来，大千先生寓居台湾、香港，旅居阿根廷、美国、巴西，最后定居台湾。大千先生在一生的艺术生涯中，先后赴印度、日本、阿根廷、美国、巴西、法国、瑞典、瑞士、西德、西班牙、新加坡、泰国、吉隆坡、英国、韩国、马来西亚等23个国家和地区举办画展和讲学。大千先生在国际上的画展活动，宣传了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中国，宣传了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中国画，为世界人民认识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有着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的

国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千先生 1946 年曾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美术画展，曾任“中华全国美术会”理事。1958 年，被美国纽约国际艺术协会推选为“当代世界第一大画家”。1936 年，徐悲鸿先生为《张大千画集》所作之序言赞：“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1956 年，大千先生在法国巴黎与西画大师毕加索晤面论画，被国际舆论界誉为“世界艺术界最高峰会晤”。时称东张西毕。可见，张大千先生是我中国一位享誉世界的国画大师。

大千先生的书画作品，我们读得不多，真迹原作就见得更少，但是，就我们见到的大千先生的画作，就觉得无一不是美的，无论是大幅还是小品，是长卷还是斗方，无论是工笔，还是写意，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都是美的。他的一幅画作，是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再加朱印几方，更叫锦上添花。他的一幅画作，无论是书法绘画，还是构图设色，或题款撒印，都有着相互的联系。互为补充，缺一不可。美的画，美的字，美的诗，美的印，构成完美的艺术珍品，可谓人们称赞的“诗书画印四绝”。大千先生是书画艺术的全才，他的作品，不论山水、人物、花鸟、翎毛、草虫，无不纯熟，他的笔墨功夫，颇为高深，真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画笔运用起来，得心应手，运用自如，行笔自然流畅，构图形象生动，他的人物画，形象真实，神情自若，他画的鸟似乎可听见叫声，画的昆虫似正在跳，他的书法得益于谢保南老先生的指教，但他自成一体，有黄庭坚书法的味道，但比黄庭坚的字更受看。大千先生的书画艺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是我们国家人民的宝贵财富，大千先生以他精湛的书画艺术，为我们中华民族赢得了享誉世界的巨大荣誉。

我们深深的感觉到，这享誉世界的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就出生在我们这个书画之乡的内江，光荣啊内江！大千先生以 84 年生命结晶的巨大艺术成就，为内江这个书画之乡，赢得了国际荣誉。

内江啊，内江！多么美的书画之乡，在同一时代就出生了晏济元老人和张大千先生两位书画艺术大师，而且是两位总角之交的艺术大师，不能不说这是内江的光荣，不能不说这是书画之乡的奇迹，不能不说这是历史时代的奇迹，他是中国的奇迹，他是世界艺术史上的奇迹。

注：本文曾参阅内江档案馆编《回忆张大千先生》一书，特此致谢。

学古要敌古 创新要破新

——访世纪老人书画大师晏济元

陈自学

整整一个世纪前，在蜀中小镇内江县茂市镇万家场（现市中区白马镇），降生了一位后来饮誉海内外的书画大师——晏济元。

100年后，这位一生中充满奇迹的老人又回到了这个生他养他的秀丽小镇。

2001年10月24日，101岁的晏老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精力和热情，踏访故土，会晤亲朋，马不停蹄。

24日晚，记者来到飘香园园林饭店拜访晏老时，劳累了一天的他正安坐在椅子上静养。为人豁达谦逊的晏老，欣然接受拜访。但老人家左耳听力有些下降，听起话来有些吃力。不忍心大声嚷嚷地让老人回顾他漫长的人生经历，只简略地请他谈谈记忆中难以忘怀的故乡人和故乡事。

说起故乡，说起亲人，晏老像打开了记忆的闸门，滔滔不绝。

他说，先父辉廷公是前清秀才，家境贫寒，以耕读为业。七岁时，便随父学写字、绘画。七岁那年的秋天，家里为其七姐出

阁办喜事，雇工进屋，彩绘门窗。他觉得好奇，拼命往里挤，想看个明白。一不小心，竟把装有颜色的碗碟打翻在地，红红绿绿的颜色混在一起。父亲大怒，转身去找东西来收拾，并说非打他不可。趁父亲不在跟前，他顺手把地面的颜料顺势涂抹起来，仿佛画出一枝红花绿叶。父亲回来一看，转怒为喜，即对其大伯说：“小弟资质好，他日可以学画，我已年老，恐来不及看到，你当善为培植。”

九岁时，晏母不幸病逝，给家庭带来悲痛和不可弥补的损失。其母在病期间，张大千曾随母前来看望。大千比济元长两岁，彼此一见如故。那时，张家住在城里，晏父进城时常常带着晏济元，将他送到张家同大千玩，待办完事后，再去接他。大千的母亲是位绘画绣花高手，常教他俩合作画画，比如先叫大千画树干、分枝，再叫济元画树叶，俩人所画都很合对方的意思。

晏老说，与张大千、张善子的交往令他终生难忘。二十年代末期，晏济元领着两位侄子去上海求学，善子先生叫他们搬到他家的亭子间去住，从此与大千、善子兄弟朝夕相处，愈加亲近，整日看画、临画、谈心，获益匪浅。1934年，张氏兄弟还协助晏济元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在早稻田大学、日本大学、日本铁道教习所就学。回国后，多次与张大千共同作画并举办画展。

晏济元一生没进过专业美术院校学习，但其集诸家之长自成家法的晏氏画风受到了广泛的赞誉。张大千赞晏公绘画“作家士气兼到”，华君武先生称赞他的画传统功夫深厚，画风潇洒，是书画“大家”……

谈及书画艺术，晏老兴趣甚浓。他崇尚民族性，认为在书画创作中，应该把民族性放在首位。“只有坚持民族性的尊严和民族审美的观点，才能使中国的民族传统立于世界之林。”晏老的艺术主张是：“学古要敌古，以古人为敌，不为古人所囿；创新破新，不可墨守成规，时刻突破日日新，又日新的规范。”

听说家乡的各级学校，举办书法美术班吸引了不少孩子学书习画，晏老很高兴，说内江自古就有此传统。他认为，学画首先要习书，书法是基础，学画是其次。学习书画没有什么窍门，主要是靠自己努力，并以写字画画为乐。

采访中，晏老思维敏捷，谈笑风生，毫无倦意。请教他养生之道，想不到他摆手乐呵呵笑道：“我没有什么养生之道。我一生都以书画为最快乐的事，每得一幅好字、好画，比赚再多的钱都快乐。我是一个无忧无虑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人”。

晏老不老。愿老人丹青常绘春长在，为后人留下更多精美的传世之作。

结束采访时，应记者之邀，晏老欣然为《内江日报》读者题字：“祝家乡明天更美好！”

世纪老人故乡行

李伯廷 王德润

“与世纪同行”的高寿书画大师晏济元老先生，内江人氏。现寓居重庆。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社会福利教科文中心国画研究会理事、中国名人协会会员、重庆国画院名誉院长。曾任重庆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重庆国画院副院长等职。2001年秋末冬初，晏老应家乡党政领导之邀，回到阔别多年的桑梓，受到家乡人民的热情接待和欢迎。在一次座谈会上晏老与党政领导及内江书画名家欢聚一堂。可他又十分怀念久违的世交88岁的老友李伯廷，他专约老友叙旧，追忆抗日期中同在甜城内江开办酒精厂，为抗日前线运输物资的汽车提供燃料的那段迷茫往事。当时虽奋力拼搏，仍步履艰辛。忆记当年，频添愁怅；斗转星移，喜换新天。

两位老人，双手紧握。两张灿烂笑脸，四行滚烫喜泪。李伯廷当即吟诗赠晏老，其诗曰：

共同抗日制酒精，战败日冠建功勋。

沉痛国耻荡涤尽，综合国力势猛增。

百岁寿星诗书画，培育后代一片心。

誉满中外人称道，书画之乡传美名。

晏老以书画摄影等作品回赠。两位老人畅谈离情，依依难别，深切品尝到“相见时难别亦难”的真情实味。

当精神矍铄的晏老回到阔别几十年的生他养他的故里万家乡时，他在泥泞的乡间小道上，健步数百米，眺望绿水环抱碧山，放眼茂林掩映楼房，他慨叹：“变了，变了，一切都变了，老马难识途了！”他并与子女在老家旧居拍照留念。家乡人十分怀念晏老，崇敬他为中国的书画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早在1964年元旦，晏老书画展在北京政协小礼堂展出，朱德、彭真、周扬、郭沫若、陈叔通等中央首长观看了展出。郭沫若向朱德介绍了晏老的书画作品，并有赞诗书赠晏老，其诗曰：

唯有寒流天外来，不教冰雪结奇胎。

东风吹遍人间后，紫万红千次第开。

朱老总也兴致勃勃地为晏老题词，并赞誉晏老“海外有个张大千，国内有个晏济元”可能有的人还没想到，张大千晏济元均为内江人，而是从小在一起感情甚笃的深交好友。无怪乎在20世纪三十年代内江就有书画之乡的誉称。真是为内江人争了光。家乡人热情欢迎晏老并希望他回家看看、走走。晏老激动地说：“早就想回家看看，一直未能成行，这次回家无比兴奋，市领导热情接待，乡亲老友促膝叙旧，饱尝了回到家乡的纯真乐趣。虽然我年纪大了，但仍要雄心不减当年，愿与年轻人一道，为国家、为家乡多作贡献。”

晏老这次回到家乡还为市领导题写了“求实”、“勤政廉明”的

赠言。并为《内江日报》读者题写了“祝家乡明天更美好！”

晏老离别家乡返渝后，又应友人之邀匆匆赴深圳作画去了。101岁的老人仍风尘仆仆，跋涉长途，仍实践着“雄心不减当年”的壮志。祝晏老万里顺风，笑临金秋。

附：晏济元老先生纪年录

- 1901年 生于四川省内江县茂市镇。父辉廷公，母潘氏。
- 1907年 受教于父，学诗书画印，父为前清诸生、长于书画治印。
- 1921年 在成都基督教青年会学英语。
- 1924年 在成都机械专门学校，学习机械工程。
- 1926年 毕业于成都机械专门学校。
- 1928年 上海求学，与张善子、张大千同住上海法租界西门路西成里169号。
- 1930年 以仿古石涛山水《人语响孤峰》一幅同张大千所作《荷花》一幅参加柏林中德美展。
- 1932年 同何香凝女士合作山水花卉多幅，参加上海抗日募捐展览。同年，在上海宁波同盟会馆举办个人展览。
- 1934年 由善子介绍赴日本东京。
- 1935年 在日留学时，以巨幅仿石涛山水画两幅参加帝国美展。
- 1937年 与张大千在北平中山公园“水榭”联合举办画展。
- 1938年 与张大千在重庆交通银行举办抗日募捐联展。
- 1944年 旅游昆明，以写生作品六十余幅，于南屏电影院展出。
- 1945年 在成都中华书局与大千举办联合展出。展出前因病返家，部分未完之作大千代余完成并题款。同年，于成都四川省银行举办个人画展。
- 1946年 经刘禹生介绍与潘蜀新于重庆柏林餐厅结婚，于右任先

生作证婚人。

- 1947 年 成都少城公园举办个人画展。
- 1948 年 昆明南屏举行展出。
- 1949 年 重庆解放。聘为中国民航重庆局所属厂工程师。
- 1951 年 加入中华美术工作者协会，重庆举办抗美援朝捐献画展。以三十件作品参展，将全部画展所得捐助抗美援朝。
- 1954 年 被西南美术工作者协会吸收为会员。同年参加美协重庆分会。
- 1963 年 毛泽东七十岁生日，为其写《青松红日》山水一幅祝贺。
- 1964 年 北京政协元旦举行六十岁以上老人会。朱德、郭沫若、谢无量、陈叔通诸老推荐以作品四十余幅在北京政协礼堂展出。
- 1965 年 卧病在床长达八年余。
- 1977 年 退休后养病在家，重振艺事，再染丹青。
- 1979 年 应文化部中国画创作组邀请前往作画。
- 1980 年 参加省文代会，被推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理事。
- 1981 年 任重庆美协副主席。重庆国画院副院长。
- 1982 年 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同年，在深圳市艺术馆举办个人画展。
- 1988 年 任中国社会福利教科文中心国画研究会理事。
- 1990 年 乌江写生，为时一月。八月去乐山、峨眉游览写生。
- 1993 年 北京军事博物馆举办个人大型书画展，展出作品一百八十余件。访问老友华君武、吴作人、启功等。
- 1994 年 《晏济元书法绘画展》和艺术研讨会在重庆市博物馆举行。
- 1996 年 出版第一部《晏济元书画集》
- 1997 年 由重庆电视二台播出三集专题片《国画大师晏济元》

- 1997 年 10 月 25 日应邀在香港集古斋画廊共展出八十余幅作品，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俊生、外交部驻港副特派员刘鸿晓、汉学家饶宗颐等主持剪彩。
- 1998 年 9 月 3 日在上海美术馆展出。
- 1999 年 元月 5 日在汕头市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展出作品 105 幅。
- 1999 年 7 月 10 日在顺德市天任美术馆展出作品 105 幅。
- 1999 年 9 月 9 日在汕头市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展出作品 80 幅。
- 1999 年 12 月 12 日在重庆国画院展出作品 50 幅。
- 1999 年 12 月 28 日在深圳市博物馆展出作品 80 幅。
- 2001 年 10 月 24 日应内江市委、市政府之邀回到故乡——内江。为内江市委、市政府分别题写“求实”、“勤政廉明”。并为《内江日报》读者题字：“祝家乡明天更美好！”

(李伯廷先生供稿)

难忘画家曾鉴清

任世俊 何舒杰

20 世纪五十年代末，正当内江画家曾鉴清在艺术日臻成熟的时候，没有走出那动荡的“大跃进”，在成都不幸英年早逝。四十多年来祖国飞跃发展、艺术事业空前繁荣，每当朋友们论及艺术，无不称道曾鉴清那种执着的敬业精神和热情诲人不倦的长者风范。缅怀他那严谨、朴实的画风。

曾鉴清内江人，抗日战争前毕业于成都四川省艺专，以画虎著称，享誉甜城内外。抗战时受聘内江女中教美术，是内江文化界最活跃的人物之一。全国解放后，同爱人李淑曼（音乐工作者）一道在成都华美女中教美术，是四川省美协早期会员，在参

与美协的各项活动的同时，曾为一些报刊画过些插画，其代表作有：《和平之音》（国画），《孔雀胆》（舞台速写）等。

（一）

抗战进入四十年代，内江成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商业城市，在此基础上教育也得到空前发展，文化呈现繁荣景象。名噪一时的西安夏声剧社的《陆文龙》到内江演出，湖北汉剧团的陈伯华等名角也来内江献艺，成渝两地各种进步戏剧团体突破国民党的文化封锁，在皖南事变后纷纷来内江开展抗日演出活动。共产党领导的中华剧艺社、中国艺术剧社、进步的剧专剧团，教育部社教三队都先后在内江演出大型话剧《孔雀胆》、《棠棣之花》、《金玉满堂》、《牛郎织女》、《草木皆兵》、《光绪皇帝》、《雷雨》等。党在文化界的领导人司徒慧敏、宋之的，金山等都来了内江。曾鉴清便是这些活动引进者和组织者之一，他几乎全身心投入，跑宣传、组织票务，并通过和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同地方当局取得调合，从而使演出得以顺利进行。

曾鉴清是个勤奋、进取，有追求的画家，善于从兄弟艺术中吸取营养，又不沿袭古人走过的道路，长期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写生，练就了他过硬的艺术表现手法。为了扩大话剧艺术在内江的影响，他曾为话剧《孔雀胆》画了一组特写，这幅速写立意新，构图新，线条流畅多变，人物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看起来自然和协调，堪称一绝，剧社艺术家们赞叹不已。使随社美工师、著名艺术家郁风十分惊异和赞赏。

“中艺”的艺术家们在内江演出时，盛况空前。人人争购剧票，街头巷尾到处都可听到人们议论演出，甜城内外，一片沸腾。为扩大演出影响，内江文艺界特为他们来内江演出编辑特刊出版，曾鉴清的《孔雀胆》舞台速写入选。但由于当时印刷设备落后，无法用照像制版影印，如用石印，则必须将原件速写进行再处理，按绘画线条转画的功夫画成木刻版画，再将画稿用药水纸画在石刻

上，一般印刷工人是无法重现原木刻版画效果。最后，还是曾鉴清亲自上阵操作，克服重重困难，不分昼夜工作，终于使《孔雀胆》速写呈现在特刊上，并赶在“中艺”离内前出刊，随票出售，该刊内容包括剧情简介，导演、演员签名，人物速写，演出场景。特别是曾鉴清那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人物速写跃然纸上，更难得的是黑白的木刻效果，给人以难忘的艺术享受，人们无不以争得一份留作纪念为荣，这真是内江艺坛值得大书特书的盛事。笔者在后来的岁月中，偶然翻得这一特刊，仍常爱不释手，并引起美好的记忆，惜乎至今对珍藏过的这份文献，已难觅片纸文字的踪影了。

(二)

为了活跃内江文化市场，扩大艺术交流，拓宽人们的艺术视野，曾鉴清以艺术家的身份，联络内江有识之士，通过各种渠道，八方活动，引进和组织过许多艺术活动。画家徐悲鸿、柯璜、沈逸千，丰子恺、梁中铭三兄弟，郁风、黄苗子等都先后在内江的信立商店举行过画展；上南街的福音堂也成了内江人民的音乐厅，在这里举办过男高音歌唱家蔡绍序教授的个人音乐会，歌剧学校教师刘甦三人音乐会，女高音陈白健个人音乐会等。同时他还邀请电影艺术家史东山等在内江国民党县党部礼堂（现市总工会内）举办过电影、话剧艺术讲座，听众十分踊跃。这些活动带动了内江文化活动的开展，一时间像江声合唱团、春秋合唱团、京剧联谊社、沱风剧社、内女中剧社等这些新型文化团体如雨后春笋，十分活跃，演出频繁，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

曾鉴清性格开朗，对人诚恳、热情好客，广交艺术界朋友，在内江人缘很广。他一生酷爱艺术，对各种艺术活动参与并非常投入。他为艺术家们亲自联系场地、跑票务、动手宣传，协调地方各派势力关系。他亲身接待来内江的艺术家们，陪他们参观内江的名胜古迹，接他们去谢家坝桔子林野外郊游，参观他哥开办的

酒精厂，气氛活跃热烈。像表演艺术家金山、项堃、谢添、张瑞芳、吕恩、秦怡、导演应云卫、艺术家司徒慧敏、兰马、画家郁风、丰子恺、沈逸千后来都成了曾鉴清艺术上的挚友、良师。笔者有幸多次相伴，曾鉴清活跃在艺术场上的身影，至今历历如在眼前。难怪朋友们都称赞曾鉴清有孟尝君之风。

(三)

作为爱国主义画家的曾鉴清，主张“画以致用”，“到现实生活中去寻找创作素材”，“要画人民大众看得懂的画，只有人民喜爱的画才是真正的画”，他反对闭门构思，独自在画室异想天开，让人们猜测的画作。他坚持到农村，社会各角落去写生、寻找创作素材。代表作《和平之音》便是在这种观点支配下产生的佳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经过八年艰苦斗争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亲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参加和谈，共商国事，这一壮举激发起画家的爱国情怀，奋笔画出了长卷国画《和平之音》。画面右方是一个古装仙女，但不是人们常见的嫦娥和七仙女的服饰，而是身着西洋式着地折叠白色长裙，上身半短袖衣，袖口花边图案装饰，外披紫红色短披衫，胸挂珍珠项链，各色宝石连贯其间，眉目秀美，面含微笑，口角微上翘，平静而凝神地坐在石上，纤手正弹着长弓形的竖琴；画面左方，则是虎豹狮象众生灵，伏地平静地仰望着仙女，聆听仙乐“和平之音”，表达了世人对和平、民主的渴望和追求。这就是曾鉴清所追求的、心中崇尚的和平女神的化身，那是一种多么令人响往的佳境。

这幅画立意新，构思独特，其画法工写相间，画面众多野兽的处理，以小写意点染而成，看起来自然和协调、生动，寓意深刻。这是曾鉴清用国画形式表现重大题材的新尝试，对传统国画技法有所突破、发展，体现了曾鉴清的绘画独特风格，是他的成名之作。

(四)

解放前，艺术教育在学校不被重视，教师均以放羊式的教法应付教学，学生也不认真学习，曾鉴清一到内女中任图画教师就感到任重道远。他曾向学校面呈自己的美育观点：“美术不仅美化生活，还可开发智力，启发人们思维活动”。经校方同意，他亲手选编了《国画教学参考题材》，教材选用了中国古典图案纹样及近、现代装饰图案的组合图例的构成等，并配以文字说明，同时还附有动、植物素描及人物造型，供学生业余创作参考、借鉴。

曾鉴清的课堂教学，都是根据中学生的实际情况，循循善诱，讲课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强调示范与自学相结合，主要学用并进。上课时他首先展示图案纹样的放大件，结合图案纹样的构成和组合以及装饰纹样的特点和选材，取舍、夸张、简练等表现手法，加上图案的变化、组合、运用，通过生动通俗而又风趣的讲解，示范，引导学生循序渐进，收到很好的效果，受到了广大学生的爱戴。学生在当时的壁报上把刚学到的图案组合中的二方连续构成的带状花边图案等得到实际运用，并起到很好的装饰效果时，同学们莫不欢欣鼓舞，学习美术的兴趣倍增。

现在，许多老校友还能忆及曾鉴清老师讲到图案的四方及多面组合的大面积运用到印染图案的设计处理时，结合数学的几何图案的变化时的情境。同学们在学习进取中露出的兴奋喜悦常常和曾老师的循循善诱、妙语横生融为一体，从而激发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

在教学的同时，曾鉴清非常重视开展校园戏剧活动。1943年冬，在校方开明人士支持下，他同爱人李淑曼一起主持排演了抗日话剧《野玫瑰》，他自任导演，亲自作舞台设计，李淑曼负责剧务，两人亲密合作，克服各种困难，在还不算开放的內江，在內女中礼堂首次出现男女同台演出的话剧，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盛况空前。笔者有幸被邀观看了首场演出，其情景至今历历如在眼前。

内女中在演剧活动上开了个好头，接着大洲中学、沱江中学、内江中学等校也陆续自发地举办一些演出，丰富了学校文化生活，从而改变了过去学校那种死气沉沉的学习空气，这一变革、探索者曾鉴清是功不可没的。

(五)

曾鉴清一生酷爱绘画艺术，饱读中外名家佳作，可谓画贯中西。不论国画、油画、水彩无所不窥，人物画、山水画、花鸟、走兽也无不涉及，甚至连舞台设计、广告商标也都染毫。他的作品题材广阔、构思新颖、富有新意，他认为：“临摹是为了开拓视野，学习前人技法和表现手段”，“应该在继承发展的基础上，经过独立思考，走自己的创新道路。”

曾鉴清在他绘画生涯中尤以画虎著称。他从小爱虎、画虎，他对老虎的写生，青年时代从未间断过，整天整天地在公园里从各种不同角度观察，速写老虎的各种形态。同时还进图书馆查找历代画虎大师的力作借鉴、临摹，从而积累了很多创作素材。曾鉴清画的老虎动感性强，有个性，粗看似有张善子画法，细审未必相同，从造型、构图、处理上与张画虎不大一样，各有千秋。曾鉴清强调比例、透视、解剖，在绘画技法上以写意笔法为主，细微处才见以工细之笔为主，使人看后感到立意新，构图美、真实感强，一般人都能看懂、接受，深爱，真是匠心独具。曾鉴清所画老虎，时人多珍藏之。

(六)

曾鉴清对各种样式的实用美术也情有独钟。不论是商标设计还是大型广告，戏剧宣传招贴画、油画人像、舞美设计他都进行过探索。他为“中华剧艺社”设计过《孔雀胆》特刊，为“春秋剧社”设计过《雷雨》的舞美和广告，为内女中《野玫瑰》搞过舞美设计，还在大利昌商店附近举办过油画人像展，曾引起甜城

轰动。他为电影院画的《人猿泰山》、《出水芙蓉》的两幅大型广告画，堪称一绝，它不是原电影广告的放大、临摹，复制，而是作者选用影片主要人物头像用特写表现手法画出，从效果上看头像眉目传神，魅力无穷，很有点像古语中的“传神写照、妙在阿堵”。^①过往行人在电影院门前无不驻足留连，不论从那个方向和不同角度看，都会觉得画中人对你默默含笑相迎。欣赏曾鉴清这传神妙笔，真令人赏心悦目。

(七)

解放后，人民沐浴着翻身的朝阳，社会欣欣向荣，人们安居乐业，曾鉴清焕发了青春，现实激发起他的创作热情，除教学外他积极地投身到社会变革的火热斗争中。

有次，曾鉴清受命为当时内江县政府的一次宣传会场设计时画幅领袖像，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当场即兴执笔，将水彩画笔在彩盒上调赭墨色勾好大轮廓，用水彩画法先点染出形象的大块面，然后兼用中国画的水墨写意法，浓淡相间地描出形象的各部位特征，再用重色刻画出五官的细微处，稍加订正全面，用手提起这幅将要完成的毛主席戴八角帽的半身画像审视后，他将相放在画桌上，再画以半圆环形光芒衬托，下方再绘出齿轮、麦穗、用红绶带组成多色装饰图案，一幅庄严、肃穆、庄重的领袖画像告成。看起来大方、美观、简洁、明快、主题鲜明、人物生动，围观的同行无不曾为曾鉴清的画艺喝彩，真正佩服他的艺术修养和娴熟的艺术功底，能在最短时间以最快速度为人们献出生动传神、寓意深刻的领袖画像。

不久，曾鉴清同夫人李淑曼受聘成都华美女中，在成都他除教学外，还积极参与省美协的各项活动，每逢节假日都同省美协的画家们一道下乡写生，从未缺席过；有时他也为报刊作些插图和人物速写，《红领巾》杂志上就时有他的作品。1954年冬笔者从西藏因公务回川，被邀在他家作客，这时他正当中年，雄心勃勃，

忙于搜集素材准备进行创作；我见他身体健康状况大不如前，长期咳嗽，哮喘不止，行动困难，他爱人身体发胖，健康也欠佳，我劝他保重，可他总是信心百倍，精力旺盛地笑对我说：“现在国家为我们创造了这样好的创作条件，我能放弃作画吗？”表示决不放弃写生，仍将继续坚持作画，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为艺术献身的崇高的敬业精神，着实令人敬佩。谁知正当他风华正茂，学有所成，经过长年的素材积累，应该是出作品的时候，不幸英年早逝。这是艺术界的损失，也是艺术界的不幸。让我们永远记着这位画家、艺术教育家、艺术活动家，人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对发展内江的文化艺术、繁荣内江的艺术事业所作的贡献。

后记：曾鉴清是内江画家，英年早逝，鲜为内江人所知；由于历史原因，曾鉴清的作品无法寻找，他1943年为笔者画的一幅老虎中堂也遭“浩劫”，《孔雀胆》速写还是没逃脱灰飞烟灭。我们所追述的都是半个世纪前同他相处间的往事，在古稀之年，记忆锐减，难免有遗漏和不确之处，望曾鉴清家属及生前友好补充、斧正。

①阿堵：顾凯之画人物，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阿堵即这个，指眼珠）

文企结合促发展 书画之乡产业兴

尤再清

居巴蜀之腹地，扼川南之要冲的四川内江，自古以来文风素

著，有着“书画之乡”的美称。在这片青山望不断，绿水流不枯的热土上，源远流长的书画艺术不仅孕育了生于斯长于斯的世界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也陶冶了以追求企业文化从而塑造企业形象的森大员工。以“森林长茂，大业永兴”，“大业从凡始，道德在躬行”为创意的内江森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弘扬民族书画艺术，突出地方特色，找准切入点；遵循艺术规律，营造支撑点；文企产业共发展，培育增长点。自企业创建森大书画院五年以来，不仅推动了当地书画市场的健康发展，培育稳定了当地书画人才队伍，成为扩大内江对外开放知名度和对外交流活动中的重要窗口，而且还是企业办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产业与市场相结合成功运作，取得两个文明共发展的成功典范。

一、突出地方特色，找准切入点

恒古不息的千里沱江环绕着内江城，长流不息，两千年的历史发展不仅为现代内江人留下了建于唐朝的寺庙和古塔，也为内江留下了宝贵的人文资源。在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又尤以“书画之乡”的美誉的文化资源最为丰厚。唐朝盛世的开国状元范金卿出自内江，清光绪皇帝的末代状元骆成骧也生于内江。至近代，更有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著名新闻工作者范长江、著名剧作家魏明伦等等。森大人认识到这是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及可开发资源。这是因为：知识经济时代来临，其新时代的知识经济与传统时代的不同就在于——农业社会是以土地为资本，工业社会是以机器为资本，知识经济是以文化为资本，而企业文化就要在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沉淀中去创新开发和利用资源，去拓展企业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个空间，既有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又有企业依托发展的市场拓展空间。而民族地方文化的发扬光大与企业文化及形象的开拓创新，就是其对接点。对此，森大人认为：唯有民族性才有其世界性，唯有地方性才有其民族性。于是紧紧抓住内江历史文化中“书画之乡”这一可资开发的“大千”品牌

和资源，在文企结合上，以全新的认识，全新的观念，全新的机制，突出地方特色，找准企业文化的切入点——创建弘扬民族书画艺术的森大书画院。

森大书画院于1997年5月落成。它座落在成渝高速公路内江服务区域内，是一座占地660平方米，建筑面积850平方米的一楼一底现代建筑，设有展览大厅、画院办公室、画室、装裱室、画家休息室等，由著名山水画家岑学恭老先生亲笔题写“森大书画院”院名。文怀沙、沈鹏、戴敦邦、白德松、邱笑秋等也分别为森大书画院题字。

森大书画院成立五年以来，主要开展了以下活动：

——1997年5月书画院落成之日即举办了首届书画展。共展出全国七十一位著名书画家的佳作九十八幅，是内江自解放以来规模最大、档次最高、作品最精的书画展览。书画家们集体创作的大型花鸟字画《沱江水暖》，带着大陆同胞的心，内江人民的情，由内江市政协副主席陈栋梁赠与台湾故宫博物院，受到馆长秦孝仪先生亲切接见。此举为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为提高书画艺术水平，扩大知名度，画院广泛联络，邀请了不少省内外各地名家前来指导、作画、交流。1997年7月又举办了庆“七一”、迎香港回归祖国书画展，并相继举办了名誉院长岑学恭、白德松、谭昌容、邱笑秋近作展等。

——1997年10月，森大书画院邀请四川美院国画系老师参观、讲座、交流、现场作画和写生表演，互相交流艺术心得，增进了彼此的友谊。同年12月由森大书画院回访四川美院，向国画系师生赠送“白德松画集”，受到师生们的热情欢迎。

——1999年5月，为纪念张大千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森大书画院经过六个多月的紧张筹备，举办了“爱家乡、怀大千”名家书画展，展出、收藏优秀书画作品百余幅，全国各省均有代表参

展。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周铁农专门为此次画展题词祝贺。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内江市四大领导班子的领导，以及大千弟子、大千亲属、各界人士共四百余人参加了画展开幕式。这次画展使森大书画院盛况空前，成为内江纪念张大千诞辰一百周年活动的重头戏。

——1999年12月，森大书画院院长及九名书画家应邀赴京参加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举办的庆澳门回归马万祺诗词书画展览。次日，参加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澳门厅举办的“迎澳门回归祖国全国百名作家、书法家、画家大型笔会”。森大书画院创作的大幅书画作品《繁花似锦》蕴含了独特的立意，成为这次活动中唯一一幅送给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礼品画，并由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和中国书协副主席沈鹏在人民大会堂亲手赠予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代表。

——2000年6月1日，由内江市委宣传部、内江市文化局、内江市光彩事业促进会主办，森大书画院承办的“内江市首届书画暨艺术藏品助学义卖”活动，共组织作品71幅，当日义卖收入1.65万元全部用于资助内江四所小学近百名失学儿童，受到市委、市政府及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

——2001年9月，森大书画院成功的承办了由内江市政协主办的“四川省六地市政协书画联展”活动，受到参展的乐山市、南充市、广元市、宜宾市、绵阳市、内江市政协领导的共同称赞。

——建院以来，森大书画院以“弘扬华夏文化，继承前辈大业，团结、交流、发展和提高书画艺术”为根本，每月组织一次笔会，书画同仁交流艺术心得、体会，并挥毫泼墨创作作品，合作书画作品数十件，个人创作书画作品数百件。

——建院以来，森大书画院先后参加了全国美协、作协、中国诗书画研究院举办的全国书画名家、著名作家、诗人首届联展；

参加了由文化部举办的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全国书法家、画家精品展；参加了建国五十周年全国大型书画展及张大千诞辰一百周年全国书画作品展，得到了全国各界的好评和赞誉。

二、遵循艺术规律 营造支撑点

森大集团公司的企业文化，坚持以文化活动为主要形式，既弘扬民族书画艺术，又以市场为依托，围绕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争取最佳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文化产品生产开发建设。这是因为：文化产品的开发与一定的社会制度相联系，文化产品是思想内容和物质载体的结合，文化产品要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缺乏经济效益的文化产品，难有社会效益；没有社会效益的文化产品，也难有经济效益。为培育企业文化，将森大集团公司的经营与森大书画院的书画艺术相结合，面向市场，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这不仅是文化事业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客观形式，同时也是将文化与生产力进行综合开发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因此，面向市场，遵循文化自身的艺术规律，力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营造支撑点——抓书画院文化产业的根基，为扩大内江对外开放，培育企业新形象，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画院现存画已逾千余幅，其中包括何海霞，苏葆桢、李华生、戴敦邦、岑学恭、白德松、谭昌容、文怀沙、刘汉、赵蘊玉、黄纯尧、马西光、唐允明、李琼久、公孙长子、邱笑秋、冯健吴、何首巫、傅仲超、胡正伟、姚思敏、王乃壮、周北溪、钱来忠、万一宾、袁晓岑、程大利、王琦、王仲、尼玛泽仁、李焕民等诸多全国著名书画家的作品，也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全国政协副主席周铁农、重庆市副市长甘宇平、中国书协主席沈鹏等众多领导的题字、著名剧作家魏明伦撰联、题词，还有四川美院国画系老师，成渝、北京及内江部分著名书画家合作的书画，可谓万紫千红，百花齐放。

——森大书画院带活了一方书画市场，培育稳定了当地书画队伍。森大书画院凝聚了当地一大批书画家，他们除积极参与和组织各种文化活动外，还致力于个人创作，以求在艺术造诣上更攀高峰。或应邀赴异邦举行个人书画展览；或参加政协书画作品展；鲁迅文学院建院五十周年书画展；或将书画义卖，捐助失学儿童；或参加各项书画大赛，喜获殊荣。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耕耘和无私灌溉，大千故里盛开出了灿烂的艺术之花。

——文化成了森大（集团）公司的产业部分，无形资产对企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书画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虽不能给予企业直接经济上的回报，但优秀的书画艺术作品作为高品味的礼品交流馈赠，在企业的对外活动中超越了物质交流的作用，展现了企业崭新而健康的风貌，使企业在无形中获得了不可估量的效益。森大书画院已成为部分企业和收藏爱好者信任的购画之处，不仅为画家增加了经济收入，也为书画活动增添了活力。书画院收藏各地名家字画千余件，亦是财富之一，对企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2000年6月1日，由森大（集团）公司投资创办的“大千艺术世界”在内江市城区繁华地段隆重开业，亦为森大书画院作品的展示和销售提供了良好窗口。森大书画院将逐渐走上以院养院的自给自足之路。文企结合、以文兴商，弘扬书画艺术、发展文化产业，将是森大（集团）公司在新世纪继续努力的方向。

三、文企产业共发展 培育增长点

弘扬民族书画艺术，在“书画之乡”创立森大书画院，突出地方特色，找准了切入点，遵循艺术规律，营造支撑点，并将文化产品的开发，注民族书画传统和地方特色的内涵，使其有地方个性的特色内涵的书画艺术有了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同时在对文化资源的多重内涵中对书画艺术的文化产品进行有深度的开发，根据市场定位，将文化资源的开发和文化产品的价格放在交

流、馈赠、收藏的范畴上，使其企业在文化资源和产品的开发和经营中，无形的财富与有形的企业形象不断攀升。一方面，紧紧抓住书画艺术这一文化产品所具备的先天资源优势，将企业形象和产品依附了“书画之乡”这一历史文化资源和载体，直接通过文化产品提高企业知名度而迅速的被大众所认同。另一方面，通过文企结合的运作，使民族书画——书画之乡——大千故里——森大书画院——森大集团——文企共发展形成良性循环。这样既为民族书画艺术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又为企业发展文企结合拓展了更广阔的空间，培育文企结合的增长点。

——森大集团公司对大千故里书画艺术的追求。认为内江是大千的故里，有着优越的条件，激发文化艺术人才辈出，应当为家乡书画文化的弘扬作出一定的贡献。1997年，集团公司与内江知名画家陈祥远、刘政权、廖心永、梅英、任世俊、王世贵、张义至、李果青、李明珣等双向结合，联系省内外书画名人，商定了为弘扬民族文化、发展书画艺术提供一个艺术交流和展示才华的舞台。于是，森大集团公司在成渝高速公路内江服务区独资修建森大书画院。

——森大书画院成立以来，有效地扩大了内江市的知名度，提升了成渝高速公路内江服务区的文化内涵，先后有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乔石、曾庆红、李铁映、王兆国、民革中央副主席纽小明、胡敏，以及中共中央统战部、交通部、民革中央、武警总部和省委、省政府、省级有关部门领导在内江服务区停留休息，有关领导在书画院参观、视察后给予好评，接待了成渝高速公路过往的中外游客及各地书画爱好者等数万人次参观。

——有利于培育企业文化新形象。森大书画院如同一面旗帜，用它来团结、融合广大书画家来这里发挥才干、交流艺术、辛勤耕耘，在这条文化的高速公路上奔驰不息；同时，书画文化艺术为企业注入了新鲜的文化元素和特有的艺术氛围，促进员工的文

化素养，思想意识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为企业树立精神文明的新形象。

——书画院凝聚了一批国内著名书画家，森大书画院自成立以来，岑学恭、白德松、谭昌容、邱笑秋、赵蕴玉、黄舜尧、杨守年等著名书画家的厚爱和帮助，四川美术学院国画系、中国诗书画研究院给予的真诚指导，驻院书画师、各名誉院长、顾问的辛勤劳动，把森大书画院妆点得婀娜多姿。为广撷博取，森大书画院联系了全国众多的书画名家，积极举行文化交流活动，参加社会各界的文化活动和公益事业，并陆续请来全国各地的知名画家及文化知名人士，他们是文怀沙、魏明伦、刘国付、何首巫、刘汉等聚集大千故里，以笔墨传情交流书画艺术，成为成渝高速公路上的一道绚丽的风景线。

——对文化进行产业运作，是企业介入文化的切入点。森大集团公司投资修建森大书画院的动因，一要回报社会，二要促进发展。通过组建书画院为家乡文化建设服务，现在森大书院已成为弘扬内江书画文化的主力军。森大（集团）有限公司是在党和国家发展非公有制企业的有利的好政策下，在家乡各界帮助支持下，在全体员工“诚为本，勤作基”，艰苦创业，发展起来的在内江第三产业中颇具实力的经济实体。创业八年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能稳步前进，不断壮大，不仅在于拥有一套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也深深懂得，形象和品牌的实质是文化。商贸如水，文化似鱼，离开水，鱼将无赖以生存之物；没有鱼，水乃是一潭死水。文化和企业相辅相成，相生相依，融合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就是企业成功的希望。

独树一帜，自成一体的企业文化，已成为森大集团公司特有的竞争优势。随着国家文化政策的改革，文化作为一种产业的潜力将被逐步地发掘、运用，与企业将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企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

翰墨书盛世 丹青绘宏图

陈祥远 王德润

马年新春来临，是内江森大书画院成立5周年的岁月。二月二日，书画院特举办“新春书画联谊会”暨“王世贵、张义至迎春画展”。

画厅正面，展有王世贵巨幅“马年跃马”图，场面雄伟，气势磅礴，笔触空灵，深蕴万马奔腾，马到成功之昌盛国运；正侧展有张义至农家小景粉画，格韵清新，气息浓郁，笔调细腻，有小桥流水、清风明月的田园风情，尽展新村新景新风貌。真是名家名画，件件珍品。

联谊会上，市政协、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领导致词祝贺。各地书画界友朋畅抒情怀。四川美院教授联手挥毫惠赠“群芳吐艳，百花争春”巨幅彩画，并敦聘书画院院长尤再清为四川美院国画系客座教授。在蓉的“巴蜀鬼才”内江籍名人魏明伦也匆匆赶至书画院祝贺，他说：“……我写的‘内江大洲广场赋’就是在这里完成的。下午三点我还要参加广场赋揭牌仪式。我新创作的剧本《好女人·坏女人》前三场也是在这里写成的。这书画院是文人、书画家的‘家’啊！”敬赠贺联一副其联云：

森林从沃土萌芽祝酒吾乡腾起沱江画派；

大笔如海绵吸水取经各地恭迎全国名流。

其联语首字嵌“森大”二字。众称好联。

整个联谊、书画展洋溢着“翰墨飘香颂盛世；人文荟萃奏华章”的浓浓气氛。给“书画之乡”带来盎然春意。

大家回顾去年，展望新春。

内江森大书画院在森大集团公司总经理、画院院长尤再清先生的辛勤耕耘和积极支持下，驻院书画师们与企业同甘共苦，团结努力，圆满的完成了去年拟定的工作计划。

在这一年里，驻院书画师们仍然坚持每月一次的笔会，认真讨论、交流、创作书画艺术。共创作书画作品八尺以上近 30 幅，四尺以下作品 180 余幅。其他还有部份优秀作品参加全国各地书画展览。为森大集团公司和森大书画院对外交流，塑造自身形象作出了积极努力。

书画院成功的参与承办由内江市政协主办的“四川省六市政协第八届书画联展”。王世贵先生国画《奥运冠军唐琳》、任世俊先生国画《墨竹》、张义至先生国画《绿满家园》、刘政权先生国画《恋秋图》、廖心永先生国画《吉祥花雨》、李果青、李明珣、陈祥远先生书法作品各一幅参加了展出。展出期间，书画院还组织承办了内江有始以来规模最大的大型笔会，促进了艺术交流，增进了友谊，达到良好效果。同时，邀请了著名书画家岑学恭教授、“巴蜀怪才”魏明伦先生光临指导和亲切交流，并向参展的各市政协赠送了由我院书画师们合作、著名书画家白德松教授题跋的八尺书画作品，受到了参展的各地市政协和省政协领导的共同称赞。

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瑰宝，继承前辈大业，为团结、交流、推动和发展我市书画艺术水平，从七月份起，书画院陆续举办了《陈祥远、刘政权书画联展》、《廖心永、李明珣书画展》、《李果青书画展》、《任世俊书画展》，各展出作品 40 余件，受到了市委、市政府、市政协的积极支持、高度评价，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内江日报》、内江电视台先后有评介报道。

任世俊先生国画花鸟参加市中区建党 80 周年书画展；王世贵先生国画《点燃苗家的希望》参加四川省建党 80 周年美展，获优秀奖。国画《奥运冠军唐琳》参加内江市建党 80 周年美展，国画《西部盛会》参加全国第五届体育美展；张义至先生国画《淌蜜流

油的季节》参加四川省建党 80 周年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国画《岁月笑春风》参加市中区建党 80 周年书画展；廖心永先生国画《金风染蜀山》参加四川省建党 80 周年美展；陈祥远先生在宣传西部大开发国际书画邀请大赛中，其书法作品一件被评为金奖。

我院名誉院长、四川美院白德松教授细嚼文企联姻的内涵，努力为森大集团公司增添艺术氛围，积极为公司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精心制作了以“森林长茂、大业永兴”为创意的大幅（1.6 米×4.2 米）国画，悬挂在公司大会议室，真是增光添彩，它象征着森大集团公司的精神面貌和发展目标。

过去的一年，书画院先后接待了交通部长黄镇东，副省长邹广严，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柳斌杰，人大副主任张中源以及国家交通部全国高速公路检验组全体人员，西部出海通道千里行人员，省交通厅、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市文化活动的有关人员。

新年伊始，我们将做好以下工作：一、举办“王世贵、张义至迎春书画展”；二、举办“森大书画院建院五周年书画展”；三、筹备编印“内江森大书画院藏画集”；四、设置“森大书画院荣誉厅”；五、进一步扩大影响，团结同仁，交流学习，与四川美院或其他地区开展交流联谊活动；六、组织安排送文化下乡及写生活活动；七、开展网站书画宣传工作。

为保证以上工作的完成，我们还将进一步努力学习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思想，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将会以更多、更精、更新的书画作品展现自己，为推动和弘扬书画艺术，为促进内江的两个文明建设，扩大内江“书画之乡”的影响，作出更大的贡献。

内江大洲广场

执笔串辑 王德润

内江城沱水之滨，出现一个城市园林广场。即 21 世纪首春的元月 21 日剪彩落成的大洲广场。

广场，原为荒凉河滩，20 世纪 70 年代，内江人曾试图辟为公园。惜未竣工，竟被 1981 年特大洪水冲毁，仅残存少许林荫。2000 年两岸江堤锁定，市府决策，毅然辟作广场，建成 150000 平方米河岸绿洲。堪称巴蜀居首的城市休闲广场。

广场绿地全长 1100 米，宽处达 165 米，窄处亦有 96 米。广场中心，高矗金属旗杆，五星红旗凌空迎风。中部彩色音乐喷泉在鲜花掩映中，两边有迎客长廊、游亭、茶楼、游艺表演场馆。广场临江处，有新立石碑镌刻著名剧作家邑人魏明伦所撰《大洲广场赋》，背面为已故世界著名大画家张大千题书诗句“看山须看故山青”。

广场，千坪草柔，锦团花簇。银杏古榕争翠；白石群雕竞辉。沿堤甬道逶迤，柳枝摇曳。健身体育器械间设其间，青壮乐此不疲；孩提列队嬉戏。蓝天白云，河浪千叠，江风送爽，阔地高天。入夜，高压水银灯，亮丽似白昼。喷泉溅五彩，弦管奏八音。广场兴建，顺乎人意，广得民心。无形丰碑，树建百姓心中。故谓之“民心工程”，得乎宜哉。

广场取名，亦有一番趣事。2000 年 5 月，《内江日报》披露党政领导意图，听取民众声音：广场何名为宜？一时全城沸沸扬扬，纷纷建言陈意者众，命名达数十之多。其中文教老前辈邹作圣先生，为大洲名，呈有灼见的书面文字。（后被采纳取名“大洲广场”）在此特将原文字录刊。

应市建委征求新建广场命名

邹作圣

建议新建成的大洲坝广场命名为“大洲广场”。这个名称与大洲坝有关，但却另有取义。明代曾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相当副宰相）的内江人赵贞吉，对大洲坝有特殊感情，因号“大洲”。他是一个著名的爱国者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与杨慎齐名的诗文大家，特别是学术上的卓越贡献为学林所倾服。被称为中国历史奇杰的李贽评为“巍巍泰山，学贯千古”，他是中国光辉历史长河中的一次闪光。他在当时还存在于大洲坝中的桂湖畔的玉溪庄聚徒讲学，在那里写下许多诗文，张大千在翔龙山书刻的“一声何处牧歌来”诗，便是赵在玉溪庄写成的。建国前内江地方人士创办的“大洲中学”就是为纪念他命的名。他的遗著《赵文肃公全集》被“四川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列为重点整理出版书目。此书已在市政协、统战部支持下由官长驰教授注释出版。赵大洲是历史名人，在这里有重要活动，有流经桂湖的玉带溪遗迹供人凭吊。以他的号命名广场，赋予广场丰富历史文化内涵，是地方文化资源与城市建设最好的结合。今后如城市雕塑予以配合为他塑像并作文字简介，那就更完美了。（以上说明 400 字）

5 月 23 日

新建广场命名会

蓝代发

说起内江新建广场的命名，社会上说法颇多，就我所知道的

有关情况，提供给市中区政协学习文史委。

该广场正式立项动工《内江日报》作了报道。涉及用何名称时，承建单位与市建委曾在《内江日报》和电视上发出公告，公开征集广场名，并公布了奖励办法，笔者冒昧地写去一信，建议定名为“内江广场”。这是2000年上半年的事。记得当时推荐了6至7个名称，即“大千广场”、“大洲坝广场”、“内江广场”、“世纪广场”、“新世纪广场”、“甜城广场”等。笔者事前就热心参与这命名活动，且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2000年10月27日下午，突然下雨，我早早就步行至市政府等待由市政府主持的广场命名会。市中区政协副主席李显文、办公室主任周丹及尤宾贤同志等参加了会议。东兴区参加会议的有：区文管所长罗仁忠、区地名办主任钟仕清、区政府办派的法制局周同清局长、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蓝代发等。主持会议的是市长助理雷洪金。宣布参会人员时讲有：市人大、政府、政协领导及市级部门（我记得有民政局、大千纪念馆、各民主党派人士）。会上介绍了市建委征集各名称的情况，筛选出了三个供大家选择的名称，这三个名称是“大千”、“大洲”和“甜城”。会上发言踊跃，发言中师院有位老师多次发言，大千纪念馆及市政协文史委的同志抢到发言，民主党派人士尤为积极。其中市政协文史委同志发言主张用“大洲”命名，原来赵大洲是内江的一个历史名人。他阐述理由后获得与会很多人的鼓掌。最后投票，到会108人，就“大洲”、“大千”、“甜城”广场进行投票，投票结果：投“大洲广场”的90票，“大千广场”的18票，“甜城广场”的0票。（我投了“大洲广场”一票）。10月28日内江日报正式公布了新建广场命名为“大洲广场”。

赵贞吉与大洲坝

邹作圣

玉带溪·桂湖·大洲坝

《内江县志·山川》载：“玉带溪，原九曲入城西，旋绕学宫，逆流入中江（沱江）。”又说：“环绕学宫如玉带。”这里把玉带溪名称由来及流向入江都说清楚了。即最初的玉带溪出通川桥（西门桥）后进入大洲坝，绕文庙（学宫）再向西北逆流入沱江。入沱江溪口正对鹭澜洞。（刘承祐《鹭澜洞刻诗》：“门迎玉带溪流入”）。后来玉带溪在一次洪水中又冲决一支沿北城垣东流入江（明高世彦有“玉带东流武曲湾”诗句）。这样，玉带溪和大江便把大洲坝围成一个小岛。进入大洲坝有一小拱桥，初名“卧虹桥”，后改“若虹桥”。

玉带溪绕文庙后，向西北流经大洲坝腹地中，出现一个开阔的水域（大概是在一次洪水中冲溃而成），在这个开阔水域的周围，早在宋代（或以前）就栽了许多桂树，命名为桂湖，宋代一个理学家黄思庄曾书刻“桂湖”二字于岸侧。因为桂湖是玉带溪一个河段，长形，所以有时又称“桂湖渠”。

自从桂湖出现以后，便成为“内江八景”的风景地之一。景名“桂湖澄碧”。明代吴讷有《桂湖澄碧》诗说“桂湖清波”，“源头来活水”。对桂湖景色描绘更丰富具体的是宋代县丞蔡逸的另一首《桂湖澄碧》，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日照沙底明，风翻浪花起。

蘋藻翠交加，凫鸥乐栖止。

说桂树围绕着的这片湖水里，在晴天，湖底的沙粒反射出耀眼的光亮，风来水上泛起粼粼的波光，湖面又铺有翠绿的水草，水

鸟也时来觅食嬉戏。

这个湖就坐落在大洲坝里。大洲坝那时又是一番景色。玉带溪入江处一带浅滩芦苇地，渚清沙白，是一大片鸥鹭栖息觅食的地方，所以大洲坝又称“白鹭洲”。鹭澜洞就因此得名（发现这些洞穴的刘承祐说：“洞在小滩之东，乃古白鹭洲也，因号‘鹭澜洞’”）。清末河北岸的张福兴的私人园林“西园”，在溪边“钓矶”刻杜甫诗句“但见群鸥日日来”。明邑人田登《九日登西林》诗中有“两行白鹭依云篆”。白鹭就从大洲坝飞起。白鹭是大洲坝又一美景。

那时整个大洲坝林木葱茏，从西林寺下望，映入眼帘的便是翠绿的大洲坝林冠。明代马溥然《西林眺望》诗中“临江岛屿翠玲珑”便是说的这一景色。葱郁的林木又与水光相接映，在这个“千重宝树晴波上”的岛里，花团锦簇，“满天花雨识龙宫”，真像水晶龙宫一般。

这大洲坝，北面是青山古寺，南面是红色宫墙，外环大江，内绕小溪，掩映于桂枝影里的是一泓碧澄澄的湖水，整个大洲坝又笼罩在一片葱茏林木之中，若云蒸霞蔚，更加上大群鸥鹭点缀其间，真是一幅美丽图卷。难怪当时邑人刘养民在《大洲》诗中把大洲坝比作仙岛瀛洲。他说“水光山色淡明空，别有瀛洲此景中。夷旷直涵千里月，清虚常度九秋鸿”。试想，这般的大洲景色再遇上碧空明月，寥廓江天，深秋雁阵，把它比作仙岛瀛洲，也不太过吧。

赵贞吉在玉溪庄

明代有一个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闪光的人物，他就特别喜爱大洲坝，自号“大洲”。建国前内江地方人士创办大洲中学，就是为纪念他而命此名的。大洲坝又称白鹭洲，故他又称“鹭洲先生”。这个人就是明代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预机务（相当

副宰相)复掌都察院事的赵贞吉。他是一个为史家所称道的著名的爱国者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是与新都杨慎齐名的诗文大家,特别以学术上的成就为学林所倾服。

黄宗羲《明儒学案》中专列者四川仅四人,内江得三人。三人中除他以外,另二人都是他的学生何祥和邓豁渠。被誉为“中国历史奇杰”的李贽(卓吾)说,“夫赵老何人?巍巍泰山,学贯千古”,另一处又说他“真圣人也”。明代散文大家归有光有幸得见赵后,无限欣喜地说:“今以有光数十年之向慕,一旦得见,不复徒念岷峨之高、江水之长矣。”赵贞吉服膺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而有重大发展,身体力行,言无矫饰,行无依违,所以其为人“傲岸一世,刚忠謇谔,不附权贵,凛凛正气,天下莫不畏服”,遂能“以道德文章雄视海内”。

赵贞吉喜爱大洲坝,特别喜爱坝上明珠桂湖。嘉靖四十年(1561年)他刚任户部侍郎还不到一个月,因议政事不同意权奸严嵩的意见而被免官,他对此并不在意,回乡就选定在桂湖畔修筑别墅名“玉溪庄”聚徒讲学(邓林材说他“累起户侍,以事忤执政,不逾月而归,治讲堂于桂湖渠上”)他在这里一住四、五年,不久又在前教育学院处另建别墅名“狮山山房”(余意即“北讲钓矶”),主要为洪水期间住地。隆庆元年(1567年)去南京继入北京任职,隆庆五年退休还乡,回来后又重建玉溪庄。这次修成楼房,又很宽敞。友人高世彦《贺太保大洲新建华居》诗可证:

华宇开层构,潭潭水上居。

玉堂今赵相,桂月旧湖渠。

从退休一直到万历四年(1576年)去世,其间五、六年,他有三个住处,除这里以外,另有狮山山房,并在“憩山”(三堆山下)老宅(现碑亭湾)小住。

赵在玉溪庄、狮山山房前后共住了十来年时间(平时有小舟来往其间代步),这些年聚徒讲学,与友人有大量书牍往还论学,

赋诗撰文甚多，逝世前一年还开局编述《经世通》、《出世通》，与友人游乐，等等许多活动都是在这里留下的。现资圣岩（翔龙山）岩刻张大千书（实为补书），“一声何处牧歌来”诗便是在这里作的，这诗的题目是《与诸生会讲于玉溪庄有作》。高世彦诗《访太保赵大洲月夜放舟》所纪游乐是在这里，他与刘怡溪唱和的诗“潦水势争下，西林北渡偏”，当然也在这里。有一次知县王三湘在北城垣官廨来云馆宴客，在座的赵贞吉赋诗中有“桂枝湖鹄读书台”，在那里正好看到他的玉溪庄笼罩在淡烟暮霭之中。寄意遥深。

桂湖后来在一次大洪水中被湮塞了。有一个叫段民的人，仍以《桂湖澄碧》为题写诗：“江上平原一桂湖，当时名在景全无，千家烟雨玻璃净，数顷云霞锦绣铺。织女渡时河汉浅，仙郎攀去月轮孤。（当时湖水像镜面一般明洁和锦绣一般绚丽，而今银河一样的桂湖湮没了，洪水拔去了桂树，像吴刚真把桂树砍倒了一样。）何人拾取思庄字，并入中川十景图。”对桂湖的湮没发抒了无限惋惜与无限感慨之情。

段民的时代就是桂湖湮没的时代。但段何时人不可考。我曾对此有过考订，可以认定是发生在万历二十六年或三十年大洪水中的事。

桂湖没有了，曾在桂湖有过许多活动的赵贞吉更是早在万历四年就逝世了。但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文化遗产。他的学生把他的诗文，编为一个集子——《赵文肃公文集》，在多处刊行。八十年代初，四川耆宿张秀熟老先生领导的“四川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把这部古籍确定为首批整理书目。前师专中文系主任官长驰先生花了十年功夫对此书作了注释，名为《赵贞吉诗文集注》，在市政协、市委统战部支持下，筹资已由巴蜀书社正式出版。这是作为纪念人民政协成立五十周年最好的献礼。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新闻出版报》把这本书列为庆祝建国五十周年四川出

版界推荐重点书目，居巴蜀书社 1999 年二十三种出版物之首。

新广场建议名冠“大洲”

最近新建大洲坝广场征求命名，我建议用赵贞吉的号“大洲”这个名称。这个名称与大洲坝有密切关系而又是纪念内江历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城市建设与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最好的结合。如果城市雕塑予以配合为他塑像，并作文字介绍，就更完善了。

（《内江政协》编者按——此文曾刊于 2000 年 8 月 31 日《内江广播电视报》。新建的大洲坝广场，市府已采纳“大洲广场”名称的建议。）

为便于欣赏名家名赋，特将魏明伦先生之《大洲广场赋》录刊于后。

大洲广场赋

魏明伦

拳拳爱国之心，悠悠恋乡之情。床前明月，胸里内江。天府四川腹地，成渝两地中途。巴蜀交通要道，沱江商贸名城。卧凤藏蛟，人材辈出之地；飞鸿舞鹤，书画腾起之乡。多情似蜜，雅称甜城；宽怀如坝，壮号大洲。青梅竹马，童年嘻游古迹；白云苍狗，今日欢呼新景。中等城市，上等广场。纵横二百亩，长达两华里。江心仰望，半轮船形月；空中鸟瞰，一艘月形船。面积之宽，规模之宏，全川罕见，外省罕闻。

广场：无顶之会堂，无门之舞厅，无票之景点，无墙之公园。

公仆居所，不妨简朴；公众广场，尽可繁华。琴廊曲折，鲜花垒成金字塔；风铃摇曳，喷泉洒作水晶宫。露天舞台，云造气氛霞配景；临江坦道，路如彩带堤为裙。满眼林荫，遍地草坪。绿到天边天也碧，翠至白头白转青。老者闻鸡起舞，顽童跨马游园。夫妇良辰散步，师生假日联欢。拍照全家福，赛歌合唱团。情侣悄悄私语，侃爷滔滔雄辩。市民游客，百姓千家。有人四季拼搏，有人半世勤劳，有人一生幸运，有人长年忧患。民间岂无疾苦？世上岂无波澜？然而，到此一游，偷闲一乐。笑采忘忧草，趣寻解语花。彼此轻松，皆大欢喜。广场本是平原，原平无论高低，人人同等；大洲真似明月，月明不择贫富，家家沾光。

华灯初上，游子还乡。对广场咏史，引桑梓为荣。青山有幸，伴青莲赠诗于北郭；大洲无愧，哺大千学画于东城。八德园名扬海外，大风堂根植故居。投弹反清，喻培伦赤胆将军，黄花烈士；挥毫抗日，范长江战场记者，戎马书生。虎痴怒吼，张善子狂笔颂中国；怪杰诙谐，刘师亮辣语骂贪官。内江才子，文成金榜状元；本市姑娘，勇成奥运冠军。吾乡如画，多少豪杰。古今灵秀汇合，广场意境升华。巨型磁场，凝聚人气欣欣向荣；特殊母舰，载送航鹰队队起飞。

天外有天，宇宙无涯。以沱江比沧海，涓涓细流。以大洲比神州，区区一粟。广场不仿夜郎，虚怀应若空谷。此坝古时曾经兴盛，桂湖名列中川十景。可恶天灾，可悲人祸。美景成衰景，绿洲变荒洲。战乱再加浩劫，几代难以复兴。新纪元不兴则已，大举措一兴惊人。荒洲又变绿洲，盛况超越古时。细流入沧海，一粟归太仓。大洲变迁之个案，乃神州振兴之缩影也！

2001年春节应邀敬撰

本市公民李静晔先生写有《大洲广场行吟》一篇。李先生兴致为大洲广场写意，是十分可贵的。文章亦有独到特色，亦刊于

此。供欣赏并志之。

大洲广场行吟

李静晔

蜀中多锦绣，明有汉安白鹭洲。横纵北门渡，唐宋溪河会纳处。六百里沱江折湍流，一系水源出宝瓶口。深洄浅荡绕廓城，清涓玉带叉溪头。曲线双分右江岸，生成岛渚育湖湾。丹桂绽湖畔，鸥鹭翼拍沿。沱水连天润草碧。情动鸿儒赵贞吉。别墅筑湖乡，讲学“玉溪庄”。朝对鹭澜洞，暮摄“七孔”光。《二通》要论宏高朋，刚正傲骨侧严嵩。从此人以坝岛名，岛坝自此因人重。

胜境罹洪泛，鸟族惊徙迁。岛荒赵大洲，雪雨复冥岚。四百余载清浊现，历史欣逢两千年。

桂湖隐兮翔龙出，腾蛟起凤运回环。华夏功成于改革稳步，甜都崛起于新纪之初。兴修护城堤，开辟科技园。发展创奇速，康乐予民间。续铺三桥云路畅，首建城市大广场。遗迹奠基大洲坝，景观四季无门墙。巍巍江堤恶波息，株株烟柳透微茫。广场广著天府，长堤长过亘古。今日内江路，大洲见坦途。

市委黄小祥，市府曾省权。勤政在任上，纳采邹老作圣之建言：因缘明相赵阁老，广场赐名“大洲”好。全国人大王光英，挥毫题额重千钧。

虹影紫气低，场肖新月，东西弦长两华里；泉树布珍奇，霞彩氤氲，南北平阔一箭地。晴晚月儿高，瀑边幻新竹，忽闻蕉窗夜雨急；明霁日初升，雾里涌芳菲，才经湖梁五更寒。临河隔岸借景，西林大千寺馆连。漫步平躁净怀，老幼上下同休闲。跻身运动尽游客，喧歌起舞非梨园。小径春思稼穡事，绿坪夏动催征帆。澄秋话实硕，隆冬赋蔚蓝。兴登景山金字塔，趣对画墙腊月花。人生得失，任性放言，生活感受，随意聊天。置身大洲这面，

却在广场那端。尘宇遇山有界，琴心豁处无边。语醉机锋密，意贪笼鸟啼。茶在梦中饮，廊对花架去。

风前草似轻浪，灯下岛作航船。浪拥乘舟进，行云托月圆。厚民兮民心则顺，荒洲不荒；存真兮真事易成，难处不难。止静兮静还动，应动兮动如磐。足履大地广场，前瞻既远且高；志薄头顶云霓，仰望且高既远。身之跨越，心之超凡。且待朝曦涉过黎明，看大洲广场会更亮更宽。

大洲广场新联

罗锦文

一、临白水，面青山，故苑想当年，阁老精深穷义理；辟荒坡，营胜境，广场成圣地，平民潇洒乐园林。

二、秀色借西林，装点回廊画阁，花圃喷泉，彩帜华灯添气象；春光迎北郭，引来白发黄髻，英男淑女，清歌曼舞庆升平。

三、何处送春风，宛然翰墨飘香，弦歌弄雅；隔江寻胜景，遥想大千临砚，太白举杯。

以上数篇文章串辑在一起，意欲增加点“文史资料”的人文色彩，宜乎？

内江十二景新咏

诗文：甘光地 摄影：林大如

昔传内江有十二景，清人许麒亦作过《汉安八景》，而其中“醴坛”、“凤冈”等，岁月销蚀信难觅；进入新纪，内江的古迹、

新胜，异彩纷呈或可睹。试新咏内江十二景，以不负秀美山河，寄语四海宾朋。

圣水禅寺

圣水灵湫播远名，重檐列殿供金身。

历经劫难香火盛，国泰民安佛事频。

圣水禅林

圣水寺位于内江城区西北部沱江右岸之壕子口，该寺后山有清泉流出，汇入崖下小池，叮咚悦耳，常年不涸，被誉为“圣水”、“灵泉”，故得名。始建于唐代咸通年间（约860~874年），唐宋以来均有修缮，号称“中川第一禅林”，为内江十二胜景之一——“圣水灵湫”。后来历经兵燹、动乱，又有修复、培建。现占地20000余平方米，有大小庙房170余间。

寺庙主体建筑按东、中、西分布，东有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和圆觉楼，中为说法堂、药师殿，西有地藏殿、古大悲殿（观音阁）。圆觉楼左侧即为“灵湫”，游人至此，倍感凉爽舒适。大悲殿有晚唐千手观音摩崖造像，高宽各8米，面部丰满，体态健美、雕工精湛，结构协调，为大唐典型作品。圆觉楼后有唐宋以来摩崖造像67龕450座，寺内还有宋、明石拱桥、石坊及历代名人碑刻，岩刻20处。藏经楼向东可进到祖师殿，供有大型玉佛一尊，其殿右所坐真人般塑像，相传是怪僧默野和尚肉身。圣水寺的建筑布局严谨、雄伟壮观，雕塑、楹联、书法均出自古今名家之手，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具有极深邃的佛理禅意，极丰富的文化内涵。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

西林钟鼓

琉瓦朱墙隐碧峰，虔诚暮鼓与晨钟。

翻飞鹤鹭江畴阔，乐奏梵音霞雾中。

古西林寺

西林古刹雄峙于内江城北沱水之阳葱茏蔚秀的西林山上。始建于南宋咸淳5年(1269年)，占地27500平方米，主体建筑由观音殿、文昌殿和大雄殿组成，翼飞宇顶，彩色屋脊，寺门有联曰：“蜀境无双地；川南第一山。”寺周古木参天，山下江流如练，为川南第一尼姑庵。寺前有明代照壁一幅，正面是明代邑人刘象岩书“紫霞境”三字，背面有明代大学士赵贞吉书偈语手迹，笔势苍劲有力。寺内有明代石坊一座，单门两柱，造型古朴。殿堂之内，佛像金身，庄严神圣，香烟缭绕，鼓磬铮铮。楹联牌匾，精美焕彩，寺内并收藏古今名家书画作品多件。为内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三元宝塔

十层宝塔揽风情，千级登临浩气生。

两侧江流俱顺水，三元际遇到江城。

三元塔

内江市中区城南7公里沱江右岸的三元山上，有一座内江最高的古塔，那就是三元塔。塔始建于唐代，明末遭毁，清康熙十年(1671年)重建。石砌底座高15米，砖砌塔身十层，高47.7米。八面体锥形塔体，耸立蓝天。三元山两面均临沱江，山上可看到驶离内江和返回内江的船只都是顺流而下的奇特景象。并留下了“撒金滩”“捉端方”等传说与历史故事。

现在塔区已建成占地9200多平方米的塔山公园。园内辟以桃花为主的、樱花、桂花、梅花相继开放的四季园，常年树翠，空气清新。古人赞美这里：“城南三元塔者，撷菁华运会，疑从海上飞来……四周山色，云衣拖缟练之纹，万派江流，万濺奏笙簧之响。松篁夹道，岚气浮青，芦苇盈陂，浪花涌白。”如今，经过园林工人的精心培植，环境幽雅，为古迹披上新装，是内江最具开

发潜力的风景区之一。

高寺放眼

文风寺塔矗云崖，村远坝低境界开。

浊浪轻波随眼去，清风碧野自盈怀。

高峰寺塔

出内江城南，经过沱江大桥行4公里，在小青龙河与沱江交汇处的高寺山上，矗立着九层的高寺石塔，塔下即为高峰寺。高峰寺始建于明代，明清之间被烧毁，清乾隆年间重建修复，明代赵贞吉学士留有“翠竹贮密荫，练江号长春”的名句。后又经战乱浩劫，现修复佛殿三间，殿侧有会真、丹华两洞，保存着一些珍贵的摩崖石刻佛像。还有清代石碑两座记录了重修殿宇事略。

寺后山上的高寺塔，修建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塔身通高33.3米，为八面体结构，采用坚硬细腻的白石砌成。内有台阶56级，原可旋登至第五层（现因年久失修，已不能进入）。高寺塔与三元塔隔江对峙，象征内江的文运昌盛。塔周树林丛拥，即可远观山川形胜，又可流连碧野清风。

太白新楼

诗人早已伴仙俦，此地犹传太白游。

白水青山添异彩，东城北郭起新楼。

太白楼

太白楼位于风景秀丽的西林公园之内。初建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为四方翘檐楼亭式建筑。相传，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在此送别友人范金卿（内江人，天宝状元），并留下了“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的名句，极写内江城的山川形胜。故后世修建此楼，以作追念，有清末书法家黄云鹄所书“太白楼”三字。

太白楼，上与古西林寺相呼，右与张大千纪念馆相伴，前与

大洲广场遥遥相望。站在亭前倚栏远眺，对岸内江全城，尽收眼底。百货大楼、电子大厦、工商银行、长城大厦、新宇广厦等雄伟建筑，鹤立鸡群般矗立于甜城街市。脚下沱江水由北向南绕城半周，缓缓流向远方。楼后，小泉清澈澄碧，树木葱郁参天，花草争奇斗艳。太白楼胜景，焕然一新。

大佛春秋

重修大佛六层楼，两两桥堤锁急流。

新柳古榕遥相忆，枝枝叶叶诉春秋。

大佛寺

大佛禅寺位于东兴城区临江路沱江东岸。始建于1938年，原有三层寺庙一座，奉石刻释迦牟尼、镇江王爷、观音菩萨等。解放后因年久失修，濒临倒塌。1988~1999年重修为主体六层，右侧四层的古典佛教寺庙。层层飞檐翘角，巍峨壮观。庙门书“西竺无双福地，东华第一名山”楹联，乃近代名士手迹。庙内增供玉佛两尊。现为内江东兴区佛教协会会址。防洪大堤和沿江公路的建成，大佛寺交通更加便利，视野更加开阔。登楼临江，可遥望西林大桥和沱江大桥，江洲白鹤翱翔，堤岸绿树成荫。寺侧的临江绝壁上有约200米的“挂榜山摩崖石刻造像及题记”，保存着清代进士王果的“挂榜山”、著名书法家余燮阳的“挹秀江濂”和公孙长子师徒的“中流砥柱”等石刻手迹。

大千美术馆

巍峨美术馆大风堂，百岁将军墨味长。

爱老花间扶杖坐，涛声如罄月凝霜。

张大千纪念馆

张大千纪念馆座落在内江市东桐路北边的圆顶山上。是为纪念世界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而修建的一座富有川南家居特色

的园林式建筑。

大千先生（1899—1983），名正权，又名爰，字季爰，内江象鼻嘴堰塘湾（现市中区公园湾）人。他有传奇般的经历和惊人的艺术历练，曾两登华山，三上黄山，两访敦煌，踏遍群山秀水，极力师法自然。而立之年便与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共享“南张北齐”的盛名。1956年在法国举办画展，与毕加索会晤，实现了东西方画界泰斗的握手。1958年他的《秋海棠》获国际艺术协会金奖，被誉为“当代世界第一大画家”。他发展了传统的中国画艺术，创造了大泼墨等新的国画技法。他的宏篇巨构《万里长江图》，高53.3厘米，长1996厘米。不仅创造了山水画的奇迹，而且包含了先生对祖国壮丽河山和灿烂文化的热爱。

“看山须看故山青”。晚年，张先生虽定居台湾，但对家乡寄于无限深情。他曾为《内江县志》和《内江市志》题写书名。家乡人民对自己的远方游子也十分怀念。1992年建成张大千纪念馆对外开放。纪念馆占地近4000平方米，包括三个展览厅在内的2000多平方米的院落式建筑巍峨壮观，大千先生的巨型坐像，屹立馆前的红花绿叶之中。由大千先生挚友百岁将军张学良题写馆名。这里常年陈列珍贵的照片、实物、书籍及书画作品，分别展示了大千先生的生平事迹、艺术进程、艺术成就、对中国和世界艺术作出的重大贡献及其深远影响。还有艺术墙、荷花池、百梅园、芭蕉园等。是海内外目前占地面积最大的张大千纪念馆，是集艺术欣赏、宣传教育、创作研究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文化胜地。

广场花洲

千坪秀草广花洲，翠柳成行拂岸柔。

如昼华灯泉喷彩，江气送爽乐音悠。

大洲广场

站在车水马龙的西林大桥举目一望，就可以看到滔滔沱江已

被两岸高高的防洪大堤锁住，向西，沱江之阴是一片巨大的树林绿地，那就是新世纪开篇，元月 21 日剪彩落成的大洲广场。此处，原为荒凉河洲滩地，20 世纪 70 年代，曾试图辟为公园，尚未完工即被 1981 年特大洪水所毁，仅留下部分窄小的林道。2000 年防洪大堤建成后，市政府一诺千金，终将堤坝围成的荒洲，建成占地 150000 平方米，堪称巴蜀第一的城市休闲广场。

广场绿化地带全长 1100 米，最宽处为 165 米，最窄处为 96 米。其中心广场区南端高高矗立金属旗杆，五星红旗迎风招展。中部巨大的彩色音乐喷泉，鲜花围绕。两边有迎宾游廊，连接造型独特的游亭、茶楼、游艺表演场馆。广场与沱江对岸的大千纪念馆、西林寺、太白楼等互为借景，千坪柔草，锦簇花团，广植银杏古榕，静卧白石群雕。沿堤柳阴甬道逶迤平坦，并设置群众健身体育器具。马年，著名巴蜀才子魏明伦先生的《大洲广场赋》石碑揭幕，给广场增添了文化色彩。江风送爽，地阔天高。入夜高压水银灯，将广场照得如同白昼。节假日，喷泉吐七彩，弦管奏五音，吸引游人欢呼雀跃。是休闲、娱乐、集会、健身的最佳去处。

路碑永垂

泪眼望穿四十年，连通巴蜀史无前。

民工筑路成勋业，领袖题词垂美谈。

成渝铁路筑路民工纪念碑

在内江城区最高的梅家山上，有一座雄伟而质朴的纪念碑。碑身通高 14 米，坐南向北。上面镌刻着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亲笔题词：“庆祝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铁路。”碑后是全川第一座筑路民工纪念堂。碑、堂为内江第一座现代文物。

成渝铁路是四川最重要的交通大动脉，早在 20 世纪，四川人民就盼望修筑这条铁路，不仅为它筹集了大量资金，还为保卫它

的主权，演绎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斗争故事。但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只知搜刮民财，这条交通干线，终成泡影。有歌唱道“一唱成渝路，有话说从头，四十年来说修路，派款又拉夫，刮尽了人民的血汗钱，只见他们盖洋楼……”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仅用两年的时间，于1952年6月修成了全长504公里的四川省第一条铁路，也是我国第一条用国产器材筑成的铁路。其间，筑路民工发挥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特修建筑路民工纪念碑（堂），以彰其不朽功绩。

目前纪念碑、堂四周，花木四季长青，并与景色秀丽的“梅山公园”毗邻。广设茶园、餐饮、娱乐等服务项目，也是爱鸟人的活动场所。山青树翠，鸟语花香，是休闲、健身的好地方。

培伦丰碑

轰轰烈烈伟将军，勇闯敌营浩气存。

碧血黄花碑不朽，满园锦绣慰忠魂。

喻培伦大将军纪念馆

喻培伦大将军纪念馆座落在入城线左侧风景如画的人民公园之内。坐北向南，占地4000平方米，由“喻培伦大将军纪念碑”和“喻培伦大将军纪念堂”组成，馆前石台阶之上拓刻着孙中山先生题词“浩气长存”。内江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喻培伦大将军（1885—1911）字云纪，内江市人。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为了革命需要，喻培伦试制炸药左手三指被伤，同志们尊称其为“炸药大王”。1911年，广州起义，他胸挂大筐炸药，率“先锋”27人，直奔总督衙门。后弹尽伤重，寡不敌众被俘，慷慨就义，葬于广州黄花岗。孙中山追认其为大将军。

烈士纪念碑、纪念堂与人民公园的参天大树和奇花异卉，相得益彰。平常游人如织，都要伫步瞻仰。每逢清明和其他重要节

日，青少年学生及各界人士来到纪念碑前，举行隆重仪式，缅怀革命先烈，鼓舞爱国激情。

松林乡情

一泓碧水融星月，万棵苍松望太阳。

踏遍青山归故里，乡人谁不忆长江。

长江森林公园

长江森林公园，原名长坝山林场，位于东兴区郭北镇东约5公里。1958年建场，经营面积约5000亩，是以松树为主要树种的大型林果场。1974年，曾在此修建铁卢沟水库，1979年引进美国红松、湿地松、马尾松等，1986年栽培红橘，后来开发了桃、梨、柚等果木和名贵花卉，逐步建为林果业与旅游业共同发展的森林公园，游览面积达4平方公里，有桃花林、一线天、林泉独家村等，可享受山林花鸟的自然风光。为纪念内江人民的好儿子范长江，1994年被命名为四川省长江森林公园。

范长江（1909—1970）原名范希天，四川内江县赵家坝村（今东兴区田家镇）人。中共党员，中国现、当代著名的新闻工作者。曾参加南昌起义，1935年以《大公报》记者身份亲临解放区考察，历时十个月，行程四千里，撰写了《中国的西北角》一书，成为第一个向全国报道红军长征的人，他又是首次向全国报道西安事变真相和首次进入延安的中国记者。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总编、《解放日报》社、《人民日报》社社长和国家科委、科协领导职务。中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即命名为“范长江奖”。

龙湖朝阳

归槽五马聚遐方，碧水粼波暑亦凉。

尤喜春来桃艳岛，千红万绿沐朝阳。

黄龙湖水库

黄龙湖水库，即原黄河镇水库，位于距市区 20 余公里的永安镇、朝阳镇、凤鸣镇区间。水库建成于 1975 年，其大坝为土坝，高 18.5 米，正常和有效库容约为 1725 万立方米，灌溉面积 32000 多亩，是集蓄水防洪、灌溉运输、特种水养、旅游观光为一身的综合水利工程。因古黄鹤镇旧址同音而得名，又叫朝阳水库。

1998 年，内江市安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开发黄龙湖水库的旅游资源。经几年的经营建设，已初步形成以黄龙湖为中心的游览面积达 1000 余亩的安泰生态观光园。游览区内，水面宽阔，波光潋滟，岛屿环列，亭楼瞩目。主楼造型如布达拉宫，配以瀑布流水，湖中别墅，沿湖茶楼，独具风味。岸上广种优质名贵树种，果木、苗圃，科技含量高，处处繁花似锦，巨树成阴；绿茵覆盖的高尔夫球训练场，设施先进的游泳池、网球场，引人注目。每年三月桃花盛开的季节，吸引无数远方游客和父老乡亲前来观赏。民间流传自内江出西门，“三匹狮子一路行”，至此间形成“五马归槽”之势。还有那隐没库底的双桥古镇，留下了许多美好神秘的传说，更增添了黄龙湖水库的无穷魅力。

说明：本稿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内江百科全书》、《内江市志》、《内江县志》等书，并有魏常福、王德润、朱善崇、钟富祥、詹光适等先生提供资料，特此致谢。

内江名胜旧游

萧焱律（文） 王德润（整理）

（一）东坡庵

东坡庵离内江犇木镇约八华里。座落在犇木镇右侧的善关中学（解放后停办）的西南隅的沱江河畔。

每当中秋时节，天清水碧，金风送爽，桂花竞相绽放，烂漫飘香十里。游人来此，即为探幽觅胜，更为瞻养心仪已久掩映在浓荫中的东坡庵。

1947年初冬，笔者偕蓉关中学教师往游，曾得七律一首云：

东坡游后行千载，惟见危亭绕暮鸦。

拾级逶迤迷径路，凭高怅望仰才华。

苍松秀挺参天叶，黄菊繁开晚节花。

石碣遗碑留史迹，神州非复帝王家。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大文学家。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贬谪黄州。其文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清新豪健，擅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少数诗篇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有些作品表现出保守的政治观点和消极情绪。苏词属开放流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力。诗文有《东坡集》等。书法擅行、楷，用笔丰腴跌宕，蕴天真烂漫之趣。存世书迹有《赤壁赋》等。画迹有《竹石图》等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相传，东坡曾来内江，故建此“东坡庵”以示纪念。清嘉庆进士邑人王果亦曾在故居郭北镇清流河畔建有“东坡楼”或称“景坡楼”亦表示对苏的仰慕。

（二）高峰寺

高峰寺距内江城南约十里，位河东。祀奉“梅南七圣”。沱水沿山麓，古塔耸山颠。群山参差，巨波滉漾。解放前，每当农历三月初一至初三，开办香会，游客如织，笔者至此有五律云：

高峰巍慕久，结伴共遨游。

塔傲风霜立，沱江日夜流。

桑麻欣蔽野，黍稷喜盈畴。

盛世恩光普，神州八亿讴。

（1978年4月2日）

（三）龙洞朝云：

龙洞朝云，在内江东兴镇（现东兴区新城），沱江河畔有“龙洞观”。唐代汉安十二景之一。垒嵒秀丰，奇构异形，林之萧森，离离蔚蔚，乃在云霞之表。仰瞩俯映，弥历弥佳，固难以叙。流连信宿，不觉忘返。道经龙洞兴有五律：（二首）

七二悬弧庆，称觴献贺笺。

千红张异彩，万紫谱新篇。

寿比南山祝，源长世泽绵。

风光无限好，相与颂尧天。

龙洞朝云望，缤纷气象昌。

桑榆紫燕舞，茭藻白鹅昂。

十里稻花馥，一畦韭菜香。

尧天舞域境，四化学同行。

（《龙洞朝云》1976年秋）

（四）旖旎凤窝：

凤窝在内江东兴镇内（现东兴新城区）。美伦美奂，房屋连属，丹楹炫日，绣梅迎风，实为胜地。西面有园，多饶奇景。春鸟秋蝉，鸣声相续。加以地处虚静、隐室凝邃，嘉树夹牖，芳杜匝阶，昼云朝市，相同岩谷。游览其地，兴趣盎然。有“沁园春”吟咏：

牖外新篁，参差弄影，掩映缥緲。看漫山葱翠葳蕤蔓衍，荷铺绿水，柳绕碧塘。树响飞莺，听馨秀蕙，黍稷盈畴稻穗香。望寥廓，喜神州大陆，治国抓纲；

近来学习加强，悦领袖诗词闪金光。即李杜佳品苏辛杰作，皆称极则，无比铿锵。目想心游，晷移忘倦，毛主席旗帜高扬，诩盛世，操觚宗典范，脱节芬芳。

（1977年7月12日岁次丁巳夏）

（五）西林晚眺：

内江西林寺，明嘉靖时建。清嘉庆年间培修。邻城建于洲坝对岸。附近并建太白楼。汉安十二景之一。古碑遗碣，明大洲居士赵贞吉相国遗迹宛然。土山钓池，冠于当世，斜峰入牖，曲沼环堂，树响飞嘤，阶丛花药。西北有楼，山凌云台，俯临相市，目极甜城，古诗所谓“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者是。”今已辟为“西林公园”。至此有《浪淘沙》吟哦：

筠竹绿如烟，菊灿篱边，苍松郁郁柏参天。古碣遗碑差可辨，记取楹联。李白本唐贤，典籍流传。曾游此地有诗篇，白水青山依旧是，换了人间。

（《太白楼·西林公园》1977年11月28日）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701—762），唐大诗人，李祖籍陇西成纪（甘肃秦安）出生于碎叶（今巴尔喀什湖南），他广览博学，并好行侠。从25岁起，长期在各地漫游，曾供奉翰林年余。安史乱中，曾为永王李璘幕僚，因璘败，被流放夜郎，中途遇赦东还。卒于当涂。其诗表现出对腐朽统治阶级的强烈不满，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和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在安史之乱中，他斥责叛乱势力，讴歌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战争。其诗富有积极浪漫主义色彩，对后世影响很大，今存《太白集》。相传，他曾来内江访友，故建有“太白楼”，以为纪念。

（六）鹭渊洞：

鹭渊洞在太白楼下里许。重岩垒障，隐天蔽日。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游时有泳：

喜上西林寺，欣登太白楼。

黄花篱畔馥，古柏岭东道。

秀浥沱江濑，深探鹭渊幽。

推行农业力，黍稷漫芳洲。

《游西林寺及鹭渊洞》1977年10月1日

（七）桐梓学宫：

桐梓坝，从东兴镇经鹭洲洞不远即到。华实蔽野，黍稷盈畴。内江师范专科学校（现为“内江师范学院”）、内江统计学校、内江师范学校（现并入“师院”）、内江第一中学、内江地区行政干部学校（并入师院）、内江地区教师进修学院（并入师院）、内江师范附小（现名桐梓坝小学）均分布在桐梓坝上。照烛三才，辉丽万有；文丽日月，尝究天人。

每清风朗月，美景良辰，对群山之参差，望清波之荡漾，或玩新花，时观落叶；既听春鸟，又聆秋雁。未尝不促膝举觞，连情发藻，且代琢磨，间以嘲谑，俱怡耳目，并留情致。习学填《念奴娇》聊记之。

江山如画，望桐梓，坝上无边春色。过上南（街）考棚旧处，仍见一中故地。零六（1906）之年，德宗丙午，开办学堂日。讴歌漫步，更能追想回忆。1920年时，一中肄业，四春秋旧制。长校三期、兼课程，教务承充年四。屈指光阴，八年以上，办足六班事。完中男女，为国家展鹏翼。

为《内江一中校庆75周年》作，1981年3月1日

（八）三元井：

三元井，由城内出南门沿公路而下，约十里抵闻名的三元山麓（即三元井），拾级而上，登三元古塔。风景秀雅，巍峨葱郁，蜿蜒于内江之沱水欣然在望。云烟缭绕，使飘飘然而临仙境。这里的景色是：

躋足甜城古洞天，此身不觉到云端。

抬眸回顾乾坤小，日月星辰任我攀。

塔下有“三盐井”，二十世纪初，汲地下盐水，用柴火煎煮，盐色洁白，盐汁咸质低于自贡。三盐井的盐，是用柴火作燃料（成本高）政府要与自贡用天然火（天然气）熬出的盐（成本低），抽同等的税收。业主商家敌不过自贡，即自行关闭盐井。自后无

人问津。

(九) 丈雪故里：

二十世纪初，出南门，经武庙（现内江六中处）有对联：

能扶汉宋偏安，正统遂召千古；

均好春秋左传，圣门而后两人。

再行四里，即到“罗官牌坊”，往下不远，即有幺店子，幺店子修在大路中间，两边都塑有土地像，一般人称此为“两个土地对面坐”的幺店子。右边土地像的后面，即立有约二米高的石碑一块，镌刻“丈雪故里”四个大字。

1932年春，笔者新到东乡查学，曾经过白鹤场的诸古寺，寺里正在办庙会，为丈雪做生日。我便进寺探视，见到清初丈雪到成都作方丈后写回内江的信件及他曾用来防盗贼的刀剑。知道丈雪是本地人，俗家姓李，曾任诸古寺的方丈，有著述。是清初四川有名的高僧。

1952年冬，笔者在成都学习时，曾到昭觉寺参观，得知丈雪和三多这两个高僧都在该寺作过方丈。

(十) 中川第一禅林

资圣寺，在内江城西南附近约里许的丛山中，寺院建于唐代，备极精巧，大殿是“搁棒”。明清时期，相继培修。寺外即为虎溪桥，南紧依香山，寺内雕梁粉壁，丹楹刻桷，石壁上雕琢有佛像，古香古色，是有名的胜地。资圣寺多为名宿讲学处所，忆1910年初。罗仲武举人曾在寺内设帐任教，罗母董太夫人七秩大庆，曾见他书写的寿联：

仲舒为汉室史儒，代有贤媛，家传理学流芳远；

从彦推延平望族，人称懿范，天锡康强获寿多。

香山经如心和尚粉饰后，约于1927年夏营业，卖茶卖酒，生意兴隆，我记得张善子先生为他写的对联特多。

内江修公路后，1928年这里改作公园，无甚建设。1942年此

地易作“内江县立女子中学”时，笔者任教务主任。1952年，男女生合校后迁走，改作“中共内江地委”和“内江专署”驻地。这里是内江地区主管八县一市的中枢区域（现为内江市委和市政府及各市级机关驻地）。

（十一）桂湖秋月：

桂湖秋月，汉安十二景之一。桂湖街的桂湖系由北门活源井的水引进而成的。中秋佳节，天清气朗，桂花吐蕊，香气四溢，沁人心肺，这是前人的叙说。桂湖街和笔者的关系较密。1911年住此，开始入学读书。1943年又在此赁屋而居。尔后，六弟等在此居家。记得在此过中秋，曾有《中秋》吟咏：

长空渺渺夜漫漫，银汉横空漏鼓阑。

井畔梧桐黄叶落，池中菖蒲绿茎残。

芙蓉逞艳金风飒，桂子飘香玉露寒。

秋色平分催序节，月轮端正九洲欢。

（1977年9月20日）

（十二）圣水灵湫：

圣水灵湫，汉安十二景之一。内江县在北周所置称中江县。隋文帝时改名为“内江县”后，圣水寺即建立。笔者赋有诗曰：

蒙君指点学吟讴，丰富题材实践求。

龙洞朝看红日灿，凤窝晚眺白云稠。

西林古柏参天蔚，圣水灵湫荡漾幽。

日化风光无限好，尧天舜日乐为休。

（《中秋·和星石君—1977年12月11日寄句》1978年1月10日奉和）

灵湫照应，圣水晶莹，高僧名宿，代有传人。解放前习俗、阴历四月一日至八日，即逢佛祖诞辰，香客货郎，来往频繁，荫蔚蔽日的楠木丛中，畅饮歌唱，八日内皆喧繁无休。

（因水准所限，整理中难免有误，敬请赐教斧正）

“屙屎坵”与“科始坵”

任世俊 王德润

内江城外有一地名，它离去我们，岁月并不遥远，可它在好些内江人的心目中，已悄然消失。它即是解放前称谓的——“屙屎坵”。“屙屎坵”（并非大便之处）它位于现玉溪路至火车站主干线与民族路（倒湾），出口交汇处，河岸路旁那棵黄桷大树，就是历史见证。

内江，自唐以来科名渐盛，特别是明代。明，内江是科举的宠儿，全川很多州县是无从比拟的。杨慎《科贡题名引》云：“独内江一邑，文风冠于一方，自洪武至今，进士将百人，举于乡者三倍焉。”据《内江县志》载：确切数字是：明一代，有进士一百一十九名，举人三百七十二人。进士是全国成千上万的举子去京城会试而被录取的。要考取一名进士，不是轻而易举的。至清代，内江科名稍逊，但文风不减。《内江县志·杂记》载：一邑令荣任内江，元宵节步楼观灯，听城内外，书声不绝，邑令顾谓宾客曰：“此乃邑之真风水也。”真是：“若问科名缘何盛，万户人家尽读书”。

过去，内江县的童子试（考童生）考棚即设在上南街（现市中区委斜对面）在县里考上童生后，遂赴资州（现资中县）考秀才。录为秀才后，便赴成都省城会试。中举后，才得晋京会考，若被录为状元、进士，便一举成名，荣耀天下。

从前，自渝至蓉的道路，只是一条较宽的石板大路，路从牌楼坝入内江城，经沱中路（现内江二中背后）上梅家山，经武庙（现内江六中处）过上南街，经城隍庙侧（现总工会处）至南街“老县衙门”（现市中区人民政府）突折大西街下倒湾（现民族

路)出倒湾口。(过去,这里已是城郊,由于化龙山脉横亘,形成出城的一个山坡垭口)即老百姓称呼的“屙屎垭”。出垭口,再经圣水寺、上白衣阁(现松林山公园处)沿莲台寺去史家街至成都。凡赴资(州)、省、京城参试的考生,本地官员及亲属送行饯别,都在倒湾口的“屙屎垭”辞行告别:祝此去赴科,科途坦荡,平步青云,鹏程万里。所以“屙屎垭”实为“科始垭”,是考生登路启程之处,含蕴“科名始于足下的山垭”也!由于谐音,老百姓习呼作“屙屎垭”,其讹传盖出于斯。

笔者有幸,能在20世纪四十年代,在这垭上还亲眼见过道旁(当时已是成渝公路)立有一大石碑,书有“科始垭”三个大字。(碑立于何时,谁人书写?是时年幼未审其详)。至四十年代末,成渝公路扩建,“科始垭”石碑推倒拆弃。据传,一农民见碑石坚实宽厚,扛抬回家作了垫猪栏之用,现不可考。“科始垭”,山垭尚存,“科始”杳去,石碑无踪,物去人非。唯那棵黄桷大树依旧,生机盎然,婆娑多姿。它实为“科始垭”石碑的邻居,真资格的历史见证。

清末内江城街名小溯

《内水阳秋》之七

洪 若

抗战后期(1942年)前后,由乡学耆朱昌鲁(寿朋)、伍心言(应奎)主纂续修《内江县志》民国版八卷本,特将清末至民初,当时城区(即市中、东兴两区未析前的县治所在城区)城内的十街三巷;城外的十小街一巷和直辖城江东岸的上东下东二街及东兴一场的街名、巷名、场名,作了专项的辑录,并分列如下:

城关内:正南街、正西街、正东街、正北街、河街、桂湖街、文英街、小南街、文明街、铎头街、高家巷、马家巷、周家巷。

城关外：南关正街、陈家小街、蔡家街、梁家巷；东关正街，西关正街、升秀街、迎恩楼街、旧县脑街、文兴街。

城江对岸，上东街、下东街、东兴场。

当时城市、市街的建设规模都很小，也不十分规范。清末、民初至建国（二十世纪），时逾百年，内江城市已有崭新长足的发展，上所辑街巷址，有的名早已消失，很难稽考，有的在不断续修、扩建中，则大多仍被保存了下来，只是大大的焕新了面貌。为了解、研究内江城市建置、建设发展的历史，和对旅外乡人的查询，把过去所辑街巷地名、沿革，及时进行一些小溯，既非常必要，同时也是非常有趣的事情。进行“小溯”的要点：首先是得把当时辑录该街巷名的历史时间（清末），与地理环境（那时内江城墙及东、西、南、北大小的八道城门，都还完整保存无损），然后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以上街巷地名及其方向位置，就可大概弄清了。这四道大城门是：

一、“朝东门”。明建，清命名“翠屏门”，沿称“大东门、老东门”，亦称“东关”。

二、“向南门”。清命名“乐贤门”，沿称“大南门”、“老南门”；“南关”。

三、“镇西门”。清命名“玉带门”，沿称“大西门”、“老西门”；“西关”。

四、“拱北门”。清命名“华萼门”，沿称“大北门”、“老北门”；“北关”。

五、大城门，莫建于明（成化），内江由土城（墙）改石城的砌建。附有明以来，内江科举兴盛，城市不断发展，街市、居民增多，便利城乡交通，往来进出城方便，乃于明纪又于大四城门之间，又新增开了四道小城门，又称之为“附城门”，这四小城门是：

一、“观澜门”，亦称“小东门”（位大东门与小南门之间）；

二、“景阳门”，亦称“小南门”（位小东门与大南门之间）；

三、“通川门”，亦称“小西门”（位于大南门与大西门之间）；

四、“临清门”，亦称“小北门”（位大西门与大北门之间）。

因城建于山坡高地，西南高，东北低，围城呈椭圆状，各城门间并不等距、规范，各街巷更不整齐划一，欲清溯当时街市名称、分布，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居城关之内、外，以及街道直通大小八道城门方向等的三个主要方面：

（一）城关内的街巷：以今市中区人民政府（旧老县衙门钟鼓楼为中心）

（1）位大东门，小东门城关以内者：

“正东街”——明代曾称“聚奎街”（街内有一万寿宫建有“奎阁”和曾设“汉安书院”于此。（载旧邑志）。由街东端下“大水巷子”，今“运输巷”下坎至大东门；清纪曾毁于火，称“火烧坝”，继称东坝街至今。抗战时期，则曾更称过“民权路”。“文革”时期一度称作“新生路”。

“河街”——辑位城关内，当即今沿称之“大东街”。抗战胜利曾改称“胜利街”。（东关外沿河坝之河坝街的上、下河街子等系后建）

“文明街”——亦注位城关内。溯之，当即今仍沿称之“小东街”，与“东坝街”平行，街东端直达“小东门”，该街在明、清纪开设有“梯云阁”、“镶云馆”等古书店及字画苏裱铺多家；在民纪又新增开有“仁义永”，“宝来”印刷社多家。建国初，故亦曾改称做“印刷街”；抗战期中，以街东端紧接小东门东门城垣（“朝阳城垣”）故又一度改称过“朝阳街”，以及修补铤锅、铤壶、多家的“修补街”。

（2）位大南门、小南门城关以内者：

“正南街”——亦称“大南街”、“南街子”（包括上、下南街）；在抗战时期，所谓施行新市政，曾新命名“中正街”；建国以来新命名“中央路”。文化大革命时期，原上南街以曾有学校及川剧团、电影院多所又一度称名为“文化街”。

“文英街”——据云街首以紧接南宋赵雄丞相书楼“昼锦楼”得

名(约位今“甜城影都”所在)。民纪以街头接小南门处有喻培伦大
将军故居,曾更名为“培伦路”;建国初期,以纪念中苏友好,曾改称
“友好路”。

“铎头街”——位今工商街间分至小东门的一条小街,以小街
弯小如耕田之犁铎,以象形取名。而后人则多误传之为街上曾
有名中医有若三国华陀,而传称为“华陀街”,建国以来现新定名为
“三八街”。

这里有待特别补溯的,可能辑漏了(或刻印未校出)的一条很
重要的小街,即“箭道街”。

“箭道街”——亦即今定称之“工商街”。箭道得名,其说有二:
1. 街口对面曾系县总兵制台衙署,街地原为县军署练兵跑马射箭
之场坝;2. 箭道最直、状街道之直伸。县城街初取名主以方位,其
次乃以地址的形貌与当地故事而取名。箭道街当地以形貌“铎头
街”取名,尚还遗有“剪刀坝”“三倒拐”等的地形连锁。如按照方位
溯之,“箭道街”最初之方位定名,当应是“小南街”。因是街起接大
南街中部,尾由北城垣及龙井沟分抵小南门城关,与文英街同为小
南门进城的主要两条通衢。

(3)位大西门、小西门城关以内者:

“正西街”——亦称大西街,是旧县衙右侧,通向大西门的一条
主街,与大北街分岔处、砌有大石井,称水井口街,亦曾称“水井
街”。街中段有明初高公韶司徒府第(今市中区曲艺场处,清陈姓在
此建陈家祠堂)。古街街名“金玉街”(见载《高氏族谱》),抗战时期,
曾改称“中山路”;建国后至今,改称“人民路”。“文革”时期曾一度
改称过“人民西路”。

“高家巷”——当即今之“阴家巷”与“半节阴家巷”。因此巷巷
周,正邻接高家府第,高家与巷头曾立“高氏五桂联坊”,因又称“高
甲牌坊”。

“马家巷”——即今之“蛋市巷”,又曾称“太平巷”,明纪内江八

大望族，马姓一支曾住此巷。

“周家巷”——大西街小巷不少，但成街巷的大巷不多。考通向“小西门”街道，所遗尚有缺如，是否“周家巷”即“小西街”今“天津街”的前身。

“天津街”，习称“小西街”，据知情父老辈传述，此乃民国后期为当局和市民所讹传，小西街原分正、横两小西街。天津街本称“横小西街”是由大西街横通小西门的一条小街；另一条小西街则是由上南街口交界的老城隍庙后门，直达小东门城关，而被称做“正小西街”。这条小街以民初拆城墙，修建穿城成渝马（公）路而拆毁消逝，而另以交通西路代之，故早被人们忘去。之后，天津街便成了正式的“小西街”，抗战时期“天津街”曾更名“民生路”，因市街以卖布疋绸缎店为多，因俗呼“绸缎街”，曾以天津布客帮为主，故建国以来乃始新命名“天津街”。

（4）位大北门，小北门城关以内者：

“正北街”——亦称“大北街”、“北街子”。它的长度、宽度与“正东街”，均逊于“正南街”与“正西街”，抗战时期此街曾新开缝纫店多家，曾被称做“缝纫街”，复因内江为甜城，甜、咸名小吃，较集中在这小街，又被人们戏称之为“好吃街”。

“桂湖街”——此街沿河。由“大北门”起与“正西门”平行直通“小西门”与“大西门”。如以最初街道命名按照方位，东西南北大小八门（街的规划，条理，初本名应当为“小北街”。后以本街内明、清纪有“桂湖池”，紧接“小西门”城街，有通向沱江的古著名“桂湖渠”与“桂湖”，故一直就沿称之为“桂湖街”了。

（二）城关外的街巷：

（1）“东关正街”——即“河坝街”（包括今之“上河街”与“下河街”的“团结街”。）

（2）“南关正街”——即由原上南街关外“关岳庙”（今市六中处）“老君庙”（原国术馆）出沿下东大路（石板大楼）下坡直上后来

新修成渝马路的一条小街。

“陈家小街”——可能即出南关由“南关正街”，分向梅家山的一条小街。

“蔡家街”——为出小南门紧接的小街，即在今益民巷处附近尚有蔡家巷的延称。

“梁家巷”——亦为今益民巷至黄桷井地带的一条小巷。

(3)“西关正街”——出“大西门”关外西门桥的一条大长街，这是南宋前，内江县城，尚未向东迁建新址(石城墙围城)，旧县治所的唯一的一条主要大街，其县衙治所所在地段，由“拐角子”到“侯家巷”前沿“吴家山”、“吴家祠堂”(今“市酿造厂大门一带”至“号子口”前延建新街，是为“吴家山街”；由“号子口”处“吴家山街”再至“学号”(学棚、科考预校)，迎接公文官差驿站马棚、马号的一小街，则称之为“迎恩楼街”(参见民八卷本《县志》、《迎恩楼碑记》及凌家镇《张氏族谱》。民族路，在“文革”时期，曾一度改称过“人民北路”。

迨至清末以来，“西关正街”多以“倒湾”(岛湾)作统称，曾历称“沱街”、“牌楼街”(全街共有石牌坊牌楼数十余座，见载《邓氏族谱》)文庙(今三初中)居街首、清纪曾在文庙内学官山(今市聋哑校处，续办“汉安书院”故亦称“学院街”街名曾延至民初，脑街近段。唐状元范金卿花萼祠曾兴办“花萼书院”，故全街亦称“花萼街”。抗战时期倒湾全街，则统称“民族路”，至今延称。

“文兴街”与城内之“文英街”常有混淆，多以为即文英街的别称。考“文兴街”辑注，是西关外，即当今仍沿称之“叠象街”。街由“小西门”(通川门)，沿玉带溪下至大西门桥西街正街交汇，地近文庙及对溪岸之“奎阁”(魁星阁亦名培天阁)故街取“文兴”之名；复因街溪背枕“梅家山”，因“象山”之“象鼻嘴”，倒映溪中，故街乃以“叠象”名之。人们后来将此街称做“铁匠街”，乃系街上确曾开设有几家小铁匠铺的误称；至将内江历史上赵家曾出过两个宰相(南宋赵雄、明代赵贞吉)，把“叠象”传成“叠相”，更把其中一宰相曾在此

跌倒，街名书之成“跌相”，那就更是附会、讹之又讹了。

玉皇观被批准为道教活动场所

廖至鸣 王德润

内江玉皇观，座落在市南郊成渝高速公路七家滩大桥右侧沱江河畔的大梁山上（辖交通乡永兴村）。大梁山山势奇峻（海拔420余米，是市郊最高山峰）玉皇观雄踞主峰，俯瞰逶迤沱江，高速公路从山麓跨江穿行。四周山峦起伏，绿水青山环抱。常言：山高水长。大梁山山峦富藏甘冽清泉，路曲林幽，是掩映寺庙的清幽胜地。

据传，玉皇观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清乾隆扩建。解放前夕，庙产达120余亩，房屋达67.5间。解放后，部份房屋，改作乡村学校。上世纪70年代初，学校迁址，相继兴办大梁山林场。1998年春，市中区人民政府以区府发(98)003号文，批准建立了“内江市中区玉皇观道教活动场所筹备组”。三年多来，道教信众们在“筹备组”的带领下，在区、市政府的领导关怀下，在市中区政协的大力协助下，积极办妥了土地证、房产证等手续，并恢复培修了玉皇殿及慈航、灵祖等四大殿，彩塑了三十三尊神像，使“玉皇观”初具规模，信众、香客、游人日益增多。

2001年市中区人民政府以区府发(2001)152号，呈文内江市政府转报四川省政府。市政府以内府发(2002)17号文，转报省政府称：“经审查，内江玉皇观道教活动场所，已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145号)和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国宗法[1994]60号)规定的开放条件。请审批。”

四川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局于2002年7月1日批复：“……经我局研究并请示省政府，同意开放内江市中区交通乡永兴村玉

皇观为宗教活动场所。”

历来，内江道教无活动场所。人称：游方道长，云游四方，萍踪无定，四海为家。而今，道教有了活动场所（现已有道长 5 人）是道长、信众们的一件幸事（这是内江第一个道教活动场所）是内江宗教界的一件大事。现仍在积极筹办、完善中，预计明春正式 牌。

（去玉皇观乘车路线：乘去白马镇的公交车，在乘风加油站下车、步行数里即到）

空军军士学校的热血青年

——为纪念抗日战争六十五周年而作

胡锡珍

腰悬三尺剑 杖策出蓉关

不灭扶桑贼 马革裹尸还

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在整个神州大地上，一曲悲壮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歌声，唤醒了千千万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

在天府之国的成都，冲破了家庭种种阻挠，与同学向子煦（川大名教授，文学学院院长向仙桥之子）、章鸿庭（彭县首富章老伯之子）于五月一日晨在成都少城黄瓦街35号，太阳还没有升起之前，我在家人甜睡中第一次学会了“偷”走100元大洋走出家门，记得当日夜晚宿龙泉驿山下石经寺庙中写下了：

男儿负志着征裘，别母辞家走国忧。

莫笑蓉城年少子，坚决抗日出夔州。

从此，在举目无亲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缅丛林，黄河之滨，巴山雨夜，中原大地，大洪山麓，四川平原，度过了二万四千多个日日夜夜，走进了二十一世纪初夏的光辉大道。

古人有言“居安思危”。近年，由于日本领导层多次参拜“靖国神社”，伤害了中国人民以及亚洲人民的感情。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高度重视。

日本军国主义的阴影时明时暗，作为中国人民一员，不能不严加警惕，在两国政府多次正面呼吁“世代友好下去”的声音未息之时，日本首相小泉先生今年又一次参拜日本的“靖国神社”。一片反对，一片愤怒，此起彼伏。我不能不回忆起一九三九

年至一九四〇年间，由黄埔军校留校任职十四期六总队岗位上，应国民党空军士校总队长劳声寰将军邀请，先后在簇桥空军士校一、二期担任队附，为时十个月。负责管理和授以陆空联络立体战术的基础教育。不仅认识在该校任飞行教官而曾经在武汉大空战中被人们誉为空军十四队之花的四川老乡雍沛，同时了解旧中国国民党空军的体制和空军部队内部反映出的空军基础以及人和机的数量、质量，比之当时的日寇，在总体上远远不及。比如，在飞机的总数上，（包括飞行员在内）机种（轰炸、驱逐、侦察等）飞机的装备火力、水平、速度、持续航行等，都逊色于日寇！

空中力量的对比，不难发现，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当时国民党统计并公布的数字）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幅员的大国，空军的情况是严峻的。如果以第二次大战德军在短短的五十多天里，攻陷了欧洲包括法国在内的大片十多个大小国家！无他，主要在于利用空军优势（数量和质量+技术过硬）当然，决定战争的最后力量是陆军。但不可否认，空军有特殊作用。当时世界军事论坛上流行的“无空防即无真正的国防”，有一定的道理。形势非常紧张，谁掌握制空权谁就把握主动。可是当时情况是：仅仅依靠原国民党杭州笕桥先后毕业于航校的几百名飞行学生，不仅反映出少得可怜，也难以达到保卫幅员广阔的祖国领空。如果从当时国共合作的决定——持久战的战略方案看，就不能不下决心在空军数量和质量上作出长远决策的打算，以适应国防需要。随着在世界航空日益发展的情况下，要求具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的广大知识青年，投身空军，献身这一伟大事业，组建一支新兴的飞行队伍更为迫切。

抗战初期，（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仗其在华北攻势得手，在卢沟桥被迫打响了全民抗日战争的第一枪的吉星文将军，震动了日军上下，因而又在同年八月十三日，以其强大的海军力量（包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强行登陆，幻想开辟第二战场。从南北

两翼的钳形攻势，一举直取中原。主观认为：只要上海得手，控制了“四大家族”经济命脉，溯江而上取得南京，迫使我国投降，企图轻而易举地实现“三个月内征服中国”的妄想。正是面对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一大批热血青年，从国外和全国不同的高中、大学之门走出来！投身到这所空军的“新型”摇篮中来。笔者从本身的经历实际，回忆往事，如实的反映这一大批热血有志之士，是如何下定决心，投笔从戎，置生死于不顾；又是如何挥泪告别亲人，走进这所人们称之为“第二笕桥”的训练空军骨干的熔炉中来的！让人们永远难忘这批中华精英！鼓舞并保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中华魂，以此来纪念抗日胜利六十五周年，就更有必要了。

一、空军士校的名称由来

在解放前，蒋介石未从各地统一军政大权之前，在军阀林立的旧社会，奉系军阀的东北航校，南苑直系军阀的南苑航校，广西有航校，云南有航校，四川刘湘有航校。杭州笕桥和洛阳属于国民党中央政府筹办的航空学校了。说明一个问题，蒋介石以其软硬兼施，从经济和官位相许拉散并分化各省军阀内部，形成了全国松散的统一。随之而来的是部队整编，空军也不例外。尽管如此，国民党整个航空的力量仍然在萌芽状态中，整个抗日制空权，在较长时间内，仍处于劣势。因此，在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就提出“航空救国”的指示。以后，在抗日初进一步提出“无空防即无国防”的号召。空军士校在这时候，面向全国公开招生，方法是：采取三个月招收一批，多方取材，密集招收的方式，在四川成都近郊太平寺正式建校。说它是一所新型的培养空军骨干学校，其特点是：要求快速完成与杭州笕桥航空学校的一切理论的、飞行的实际训练，以杭州笕桥空校一切规章制度作为蓝本，除入伍时间适当缩减外，能够缩减的科目实在不多了。这就要求学生们在生活上艰苦，训练上从严，白天上不完的课晚上继续听。空

袭来临时疏散校外森林听课等等。当时，在苏联的空军组织，以及日本、英国的空军组织中，日本称之为飞行军曹，苏联称之为飞行军士。国民党航空委员会有如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似的，兴奋万状，主观认为在缺少空防情况下，找到了既能解决燃眉之急，又能解决中国空军建设快速的要求和世界有章可循的军士制度下，正式命名为“空军军士学校”。从来自五湖四海和国外爱国华侨的高中、大学毕业或肄业的经过严格学科、体检、目测筛选榜上有名的一批“知识青年”，怀着碧血洒兰天，不作亡国奴的雄心壮志，走进了四川成都平原簇桥的太平寺大门。这批航空骨干，从学科到飞行技术各方面都不亚于杭州笕桥空军学校的学生水平。可是，毕业前，在军衔和待遇上，显然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待遇后，引起了空军士校一、二、三期达三百多人对政治前途的关注，不满情绪开始扩大加深。引起了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的注意，派人多次到校了解内情，出于团结抗日的热情，我两次向空军士校学生总队部队长劳声寰将军直言以告；但未引起重视，以致后来二期学生在晚会上多次与毕业于杭州笕桥航校的教官们发生冲突、斗殴。直接影响到空中训练的质量提高。从此，在学生与教官之间的不满与日而增！教官中一部分人心怀不满，借机在训练中，要求苛刻。如飞行时学生动作不合标准，或不良的动作，不能迅速改正过来，于是“打架杆”（驾驶杆）直接冲撞到学生的左右两腿。虽皮肉痛小，但精神压力大。或在空中咆哮谩骂，或故意在空中搞些激烈的动作骇唬学生。到了地面，对学生处分的方式，真是花样百出。最文明的是罚“站丁字布”（叫学生立正不动站在T字布旁边，参观他人的起落飞行动作）。站好久，根据教官的喜怒而定，或“跑机场”或“戴红帽子”羞辱人格。红帽子何时取脱，根据表现而定。随着体罚的深入，以后发展到在机场来去，跟在队伍后头戴红色长达三尺上下的圆锥帽筒，让沿路人们认识这一位似乎“判刑”的“不良学生”。变本加厉借机报复，

上升到罚“两腿半分弯”站在两个三角形水轮档的楞缘上，痛苦万分。一站不要紧，两腿分开弯曲，汗流浹背，而不能表现半点不满。在学生内心深处，愤恨多于敬重。不少学生认为：在空军内部，一部分军官们联成一气，歧视、压迫、虐待他们这些飞行“幼苗”，因而给一部分军官暗中取了一个代名词叫“乌鸦”。并由此而对这些空军教官认为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教官与学生之间鸿沟拉大。国民党军事学校，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本、德国法西斯教育的影响，谈不上官爱兵，兵爱官。当然，民主空气在军事部门是永远难求的，尽管这些有志之士，离乡别境，来到抗日大后方的四川成都，受到从生活上的艰苦到精神上的压抑，并没有冲淡他们那一心为了抗日，甚至牺牲生命而不顾的满腔热血的高度爱国情操。至今，这些同学的面孔，仍然记忆犹新，他们之中有来自南洋群岛的柯腾蛟，北方大个子贺洁甫，广东书生薛介民，四川双生兄弟周远柱、周远材，以及国民党何应钦将军的侄子何绍修等同学，不少人在一九四八、四九年分批去美深造，一般晋级空军中、上校，一部分人因抗日立功被提拔为空军少、中将的人大有人在，也有一部分为国牺牲而长眠了。

二、一场“战斗”在黑夜

正由于飞行教官与学生们之间，平时来自于一部分教官看不起这些学生们的军士级，似乎比军官低人一等的错觉外，更为主要的是忌妒这些军士级的飞行技术，比“老师”还“高明一等”，二者加在一起，矛盾随时可以扩大爆发。从学生们的心理上，几乎普遍存在着一种被骗感（招生时在全国各大城市报上是以招收航空生的名义，并未公开明确招收空军军士。）但出于爱国，他们忍受了精神上的压抑，可是，万万没有意料到在老师与学生之间，被老师看不起而羞辱，也加剧了矛盾的白热化。在一九四〇年秋一个晚会上，由于一两位教官老师在全场鸦雀无声凝神贯注观看台上表演者的对话时，这两位老师教官从礼堂门外高谈阔论大摇

大摆走进礼堂地板咚咚作响时，学生队伍中，有位同学也仅仅是说了一句“怎么搞地，轻点嘛！”这种意见，（说它是批语也好）应该说是正常的。没想到“教官老师”发气了！竟然以极其粗野的话直问学生。瞬间引起了飞行教官出手打人，学生也还以颜色的一场“夜战”点燃了，把矛盾上升到沸点。从此，在一部分飞行教官中，主观认为“飞行军士敢打老师，真是孺子不可教也”。从此，飞行军士的名声在他们眼中被视为“不良”分子。矛盾和鸿沟加大上升！引起国民党航空部门注视，一直到以后将空军士校毕业的各期毕业班改为空军军官学校（十一期）特班。才初步冲淡并纠正多年的矛盾。

三、简陋的环境和飞行条件，飞行阶段

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要完成与杭州笕桥航空军官学校同等的飞行理论和技术，没有高度的爱国献身精神是不可能的。生活上一日三餐，在与青菜、萝卜、猪血打交道的年青人，被蒋介石、宋美龄了解发现后，作了一些改进。尽管在长时间由于营养不良而面呈黄色，但是这批年青人，仍然能克服生活上、飞行中的种种困难，证明这些青年是有战斗力的。当时一月伙食费仅十二元（法币），七元的零花。而在大后方的成都是风行一时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灯红酒绿大吃大喝对比下，无疑是一种严峻的考验。

飞行从初级开始。在初级飞行阶段，用当时苏联的战斗机，经过粉刷伪装成黄色的双翼双座小飞机作“教练机”（名为“弗力提”。在苏联叫“小苍蝇”F—15 或“小老虎”F—16（FLFFT）人们称之为黄翅膀的洋鸟儿。）通过这种仅有 120 匹马力的“小鸟”，竟培养出了在抗日战争中能作出较好贡献的一批年青飞行员。这些飞行员艰辛地经过“感觉飞行，特急，起落航线，向生胎儿，小河管，地面 8 字，定点着陆，长途飞行，空中编队，特级飞行，编队起落”等以及高级飞行时的跳伞训练等，全是利用这些飞机完

成的。

进入中级飞行阶段，（1940年由太平寺迁移到双流机场近区的第一期学生，已被淘汰了二分之一）。被淘汰的有改行机械，或待业退学回家。在长时间接触中，这批爱国青年，放弃了读书而投笔从戎！言谈间不少人暗中神往延安，但不敢公开表达。与这些热血可爱的飞行壮士谈话中，往往被他们那种“早日学成，飞向蓝天与敌人试比高下”，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所感染。加快我奔向战斗前线的步伐，我和同学们之间师生情谊密切而深厚。当时，一位同学被密告为有共党嫌疑，队上开会后，我及时暗中通知这位同学（薛介民）要注意。据了解，这位同学在美国早已成家立业了。

中级飞行的着眼点，在于培养学生从小马力飞机到大马力飞机各种感受与操作，供训练使用的是在五百五十匹马力左右的飞机（550），比起初级飞行的弗力提一百二十四匹马力（120），就高明多了。一般为“道路拉斯”中国仿造的羊城号，以及美制老可塞和新可塞到以后国民党模仿美制的大胆改制命名为复兴号。同学们在条件多样化的学习中，适应了各类不同性能的飞机，也增长了空军技能，提高了杀敌本领，证明这些学生在以后飞行时彻底扎实。

高级飞行是在一九四〇年后开始的，它要在训练时使用大马力的飞机，并要在更大的空间层和空域飞行。高级飞行毕业后，就可以编入部队作战。可以看出，国民党当时在空军建设上，是分三个阶段来实施的。其层次的着眼点是要把一个完全没有飞行经验的人，以如何通过一架小马力的飞机安全的飞上蓝天后深化到必要的应用技术加以养成。然后再经过把一个仅有一些小马力飞机飞行经验的人，过渡到另一种较大马力飞机的驾驶技能并深化空间层与空域范围，加以扩大的训练，使初级飞行员能在较大领域中发挥飞机种种特性，进入中级飞行阶段。最后训练如何使用

大马力飞机，并在更大的空间层与空域中，进行空中各种作战的技术训练，以完成高级飞行的要求。待合格后，编入作战部队。担负起作战任务。这一体制和飞行阶段，至今在世界和我国要训练一个合格的飞行员，仍然保持着这一培养方式。

四、国民党空军的主力概况

在抗日整个阶段中，国民党在对日作战的空军兵力上，只有两大主力，即轰炸飞行部队与驱逐飞行部队，因而，这些学生在结束了三个阶段历时三年之久的宝贵光阴，经历了生活、飞行中的锻炼，克服了各种困难终于取得了国民党政府认可，授以国民党空军官校（十二期）特班的毕业证，正式晋升为空军军官。在远征军和各地战区，包括党的十八集团军和解放区的地方行政部门，在国共联合抗战中都给予了这些年青的飞行壮士的关心和支持。他们中，有的奔向光明，走向延安，有的在两航人员起义队伍中，做出了一定贡献，有的为国牺牲了。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少同学怀着对祖国的强大而引为自豪时，一批从世界不少国家和台湾地区的同学，回国观光。一九九〇年，在二期（十三期特班）几十位同学欢聚在成都西城区党校大礼堂（借用）时，欢笑的面孔，紧紧的握手，热烈的拥抱，互相祝福的碰杯，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热泪盈眶。特别难以忘怀的是：这一批批在台湾空军退役后能亲自再到双流机场，簇桥太平寺空军士校母校旧地一游，旧貌全新，大家心情激动，众口同声说“北京、南京、上海、成都认不到了，祖国更加强大了”。不能不从内心赞扬。作为被邀请出席这次联欢会的我，禁不住从内心喊出了“团结就是力量”！大家一致希望祖国早日统一，为民族再立新功，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二〇〇二年五月一日

淡笔浓情的“抗日”画展

梅英（忆述） 王德润（整理）

张聿光先生原籍绍兴（会稽），海派名画家。早年学任伯年，善画花鸟。后由任派之秀润鲜活入于苍劲简洁之途，间亦画人物；略近于白龙山人王一亭。张氏之画常为书画名家器重。

抗战军兴，张氏于上海创作宣传画，上海沦陷前夕，辗转流入蜀，于1939年春莅临内江。经内江银行界接待在大南街信立商店客厅举办画展。画件百余件，多为花鸟人物。其画设色淡雅、寓深情浓，笔触苍劲，妙语双关。有幅《荔枝图》，题句为“妃子开颜笑，定是荔枝来”题面似乎说唐朝川南荔枝飞骑专送长安，致万马填沟壑，劳民伤财，不正活画当时豪门的腐化生活么？群众在观赏时，有位青年不无幽默地说：“难道我们四川人就不喜欢吃荔枝吗？”张氏颇有风趣地回道：“我正想另拟作一幅题为“日食三百颗，东坡不思蜀”之画，这美味儿使苏东坡甘愿长谪南海，四川人是喜欢吃荔枝的，也许苏氏忘了四川早有荔枝了。答语机锋活泼，使得观众大笑不止。另一幅，图中为一古碗，两侧各一人：一着官袍，一为贵妇，相对埋头在玩斗蟋蟀，题曰：“半闲时候”。意为宋朝奸相贾似道有“半闲堂”，而好斗蟋蟀，置国事而不顾，这画当有所指，力重千钧。又一幅为，梧桐枝上立一凤凰，题曰：“旧巢合是衔泥燕，飞上高枝变凤凰”。是引用清人句，暗讥卖友求荣及投敌汉奸的肮脏丑像，形象感人，确比空喊口号有力得多。另一幅是，一个背面老人像，身侧清淡柳树一株，老人仰望长天，题曰：“鱼沉雁杳”，表现出义民对沦陷区家乡无限的怀念，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生动形象的写照，又一幅为：一支半

开的荷花，荷花下寥寥几笔水纹，题曰：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饱含家国沦陷之苦情。展后，述者凝思了几句相赠：“白发五千里，杖笠蜀山行。霜毫燃血火，不愧会稽人”。

范长江与冯玉祥二三事

范长城 王进坤

血 书

1933年1月，日寇攻占山海关。

那时，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4岁的范长江，义愤填膺，决心走出书斋，投身实际的抗日战争。

他为首发起组织了“北大学生长城各口抗日将士慰问团”，先后去喜峰口、古北口、冷口、独石口进行慰问。不久，见日军即将向察哈尔、绥远方向入侵，他想，这些地方很快将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占领，长城内外的雄关古道，以后要想看也看不到了。长江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沿平绥铁路抢时间去最后目睹一眼祖国的大好河山。

返京时，路过张家口，见车站上贴了许多标语，原来冯玉祥将军已成立了抗日同盟军、正在召开反对“塘沽协定”的群众大会。长江十分兴奋，他挤进会场，并登台即兴发表抗日演说。由于“托派”思潮的影响，同盟军内部已开始采取恐怖政策，大肆逮捕所谓“不妥分子”，其时范长江穿的是抗敌后援会发的军装，却又没有军人身份证明。突然，被蜂拥而上的十几名手枪兵，不由分说地抓了起来，并施以脚镣手铐送进地牢。罪名是破坏抗日的“蓝衣社”特务！

塞外初春，午夜有如严冬，当时长江仅着单衣，在地牢中，四肢冰冻欲裂！不仅如此，地牢中常有人被拖出处决，说不定要遭

此大冤，但又无法向外界投递消息。危难之中，范长江急中生智，当即脱下唯一的一件汗衫，咬破手指，用鲜血在汗衫上写了24个字：

“以抗日见之于前线者，竟蒙蓝衣社之诬，请亲审！此上冯先生。”

狱吏惊惶地将长江的血衫转呈。

冯玉祥见此血书，慨然长叹！命令警备司令部迅速将此人从地牢中提出并立即释放，不得有误。这是被视为囚徒的范长江与冯玉祥将军第一次没有谋面的“会见。”

婚 礼

七年后，范长江已成为我国著名的新闻记者。1940年12月10日，与沈钧儒的爱女沈谱在重庆结为伉俪。

此前，他们在报上登了一则启事：“……所有新旧仪式，一概从删。是日下午三时至六时，在重庆枣子岚垭83号良庄敝寓举行茶会，欢迎本埠亲友光临。抗战期间，本外埠亲友地址迁移无常，故一律不再单独通知，以免万一遗漏，转致不恭，且民生日艰，无论何种馈赠，徒损物资，谨此声明辞谢。”据此，来贺者，仅有清茶一杯相待，如斯而已。以常规论，这样的婚礼，来者必定寥寥，因为主人实在太：“寒碜”了。

其实不然，消息传出，当天不仅来了大批进步爱国知名人士，就连国民党中许多高级军政人员也接踵而至。穿着圆口布鞋，身材魁伟的冯玉祥将军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手里攥着一幅亲笔撰写祝贺新婚夫妇的对联。

当天，长江和沈谱各自穿了一件洗得十分洁净的蓝布长衫，没有任何标志性的饰物。问题就出在这里，由于“一切从删”，特别是一些慕名而来的“神交”的朋友，平常读报，只知其名而未见其面，他们自己提了酒菜，带着酒杯，热情的来向亲人祝贺，挤

来挤去，左顾右盼，辨认不出到底谁是新郎新娘，这是始料不及的！

这时李公朴忙与刚到的冯玉祥商量，冯见桌上花瓶，乃大声说道：“有了！”公朴会意，二人即将瓶中的鲜花取出两枝，分别别在新人的衣襟上，以示区别，才避免了闹出更多的笑话！

第二天，重庆《新华日报》有如下报道：

“……。正如他们的结婚启事所说：‘新旧仪式，一概从删’，这没有仪式的婚礼，因此就不同凡俗，宾客们没有特别的馈赠，我们却看到冯玉祥先生和于右任院长的贺联，黄炎培先生、王昆仑、郭沫若、田汉先生的贺诗，周恩来同志也简要地祝贺新婚夫妇‘同心同德’。”

“鲜花堆满着客厅和过道，人们在欢乐的气氛中握手谈笑。简单的茶点代替了习俗的浪费。从下午五时起直到天暮，数百位来宾都尽情享受了这份难有的欢乐。”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冯玉祥先生贺联早已无法查找，但是，这位闻名遐迩的爱国将领，国府要员，亲临共产党人范长江的婚礼现场并撰写巨幅对联以祝贺的事迹本身，早已成了佳话，广为流传。

范长江首倡筹建江油李白纪念馆

伍丕庆

今年是唐代大诗人李白诞生 1300 周年。为此笔者带着“谁首先提出筹建四川江油李白纪念馆”这个问题，查阅了江油纪念馆现存的大量馆藏文献资料，发现最早提出这一建议的，是我国著名的新闻记者和中国记协创始人、解放初期担任新华社总编辑和人民日报社第一任社长的范长江同志。

1962年6月，时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兼秘书长的范长江来到江油，明确指示：国务院二办决定在李白出生之地江油县筹建李白纪念馆，并指出这是李白文化在国际国内交流传播的需要。1959年，安徽省已建有马鞍山李白纪念馆，但那里毕竟只是诗人终老之地。按惯例应在李白的出生之地江油县建一个纪念馆。

范长江一行前往李白出生地青莲乡，实地察看了附近的太白祠、陇西院等遗迹和周边环境，提出了对选址的意见和建议。回到北京后，又及时与老战友、时任国家文化部部长的周扬交换了意见。几个月后，四川省文化厅批准江油县成立李白纪念馆筹备处。

1963年2月20日，筹备处致信范长江，汇报筹备工作情况。

1963年12月10日，范长江看到来信，马上复函指示“纪念馆应很好设计，要有长远的考虑”。

1964年3月30日，筹备处致函范长江，请示有关筹备问题。5月1日，范长江复函，作出了建立李白纪念馆应反映李白主要精神（即在封建时代粪土王侯的精神）的指示。

这一天，范长江为纪念馆题写了对联：“秦宫自古输学士，蜀道而今笑诗人”。联中一个“笑”字将新时代、新变化喻于其间，川陕公路、宝成铁路相继建成昭示世人：今日蜀道不再难。这副对联后被刻制成楹联挂于馆内供游人观瞻，原件现珍藏馆中。

革命烈士栗立森

闵昌其（供稿） 蒋政伦（执笔）

热血男儿有气魄，投身革命为报国。

肝脑涂地身相许，壮烈牺牲赞人杰。

栗立森（1919—1949），曾化名孙立清。1919年6月23日出生于内江县倒湾（现内江市民族路），不久即迁居驼背场（现龚家乡大梁二社）。他自幼聪颖过人，为同龄人中之佼佼者，父母也极欢欣，对其关爱备至。他七岁发蒙，1927年至1939年期间，先后就读于内江县小学，资中岭南中学，成都市大同中学，完成了小学、中学的学业。他在成都求学时，正值抗日战争初期，举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同仇敌忾，深恶痛绝。抗日救亡运动在天府锦都风起云涌。同时，祠堂街的生活书店、《新华日报》经销店的进步书报杂志发售，成了青少年学生追求进步、憧憬美好未来的第二课堂。读者、购书者常常挤满书店，立森亦常利用节假日置身其间。因此，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在激流中勇往直前，投身于火热的时代大潮。

漫步假山·秘谈国事

1938年暑假，蒋政伦和同乡陈中枢由资中步行至成都求学。到了成都经陈介绍认识了栗立森。当时，栗在青羊宫大同中学高中肄业，陈在敬业中学高中就读，我随即考入南薰中学高中学习。栗是内江人，陈乃资中人，其父常在内江东坝街经营糖业，我本内江人，我们三人都是同乡，寄读蓉城，陌生者众，谚云：“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异地遇同乡，显得特别亲切友好，常常彼此相约，星期日是祠堂街开明书店或少城公园（现人民公园）聚会。由于相互接触渐多，栗给我的直观感觉是：方型脸，中等身材，面部微黑透红，二目炯炯有神，口齿清楚，谈吐流利，显得英姿勃勃。

一个星期天上午，我们三人在少城公园聚会，漫步游至假山，陈提议我们今天来谈论国家大事，栗说：“茶馆酒店贴有‘休谈国事’的标语，最好少说为佳，（暂停）真的要谈也可以，要注意不得外传。”陈和我都表态，这是肯定作得到的。栗接着说：“国民

党腐败无能，贪官污吏比比皆是，民怨沸腾，以孔祥熙、宋子文、蒋介石为首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大权和经济命脉。国民党的军队在前方抗日不堪一击，节节败退，国土沦陷。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报喜不报忧，民族危亡，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应该看到陕北共产党所领导的延安政府，廉洁奉公，上下一致，提倡民主、自由、平等……共产党的军队，长于打游击战，给日本鬼子以沉重打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青年志士岂能袖手旁观。应当义不容辞的担当重任。我们处于青年求学时期，黄金时代，最好多读点进步书籍。呃，总有一天，我只有铤而走险了！”陈和我都表态说：“你谈得太好了，可是你太激动了，太激进了，危险！！危险！！！”陈又说：“我和蒋都保持中立。”通过这次聚谈，其慷慨激昂之情，溢于言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粟为人爽直，性格开朗，思想激进，反映敏捷，谈吐自如，广交朋友，他是一个追求进步，向往革命的杰出青年。

乐于助人·解决困难

一九三九年上期，我因经济拮据，中途辍学。陈将我的失学情况告知粟后，粟立即前来见我，他安慰我说，失学不要紧，可想办法就业嘛，现在你还有困难没有？我说有困难，每天吃馆饭不划算，能够搭伙就好了。粟说这有何难，你随我来。粟立即引我去顺城街×号一座住家房内，给我介绍认识了一位省政府秘书，我看他约半百年纪，脸呈长圆形，两颊微陷，中等身材，沉默寡言。他招呼我们坐下后，粟说明我的失学情况后，准备在秘书家搭一段时间伙食，按食堂收费标准付伙食费。秘书立即表示同意，叫我每天上午七点半，中午十二点，下午五点半，准时去他家吃饭。关于伙食费随便给点就行了，因为失学青年要找工作，经济上有困难。实际收费比食堂还低，当时我充满感激之情，难以言表，只说工作以后，定当重谢。粟和我告别秘书离家以后，我一

再向粟表示谢意。粟亦说明彼此既是同乡，又是好朋友，你有困难应该帮助解决。今天专为此事而来，幸好解决得很顺利，你的工作问题，以后再谈。因粟还有急事，我们彼此匆匆分了手。

我在秘书家搭伙一月多，就按报载招生广告，考入正中书局，实习三月，就作会计助理员，约两月后，我写信约陈星期天外出，一同去开明书店，少城公园找粟聚会，一次、二次、三次都未见粟。后来我又去顺城街找秘书，邻居说秘书早已搬家，搬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继而陈也离开成都不知去向。我到处打听粟的下落，如石沉大海毫无结果。万没想到，顺城街彼此分手，竟成永诀，给我留下了终身遗憾。

投命开展统战工作

1939年，粟立森考入重庆求精商学院肄业，旋即参加中国共产党。1942年在西南学院工作时，组织“黎明剧社”，任社长。1945年，粟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以学生身份作掩护，公开活动，同各阶层人士广泛接触，广交朋友，扩大团结面，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筹集资金·上演《雷雨》

1946年，当抗日战争结束后，在各大城市掀起反独裁、反内战、争取民主运动，如火如荼。昆明西南联大教授、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同该校教授、爱国诗人、学者闻一多，都积极参加斗争，于7月中旬，均遭国民党特务杀害，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和谴责。

1946年末至1947年初，粟以学生身份作掩护，多方求助，日夜奔走，克服重重困难，竭尽全力，筹集资金，并组织进步学生，排演著名剧作家曹禺创作的四幕话剧《雷雨》。在上述的政治形势下，排演此剧，最富有现实意义。

《雷》剧以1925年前后中国社会为背景，通过周、鲁两家错

综复杂的爱情、血缘关系和尖锐的阶级对立，揭露了封建资产阶级的罪恶，预示了旧制度的必然崩溃。

经过反复精心排练的《雷雨》，在重庆土桥、南温泉一带义演，以主题鲜明，典型突出，对立面强，故事情节错综复杂，兼以演员进入角色，配合默契，剧情进入高潮，使人惊心动魄，荡气回肠。激起观众对官僚资产阶级的无比痛恨，对使女和大海的惋惜同情。深受观众喜爱和赞誉。

受党派遣·筹运军火

1945年至1948年间，粟立森冒着出生入死生命危险敢于负重重任。他受地下党派遣，往返于江津、泸州等地，开展地下秘密军运工作，筹集武器军火，支援人民武装。其弟粟立全在内江沱江中学（现内江二中）高中就读。为了满足思兄之情，于1948年暑假，从内江步行至双凤驿，搭乘一段路的汽车，又步行至泸州，找到靠河边的一个小旅店，才与哥哥立森相见。立全由于旅途跋涉，身心疲惫，途中又受疟蚊叮咬，身患疟疾（俗称打摆子），本来弟兄久别重逢之喜，却喜不起来。弟兄虽然同住旅店，其兄常常深夜不归，从兄与朋友的言谈中，隐约知道是忙于军火的事。虽手足之情，久未蒙面，却无暇倾心尽叙。权衡轻重，私轻公重，不几日，立全只得怅然若失地与兄分手，离泸返内，谁知泸州一别，竟成永诀。

被捕狱囚·坚持斗争

1948年10月，军火事发，粟在泸县被西南特区军统局（即西南长官公署二处）逮捕，囚于重庆歌乐山渣滓洞八号监狱（进门左边第二床位，左四右二共住六人）。他坚强乐观，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念。

1948年12月，粟立森曾积极参加了反对监狱当局虐待政治

犯的绝食斗争，取得了改善狱中生活、取消对政治犯的非人待遇，为龙光章开追悼会的胜利。其中有两副挽联，对比鲜明，耐人寻味。

一副是署名李磊（看守所所长，人称猩猩）的挽联，表达了特务的幻想。

“人生百岁难免一死；

愿君超凡直上九天。”

一幅是六室的挽联，道出了难友们的心声。

“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

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为庆祝淮海战役取得的决定性胜利，难友们在狱中举办春节联欢。粟立森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其中有贺年片、对联（亦称春联）及部份节目，录后：

楼下一室贺年片：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楼上一室贺年片：

“星火燎原，愚公移山。

众志成城，水滴石穿。”

楼上七室贺年片：

“熬过冬天，迎接春天。

越过高墙，穿过云端。

高山仰止，黎明来兮。”

有个牢室的同志用俄语和英语祝贺，在贺年片的两面都写着“新年快乐”这个短语：

正面是“С НОВОГО ГОДА

反面是 New years Happy!”

楼下七室对联：

两个天窗出气，一扇风门伸头。

横额：乐在其中

歌乐山下悟道，渣滓洞中参禅。

横额：极乐世界

楼上五室对联：

洞中才数月，世上已千年。

横额：万象更新

楼上二室对联：

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横额：春回大地

上述贺年片和对联，比较含蓄，寓意深刻，对仗工稳。特务看了，莫明其妙。“知音”看了，翘起大拇指连声夸奖说：“妙，妙！”

演出节目有踢踏舞、空心筋斗、叠罗汉、《月儿弯弯》、大合唱等。

壮志未酬·慷慨就义

当粟立森知道监狱看守黄茂才是比邻荣县人，仅二十多岁，是一个到渣滓洞不久，没有参加特务组织的一般看守，出身农家，思想性格比较温和纯朴，便主动接近他，与他谈心交友。粟对黄说，国民党腐败透顶，大厦将倾，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全国解放迫在眉睫，要他不失时机选择道路。同时，江竹筠（自贡人）、曾紫霞、何松涛等，也利用放风机会，做黄的工作。经过对黄的启发教育，黄逐渐倾向革命，曾冒着风险，给江竹筠、曾紫霞、胡其芬、何雪松、陈作仪、刘德慧、田一平、粟立森等传递书信和进步报刊。黄曾准备营救粟立森出狱，后因局势急变未遂。

1949年11月27日，重庆临近解放，粟立森在狱中被国民党特务杀害。1950年2月，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粟立森为革命烈士。从1950年2月起，其妻张氏每月一直在内江县（今内江市市中区）民政局领抚恤金。

1983年9月3日,由国家民政部颁发

革命烈士证明书

粟立森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一九八三年九月三日

注:

1. 证明书系精厚白纸四开印制。
2. 证明书左边缘骑缝裁剪处,编号:“内江府烈字第零伍肆号。”
3. 证明书左侧记,姓名、性别、籍贯、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入党时间、牺牲时间,地点,原因,批准机关时间,填写机关时间,化名等。
4. 右下角盖红色圆形章,周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中心“红五星”下“天安门”图案。

1984年7月,《歌乐中魂》(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104页及《红岩春秋》1989年增刊106页均载“革命烈士英名录”:粟立森(1919—1949),四川内江人,求精商学院肄业,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西南学院工作时,组织“黎明剧社”任社长,1948年10月在泸县被捕,1949年11月27日殉难于渣滓洞。

斗转星移,光阴流逝,现已进入二十一世纪初期,正值粟立森烈士殉难53周年纪念。回忆当年与他蓉城聚会,虽属同乡,却亲似手足,密如挚友,其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宛然犹存。缅怀之情,梦绕魂牵,难以平静,特献拙诗,以示哀悼!

英杰粟立森,革命志坚贞。

派遣膺重任,危难见忠诚。

筹资演《雷雨》,震撼观众心。

秘密运军火,敢冒黑风行。

就义慷而慨,千古褒精英。

先烈未竟业，自有后来人。

立森家庭成员状况

父：栗时铭 务农 1954 年病逝

母：栗孙氏 务农 1974 年病逝

妻：栗张氏 83 岁 双眼失明

弟：栗立全 盟员，1932 年出生，兰州大学毕业，自 1956 年起，留校任讲师，1972 年调内江一中任教师，现已退休，正欢度幸福的晚年。

长子栗本全 党员 曾任大梁二队支部书记。

次子本德、三子本树、四子本良均务农。

参考书刊：

《红岩的故事》(杨益言著)；《歌乐忠魂》《狱中斗争纪实》(傅伯雍、张正履执笔)，《内江盟史资料专辑》、《红岩春秋》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烈士殉难 40 周年纪念特刊。

本文承傅伯雍、张正履、杨益言(园林编研室提供部分文字资料)，还有何舒杰、栗立全提供的口碑、文字资料。特别是闵昌其亲赴荣县，走访黄茂才提供了口碑资料，笔者特致谢意。

从内江走向朝鲜战场的邱少云

郭安民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在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二日抗美援朝战争中为了整体、为了胜利，忍受烈火燃烧而壮烈牺牲，已整整五十年了。他的英雄事迹除报道的情况已家喻户晓，他的战斗历程鲜为人知。我是他的同班战友，连队文化教员，战斗中的排长。江泽民总书记一九九二年八月十二日视察甘肃武威驻军题词“发扬邱少云精神建设过硬部队”。我利用这个好的机会，详细地回忆了我和邱少云在一起的战斗历程，向全国全军汇报。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乘胜挺进大西南，十二月成都解放，邱少云在童桥获得新生。邱少云从小受尽苦难，经过部队的政治学习，忆苦思甜教育，他自愿留下，在内江参加了人

民解放军。

一九五〇年初，国民党在四川的残余势力不甘失败，他们与当地土匪勾结起来暴乱，妄图颠覆新生红色政权。解放军在内江担负工作队、战斗队双重任务，负责内江地区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工作。当时资中太平区、安岳周礼、内江高粱区一带匪情猖獗，邱少云所在连队化装成乡下农民，深入匪窟，在高粱镇活捉匪徒×××，为连队立下集体一大功。

正当各级政权建立之后，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纠集十五个国家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侵犯我国领空，第七舰队驻入台湾。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巩固人民政权，人人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邱少云和他的连队都报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全师在内江梅家山召开誓师大会。全体指战员徒步行军到重庆乘民生公司轮船，顺江而下至武汉，再乘车至河北内丘县驻扎下来，进行入朝作战准备。我随军政干部学校分配到九连工作，迎来送往是部队光荣传统，干校送出，连队接人非常热情。在大雪纷飞的半路上，一个清瘦的战士接过了我的背包，他就是大功于九连的战士邱少云。

路上，邱少云对我说：“小教员，到我们六班吧，我们盼望一个文化人教我们开眼识字啊！”连长朱斌同意了他们的要求，把我分配到所在的2排作宣传员。深夜，邱少云同我摆起了“龙门阵”，他说：教员你能一天教我一个班（识10个字），10天教我一个排，40天整训能教会我写信、写决心书吗？”我说行，可战斗临近，我一个学生娃，不会打仗呀！邱少云说“我教你瞄准、投弹、拼刺刀、挖工事”。第二天，我教他识字，他开口就问“写共产党好，祖国万岁，毛主席亲，怎样下笔？”我细心地在雪地里一笔一笔地教，邱少云一笔一横地划。“一个班”当天超额完成了。10天，他学会了“一个排”，我也学会了投弹取盖、拉线、50米。40天下来，邱少云能写简单的决心书了，他写的第一个决心书是“严守纪律、服从命令、英勇杀

敌。为了祖国，为彻底消灭美帝侵略者，为了朝鲜人民解放事业，献出生命。”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傍晚，部队开进朝鲜。刚过鸭绿江大桥，美国“油挑子”飞机就在我们头顶上盘旋，不时扔下几颗炸弹，地面上腾起团团烟火，映红了天空。行进到新义州，迎面扑来刺鼻的焦臭味，美丽的新义州城市，只剩下一片废墟。美帝国主义残暴的罪行，激起战友们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决心。部队连续夜行军，战友们负重80多斤，每夜要走百华里。邱少云自己脚上打起了血泡，还帮助我这个“小教员”背枪。一到宿营地，邱少云就为全班同志烧水洗脚，挑血泡。

行军的第六天，经过平川里的一个山村时，美国飞机刚飞来轰炸过，一片火海中，一阵阵微弱而凄惨的哭泣声随风传来。连长命令6班寻着哭声搜索前进。邱少云冒着浓烟，冲进一间房顶卷着熊熊火焰的茅屋里，里面的人都被炸死了，只在水罐边找到了一个小孩。邱少云挟着她奋力撞倒板壁，从房顶随时都可能垮塌的茅屋里冲出来。月光下，我们看到他救出来的是个小女孩，大不过三四岁，眉毛、头发烧掉了不少，脸被熏得很黑，右脸还烫起了好几个大水泡。小女孩两只小手抓住邱少云不放，哇哇哇只是哭。朱连长抱过小孩，沉痛地对我们说，如果我们不抗美援朝，祖国的儿童也会和这个小姑娘一样。这笔血债，一定要美帝国主义用血来还。

部队继续前进，我背着小孩行军。小女孩说的话，我们听不懂，只听懂了一句，她的名字叫“朴顺姬”。部队通过山谷进入平川以后，王指导员叫我把小孩交给当地的里委员会负责人，并拿出10袋军粮供给孩子度日。50年过去了，不知当年的小顺姬是否还在？现在在哪里？生活得怎么样？

20天后九连按时到达目的地连川。没有一个人掉队，没有一个人伤亡，全连荣获了“出国千里行军第一功”。我和邱少云都荣立两小功。

4月20日第五次战役临战前夕，团里决定从9连抽10名战士，到团里作预备队，学习军事技术，同时做些战斗保障工作，比如运弹药，救护伤员等等。连长宣布名单，当点到邱少云名字的时候，他两眼瞪得很大，嘴唇动了一动，看样子就要叫喊出来。连长看见他这个样子，动情地说：“说句心里话，我也舍不得你。但是组织决定呀！”邱少云紧咬嘴唇，没有再吭一声。与此同时，我也从二排调到连部作敌工员。

25日夜里，9连奉命向含水洞罗家山发起攻击。正面之敌是菲律宾营某部，依托复杂地形和坚固的工事，用密集的火力，阻击我进攻。连长指挥1排和2排，连续冲锋三次，战友锁德成和杨明志从敌人手里拖过他们的机枪，打开了一条血路，部队冲上去，占领了162高地。连指挥所前移到高地上，部队继续往前冲。不幸一发炮弹打来，命中指挥所，卫生员葛寿明牺牲，朱连长大腿被炸断，我也身负重伤。朱连长躺在战壕里，大口大口地直喘气，大滴大滴的鲜血，不住地从棉裤里渗出来，由于失血过多，脸变成了腊黄色，满脸好久没有剃的胡子，显得更长了。通讯员小张要背他下去，朱连长不肯，命令司号员小秦，赶快通知了排长，作好冲锋的准备。这时，邱少云送弹药上来，要背连长下火线。连长要邱少云背我，说：“上级要我不惜一切代价，拿下罗家山。现在，罗家山还在敌人手里，我不能下去，你把小郭背下去吧。他伤得不轻，又是个文化人，要好好保护。”朱连长转过脸，叫通信员通知王明世指导员前来指挥所，组织新的进攻。说是一定要拿下罗家山！”他说着，霍地从地上站了起来，两眼喷火般地直望着罗家山方向，就这样光荣地牺牲了！

邱少云掩埋了战友，背着我下了山坡。他的棉衣，被我的鲜血染红了一大片。他一面走，一面安慰我：“小教员，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再受伤了”。我倒在他的背上，一点说话的力气也没有。快到北汉江的时候，他说：“小教员，你我相处100天，你教会了我写字、写

信、写决心书。而我教给你的军事技术太少了，使你受了伤，真对不起。现在，我心里只剩下一个仇恨，一定要把美国鬼子消灭光！”邱少云把我背过北汉江，一位叫做金再熙的朝鲜劳动党党员，从他的背上接下了我，继续往后方医院送。我眼睁睁地看着邱少云重回战火纷飞的前方而去。

由于伤势太重，我被送回祖国接受治疗。直到1951年11月，经过几度申请，才获准重上前线。重回大功九连以后，上级安排我作文化教员。1952年5月，我被任命为炮排排长。在此之前，邱少云已经回到连，在1排3班作战斗组长。

我团部署在平康与金化之间，阵地前面，是3000米的开阔地。再往前，是敌军阵地391高地。高地长约1000米，南北两峰相对，形如屋脊，四面都是陡壁，像一艘搁了浅的舰船，突入我军阵地。四周地雷密布，架满了密密麻麻的铁丝网。高地由南韩一个加强连驻守，有很多地堡，每个地堡间有两三挺机枪，组成交叉火力网，射界开阔，易守难攻。

391高地既是敌军交通要道，又是阻碍我军进攻的一块绊脚石。敌人从高地上，可以俯视我纵深平原。我们的车辆运送给养、弹药上五圣山和上甘岭，他们看得一清二楚。必须迅速攻占这个高地，遏制敌军机械化部队的威力，使我军向前推进到平康一线，是当时极其重要的战略任务。夺取391高地，最困难的一步，就是如何通过高地下方那3000米的开阔地。长距离冲锋，战士体力跟不上，而且必然要蒙受极其重大的伤亡。为了缩短中间冲锋时间，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师团首长决定：在发起攻击的前一天夜里，让部队潜伏到高地四周半人多高的乱草丛里，待到次日黄昏，出敌不意，突然发起进攻，一举拿下391高地。我大功9连，奉命与兄弟连队一起，完成这项艰巨而光荣的潜伏任务。

战前，大功9连进行了一次实地潜伏演习。张显扬师长、孟建明团长和赵建忠营长站在山头上，但见秋风轻轻地吹，把高高的蒿

草吹得随风摇摆，看不出一丝动静，反复仔细搜索，也没有把潜伏在山坡上的战士们认出来。师长高兴地放下望远镜，对我们的连长程子英说：“凭我这个老侦察兵的眼睛，也没看出破绽，9连的潜伏，验收上了。让我再看看部队如何打冲锋，也好向秦基伟军长报告。

程子英连长一声令下，司号员小秦吹响了冲锋号。顿时，草丛中一个班揭开伪装，跳出草丛，手持炸药包、手雷和爆破筒，向山坡猛扑。这是3班为突击排开路。首长指着前面匍匐前进最快、动作最敏捷的战士问：“这是谁”？程连长说：“3班副班长李元兴。”话声未落，李元兴已接近地堡，连滚三遍，侧身把手一举，两个手雷扔了进去，还未等到轰的一声炸响，李元兴就已撤回安全地方隐蔽起来了。

下一个是邱少云向另一个地堡攻击。他的动作更利索，只用了3分钟就通过了开阔地，师长看得直点头。但见邱少云接近地堡，连滚三遍，拉开导火绳，把冒烟的炸药包塞进地堡，一个猛转身，向右侧洼地翻滚过去，谁料动作稍稍慢了一点，爆炸掀起的泥土盖满了他的全身。气得连长大喝一声：“真熊”！

邱少云内疚地站起来，脸上汗珠直冒，报告连长，请求再来一次，“保证完成好”。连长不满地瞪了他一眼：“来不及了。这次潜伏作战，你不参加了。”卫生员几次喊“报告”，连长理都不理，忿忿离去。邱少云牙齿咬得紧紧的，眼泪长流。小卫生员也哭了。

学习结束后讲评时，自由发言。连长盘腿坐在战士中间，听取同志们的意见。李四虎是个快嘴，冲着连长“开炮”，说连长看见邱少云出差错就发火，又犯急性病了。卫生员从地上蹦起来说，邱少云没有错，他大腿上生了个馒头大的硬疔子疮，还忍着疼痛摸爬滚打，一声不吭，坚持演习，连长不问青红皂白就训人。程连长连忙撕开邱少云的裤腿看，一把拉住他的手，连连说：“错怪你了，这次战斗，你可以参加。”

10月11日19时,9连整整齐齐地列队,接受首长在出发前的检阅。队列里,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清楚,进入潜伏阵地以后,如果暴露目标,几百人就将在敌人万炮齐轰之下,全军覆没。然而,我们全连战友,人人明白自己的责任,充满了光荣感和自豪感,决心去创造战争史上的奇迹。就在这时,平时不善言词的邱少云从队列中跑出来,从贴身的军衣口袋里,拿出他隐藏了几个月的一张纸片,庄严地递交到指导员手里。战后,我们才知道,这是邱少云同志的《入党申请书》:

亲爱的党支部:

请考验我吧!如果我这次战斗中牺牲了,希望党承认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邱少云

一九五二年七月

10月11日团、营首长作了最后一次战斗动员,部队作好伪装,从坑道出发,人不知鬼不觉地运动到高地下面,潜伏了下来。12日黎明,平康以南的山岭和平原上,大雾弥漫。太阳把晨雾驱散以后,391高地露出了黑黝黝的山体。山下,茫茫草海里,潜伏着全副武装的500多名志愿军。我们不能相互交谈,不能咳嗽,不能发出任何一丁儿声音。邱少云所在的突击一排,在排长孙纪友的指挥下,成三角战斗队形,潜伏在高地东麓一条杂草丛生的土坎下,他们的后方,是一条小水沟,距离敌人只有60米。按照预定作战方案,部队从11日19时开始要在这里潜伏24个小时。按照预定计划,12日18时半,我军炮兵对敌实施猛烈的30分钟炮火轰击,19时整,潜伏部队看到三发红色信号弹,就出敌不意发起进攻。

太阳慢慢地升起来了,我们在草丛里,已经潜伏了七八个小时。全身又酸又痛,真想站起来直一下腰。但是,大敌当前,谁也没有动一动。

11点过,两个敌人从地堡里钻出来,下山到水沟取水。眼看要

走到邱少云和李元兴、李四虎的面前，正在这最紧张的时刻，我军炮兵发言了，一发炮弹打翻了一个，另一个掉头跑回去了。敌人似乎感到情况可疑，飞来一架飞机侦察，但是没有发现我们。不一会，敌人炮兵向高地前沿施放一排烟幕弹，企图把高地用烟幕弹遮盖起来，让我军无法对之进行观察。其中一发，碰巧在邱少云身边爆炸。秋尽冬来，地面上的荒草早已枯干，当即烧起熊熊烈火，很快就将邱少云包围了起来，烧得他全身是火，痛苦不堪。邱少云身后，就是小水沟。只要他回身滚下沟里，或者随便扑打一下，身上的烈火就会熄灭。但是，这就将惊动敌人，引来敌人飞机、大炮的狂轰烂炸，几百名战士就将陷入绝境。我清楚地看见邱少云咬紧牙关，身体紧紧地贴在地上，颤抖着的双手，深深地插进泥土之中，忍受着烈火焚身的痛苦煎熬！

大火烧了约一个小时，野草烧完了，邱少云的衣服被烧成了焦炭灰，人活活被火烧死，壮烈地牺牲了！在这整整大约一个小时的生死煎熬之中，邱少云为了不暴露目标，为了战斗的胜利，半点也没有动一下，连吭都没有吭一声！李元兴、李四虎等几位战友，也被不同程度的烧伤。他们和邱少云一样，也半点没有动一下！

阵地上，依旧一片寂静。好像什么也从未发生。几百名志愿军战士，继续潜伏在敌人的鼻子面前。好不容易熬过了这漫长的白天，夜幕开始降临。18时半，我炮兵按时对敌人进行破坏性的猛烈袭击，万炮齐鸣、声震天地。19时正，三发红色信号弹划破长空，我和战友们一跃而起，冲锋号、喊杀声和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交织成一片，汇成一个最强音：为邱少云战友报仇啊！不到40分钟，就攻克了三九一高地。

战斗结束以后，王明世指导员跑步去到邱少云烈士的身前。烈士的遗骸已经烧得萎缩，近乎一团焦炭。王指导员脱下自己的大衣，把他包裹起来，同志们把他抬回救护所，就在近旁暂时安葬。坟上插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邱少云烈士”几个大字。

邱少云烈士的英雄事迹，很快传遍全军部队，传遍了全中国，成为全体志愿军和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根据邱少云烈士的生前意愿，部队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志愿军总部为他记特等功，授予他“一级战斗英雄称号”。1953年6月25日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授予他“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英雄”称号，授予他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我87团九连再次荣立集体一等功。邱少云的副班长李元兴荣立特等功被命为二级爆破英雄；邱少云同一个战斗小组的李四虎荣立一等功。我在阵地上活捉一个敌人，缴获步枪一支，也荣立二等功。

停战协定签订以后，1953年8月，部队把邱少云烈士的遗体运回祖国，正式安葬在沈阳市烈士陵园。邱少云烈士的英雄事迹，永垂青史，光照人间，永远鼓舞和激励着全国各族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奋勇前进。

战后，中朝两国人民，共同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在391高地的石壁上，铭刻了一处醒目的摩岩：

为了整体，为了胜利而自我牺牲的伟大战士邱少云同志永垂不朽！

注：当时，我志愿军战士把美空军F-86飞机叫做“油桃子”。朝鲜的“里”大体相当于我国的乡。

五十年前一场军民联欢晚会

向汝君

那是1952年春节的事。

1951年初夏，为适应当时军事斗争形势的需要，川南军区成立了一个为部队培训无线电收发报人员的报务训练队。建立之初，先在云峰寺驻了一个多月，后迁移在泸州蓝田坝机场附近的邻玉

场街口。学员是从全区部队（含各军分区、警卫营）选调来的政治上比较纯洁，具有初、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年轻军人，三个男兵分队，一个女兵分队，共140多人，内有少数排级干部，多数是战士、班长、卫生员、文工团员、宣传队员等。几名队领导都是具有几年乃至十几年军龄的同志，他们都十分重视搞好军政、军民关系，除组织学员帮助群众车水灌田外，还经常教育学员们多为群众做好事。学员们通过学习社会发展史，懂得了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增强了对劳动人民的感情，积极利用课余时间帮助孤寡老人挑水、扫地。1952年新年临近，队里决定组织一场以部队演出节目为主的军民联欢晚会。

开始是打算搞歌舞，说唱等小型节目，后经摸底，发现有力量搞一个大的节目，最终确定演出多幕大型歌舞剧《解放》。该剧的主题思想和故事梗概同《白毛女》有些类似：贫苦农民李大牛一家深受地主刘四爷的压迫、剥削，爷孙俩被迫给刘家干活抵债，伪保长勾结地主把李大牛抓去当了壮丁，后大牛在战场上被我军解放，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员，经过诉苦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在战场上英勇杀敌，随部队打回老家，解放了自己家乡，家乡人民载歌载舞欢庆解放，斗争地主和保长。

演职人员全部是学员。导演由徐涛（女，江西人，原是某军分区文工队干部）担任。在挑选演员时，每个角色都先由几个人试戏，最终确定一人。筛选的结果，男主角李大牛由我饰演，大牛爷爷由刘柱辉饰演，大牛妈由刘强（女）饰演，地主刘四爷由潘致富饰演，伪保长蒋二里由三班一个学员（记不清姓名）饰演，另外还有我军班长、战士、农村男女群众、国民党军等角色多人。

我在到报务训练队之前，原在内江警卫营任文书，没有什么演戏经验，在另外还有来自文工团、宣传队的同志的情况下，导演选中我，我想并不是因为我的演技，而是我的年龄和李大牛一样十九岁，入伍前生长在农村，某些方面和角色较为接近吧？

角色分定以后，背台词、对台词，以及布景、道具等准备工作，都安排在课余时间进行。训练队露天坝有一个一米余高的土台子，略加修砌，便作为排练和正式演出的场地。除夕前两天晚上彩排、领导审查，本队的多数同志便看了演出。大年初一晚上正式演出前，除在邻玉场街上张贴海报外，还派人到各村寨口头通知，不到天黑，周围附近几里路以内的群众便带着小凳看戏来了，少说也有一千多人。

演出前，队领导和乡领导分别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内容紧扣军民团结、共度新春佳节主题。

演出开始，李大牛（我）第一个出场，肩上扛着鼓胀的麻袋，唱词是：“李大牛，年十九，在财主家把活儿扛……”全场观众立即静了下来，大牛来到台口，放下麻袋，继续唱道“老爷爷，六十五，白发苍苍，只因为，欠下了，财主的租粮，因此上，爷孙俩，一年到头白给他扛，不是打来就是骂，刘四爷他黑心肠……”

爷爷出场，他躬着腰，背着麻袋，一步一顿地唱道：“李老五，咬牙关，走也走不动……”观众的情绪进一步被剧情感染。

保长蒋二里的造型有点像川剧里的丑角，他是念着快板词走过场的：“我姓蒋，名叫蒋二里，外号人称我活剥皮，今天上方来了公事，抓提壮丁不能延期，我急急走那个快快行，心里盘算着雪花银……”

李大牛被抓走以后，爷爷气急身亡，家破人亡的大牛妈唱段悲愤、凄凉：“秋风起，树叶落，又到了八月中秋，大牛妈，我这里，分外忧愁……”饰演大牛妈的刘强同志，原是内江军分区的，做过宣传工作，有一定演技，加上风声、灯光等效果，听起来如怨如诉。观众中有人哭出声来，后来听说是一个老婆婆，他的儿子被国民党抓走几年，至今音讯全无。

李大牛在战场上同敌人拼刺刀那场戏，排练时一个老同志带

着我反复苦练，演出中获得观众喝彩。

欢庆解放、斗争地主刘四爷一场，演员们在台上呼口号，观众在台下跟着喊口号，演出达到高潮。

通过那次晚会，不仅进一步密切了报务训练队同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而对我们自身也是一次生动具体的阶级教育和拥政爱民教育。以后部队整编，学员们分散到四面八方，一部分同志（其中包括我）被调到了当时驻守在云南边疆的野战部队，但“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却在我们心灵深处牢牢地扎下了根。五十年岁月沧桑，我们国家和军队的面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拥政爱民这一光荣传统却很好地传承下来并发扬光大。军爱民，民拥军，我想，这是人民军队的本质所决定的，也是我军克敌制胜的力量源泉。

联 谊 小 记

徐智广

公元 2002 年元月 15 日，内江市中区老政协委员联谊会（以下简称“老联谊会”）三组，假座市委党校内聚会。李朝德组长宣布两项活动内容：（1）座谈 2001 年 12 月 20 日区“老联谊会”理事会对会员大会的工作报告。（2）贺徐工八十寿辰。组长称赞报告事例实在，会员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谈到与我交往印象，认为相见恨晚。继之出示“中国工艺扇”一件。志庆相赠。该扇系由汤祥栋副组长选赠，专请著名篆刻书法家李文馥先生题扇面。录曹操（步出东门行）诗句，堪称诗书双佳的文化纪念品。

组长颁赠，我躬身受领的瞬间，张秉南理事自备相机，及时摄入镜头。我赧即恭敬致谢：

谢谢区‘老联谊会’三组集体友情，谢谢理事们筹划服务；谢

谢名家墨宝题扇的情谊。

“昔称七十古来稀，而今世有百岁人。”难得的是：老一代经风雨，见世面，闯过战乱、运动、灾害、浩劫多重折腾关，跨入新世纪，晚逢盛世，来之不易。个人经历平凡，也难免攀崖涉滩，托福于党的统战政策和科教兴邦战略的教育和引导，幸能有惊无险或化险为夷，走进新时代。

联谊座谈，广泛深入；评价工作报告，朴实无华；称道区政协作风，平易亲切；赞许区文史资料，精选博引；欣慰率先创立“老联谊会”，敬老集贤，倡导适十祝寿，贺勉有加等。畅所欲言，谈笑风生。

座谈毕，张秉南理事选好外景，支妥三脚架，拍下参会全体合影，午餐时，又即席拍了4张相互祝酒镜头。会后联系冲洗扩印合影，署字塑封，取件分发，一竿子服务到底。张理事热心肠老当益壮，所摄影照，清晰传神，引人入胜，浮想连翩。

上世纪40年代及50至80年代，酒精工业和机制糖业，先后曾是内江辖区（专区、地区）的支柱产业。我与之打了几十年的交道，说不上爱岗敬业，却也是机遇和机缘启迪，尽过微力，五十年代被接纳为基层政协委员，受到鼓舞。1989年，区政协文史委主编在常委会议上，为《纪念内江解放四十周年专辑（第28辑）》征稿，我写了《五十年代内江机制糖业的建设和发展》，编入了该辑，后聘为编委，连续至今，与区政协文史界结缘。续以糖酒“三亲”经历，提供文稿。晚年参加区“老联谊会”后，被选为理事。和区政协科技界、文史界社会交往的机遇和机缘，获得多方面教益，有助我老有所依，老有所学，跨入新世纪，走进2002年，迎来农历壬午马年。

2002年是近百年才遇的数字对称年（1001、1111、……1991、2002）。对称意味均衡稳定，国泰民安。马为六畜之首，象征超前进取，马到成功。李文馥名字题录曹操名诗，巧用“老骥伏枥”典，

妙喻双关。联谊合影会员 21 位，神态安祥，恰合跨入 21 世纪之吉兆。联谊于翔龙山上市委党校校园内，引用成语，“攀龙附凤”，“地灵人杰”不亦宜乎！爰小记联谊动态，旁白合影心声。聊供存忆。

这就是沱江

黄建军

沱江，是内江重要的地理特征，文人骚客、平民百姓言必称沱江河，我们的诗人常常把“啊，沱江，我的母亲河”写入诗行，内江电台有“沱江通讯”，内江广播电视报有“沱江文苑”文艺副刊，可见沱江与人们之亲密，内江人对她之钟爱。沱江河，究竟是怎样的一条河，我就来饶舌几句，给家乡父老提供点摆龙门阵的资料。

古称中江

沱江属长江上游左岸一级支流，为四川省四大河流之一。

沱江，两晋时称洛水，也称绵洛，又名新都江和牛鞞江，南北朝时称洛水为绵，因居岷江和西汉水之中，又名中江。自南北朝历隋、唐、五代、宋、元至明末一千二百年左右都沿用此名。至清初，由于胡谓在《禹贡锥指》中把中江与成都平原上的被称为《禹贡》梁洲之沱江贯穿起来，一并称为江沱，而江沱当时即称沱江，故清初至今就把中江更名为沱江了。

沱江流域

沱江其流域地理座标为东经 $103^{\circ}38'$ ~ $105^{\circ}50'$ ，北纬 $28^{\circ}53'$ ~ $31^{\circ}36'$ 之间。西北部以龙门山脉为界，西联岷江，东临涪江，汇水面遍及川中腹地 36 个县（市），流域面积 27860 平方公里，约占全省总面积的 6.2%，为长江流域总面积的 1.54%。

沱江上源为绵远河，发源于川西绵竹县九顶山东麓老鹰窝梁子，出汉旺场入成都平原，汇石亭江、蒲江、纳青北江、毗河的

岷江水源，至金堂县赵镇汇流点，始称沱江。穿龙泉山形成金堂峡。入丘陵区经简阳、资阳、资中、内江、富顺至泸州市入长江，全长 629 公里，以赵镇三江汇口为界，之上为上游山地平原区，之下为干流丘陵区；干流全长 502 公里，赵镇至内江市为中游，长 300 公里，内江市至泸州市长江入口为下游，长 202 公里。

沱江流域呈南北长，东西窄的狭长形，平均长约 381.5 公里，平均宽约 73 公里。自贡至内江至大足一线为流域最宽处，约有 150 公里。龙泉山一线为流域最窄，仅有 49 公里。流域地势由西北向东南逐渐下降，发源地九顶山最高海拔为 4982 米，河源高程为 2579.3 米，降直河口 225.3 米，总落差为 2354 米，平均比降 3.74%。

沱江上游关口镇以北为山区，高程在 700 至 2000 米之间，地势陡峻，森林茂密，耕地稀少，峡谷深切，水流湍急，约占流域面积的 6%。关口镇至龙泉山为著名的成都平原水网区，地形平缓，高程在 440 至 730 米之间，其间河渠密布，农垦发达，人口密集，约占流域面积的 17.7%。沱江干流为台地丘陵区，高程在 250 至 500 米之间，其间山丘林立，溪河发育，耕地集中，人口稠密，约占流域面积的 76.3%。

沱江水系

沱江洪水主要由暴雨形成。历年大洪水出现在 6 月下旬至 9 月初，7 至 8 月份出现的机会约为 80%，具有峰高、量大的特点。枯水出现在 12 月至 5 月，具有水量小、持续时间长的规律。水量主要在由岷江来水和上游径流控制，山区来水很小。最枯时段多发生在 3 月和 4 月。汛期和枯水期的流量变化大，均值倍比在 100 以上，极值倍比达 4000 以上。洪枯水位变幅较大，峡口段大于丘陵段，最小枯水与最大洪水变幅约 10 至 20 米。“81、7”大洪水的水位变幅据资中登瀛岩水文站记录达 19.74 米。

沱江干流 502 公里两岸有集镇、城镇 50 余个，平均约有 10 公里一个。内江市境内有甘露、归德、资中、银山、史家、内江、东兴、裱木、白马等城镇。

沱江在丘陵区水系发育方面，流域面积 500 平方公里以上的中等河流有 12 条，内江市境内就有球溪河、蒙溪河、大青流、威远河、隆昌河等 5 条河呈树叶枝状从东西两侧汇入沱江。

内江市首届运动会 市中区代表团战绩辉煌

曾晓平 杨 峰

由中共内江市委、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内江市体育局承办的内江体育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综合性最强的内江市首届运动会于 2001 年 10 月 29 日正式降下帷幕。市中区代表团在本届运动会上取得辉煌战绩。

市中区区委、区政府对参加这次市首届运动会给予了高度重视，成立了以区委书记李必胜、区长袁玉庄、常务副区长李忠辉、副书记何克副为顾问，兰代明副区长为团长，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扬贵、副区长张翼、政协副主席、文体委主任邱明强为副团长、各承担项目单位、企业负责人为成员的高规格代表团，具体组织由文体委负责，十一个项目分别由：宣传部、粮食局、教委、国土局、城工局、科委、交通局、劳动局、人事局、老干局、环保局、房管局、防疫站、内江大众特约维修站、飘香园林饭店、三泰鞋服有限公司、江城花园、大千花园、神州药业承担。代表团制定了统一组团、统一指挥，明确提出了“勇争第一”的奋斗目标。为参加这次运动会，区政府在区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拨出 3 万元的专款，中区文体委从体育彩票公益金中安排 12000 元

作为补充，以保证运动会的各项开支。

市中区参加的田径、篮球、游泳、足球、羽毛球、乒乓球、门球、武术、象棋、围棋、桥牌十一个项目的比赛，在代表团的统一指挥下，在有关单位、部门、企业的通力配合下，经过运动员的顽强拼搏，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大会开设的十一个项目中，我区代表团共夺得八个项目第一、三个项目第二，团体总分遥居各县区之首，并荣获内江市首届运动会优秀组织奖的优异成绩，为我区体育事业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市中区代表团取得的优异成绩，集中展示了市中区人“负重拼搏，实干争先”的精神，充分体现了市中区人民热爱体育、关心体育、参与体育的优良文化品质。通过参加这届运动会，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区全民健身活动和各项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必将使我区的精神文明建设上一个新台阶，必将鼓舞我区人民在各自的岗位上，解放思想，真抓实干，顽强拼搏，踏实工作，为实现市中区追赶型、跨越式的发展而努力奋斗。

市中区代表团获总分名次第一名。获优秀组织奖。

市中区赵锡贵、赵永森、陈伟、杨园梅获田径比赛体育道德风尚奖。

市中区男女队分别获田径比赛团体总分第一名。

市中区三秦鞋服代表队肖锋、张晏萌获游泳比赛体育道德风尚奖。

市中区男子、女子组分别获游泳比赛团体总分第一名、第二名。

市中区女子、男子组肖萍、刘小霞及邹强、沈剑分别获篮球比赛体育道德风尚奖。

市中区女子、男子组分别获篮球比赛第一名。

市中区张群获乒乓球比赛体育道德风尚奖。

市中区男子、女子组分别获乒乓球比赛团体总分第一名、第

二名。

市中区闵锡芳、郭有恒获羽毛球比赛体育道德风尚奖。

市中区男子、女子组分别获羽毛球赛团体总分名次第一名。

市中区李书华、杨明德，获门球比赛体育道德风尚奖。

市中区男子、女子组分别获门球比赛名次第二名及第四名。

市中区刘若彬、柏其秀获武术比赛体育道德风尚奖。

市中区男子、女子组分别获武术比赛团体总分第三名及第二名。

市中区邓建义获象棋比赛体育道德风尚奖。

市中区获象棋比赛团体名次第一名。

市中区刘力宏获围棋比赛体育道德风尚奖。

市中区获围棋比赛团体名次第二名。

市中区蓝华获桥牌比赛体育道德风尚奖。

市中区获桥牌比赛团体总分第一名。

市中区钟珂、肖彬、吕文博获足球比赛体育道德风尚奖。

市中区获足球比赛总成绩第一名。

巫丹，我们为您自豪

周梦蝶

巫丹出国打球去了，她的情况怎么样呢？内江的体育爱好者们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但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在刚刚举行的全国九运会赛场上，人们又看到了巫丹的身影。她率领四川女排在全国第九届运动会上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杀入四强。

今年已34岁的巫丹何以仍能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她在国外打球的情况如何？近况又怎样？日前，笔者采访了巫丹的父母。

据巫丹的父母巫兴礼、黄庆碧介绍，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女排精神一直激励着巫丹奋发进取，这也是她能在球场上坚持到34岁的动力之一。

据了解，自六年前出国在意大利等国打球，物质条件令巫丹感到满意，除了合适的薪金，俱乐部还给她租了专门的单人公寓，配了车。

然而，如果仅仅是为了舒适的生活，巫丹去年和今年就不会两次回国了：去年奥运会之前，受胡进教练之邀，她重披国字号战袍；而今年代表四川女排参加九运会，同样是受胡进邀请。她为何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归呢？巫兴礼引用巫丹的话说：“钱很重要，但不是一切。四川队的环境她非常熟悉，再说，人总是着重乡情的。”在小组赛中，作为四川女排的自由人，巫丹不止一次飞身救起对方几乎已经扣死的球，一些排球界行家为此赞赏：正是巫丹在防守中所起的出色作用，极大鼓舞了四川女排的军心，不然，一支仅仅合练了九天的球队，很难闯进九运会的八强阵营，更别说后来杀入四强了。

巫丹为何“老当益壮”呢？据悉，34岁的她除了肩部做过手术之外，没有落下其他伤病。此外，巫丹的“秘技”在于重视力量训练，在她看来，力量训练正是防治伤病的良药。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大，巫丹更悟出保持状态和提高技术的关键是真正投入地训练，“在国外我们每天就练两个小时，但这两个小时是真正解决问题的两个小时，如果带着混的心态，练再长的时间都没用。只要全身心投入你所热爱的事业，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巫丹这样自我“解密”。

据了解，巫丹完成征战九运会的任务之后，将回意大利再打一个赛季的比赛，然后在35岁左右结束自己的运动生涯。退役后的她打算继续学业。从国家队退下来后，她曾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执教并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来因为打球中断了。“把学业完

成是第一步，之后的选择也不会离开排球”。情牵故土的巫丹深情地说。

市体育局副局长叶永康 11 月 19 日对笔者说：“巫丹在国外各方面都很好，在四川女排面临重重困境的状况下毅然告别两地分居的丈夫和年幼的子女回国征战九运会，这样的精神难能可贵，体现出她对国家和家乡的热爱，我们为能有这样的内江儿女感到骄傲和自豪。”

一方沃土育英杰

王德润

2001 年深秋，中央电视台（第十套）《人物》专题栏目，连续推出三个专访人物：即 101 岁高寿的国画大师晏济元老先生及“巴蜀鬼才”魏明伦先生和“清华爱迪生”邱虹云学子。对此，不加思索则罢，只稍作考虑便觉颇有奇趣，意味盎然：从年龄看，魏先生虽年逼六旬，但与晏老先生一比试，只能算一个中年人了。三个人物老、中、青俱备，而更觉妙趣的是：三个杰出人物均为内江人。

晏老，原籍内江市中区白马镇万家乡人。前些日子，晏老在京由中国文联、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百岁书画大师晏济元书画精品展”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展出。全国政协副主席周铁农、民革中央名誉主席彭清源，民革中央副主席李贻骝、朱培康等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画展后，晏老回到家乡，踏访故土，受到家乡党、政领导热情接待，晏老并欣然为《内江日报》读者题字“祝家乡明天更美好”。还兴致勃勃地回到老家白马镇万家场寻亲访友，追忆儿时趣事。晏老精神矍铄、身板硬朗、举止轻便、言谈流畅，俨然鹤发童颜一仙翁。晏老与张大千、张善子交往密切，感

情甚笃，多次与张大千共同作画并举办画展。其书画艺术在海内外影响颇大，深得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青睐，朱总称誉他：“国外有个张大千，国内有个晏济元。”这是对他很高的评价。

魏明伦先生，内江城区半截阴家巷人。著名川剧作家，他以《易胆大》、《巴山秀才》、《岁岁重阳》、《四姑娘》、《潘金莲》等剧作蜚声海内外。他不仅是剧作家，亦是戏剧理论家、杂文家、词赋家，在文艺界兼任多重领导职务。今夏，“央视”《人物专栏》主持人随魏先生来内江，曾往内江市川剧团采访拍片（魏幼年曾在该团作过演员）后又去内江六小（魏曾是大名小学学生，大名小学是现内江六小的前身）采拍。追寻着魏先生成长的足迹及成名的奥秘！

邱虹云：一个年仅24岁的小青年，即被誉为“清华爱迪生”，“全国在校大学生创业第一人”、“彩电史上一次伟大革命”等众多崇高荣誉的人。不能不令人惊讶，投去仰慕的目光。邱现仍就读于清华大学，可是他早已成为北京澳柯玛视美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负责产品研发。其麾下聚集了专家、博导、博士、硕士等高科技人才40余人，不能不说是个奇迹。邱之父邱名丹现任职于威远县政协机关，而他的祖父邱子厚系内江教育战线上的老教师。这里有段旧话赘提：邱子厚先生系原沱江中学（现内江二中）第八班学生。1939年邱与刘玉华女士联偶时，同班同学余洪儒恭贺一联云：“计我良朋唯子独厚；偕彼淑女如玉之华。”上联嵌“子厚”二字，下联现“玉华”芳名，一时传为佳话。后，子厚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约于1990年去世。他家世居内江市东兴区东兴镇旁沱江河岸的罗家嘴。

常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山川毓秀，孕育俊彦。”央视《人物》栏目推出此老、中、青三杰，正是内江这片沃土养育出来的“骄傲之花”。内江人能不引为自豪，能不“热恋”这片有灵气

的沃土？

名师李大方

邹光明

年岁稍长的内江人，都知道这个李大方。说起李大方，很自然地就会把他与钟表、钟鼓楼的大钟联系起来。他修理钟表，技术精湛，在技术改革中，成绩突出，被授予“名师”称号。内江市1986年编辑完成的《内江市志》第十八编人物传记栏中，记有喻培伦、张大千等二十三位已故名人，李大方就是其中之一。

李大方1923年出生于内江县城文英街半边巷，1972年病逝，享年50岁。幼小时七岁丧父，八岁丧母，另有哥哥、姐姐、妹妹各奔西东，失去联系，他被当时在大西街开钟表修理店的舅父杨一春收养为徒，学修钟表。1948年才脱离舅父，自行开业。解放后，1956年加入市钟表合作社，直至去世。其中，1940年曾去成都春熙路协和钟表店，当帮工大半年。时间虽短，有增长见识，扩大视野，拓宽思路的作用。但真正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在解放以后。

幼丧父母，失去了欢乐的童年和上学的机会，生前只读过半年私塾。李大方自小资质聪敏，个子小，显得文静，也坐得住，善于用眼观察，用脑思考，用手操作，所以技术上进步很快。根据陶行知先生的教育学理论，实践出真知，他就是从实践下手，获得大量有用的直接知识。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培育并发展了他的动手能力、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解放时，年仅25岁，在修理钟表行业中，也颇有名气，本地和外地慕名专程找他修理高级名贵钟表的人，为数不少。

李大方一生淡泊名利，酷爱技术，几乎到了狂热的地步。在

经营修理钟表业务中，决不搞欺诈哄骗，潜心精工修理，以“德、诚、信”取信于人。他从不自我吹嘘，善待他人，乐于助人，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都喜欢同他来往。所交往人中，有农民、工人、党政干部、工程技术人员、高级知识分子，人际关系好。解放以后，因受社会变革的影响，使他由不善言辞，性格内向，变为活泼开朗，爱好文娱，通过自学，能识乐谱，喜欢唱歌、弹琴。内江刚解放时，他组建了一支腰鼓队，积极参加各种集会游行活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打苏卡当指挥。这支腰鼓队打起来时，步态轻盈，红绸飘舞，卡声鼓声，交响成曲，节奏鲜明，非常引人注目，很受群众欢迎，显示了他的指挥能力和文艺天才，表达出他对解放的喜悦心情。

他对新生事物敏感，能着眼大局，只要社会上需要的，他就会去作，不懂就问，刻苦钻研。除修钟表外，还承接过手风琴、坐风琴、口琴、钢琴的修理业务。他是内江第一个修理中、英文打字机和国内外各种型号计算机的人。解放前，成渝铁路局内江牌楼坝办事处的打字机，就是他修理的。解放后，打字机、计算机普及很快，数量大，维修任务重，人手不足时，则由李大方带徒弟，边学边修，以满足社会的需要，我市名书画家邱笑秋的爱人曾先芬就是从师李大方修钟表和打字机。因为内江钟表社修的打字机质量好，上海打字机厂把内江设为该厂的特约维修部（四川只有成都、重庆、内江三地），通过上述修理业务的开展，为本单位创收，保障了职工工资，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又为机器使用单位免除外出维修之苦，节约了人力和经费，提高了机器的使用率，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收到很好的社会效益。

基于他的政治条件好，思想品德好、技术好，曾光荣地被选为人大代表，出席了1954年7月召开的内江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内江解放后，是由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过渡到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的），继又担任过多届市政协委员，这是他政治上最高

的荣誉，对他后半生起着极大的激励作用。1962年，市手管局授予“名师”称号，五次评为市手工业系统先进人物，曾任市钟表社理事、委员，市手联社理事等职。在出席市首届人代会期中，有的代表仰望着场外面高大的钟鼓楼感慨地说：“要是在上面安一个大钟就好了，钟鼓楼就名符其实了”。李大方听此话后，遂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它变为现实，从而萌发做大钟的念头。

修钟和做钟，虽然都是钟，结构原理相同，可是所需工艺，则迥然各异。当时尚未成立钟表社，在无图纸，无设备，无资金的情况下，一个人要去做个大钟，谈何容易！但是李大方一经认定了的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人大会开完以后，他就独自开始构思、设计，去钟鼓楼实地查看，丈量尺寸，啊，真不是一个简单的大钟，钟面就是一层楼房那么高大，（直径三米，周长十余米），他并没有被这个庞然大物吓倒，知难而进，绘制草图。凭他的经验，估计大钟用作“走时”和“打点”的两根发条，难以解决，经反复思考，决定采用重锤的重力势能代替发条，再通过杠杆传动，打击钟鼓楼上原有的铁质大钟，一并解决走时和打点的问题，初步设计为一座重锤式的走摆大钟。其他有关准备工作，利用工余时间，逐步地进行着，如此历时一年余，投入了大量的劳动。

1956年2月，市钟表社成立，他正式向社提出做钟的设想，经理事会研究同意，并作出了由社先垫支部分经费，抽出曾国华协助的决定，继又请示手管局、市政府，领导们都表赞同，大力支持，于1956年7月底正式开始制作。由于构思严密，设计合理，准备充分，又有各级领导的重视，所以进展顺利。钟的主夹板和轮轴自由兄弟社协作加工，利用一部分其他机器的现成零件，如轴承、自行车链条等，重锤是用两个百余公斤重的铁砧代替，齿轮及其他零件，则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手工锉制，苦干加巧干，克服重重困难，历时两个多月，最后组装、调试，结果走时、报

点准确，运行良好，1956年10月，一座重锤式走摆大钟出现在钟鼓楼的七层楼上。大钟钟面直径3米，红沿、蓝边、白底，中心有金色葵花。入夜，钟沿60个彩灯齐明，中心葵花转动，夺人眼目，蔚为壮观。报时的钟声，夜间可达10里之遥。李大方去世以后，无专人管理，曾多次出现故障，闲置至今。故障原因之一，是钟面面积大，指针就必须长大，指针运转时，要受自重产生顺、反力矩的影响，指针在右边时，产生顺力矩，指针在左边时，产生反力矩，若遇大风大雨，外力作用超过大钟动力极限，则会产生停摆。鉴于此，可采用轻型材料，减轻指针重量，或用其他办法，改换指针，同时钟面用透明板加盖，以避免外界影响，保护钟面色泽，最初设计时，还有定时唱东方红歌曲部分，因条件不具备，没有完成。若将大钟的机芯清洗、上油，完善缺点，补装唱歌部分，仍是一座非常好的大钟。这个大钟：看似简单，做起来不容易，按正规生产，先由工程技术人员设计、出图。（包括总图和零件分图），照图施工，有的零件要翻沙，翻出的胚件和所有其他零件，根据需要，进行车铣、刨、钻、锉等工种，分别加工，最后由设计人组装调试，直至正常运行，才算完成。这么多的工序，这么多零件的各种加工，皆由李大方因陋就简，手工制作，两个多月内完成，真是难能可贵，令人钦佩！此钟是李大方技艺的结晶、是他回报党和人民的杰作。

1958年，他被调往民乐餐厅，为内江市饮食行业搞技改试点。自己设计，自己制作，为民乐制造有洗碗机，面条机、食品传送带和空中行车，制作了由进面粉到出馒头自动化生产的馒头机。馒头机的食品转换程序多，难度大，制作中失败多次，最后经过连续六天六夜不停的摸索、改装，弄得走路都要打瞌睡的疲劳程度，才终于试验成功。该机每小时可产出960个馒头。这些产品的投入使用，改变了民乐的经营面貌，节约了人力，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经营的效益，促使饮食行业向科学、文明经营道路，迈出

了一大步。1960年，又调往金融系统，为内江市人民银行搞技改，也是自己设计、制作，仿计算机原理制成点钞机，大大提高了点钞的速度，银行的领导曾带此“样机”去江苏南通市，参加技改现场交流会，先作情况介绍后，当场作了收款和付款的操作表演，效果很好，准确无误，深受与会者好评。

内江市钟表社成立以后，因为人员多，业务不饱和，职工工资低，李大方积极为社开发新产品创收，为社转向生产寻找出路，曾制造过手提式钢琴出售，试制过脚踏耕地机（又叫铁牛），水上脚踏船；制造过修理钟表专用的精密小车床、小刨床、小钻床、卧式钻帽机；制造过蒸汽压力表，曾交仪表厂投入生产，以后又转产电动机；1960年为车表衡器厂制作攻丝机，手动小刨床，在该厂为生产架车发挥了作用；60年代末，他听说四川每年要从省外调进十万组的什景锉，为使成本降低，满足本市和本省的需要，就动手制作生产什景锉的锉刀机。若能成功，还可以作为钟表社转向的生产项目。样机制成以后，经试验，由于锉刀原件淬火没有过关，影响质量。主机已成，只是附件尚待改进、完善，不幸就此病故，未能如愿。可惜他生前最后一件产品尚未喜获成功，便与世长辞了。

李大方富于创造和钻研精神，有很强的毅力和自信心，解放后的二十余年中，除修钟表外，以从事机器制造为主，试制了大量的新产品，显示出他在机械技术方面的造诣。他研制新产品的出发点，都是为了集体的利益，制作中，牺牲了自己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公而忘私，品德高尚，不愧为“德、技”双高的一代名师。他唯一受制约的是文化科学理论水平不高，否则，技术上的成就更大，对人民的贡献会更多。一生中，真可谓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由于长期地过度劳累，积劳成疾，50岁就离开了人世，殊令人为之惋惜，追忆故友，感慨甚多，献上拙诗，作为本文的结尾。

幼丧父母苦难言，八岁重担压双肩。
私塾半年即学历，孤苦漂零命由天。
解放朝晖满天红，劳苦大众把身翻。
钻研技术为人民，党指征程永争先。
人大政协参两会，名师称号又加冠。
制作大钟饰钟楼，钟声敲得满城欢。
技术改革结硕果，精品纷呈万万千。
大展宏图黄金日，你却撒手辞人间。
内江告别差脏乱，城市面貌大改观。
钟楼将作一景点，大方美名世代传。

附注：一、1962年市手管局授予李大方“名师”的同时，授予同行另一职工“巧匠”称号。二者同样授牌外，名师每月多奖励20元钱，计入工资。显然，名师和巧匠不等同，名师高于巧匠，也不合称名师巧匠。

二、文中所称“内江市”或“市”，是指地改市以前的内江市（即现在的市中区）

三、关于钟鼓楼的修建和变迁史，市中区政协李文馥先生所著“弄波堂”书有“话说钟鼓楼”一文，其中有段“钟鼓楼史话”，不妨附后供参阅。

钟鼓楼史话：原钟鼓楼在南街北端口，始建于唐宋，名曰“渔楼”，到明代洪武年间，已初具规模。主要用来瞭望烽烟，打更报警。明天顺六年（1463）毁于民愤，后重建。万历元年（1573）又遭火焚，后再建。崇祯七年（1635），知县朱国寿续修渔楼，楼下建成大门，为往来行人通道。楼上悬吊铁钟，改名“钟鼓楼”。清代顺治元年（1644）张献忠攻破内江，钟鼓楼坍塌。康熙五十年（1712），重建成三级高楼。嘉庆十四年（1810）因洞门倾斜，改建增修，其规模比原来更加宏伟。成为当时内江一大

名胜，蔚为壮观。

20 世纪四十年代末，旧时县长黄希濂，将原钟鼓楼拆毁，向北移百米处建成现市中区政府内的七层钟鼓楼。高 30 余公尺，每层面积约 16 平方米，四面有二至三个玻窗，每层有十三、四级木梯，可旋转而上。吊钟悬其顶层，拉长绳转动吊钟铁铃敲点。

忆内江川剧团演现代戏的一些情况

刘泽森

内江川剧团从建国初就开始演现代戏。由于对演现代戏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够，存在着演现代戏是“单纯地为了配合中心工作”，“川剧演现代戏会丢掉传统艺术”，“群众不喜欢看，会影响收入”等思想，当时虽然演了现代戏，但演出质量不高，保留的剧目很少。

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提高了演职员的认识，重视和加强了现代戏的演出，是贯彻党和毛主席：“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指示的具体体现，是典型地反映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思想，对群众进行最现实、最直接教育的最好形式。认识提高了，演现代戏的决心增强了。但如何演好现代戏，特别是如何运用川剧传统艺术表演现代生活，该团感到必须在继承传统艺术，保持川剧特点的基础上，进行借鉴、革新、创造和发展，有破有立，并在《雷锋》、《夺印》、《霓虹灯下的哨兵》等剧的演出上，作过一些探索、实践。如《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序幕：“解放军进入上海”，采用了传统的“发兵”舞蹈，摆“壕子口”、“五捶半”等锣鼓，既介绍了人物，又大大增强了舞台气氛。又如《李双双》一剧中，表演李双双拉面，改用了传统戏中有关拉面的舞蹈，喜旺高兴时掸动烟竿，借用了传统折扇

舞姿。这些都给人以准确、优美的感觉。《首战平型关》一剧中的打斗场面，更是广泛借用了很多传统武打的“把子功”和“毯子功”等舞蹈，既丰富了剧情，又发扬了传统中载歌载舞的风格。在音乐方面：除了继承发展外，还有革新。高腔曲牌基本上跳出了过去的“红、梭、课”的圈子，改用了其它多种多样的曲牌。同时，还根据戏里需要，也尝试性地运用了一些革命歌曲和根据传统改编创作了一些曲牌，有的在合唱时，都加上锣鼓的“套打”和唢呐伴奏，跟传统音乐谐合一体，体现出川剧演代戏有川剧的风格和表演艺术上的特点。

为了表演现代人物，熟悉现代生活，演工农兵，熟悉工农兵。该团还本着“演啥学啥，需啥学啥”的原则，采取请进来，派出去的办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培养和锻炼了一批演现代戏为观众称赞的演员，说他们“演得真，扮得象”。

一九六三年，该团连续上演了一批反映现实生活，反映革命斗争的现代戏：《夺印》，《霓虹灯下的哨兵》、《雷锋》、《李双双》、《宜宾白毛女》、《青年的一代》、《迎春花》、《首战平型关》等，据当年3至11月的统计，上述剧目演出了一百八十多场，观众达二十一万多人次，其中仅《雷锋》一剧，在城乡就连续演出了四十多场，观众场场客满。由于现代戏内容现实，紧密结合当时的中心，加之用川剧形式演出，群众喜闻乐见，群众反映“看川剧现代戏，既能得到川剧艺术的享受，又能受到思想教育”。当时的《沱江报》，在1964年元月以很大篇幅报道了该团演现代戏的情况，并刊登了剧照。

解放前夕的川大内江同乡会

张学成

1946年春，我在内江中学毕业后，回到张家乡老家，从师吴玉枢，补习中文半载，学习了《左传》等古典名著，为备战高考，确有所得。金秋时节，我与好友赖耀富一同去成都应试，在考场激烈竞争中，耀富名登虎榜，进入名牌大学华西大学医科，我考取了著名学府——四川大学，取录在教育系19届。我在教育系主任刘绍禹及诸多名师张敷荣、普施泽、张增杰、邱觉心等的谆谆教诲下，受益良多。我除了搞好专业学习外，还参加了川大内江同乡会的各项活动。在三瓦窑新生段时，我参加了川大内江同乡会主办的小伙食团，每日餐桌相聚，与同乡诸友接触频繁，互相砥砺，勤奋共进，友谊日增。读二年级时，来到望江楼校本部，我最爱的是那座钢筋水泥结构的图书馆，馆藏甚丰，是一座精神食粮的宝库，我可以在书海中畅游，扩大视野，增加知识。那时同乡会，每学年都要举行欢迎新同学，欢送毕业同学的“迎新送旧会”。地址大多在望江楼公园内举行。荣丽阁等处楹联众多，最使我难忘的联语是：

多难此登楼，看他千寻涌浪，百尺波涛，问谁砥柱中流，澄清再现？

悲秋常作客，对此四野桑麻，万家烟火，使我凭栏眺望，忧乐关怀！

此联所抒发的感情与当时大学生的感情，一脉相通。同乡学子十分关怀人民的疾苦，民族的盛衰，渴望澄清盛世早日到来。他们正为将来作中流砥柱而努力学习着，时刻准备着。

1949年，川大师生在纪念“四·九血案”一周年晚会上，邻

县威远籍同学缪竞韩主演了《灵官扫台》一剧，对人民公敌蒋介石及其在四川的代理人，伪省主席王陵基进行了极辛辣的讽刺。8月缪竞韩在成都九眼桥被捕。12月6日内江解放。第二天，缪竞韩等30多难友在成都十二桥被国民党特务集体杀害。同乡中有位学友与韩相知，也无辜被牵连，解放后又被怀疑，长期背上黑锅，20多年后才得到澄清，落实了政策，亦不幸中之幸也。

1948年，由于同学们的信任和厚爱，在换届选举中，大家选举我为川大内江同乡会理事长。我的前任是农经系的李开哲。查阅1948年5月16日“川大内江同乡会欢送17届毕业同学纪念”的老照片，那时共有同乡学友70余人。可谓人才济济，盛况空前。这两年中，同乡会有两次重要活动，值得回忆和记述。

一、回县争取奖助金。在物价飞涨的1948年，部分家庭清贫的同学，生活上困难重重，难以为继，引起广大同乡的关注。四月份川大内江同乡会选派政治系伍丕治、张巨川和我组成一个小组，返回内江办理此事。因丕治与巨川的家庭与家乡的主流社会有较广泛的联系，如伍的祖父伍心言就是一位较有声望的名人。我们回到家乡，首先是广泛宣传，使父老乡亲了解清贫学生的处境和困难，争取他们的支持。我们草拟了《告全县父老书》及《致县参议会的公开信》，可能在《内江日报》刊载过。又撰写了一份公函，请县参议会将川大内江籍学生奖助金一案列入议事日程，经过多方努力，最终获得通过。凡川大内江籍学生每人补助黄谷一石，约合大米100多公斤。并决定从屠宰税中折现金支付。这对贫困学生确实雪中送炭，获得实惠，而对富裕子弟不免锦上添花，利弊并存。

二、组织革命歌舞演出。川大地下党组织鉴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毛主席又指出：中国境内出现了第二条战线，即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根据新的形势，斗争策略及工作方法做了必要的调整。为蓄积革命力量，更广泛、更深入地

发动群众，决定到自然社团（如同学会、同乡会）中去做工作。当时“新民主主义青年协会”核心成员李特筠，根据地下党的指示，找到迫切要求参加革命的那焱商定，以川大内江同乡会募集基金的名义，利用寒假回家，组织一次革命歌舞演出，这一倡议与同乡会的打算一拍即合，理事会一致赞同，立即行动。我同负责文艺活动的许克修、陈恒一便分头联络，约请了张真仕、江泽民、官铁华等担任节目的挑选、编写、导演、排练，还特邀了省艺专官中林、吴德昌、巫选文，川大附中的谢和源和内江中学的李羨筠，黎淑君等参加演出。参加宣传、组织和前后台工作的还有李景直、伍丕治、伍丕澄、赵启林、张学成等，共20多人。人才荟萃，行当齐全，构成了一整套演出机构。我们选择的节目大多来自川大进步社团“方言剧研社”、“黎明合唱团”及解放区流行的歌舞节目。这次演出具有三大特点：

一、演出内容具有鲜明的进步思想和饱满的革命激情。如《山那边的好地方》、《团结就是力量》、《古怪歌》、《张老三》（男女声齐唱）及用秧歌舞表演的《朱大嫂送鸡蛋》等，均富有战斗性和鼓动性。

二、演出的艺术形式为群众喜闻乐见，并富有地方特色。如新《王大娘补缸》，原本是四川灯戏中的传统剧目，在巴蜀地区流传广泛，妇孺皆知。但传统的唱词及表演充满了色情庸俗成分，我们仅利用其形式，赋予了崭新的内容，将唱词改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的题材，反映了贫苦农民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命运。由许克修扮演王大娘，川大附中的谢和源饰补缸匠，用秧歌舞的艺术形式来演出。这种新颖的艺术形式是家乡群众耳闻已久，想见而又未见的，所以极富吸引力。

三、这次演出的编剧、导演、演员、乐手及前后台工作人员，全系内江的青年学生，他们富有朝气和艺术才华，团结一心，各尽其能。如官铁华作词的《新年谣》，借用秧歌舞曲调，生动地表

现了家乡人民在黎明前夕的期盼和心声。

演出地点的选择和确定，颇费周折，幸有回乡的老校友鼎力相助，才顺利地找到内江民盟成员张匀石（任内江县政府财政科科长），借得新建的县府大礼堂作为演出场地。此处地点适中，设备完善，便于召集观众。在1949年2月中旬，即农历元宵节的前夕连演三场。宣传海报遍及全城，观众场场爆满，深得广大观众及乡亲们的欢迎和赞许。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这些革命歌舞，不胫而走，在内江各中、小学广为传播，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反动派的震怒和惊恐。在内江县的旧档案中，记载着议员们在县参议会上纷纷质询县长李之青，为什么把堂皇的县府礼堂提供给赤色分子作宣传阵地，让他们将解放区的秧歌舞大跳、大演。进而追查政治背景和主谋。在此压力下，李之青受到撤销县长职务的处分。新《王大娘补缸》的主演许克修首当其冲，被特务盯梢跟踪，由于她警惕性很高，觉察到敌人的险恶用心，她就与唱歌的主力陈恒芝相约，紧急而秘密地撤离内江，远去成都安全处隐蔽。果不出她所料，她俩走后不几天，持枪特务竟扑向她住的文英街老家，威逼许的母亲交人，故未得逞。解放后，许克修与李之青邂逅相遇，李说：你们演完了歌舞，我也被赶走了。其实，这对李并非不幸，反而因祸得福。这次革命歌舞演出，是有组织的活动，是在党领导下开展的，它是川大学生爱国运动的延伸和辐射，是全川学生爱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使秧歌舞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在甜城开了花，结了果，它象黎明前的一声号角，从县府礼堂响起。许多青年学生后来热情参加革命宣传，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革命队伍的行列，多多少少受到这次活动的积极影响。参与这次演出的青年男女，在艺术实践中也提高了革命觉悟，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有的同学，还手持钢枪，走向了武装斗争的前沿，为四川的解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五十年后的世纪之交，李特筠、郭焱、李开哲、许克修、陈

恒芝、张真仕、张学成等，曾分批在昆明、成都、雅安先后相聚，畅谈往事，记忆犹新。这些白发老人，感到无限欣慰。往日的歌声虽然已随沱江水滚滚东去，但它激溅的朵朵浪花，仍深刻印在甜城人民的美好记忆之中，书写在内江地方史志的文献记载之中。如1989年《内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纪念内江解放四十年专辑中，就有《内江解放经过》及《内江解放前后大事记》两文作为大事记述，同期还刊载有李特筠、张真仕的文章，本刊第28辑又发表了官铁华的文章，均对这次革命歌舞演出作了专题介绍。

“红、勤、巧、俭”活动中的“半边天”

吴鸿禧 刘泽森

毛泽东主席说“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妇女被誉为“半边天”。本篇记述的就是内江市（现市中区，下同）广大妇女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半边天”作用的一个侧面。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这年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确定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发动一个增产节约运动。1957年9月，第三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根据毛主席提出勤俭建国的方针，确定了“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是我国妇女运动的根本方针（简称两勤方针）。内江市妇联根据上级妇联和市委的要求，在全国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认真贯彻“两勤方针”，充分发挥妇女组织的作用。从1957年到六十年代初结合妇女的特点，在城市、农村、工厂、街道广泛开展了“红、勤、巧、俭”的比、学、赶、帮，超竞赛活动。（红，指识大体，顾大局政治思想好；勤，指辛勤劳动，勤出工多增产；巧，指开动脑筋，找窍门，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俭，指在各方面厉行节约。）此活

动在各条战线上着重是开展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巧姑娘竞赛活动；在街道和职工家属中着重是勤俭持家。

1959年开展的巧姑娘活动中，工交、财贸战线上的广大女职工大闹技术革新，提高服务质量，生产效率成倍增长，产品质量提高，成本降低，节约大量的原材料，为国家创造了财富。据14个技术比较复杂，产品品种多的工厂统计，有2057个女学工，占学工总数的90%以上，在巧姑娘活动中，很快能单独操作，改变了过去“师傅守阵地，学工打游击”的状况。女工们针对生产薄弱环节，提技术革新建议836条。内江棉纺厂学工罗美光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由原来看104个纱锭提高到看624个纱锭；内江糖厂酒精车间一天需要三吨曲子，制曲子的原料是需80%的麸皮，在原料缺乏的情况下，女技术员古群英积极开动脑筋，搞技术革新，用红苕渣代替麸皮制曲子成功，一天节约麸皮1.35吨，一年为国家节约78.94元。财贸战线的女职工，服务质量大大提高，一年中收到顾客的表扬1277条。1959年在各行各业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中，有10138名国营工厂的女职工和56个民办工厂的5666名女职工提前跨进1960年。全年在工交、财贸战线共评出妇女先进生产（工作）者1227名，巧姑娘集体57个，巧姑娘609个（其中市级69个，厂（社）级440个）。

农业战线的广大妇女勤出工，出勤率达95%以上，有74%的妇女搞高产，大、小春妇女高产组286个，种植稻麦、甘蔗、红苕、玉米、油菜等3159亩。裨木分社十一大队张崇玉妇女高产组，大面积丰产小麦14亩。农村妇女改革农、副业、生产福利工具129种，大批妇女积极参加兴修水利。1959年共评出巧姑娘1195人。

在广大职工家属和街道居民妇女中，从1957年起开展的勤俭持家活动搞得轰轰烈烈。节约用粮，节约用布，节约烧柴，计划开支，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注意一点一滴的节约，如四街四委黎群英全家7口人，人平月收入7元，精打细算每月还存8

元。交通路二妇代会妇女实行计划用粮后，三年节约粮食 8065 斤。胜利街四妇代会一妇代小组推广改灶节约烧柴的方法，全组 25 户一年为国家节约 10300 斤柴。特别是在市举办勤俭持家展览会后两个月中，城区居民上缴节约余粮达 12328 斤。勤俭节约，简朴过日子，在家庭妇女中成为风气，数千户家庭订了勤俭持家的爱国公约，过去闹粮，闹钱不成的户，在勤俭持家活动中变成了余粮户，储蓄户；过去因开支无计划，入不敷出，夫妻吵闹不休，影响职工生产的家庭，在勤俭持家活动中做到精打细算，量入为出，巧安排而变成和睦家庭。广大职工家属还积极发展牲畜、种菜、种瓜等副业，成立洗衣组，缝纫组为生产服务，为职工服务，促进了职工在生产上的积极性。

几年来，“红、勤、巧、俭”竞赛活动的开展。调动了全市广大妇女在增产节约运动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显示了妇女的“半边天”作用，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完成，支援了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怀念拙老

邹作圣

一、拙老和茶馆

官简贤翁，我们称他“拙老”，缘自1988年他以“养拙斋”名撰写《梦影录》后，便这样称呼他。他撰写文稿未署名，编者为他署“拙老”名，亦认可。

拙老于今年元旦离我们远行。一提起他，就忆起他热爱地方文史和所作的贡献，不由得产生无限敬意。

与拙老相识于1949年沱江中学，同在该校任教，少往来，他是前辈，与我远房舅父刘颂杰很要好，只知他爱好诗词对联，对他尊敬而已。解放后几年他到师范工作，他刚被错案“解除”，不久我被“扩大”，同室办事，渐多了解，曾赠他《洪宪纪事诗本事笺注》一书，“文革”中吓得烧掉。真正了解，是近20年的事。

改革开放以后，除公园已有茶馆外，其他地方也可开设茶馆了。文教和社会各界的老人们便可不约而同地每日到茶馆聊天。

茶馆是很有吸引力的。为什么对这些人有很大吸引力？我想是因为那里有“年相若、道相似”（大体说来）的“吹壳子”谈天的伙伴。更重要的是谈话的内容上下四方、古往今来，无所不包，每个人都有可发之言，为每个参与者提供“讲台”。说得时髦一点，就是每个人都可在那里体现自己的价值。说话出于自然，绝无装腔作势、凝筋贯骨、矫揉造作之态，绝无八股腔调，听到的大体说来是真心话，发言绝对平等，意见虽有争论，甚至可达到面红耳赤，但谁都没有一言拍板的资格；这种平等地位是每个人都在刻意追求，而往往又在其他场合不易得到的。在那里有信息和知

识的交流，评人论事的意见可以得到交换，吐露胸中抑郁有人听，迂夫子谈论诗文有同好。这都是独自居处和带有功利色彩的场合无法得到的。茶馆里还能结识新朋友和交到推心置腹的朋友。

那时我服役文史，初始阶段征集资料重点放在建国前，这些老人们正是我们征集的对象；有的是许多重大事件的知情人甚至是亲历者而又年事已高，还是资料抢救的重点。除资料征集外，史料的核实，重要线索的得来，也少不了他们的帮助。正是这样，我带着一种“功利”目的进入了他们没有功利目的的群体里去，这并不矛盾，而且是他们原本想不到的还能为地方做贡献的机会，所以他们都乐于支持我们的工作。众多的老人都为政协文史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拙老便是对我们工作支持最力的老人之一。按虚岁算，他已98岁高龄了，如此高寿，得颐养天年，潇洒而去，他本人已无遗憾，有自挽联为证，我们也为他晚年“宽闲并享”“福慧双修”而高兴；但他的离去仍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怅惘。

拙老是“喝茶”的骨干。他不利于行，为了照顾他，喝茶地点几经变迁，把茶馆选在离他住所不远的朝阳茶园。后他家迁到大洲路，又住九楼，上下由儿子背，来去“打的”，便改为每周星期三聚会了。自从1999年开始耳聋，继之膝关节不能伸直，坐都成问题了，才脱离茶馆聚会，但仍念念不忘茶馆。记得2001年2月，他大儿子建军从柳州回来省亲，我们几个朋友为他做“摸百酒”祝寿，触动了茶馆之情，硬要建军背他打的到茶馆，与昔日茶友拍照留念。

茶馆有吸引力，还可以举梅晓初先生为证。1999年9月梅先生重病锯了一腿，同时滴水不能进。友人何华国兄前去探望。那日是星期二，第二日为周三茶会时间。他向何说：明天要打的去茶馆。”护士忍不住笑，小声说：“他还不知道（因全身麻醉）锯了腿呢。”

二、《梦影录》

日子久了，拙老给我们最深的印象是他十分熟谙地方掌故和里俗乡情。而对地方掌故述说不是只就事论事，而往往是联系到时代背景从大的“气候”中来看地方事物的发生发展，从中获得历史知识，这是一般老人难以办到的。这是由他平时关心国计民生，又勤于作笔记和一直不断地写日记、积累资料的缘故。说到写日记，已成习惯，他卧病中也不断写。他看《团结报》（外孙女王浩知他喜看报为他订的），近年日记中记不少国家大事，而更多的吃、睡、拉、喝和看望的人来人往，也有为他的生活安排和本玉媳妇的辩论等等。直到2001年12月下旬进入医院，还叫媳妇拿日记本来，但已无力记写，日记本搁在枕畔，伴着他离开人世。他的笔记很多是诗词对联佳作，又特别是与地方掌故相联系的。

由于对他的这些印象，我从职业出发，产生了一种想法：除了他能写一些完整的人和事的史料以外，特别感到他是写笔记的好手，如果他能将平时所谈的地方轶闻逸事的片断记录下来，不就很珍贵的史料了么。

原在1987年全面抗战50周年，梅英先生曾记内江本地及外地文艺界活动若干则，我以《战时内江艺林散记》为题刊于市文史，曾引起人们的很大兴趣，而今对拙老的这个印象，更增加我对征集笔记体例的信心。

为了引起他的动机，我又送了他一本文革后新出版的刘成禺的《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他反复看得津津有味。不久他去西安大女儿建立处探视，临行前我又送他一本郑逸梅的《艺林散叶》，我笑着说，你也是郑逸梅。他在西安住了一些时日，又去柳州大儿建军处。两地消闲读了这书，果然引发了他的兴趣，上了我的“当”了。回内江后，于1988年初成《梦影录》70余则，载于市中区文史第26辑，后又于27辑刊出《梦影录》续一，离开人世前数月还平躺在床上仰着头，悬肘执笔，手不停挥，续写《新梦影录》和《昔日旧闻录》，前后近200则。

《梦影录》初集刊出时，我以编者名义在《按语》中特别推荐，但是如是地称颂这位文教前辈，“一生经纬世事，阅历既深，又勤于笔耕。为文意到笔随，要言不烦”，又特别指出他开创了“文史资料的一种体例”将亲历之事的片断笔之于纸“可为史志拾遗补缺之资料，或为核实史实之助”。

《梦影录》刊出后，立刻引起反响：一则认为这种记可记之人可记之事的片断，不须长篇大作，有多少写多少，大家都可写，随时可动笔，被称为文史资料的“轻骑军”；一则这种亲身经历目击之事，真实可读。时任北碚区政协副主席的王庄兄，读到《梦影录》，立即来信询问称道。认为那么熟悉地方掌故，文笔清新，读起来那么亲切，他猜想是梅晓初先生之作，因梅先生也是写笔记文字的大手笔也，而拙老则尚未为王庄所熟知。

《梦影录》刊出后之二年（1990），中央文史馆馆长萧乾先生发出号召，发动各省文史老人用笔记体写“亲见亲闻为主的轶事掌故，琐闻杂记”“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的“文史笔记”。

他说：“读书界向来对野史有所偏爱，野史大多是信手拈来的片断，且往往出自亲历者之手。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而文笔潇洒自如，意味隽永，自然朴实”。他说，这种文史笔记“也属野史杂说的范畴”。他号召“每篇以千字为度”，“写法上务求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史料一定要真，内容要新”。萧乾先生这些要求，恰好是拙老的作品中真实体现的；真是声应气求，如出一辙。

后来于1992年起至1994年由萧乾主编上海书店出版《新编文史笔记丛书》第一至四辑相继出版，共49分册，四川省文史馆编了《巴蜀述闻》和《益州集粹》二分册。拙老于此，可谓先行者了。不久，他该90岁了，我送他一联：“胸中经纬；笔底烟霞”，主要即指此。

在茶馆闲聊中，常常谈到地方一些对联、诗词（包括打油诗、

竹枝词)引出一段内江往事,或者从地方掌故中引出对联、诗词,颇觉有趣。经大家讨论,提出大家动手写“内江联话、诗话”之类的东西,拟集为“内江风物丛刊”,而先从对联(后来因故改为“内江对联漫话”)开始。拙老对对联有特别癖好,当然支持。这是1996年6月的事。第一步工作便是对联语的广征博采。从那时起,直至1998年,拙老每周星期三到茶馆都提供三幅对联,两年半内从未间断,真可算此举的积极分子。那时他已高寿95岁,我们戏称他是“九五之尊”。这样的望百老人如此热爱乡邦文物真令人敬佩。后来因种种原因余洪如兄致力于采集注释工作(汇集达一千余副,而“联话”(后改“漫话”)却主要落在我头上。这就是2001年由市政协支持下出版的《内江对联集·漫话》的由来。没有拙老主盟其间,是很难成其事的。

三、“摸百酒”

我们内江的习俗,把祝贺亲友喜事称为“吃酒”,结婚叫“吃喜酒”,生朝满十吃叫“吃生酒”“吃寿酒”。2001年元旦已过,拙老年过96,但他按虚岁算,高兴地说,“我都97岁了哦!”真也难得。几个朋友商量到他家里为他祝寿,就名为“摸百酒”。人人称觞相祝,乐也融融,并拍影留念。席间,我提议与拙老有世家之好的张隐秋女士作诗纪盛,后来曾孔恕、余洪如、王德润都有唱和,我也凑了热闹。

隐秋诗题为《简贤老人摸百之庆》

简贤老人,予诸叔与兄常相过从之同窗好友,与兄情尤挚。予年始六七,即识老人于济济衣冠中。因幼承父兄偏怜,故得追陪末座。尝以纨扇索书画于诸彦,均莞尔允诺:代英张君为绘朱藤麻雀,老人特书《虎门之叹歌》;盖予曾谈失虎门而悲泣也。今叔兄张君俱去,当时之翩翩年少,除老人无复存存;而老人得天独厚,由“摸百”而至期颐,遐龄永享,此福寿之至也。今逢“摸百”之会,复得追陪末座,承邹老作圣嘱,不敢辞,敬写数语为

念，而求正于诸贤达。

髫年相识笑谈中，济济衣冠春意浓。

品酒草堂评史事，漫书纨扇夺天工。

相交不愧称知己，走笔揭私集《洞风》。

摸百期颐公独享，追陪末座始终同。

注：《洞风》为当年老人与兄所办进步刊物

曾孔恕兄和诗云：

和隐秋君《简贤老人摸百之庆》诗一首

甜城客况胜缘中，耆宿高贤许过从。

浅论猥搜刊卷册，拙诗谬赏蹊天工。

长松独羨冰霜后，眉寿还因灵秀钟。

为祝期颐公更健，敢陪濠上证齐同。

余洪如兄《奉和张君〈简贤老人摸百之庆〉前韵》

严寒岁末访贤翁，百尺危楼拾级通。

阔论高谈浇块垒，低斟浅酌暖调空（室内空调）。

怡情四有身心健，颂祝三多韵律工。

纵目广场新胜景，桥堤辉映水朝宗。

拙因屋顶拂春风，飘逸苍髯不老翁。

倾赏曲词劳助听，卧游图册漫书空。

筵前笑语亲朋聚，城外佳音嗣息融。

白鹭洲头追往哲，画船箫鼓夕阳红。

王德润君和诗云：

秉槎天海任西东，泛历旁搜亦自雄。

望重德高人敬仰，父慈子孝世推崇。

录成《梦影》醒衾俗，史载《张公》见素衷。

举酒祝公何所似，凌空挺拔一苍松。

余凑热闹题为《和隐秋世妹〈贺简贤老人摸百之庆〉一首》

庚辰岁末，拙翁九七初度，期颐可摸索，欣言“我都九十七了哦！”余随诸友往贺，谓“摸百酒”。尽欢。隐秋世妹即以为题。首唱众和。

层崖高处有孤松^①，欲揽苍茫意自融^②。

补壁依稀金石序^③，续书奇佚拙贤翁^④。

魂萦锦里常劳梦^⑤，情系江阳难尽衷^⑥。

日食葡萄三百粒^⑦，交谈未达却说通^⑧。

注：①同辈老人仅存硕果，鲁殿灵光，孤松独秀。

②即欣育九十七事。

③壁间自书行草《金石录后序》，甚得意，日久已破损。常夜不能寐，即背诵名诗文以消长夜，此文为常诵之一。

④不利于行，独卧难奈，又续撰《新梦影录》以自遣。

⑤青年时在成都曾有难忘恋情。八十年代去成都有《旅蓉杂感》诗忆旧。

⑥夫人（已故）杨敬淑女士，小学教师，泸州市人。泸州古江阳郡治，在蹇顿途中，相濡以沫，苦相扶持，独担六个子女养育责任，个个成才。老人谓为“圣人”。

⑦日食鲜葡萄一斤。

⑧重听，又不愿戴助听器，语言难通。但日记中却说，“某某来，相谈甚欢”。

他看了大家给他祝寿诗，非常高兴，记入了日记。对我诗中说到他“魂萦锦里常劳梦”事，他灿然一笑说，“你一句就给我删了”。对这鲜为人知的旧情，真割舍不了。

四、飘然而去

离开人世前，曾作自挽联。以前他偶有诗作，常请炯于此道的曾孔恕兄为他斟酌。这次的自挽联，据他儿媳粟本玉说，写过

多次，后来只找到一些零散句子。他在写自挽联时，过度思维，脑力不济，他曾将这些零散句子给：恕兄看，孔恕只得从命就原意为他整合成完整的联语如下：

俯仰一楼间，想从前浪荡江湖，见多少名场过客，尽成泡影，到如今宽闲并享，吾心良已足；

结交千载上，忆往昔浮沉人海，弄什么公案文书，都是虚华，望来世福慧双修，此外复何求。

总起说来，这联对过去烟尘往事，大都没有什么可留恋的，而甚得意晚年“宽闲并享”，虽说愿来世“福慧双修”，实际已于今世实现，还有什么比这样还好的桑榆晚景呢？

他因曾任国民党县党部指导委员会委员而在建国后判刑。其实在这期间他在县党部办的训练中用廖划平在黄埔军校教《社会发展史》讲义讲课，被认为宣传历史唯物主义，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平了反，他高兴；他的子女个个成才，他亲昵地骂他们“狗日的”，他说“狗日的个个都比我强”，他高兴；每月工资用不完，吃用什么都不用愁，他高兴；他住小儿建民家，儿媳粟本玉如亲生女儿，服侍无微不至，他常说“我遇到杨敬淑作伴侣，又遇到好儿媳本玉，真是此生之福！”生前曾书有赠语给本玉，他高兴；老来优游岁月，赋诗撰联，每日听川剧，坐茶馆，与朋友聊天，闲来哼一两句川戏，背诵古诗文，书写条幅扇叶送友人，一次在半节阴家巷吃狗肉火锅，边吃边唱《情探》，边讲精彩唱辞，津津有味地说其中几个“来”字，是神来之笔，足足一个半钟头。临终前，他都头脑清晰。说他福慧双修，也不为过吧。

2001年12月下旬住进医院，只六七天，到31日，只能张口喘气，医生说，各器官俱已老化衰竭，血液循环不利，脚尖变乌黑，已坏死。次日即元旦，他已尽最大力量，跨上2002年了。家人准备中午齐聚备蛋糕为他祝98生日，而他上午9时即匆匆离

去。他生前多次说过（也对我说过），“死了不要搁，王安彬（二女婿）他们人熟，立即火化”。按照他的遗愿，即从医院送去火葬场，次日入土，与杨敬淑夫人合葬一墓。未惊动任何人，飘然而去。

友人都有挽联送行，余勉为联云：

众里失追陪，难忘相于巷陌，娓娓述说里闾轶闻，任桑柘影斜，畅怀人散；

期颐可摸索，何乃急蹈天台，匆匆了却尘寰羁念，令庭闱梦老，万里风悲。

赵熙晚年的一次生日

拙老口述 王德润笔录

荣县赵熙（赵尧生），清末翰林，出任监察御史，高风亮节，名重朝野，且精诗、书、画。文坛巨擘梁启超习诗曾师事之。吉光片羽，为世所珍，尤工词曲。所作川剧《情探》，轰动艺林，叹为绝唱。

抗战期中，赵熙第八子赵荀龙任内江粮食供应处副处长。1945年夏末秋初，荀龙迎父来内江度80寿诞。时值新秋，天高气爽，荀龙特于沱江北岸西林寺太白楼设华筵二桌恭贺，特邀供应处主任张仲孝（内江名书法家）作陪，并偕同事十三四人，述者亦被邀共宴。酒酣，赵老讲起他写《情探》一剧用几个“来”字刻画人物感情的缘由，如“今朝都到眼前来”、“春色因何人得来”、“千山万水无音无信忽然来”、“感得她千山万水一人来”、“只落得望穿秋水不见一书来”、“芦花风起夜潮来”等，人物情思步步紧逼。众人贺曰：赵老词调高雅，情文并茂，真写得意浓情切，令人心碎。荀龙并忆起他于1935年在重庆陪父至章华舞台看名伶周

慕莲、萧楷成演《情探》时，赵老边看边掉泪，怅触前尘，感伤万千。戏毕，口占一绝云“绝代深恩化作仇，哀弦和泪写伊州。章华台上三更雨，不是情人亦白头。”席终，众请赵老赐书条幅，书云：“一条银线自天来，水势随山阖复开。从古城称重镇，丛林深处读书台。兰成萧瑟行千里，李白飘零酒数杯。遭乱莫伤流寓久，满林松竹在蓬莱。”时，赵老已双目昏花，两手颤抖难止。执笔时尚不知笔尖是否落于纸上，赖其子荀龙扶手示落笔处，始克完成，字仍苍劲，足显朴拙。当时西林寺太白楼四周森林茂密，重峦叠翠。名士雅聚楼台，江上烟波浩渺……追忆当年：太白楼头贺高寿，江天遥望夕阳红。

记拙老追忆一古联

王德润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某日，赴内江箭道街朝阳茶馆，得文教界 95 岁高龄的前辈官简贤先生追忆一联，联云：

看阶前草绿苔青无非生意；
听窗外鸦啼鹊噪恐有冤魂。

官老（人称拙老）再释曰：此联系普州（今安岳县）旧县衙内，幽深浓荫处筑一“亭园楼阁”（惜阁名已忘）造此亭阁，专供县府文案人员，暇时饮茶闲谈雅座。旨在避免县衙人员乘隙外出私通关节，藉以培养“清廉良吏”，并于亭内镌刻该联。时人欲使官吏“清廉”，足见用心之良苦矣！

对《新梦影录》的修、补意见

沈元加

《内江市市中区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所刊载的《新梦影录》（作者拙老）是一篇引发读者浓厚兴味的短文，但有少数细节不大符合历史真实，或有一些遗漏或误传。如：

第166页关于“李绍羲（景骅）”一段。说李任“成都县长”实为“华阳县长”之误。李绍羲曾任川军某旅参谋长，时人多以“李旅长”相称，据《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建馆四十周年纪念》专刊记载：李景骅于1956年被聘为该馆馆员。

第167页关于“刘伯超（展绪）”一段。说刘展绪自“陆军大学”（应为“陆军大学”）毕业后“分发到汤恩伯兵团抗日，据说黄河决堤，是其谋略。……”与历史事实不符。抗战初期，汤恩伯军团曾参加台儿庄战役，后调驻河南境，不在黄河岸边。1938年6月国民党军队炸开黄河堤防，不是汤恩伯部所为。1946年汤恩伯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刘展绪被任命为陆军总部副参谋长。说刘展绪返川后，“任29军副军长”，亦不确，1943年初，刘展绪任国民党第172军副军长兼新编第34师师长。“其实29军军长就是地下共产党员，刘当时并不知晓。”事实上，当时任第172军军长的郭汝瑰并不是“地下共产党员”，但他早与中共地下组织有密切联系，于1949年12月9日率部在川南起义。郭汝瑰于1951年3月开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设在南京）任教，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0年转业回四川（重庆）198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12月因车祸不幸逝世，生前为成都军区副兵团级离休干部，成都军区模范共产党员。经郭汝瑰等人的积极努力，1985年成都军区政治部发文承认刘展绪的起义人员身份，1950年刘在内江被判死刑案件宣告平反。

诗、书、画兼擅的梅晓初

杨祝康 赵延禄

梅晓初，又名梅英，笔名笑楚、阿英、老梅、川南老梅。1910年9月29日出生于内江县松柏乡梅家祠堂。1999年9月20日歿于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享年89岁。

梅老一生与诗书画结下不解之缘，这与他出身于书画世家分不开，据《内江县志》记载：梅氏自明清以来，名人辈出，文者有进士及第，武者有官至“三边总督”（坟墓于梅家山）。又据《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904页记载：“梅雪舟（清）号荣江，四川内江人，擅长工笔花卉，习挥寿平设色法，画芦雁人边寿民之室，常与曹琦往返，绘事益臻神妙，卒年九十二。其父春崖亦精花鸟，子梦清，邑之增贡生，亦工画法，曾孙鹤年、晓初俱以书画名世，玄孙志尧善画仕女，一门画传五代”。被邑人传为佳话。清末至民国，梅氏在内江属望族，家道殷实。

梅老经历了旧中国40年及新中国50年的风云变幻，历史铸成他既有传统文人的风范、又有新时代文人的气质，“三绝诗书画，人品美善真”、“淡泊名利，与世无争”是他生平的写照。

他青少年时期，在内江城内读学塾和中学时，即受到诗书熏陶，酷爱诗文，常习翰墨丹青，后考入四川艺术专科学校，于1933年毕业，随即又在华西大学国学研究班进修，为尔后的笔墨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在求学期中即有“梅生年少善工文，鹤立寒鸡总超群”的美誉。

1934年后受聘在内江县中（现内江一中）、内江师范校、沱江中学（现内江二中）教书，直至抗日战争中在原《内江日报》客串任报社副刊主编，撰写过大量抗战救国诗文，见诸报端。解放后在内江一中、四中教书。退休后，长期从事诗书画活动，并积

极为报刊杂志写稿。先后被聘为中国诗书画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四川省老年书画研究会理事、四川省诗词学会会员、内江市老年书画研究会副会长、内江市书画院顾问、内江森大书画院顾问等职。晚年亦体现了生命不息、笔耕不止的高尚情操。他的诗书画和杂文，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被人们誉为“内江‘三绝’画家”。为教育和文化事业呕心沥血，贡献了毕生精力。在群众中德高望重。

对梅老生前轶事传颂不少，仅据亲见亲闻，作如下概述。

笔作刀枪抗日救亡

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初期，抗日烽火燃遍神州大地，梅老在内江从事教学及担任《内江日报》副刊主编期间，积极参加“左联”进步活动，教书育人，以笔作刀枪，口诛笔伐日寇侵华罪行，激励大后方人民群众的支前工作。他常在课堂上宣讲梅花神韵：“杆是英雄骨，花是烈士魂”，用以教诲学生，歌颂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崇高精神。1938年秋在内江县中、沱中任教时，画了一幅二丈多长的宣传画，题为“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画上一群抗日武装，以大刀长矛同日寇作殊死搏斗，在大南街展出后，群众赞不绝口。抗战期间，他在教学编刊之余，还用石印编绘出“小漫画刊”，取材于各地出版的抗日漫画，加上自己的创作，在上课时分发给学生，先讲后画，收到很好的效果。难能可贵的是画刊经费都在他的薪资中开支。

1937年梅老在《内江日报》副刊任主编时，主编了《晓角》、《血光》、《文化动员》等文艺刊物，以抗日救国为主要内容，稿件多系国内名作家如王余杞（鲁迅弟子）、高兰、林涤非、范长江、闻化鱼、柳倩等的作品。他自己创作了《生死线上》、《北国招魂曲》、《天明了》（诗歌剧）等，对日寇的残暴行径进行了血泪控诉。这些作品以“梅英”的笔名，先后在成都的《国难三日刊》、《华西

日报》、《星芒报》、重庆的《新蜀报》上发表，其中《天明了》长诗在成都《新民晚报》上连载了三个多月，在群众中产生了极大影响。

1939年著名作家、全国文协负责人老舍到内江，被邀请到沱江中学演讲“抗日文艺新动向”，在内江文教界引起强烈反响。演讲内容经梅英记录整理后，在《全国文协会刊》、《救亡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在大后方文艺界影响很大。同年老舍先生第二次由陕北回重庆路经内江，亲自介绍他参加“全国抗战文艺协会”，并赠送他《剑北篇》诗稿以作纪念。抗战期间，冯玉祥将军先后到过内江三次，1944年曾和夫人李德全来内江领导献金劝募，宣传动员深入人心，仅3天即募得金戒指400余枚。由梅英画树干于兰底厚纸上扎成黄梅，在献金大会上展出。梅老曾在《内江日报》上作小诗为证：“戒指扎黄梅，救亡战鼓催，枝枝同傲雪，朵朵放光辉”。冯将军在内江期间，曾书赠对联、诗句与《内江日报》及梅英、尧文藻等人。

《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在抗战期中曾两次回家乡内江，在沱江中学演讲“抗日英雄事迹”，激发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梅老组织学生写出了不少悲愤激昂的诗文，在他主编的《文化动员》上发表。由他亲笔题词编辑出版的《长江战地通讯集》，将范长江所报导的事迹向国内外披露，使大后方人民了解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受到极大教育和鼓舞。

抗战期中，全国进步剧团如中华剧艺社、中国艺术剧社、国立艺专剧团等，先后到内江进行抗日宣传演出活动，不少名演员、剧作家如陈白尘、宋之的等，梅英在《内江日报》开辟专栏，撰文扩大影响。通过演出活动，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抗日激情，并为繁荣内江文艺戏剧播下火种。梅英曾在《内江日报》上赋诗一首：“正义心声无国界，救亡旋律泛高潮。沉雄号角声悲壮，多少男儿夜引刀”。

1941年初国民党在日寇侵华，大敌当前之际，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在大后方炮制“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大逮捕。新闻机构列为重点之一，《内江日报》社一些抗日活动分子梅英、闻化鱼、吴天嘏等均一度被迫停职离任。直至1944年梅老才回到报社主编副刊。曾编辑出版《节约献金救国运动专刊》，受到群众的好评，并在副刊上开辟了《汉安书画舫》，介绍内江及外地有影响的书画名家的事迹，先后刊载了80余篇稿件。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下年，梅英担任报社副刊《中流》主编，直至临解放的1949年上年。由于报社负责人等推卸责任，不孚众望，经费吃紧，内部矛盾重重，形成群龙无首，各行其是的局面，随即进行改造，由于梅英编辑工作出色，加之他家经济条件较好，利用他能暂时撑持门面，原报社负责人乘机纷纷弃职，推选梅英代替社长，他深知垫钱支撑局面的疾苦，在物价飞涨的时局下被迫上任一段时间。作为民国政府地方小报的《内江日报》，在解放前夕，也难免登载过一些不适报道，他在有苦难言的情况下，拖至临近解放。在内江解放的1949年12月初，他书写了大量标语，欢迎人民子弟兵解放内江。

诗情画意独领风骚

梅晓初在四川艺专读书时，从师黄宾虹、冯建吾等名家，在家乡多次到张大千家中观摩画艺、获益匪浅。抗战期间，全国一些知名画家云集四川，如董寿平、张聿光、沈一千、胡藻滨、柯璜、阎松父、丰子恺等先后到内江举办画展，均与梅老交往切磋画艺，使其在绘画艺术上愈加精进。加之勤奋好学，为以后的画风变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人们对他画的梅花赞不绝口，称为“梅痴”，其实他画路宽广，山水、花鸟都很精美，其中尤以梅兰竹菊著称，画梅可谓出神入

化，栩栩如生，独树一帜。他笔下的梅花有红、黄、墨、白、绿、素等各种色调，品类繁多：有傲雪之梅、月下之梅、园中之梅、旷野之梅；有铁骨嶙峋、虬干盘旋的老梅，也有亭亭玉立，繁花似锦的新枝。真是变化万千，使人赏心悦目。他常教导学生，绘画无论大小繁简、工笔、写意，画花必须有花瓣、花蕊、花蒂，画枝干无论主次大小，先画干再生枝，然后画叶，花卉的叶子画成后再勾上叶脉，叶的上下、背向、老嫩、荣枯要鲜明，有层次感，贵在一个“活”字；题款要根据画面大小、疏密等情况灵活下笔，使之浑然一体，完美无缺。

梅老特重诗情画意，几乎每画必有诗，他文思敏锐，画后即兴题诗，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与晏济元合作的“海天落照图”上题诗：“晏九落笔信有神，席卷江山入画屏。惊涛怒涌三岛沉，海燕低昂云水腾。八年血战五洋惊，海天落日陈云昏。百年蚕食变鲸吞，灰飞烟灭一朝崩”。抗战期中，青年画家曾鉴青在内江画出“百虎图”，梅老为其题小诗一首：“画虎鉴青笔有灵，威风摇撼海东云，休嫌弱质丹青手，绘出军民怒吼声”。这些诗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解放后他的题画诗就更多了，他以诗情养性，余热生辉自怡。据其亲属搜集整理遗物中发现，笔记中到处都有他的诗迹。估计平生写诗不下千首。初辑的《川南老梅题画诗稿》就有120首，这只是一鳞半爪。从这些诗的内容来看，多系歌颂党和社会主义，反映时代脉搏的诗篇，不少是抒发他的高雅情操、处事为人的心声。如他歌颂新中国的一首梅花诗：“一片晴露灿玉京，祛寒嘘暖故乡情。海天万里东风正，树树梅红赤子心”。在改革开放年代，他的诗兴更浓，写出了不少佳作，如“梅花岁岁桠枝红，喜报宾来语意融。到处河山增锦绣，五湖四海有亲朋”。1989年春，市政协、市民盟、民革等单位联办了包括梅英的“五老书画展览”，请帖印目上介绍了五老“阅历广、知识博、功底厚，且勤奋，确是后辈

学习楷模”等前言，梅老十分谦逊，在一幅展出的梅花图上题诗：“梅雪争春古到今，梅花村雪更精神。独嫌诗叟偏多事，何必劳心强作评”。他在内江市“庆祝香港回归书画大展”上画的“远浦归帆”图上题了两首诗：“五十春秋旧画图，香江凝笑九龙苏，重洋门户千帆集，还我天南一颗珠”。“百年风雨望归帆，骨肉流离路八千，棠棣花残与花发，江山锦绣换新天”。

梅老更多的题画诗是抒发他的人生处世哲学。如他在独居农舍几年时的一些题画诗：“冰肌玉骨野梅寒，绰约芳姿景色娇。白到此心天可表，水边篱畔也心甘”。“兴酣走笔势摇山，虬干飞腾云水间，圆罢月明珠有泪，更无余墨点苔钱”。“百丈冰岩稳重身，几枝倩影笔端陈。任渠桃李夸颜色，不羡迎风作态人”。在他的两幅素梅画上题诗云：“老干春迟雨后寻，暖风扶醉上西林，可怜万树花争艳，不及冰梅一点馨”。“凌霜挺立见天真。梅雪香凌迥出尘。沁人晓寒清透骨，诗人风格玉精神”。字里行间充分反映了他与世无争的内心世界。他还有几首题梅诗：“纷纷红紫不胜稠，争得春光映画楼，毕竟梅花真本色，乱头粗服也风流”。“八十苍桑岁月新，丹青难绘意中情，披图深似超山道，雪夜梅花处士身”；“墨分五彩写冰花，露重烟浓月影斜。要与竹松同劲节，更于疏散见生涯”。这些都体现了他淡泊人生的情操。在“十年浩劫”后，经过拨乱反正，他已是古稀之年，诗兴不减当年，题了不少梅花诗。如五言诗写道：“十载冰霜霁，春风岁月新。征途诗思壮，怒放几枝春。辛勤种花叟，莫问看花谁。红绽催春急，锄雪护花髻”。七言诗：“泼遍胭脂画不成，休轻一艺愧平生。十年风雪青山在，且喜神州值晚晴”。“十年风雪转新晴，满眼青山夕照明。铁骨凌寒心更赤，梅花怒放万家春”。“斗雪栖霞十载身，梅花几点故山春。东风未老头飞白，喜作忘年路畔人”。

绘画写字是梅老每天的必修课，也是他精神上的寄托。他没有固定宽敞的画室，每月在其妹和几个子女家轮流居住时，走到

那里就写画到哪里，每天练字一小时，从不间断。他写字能左右开弓，即一副对联能用双手同时在纸上写出上下联，一气呵成。作画时从不讲条件，在一张小条桌上也可以画出两张6尺宣纸连接的长卷画图。方法是先将纸铺在地上，统观全局，打下腹稿，然后在小桌上下笔，画幅布局作色仍很精美。他的书画作品分堂幅、条幅、屏条、手卷、册页、扇面、对联、横披等品类，各有特色。梅老还会指画，在厚纸上点染自如，以画梅兰竹菊称上乘。在《东方美术》刊物上发表的墨菊，就是他的指画。在扇面上作画难度较大，他却可以浓墨淡彩一挥而就。曾在内江专门举办过一次他的扇画展览。

梅老的诗书画深为群众喜爱，内江市、市中区、东兴区历年的书画展览都有他的作品。平时向他索要墨宝的单位和个人较多，他都一一应承。人不分贫贱富贵、地不分南北西东，几乎有求必应。各处可见他的画陈列于楼堂馆所，挂于普通百姓家中，有的被收集珍藏。甘肃、安徽、江苏、黑龙江等地的人士，在报刊上看过他的作品，慕名写信向他求画，也都照办无误。他专门备有一本“画债”记录，记上求画人的通讯地址，已经交卷的作了记号，未交付的依次完成奉送，家人称他是“廉价劳动力”，甚至分文不取他也心安理得。

他的梅花作品被省文物研究所鉴定为“三级文物”，被不少文艺单位收藏，如杭州文澜阁图书馆作为精品收藏了他一幅梅花图。解放前后他的画有数十幅流传至香港、台湾、新加坡、南斯拉夫、日本、法国、美国等地。在《30周年国庆画集》、《四川老年书画刊》、《晚霞书画册》、《东方美术》、《内江市老年书画册》、《内江森大书画院画师作品选》等各种画册上，都选印了他的作品。

撰稿不息硕果累累

梅老一生酷爱学习，博览群书，无论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章

回小说、名人传记等书籍都喜欢阅读，用以充实自己，提高写作能力。他的工资收入微薄，但订阅报刊、购买各种书籍从不吝啬。常订的有《人物》、《炎黄春秋》、《名人传记》、《龙门阵》及一些书画刊物。对当代文坛上如钱钟书、贾平凹等作家的著作仔细阅读研讨，往往在书上作评点，写上旁批，发现错误之处，予以商榷或更正。

他每天晚上就寝前要写出简要日记，除记大事外，也写杂文、诗稿和看书的心得体会。平时十分关心国家大事，注重时事政治学习，报纸必读，新闻联播必看，重要事件还要记在本子上。因此，家人称他是“书迷”，“学习模范”。

梅老常年紧握笔杆，辛勤耕耘，写出了不少佳作。据粗略统计，新中国成立后，他为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写稿达200余篇，诗词对联若干件。这些作品先后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文化报》、《四川政协报》、《成都晚报》、《龙门阵》、《晚霞》、《晚霞报》、《海峡两岸》、《四川侨报》、《团结报》、《沱江报》、《内江日报》、《内江广播电视报》、《内江文史资料选辑》、《内江政协》、《岷峨诗稿》、《沱风》等报刊杂志上。在他晚年体弱多病时，有的稿件系由他口述，别人代笔发表的。

纵观梅老发表的一些文稿，可以窥视出他对地方掌故、民间传说、历史人物、人文景观、名胜古迹、文史知识、名人轶事、汉文语辞、古诗词研究等方面的探索，涉猎广泛，研究文章颇多独到之处。阅读他的作品，回味无穷，受益匪浅。

他的诗画文章曾多次获奖，荣誉证书一大堆。在《现代作家笔录》中，有全国著名作家签名手迹。在（一）面上有鲁迅、巴金、郭沫若等名录，在（三）面上，除梅英的签名外，尚有肖军、唐弢、张香山、罗峰、梁山丁、姚雪垠等名家的签名。这在别人看来，是很值得炫耀骄傲的事，但他却守口如瓶，从不在人前宣扬自己。

德艺双馨启迪后人

梅老一生在文艺创作上孜孜不倦，卓有成效，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他思想上向往光明，追求进步，在抗日战争和胜利后，做了大量有益人民的事情，除了在报刊上撰写了不少进步作品外，还在白色恐怖的年代，不怕受到牵连，与地下党员闻化鱼交往甚密，并曾掩护地下党员尧文藻等人开展活动，长期供其在家中吃住，虽然他当时的处境不同，但仍可充分反映他是一位富有民族气节、正直的爱国者。

他在教书期间，常以“人品第一、画品第二”的做人准则要求学生，告诫大家要做一个“纯洁的人，高尚的人”，他首先以身作则，做出榜样，在学生中威望较高。人们评论他“忠厚善良，豁达乐观，淡泊名利，坦荡为人”。他对子女要求严格，教诲正直作人，为社会多作贡献。平时他对人宽宏大度，和蔼可亲，性情缄默，不随意褒贬他人。同辈人都喜欢和他一起饮茶聊天，有不少知心的老朋友。为了搞好“传、帮、带”，还与许多年轻人结为忘年之交，常与这些人评论书画，切磋技艺，融洽相处。使新一代文艺人才茁壮成长，后继有人。

梅老对新中国无限热爱，对社会主义前途充满信心。他在70大寿时曾吟诗一首：“霜鬓冰须重见时，老梅仍是旧容仪。欣看彩蝶神州舞，长袖迎风笑古稀”。改革开放以后，更是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唱赞歌，在一首题画诗上写道：“烂漫春红照锦江，文翁化育泽流长。梅花百载成梁栋，散作神州万里香。”

他在耄耋之年，仍坚持学习，挥毫不止，对新事物充满好奇心，具有无穷无尽的想像力；语言表达能力比年轻人毫无逊色，记忆力不减当年，能随口背诵出不少旧诗词，这是同辈人中罕见的。

梅老晚年生活较为清苦。虽然他有5个儿女，其中有两个女儿在北京、武汉工作，政治地位和经济条件都较优越，但他从不

要她们接济。平时克勤克俭，粗茶淡饭，布衣敝履，80年代以前基本是独居陋室，住过5年农舍，生活水准相当于一般平民百姓，有时吃点胡乱盐酱佐餐，经常进城也是以步当车，持杖来回行走，长年累月奔波于其妹和3个子女之家，轮流吃住，晚年过着不太安定的生活。但他却心安理得，毫无怨言。

据梅老亲属谈及，在他生前没有什么储蓄存款，没有留下什么字画精品在家，只残留了部分未完成的诗书画稿，也是索要者未能如愿的遗墨。唯有遗产是在其妹和三个子女家的书桌抽屉内及平柜、立柜中，堆满了他的书籍、笔记本，甚至他的睡床上、枕头下也是这些东西，真是伴书伴到死同眠。

对梅老的人品，市政协原学习委员会有位负责同志曾吟诗二首赞曰：“虬枝铁骨几多姿，不竞群芳独放迟。长伴幽岩甘寂寞，素心高洁又谁知。”“郭外一枝开无主，零落成泥野径香。自是风流高格调，耻随飞絮逐斜阳”。这对他的生平写照，是最贴切的。

梅老一生在内江文化教育战线上卓有建树，培养了一批人才，影响所及，社会各方面人士对他很尊重，有的人也很同情他的坎坷人生，他在40年代曾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以后脱离组织一段时间，解放后又重新入盟。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一度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作为一般教师退休处理。但他生前却是坦然处之，从不计较，将名利置之度外。

“天不遗一老，人已足千秋”。梅晓初先生病逝后，有关组织及其亲属、生前好友等，为他举办了较隆重的追悼会，他的骨灰安放在内江市东兴区五星水库青山碧草丛中。他生前虽没有为子孙留下什么遗产，但却给人们留下了更多的精神财富，留下了他处世作人的高尚品德，这是千金难买的无价之宝。

2001年4月10日脱稿

注：本文作者曾采访梅老亲属并参考《内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二、第六辑有关资料和《内江广播电视报》王德润、马兴国撰文

寒梅岭上溢清香

王德润

一年一度北风劲，又到寒梅溢香时。

一日，偕友游郊外，正北风朔朔，寒气袭人。望大地枯草蓬松，百花萧煞。然而，岭上树树红梅，生机盎然，迎风怒放，随着刺骨的寒风飘逸着阵阵馨香。

我们趋步梅树下，未料主人从梅树丛中含笑迎来。言谈间得知主人不仅喜植梅树，还是一个画梅、吟梅的爱好者。他热情邀我们至家舍少憩，我们婉言以谢，眼看着这鲜活带露的梅花，不由想起一首题梅诗：“戴月披风战雪霜，红酣万点透春光。生成铁骨心肠直，吟到梅花句亦香”。正诵间，主人笑了笑亦吟道：“岭上梅花未染尘，折来带雪更精神。吟成诗句嫌多事，俏不争春只报春”。我惊讶地问主人，这诗句出自何处？主人笑答：“是一位梅画家在《腊梅图》上的题诗。我未敢追问画家名。我友人亦来了诗兴接口诵道：“纷纷红紫不胜稠，争得春光映画楼。毕竟梅花真本色，乱头粗服也风流”。主人大笑说，这首诗同出于一梅家之笔。我与友人含笑未作正面答复。倏地生出一点勇气，我接着说，鄙人再来一首如何？唉！恐怕也难逃出你的记忆圈子，“珠砂绿萼自风神，斗雪凌霜百炼身。老树新枝无丑态，横伸一臂好迎春”，主人大笑不止，握住笔者的手说，请原谅我的不客气，大家别倾“诗篓”了，这些都是梅画家梅晓初先生“梅画”上的题梅诗。我不得不追问主人，原来他竟是梅先生的学子，收藏有梅老题梅诗近百首的《诗集》一册（油印本）。由于对梅老诗册的兴趣，应邀随主人至房舍一坐。室外北风正紧，屋内主人沏茶甚忙，真是：“风吹腊梅满门香，主妇沏茶劝客尝”。有幸拜读了梅老这册题梅诗集。我征得主人同意，掏出纸笔，吹吹冻僵的手，疾录十余首。这里不妨摘抄于后，与爱好者共享。

十载冰霜冢，春风岁月新。
征途诗思壮，怒放几枝春。

辛勤种花叟，莫问看花谁？
红绽催春急，锄雪护花蕾。

冰岩乍见几横枝，古拙清奇未入时。
兴到雪深禁不住，波翻浓墨当胭脂。

写到梅花便不同，枝繁蕊密倚东风。
春光无限来天地，骨硬心红意志雄。

寻春徒倚绕东墙，漫写村梅细酌量。
笔冻砚水深不觉，吟成独对一枝芳。

捣碎红绒唾满枝，晴霞绕地暗香滋。
寒禽晓角啼霜月，溶入春风化小诗。

高土寻春对古梅，冰花铁干共低徊。
夭桃绚彩争红艳，不敢横枝傲雪开。

梅雪争春古到今，梅花衬雪更精神。
独嫌诗叟偏多事，何必劳心强作评。

正月桐乡雪意浓，春寒剪水一江风。
梅痴不惜胭脂贵，波染横斜万点红。

耐尽人间冷暖晴，一番冰雪一番春。

天南地北年年客，惟有梅花似故人。

漫写绿珍三两行，品清影淡貌端庄。

羞倚金谷成娇丽，野舍村篱伴众芳。

铁骨嶙峋邀汉唐，虬枝盘崛历千霜。

紫云绛雪开新境，百卉迎春尽向阳。

梅老虽已辞世数载，然而他的画和诗仍在民众中盛传，梅老笑容笑貌，尚在眼前，梅老对梅的述说，还响在耳畔。梅老常说，梅花高洁，不以妖冶而媚俗，不以趋炎而邀宠，不屈服雪压霜欺，它飘逸而独放寒香。它高雅奔放，具有呼唤春天的浩然正气。梅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主人热茶暖心，满屋笑语欢声，驱散风刀霜剑，野舍盎然生春。

隆冬，北风呼啸的郊游，与之春意融融的艳阳踏春，恰又别具一番情趣。

家先严陈鸣鸾遗作及事略补正

桂湖长子

首先，由衷感谢文坛各界世家师友对家父的缅怀；对敝人的帮助、鼓励、鞭策、关注之情。

内江市中区文史资料编委的老师、先生们，多次多篇幅刊载家先父的遗作和史略等。祥移自当铭感不忘，必发奋自励以报。

所谓“补正”，直言之，即补其遗漏，正其偏颇。兹将敝人自幼至今，所了解家先严的事略、遗作等方面情况，在尽可能不重复的前提下，给文坛诸君提供参考。并希能得到指正。

(一)关于名与字

家父族名嘉苓。学名鸣珂。以后名鸣鸾字步鸾。号桂湖居士；署白漫斋。1874年生于内江县来凤乡。根据家严的学识及抱负，在命名上当是意向有所指而别具一格的。本人有以下几点推测：

(一)学名曰“鸣珂”，(后来在军队任职亦用此名)估计是师祖敖登崇所取(敖系晚清翰林，荣昌县吴家镇人，现镇边尚存敕建红牌坊有记载)。其意出自晋典《闻里鸣珂》。(见龙文鞭影五歌韵)

(二)大约在1920年以后，家父去军从政，自己命名为鸣鸾，字步鸾。根据父亲的志向可作如下解：

(1)先从“鸾”字看，字典条目解“鸾、神鸟也，赤神之精，凤凰之佐；毛备五彩，鸣中五音”又“鸾现而天下安宁”。由此可知，鸣鸾是才华和抱负。

(2)杨升庵送赵大洲诗“鸣鸾飞步上瀛洲”。从这个意义上看，若命名据此，也不无道理。紧接着“字以表名”的原则，步鸾也就自然而然了。

(3)但从家父的性格看，他是要循经典的。来个“转弯倒拐”，这个典就叫“代生独步”。因为代良字叔鸾，当时文坛称他是群伦之冠，代曰“我要独步”，推论到叔鸾独步，转为“步鸾”或许是可以的(见龙文鞭影三江韵)。

(二)关于军政任职

家父于光绪28年(1902岁在壬寅)院试中秀才。有钱人家子弟中试，骑马坐轿，披红挂彩，吹吹打打，大宴宾客庆贺。而家先严家境贫寒，由敖登崇师祖给一串铜钱，手提几斤挂面，背揸一个包袱，脚穿草鞋，回家(步行一百几十里)祭祖。

尔后，在当时四川军阀杨森的军部及其所属二师王文鏊，六师王芳洲，七师王国栋，八师王仲银等各部任秘书(还有熊克武部，不

知是哪一师)。

也许是家父的性格关系,不管任军职或搞政务,没有一处超过三年的。反正不顺心就走。这个问题,我亦有体会,1999年我写《子夜吟》中有两句“直傲轮番频调职;糊涂一度小登科”。正是我们爷儿俩的写照。

之后,任四川税捐总局科员;后提拔为四川国民党政府首任盐场知事。任了一年,死活不干。当时人说陈步鸾是“傻儿”,不会搞钱,一个上好的肥差事不干。那是民国23年的事。

就这一年俸金,正好办三姊祥芸出嫁嫁装,十铺十盖八大抬,吹吹打打送到龙门镇曾家,好热闹,满城传开了“陈步鸾这个穷秀才,比大绅粮嫁女还阔气!”

过了一段时期,税捐总局长唐殿臣调任巴县县长,又聘任我父作“文牍师爷”(即文案秘书)。以后又在古宋、叙永等县政府任秘书职务(可能还不只以上三县)。

在1934年,那时父亲已经六十岁了。正当我要出生之际,可能是对现实社会的厌倦,从此不再出门作事,从军政界转入文坛。

在进入社会任职的各个间隔阶段,中间也插入一些学校任教过程,时间都不长。只是在内江县陈氏宗祠重华小学校董会兼任董事长,并教学时间很长,因多年来家父一直被公选为陈氏宗祠族长。

(三)关于诗书画

(1)有关诗作遗稿;首先,将未发表过的二首抄录于下,以飨读者。

秋日寄怀谭直方^(注)

尚有金钩在,星霜自抚摩。
桂从秋气老,湖受夕阳多。

过隙看驹迅，临宫坐蝎磨。

故人惠思我，千里意如何。

注：此作为草书条幅。

临城帖诗^(述)

雪后溪山照眼明，出门一笑大江横。

龙瘦虎困三分地，留与先生曳杖行。

注：此为临城相国章草斗方单页，前有序言。

市中区第 39 辑文史资料刊出的先严遗诗，因草书识读及排版出现的错字辞，作个别单句摘抄，更正如下：

一、代陈石渔挽邱特澄联：下联第二字应为“袂”。

二、香山刻壁诗第五句是“从识河山真泡影”。末句是“莫漫逡巡过去来”。

三、题石涛山水画册眉批诗第一首一二句为：“竟教屋占三分水，欲捻书买千钱邻。”

四、该山水画眉批还有一首，兹录于后：

古戍云深苍莽外，雄关烟锁有无间。

诗情多自骑驴叟，处处梅花雪满山。

五、杂感四首第一首第六句“蜚簾馆不锁烟霞”。

第八句“琢否新辞苏幕遮”。

第二首七句第一字为“庄”。

第三首五句“天上近参非想界”。

市中区文史资料 33 辑，以《陈鸣鸾先生事略》为题的文章中所载家严遗作及史略等，由于各种原因，有所讹误者，均以此次供稿为准，不另赘述。又陈鸣鸾么女祥兰实为嫁赖星辉部之师长魏溶之三公子为妻，原文作杨森部；又杂感第三首末两句“乘槎向苦仙凡阻，从泛飞狐是画桡”。误为“白信”。

(2)有关书法作品等，近百年来，各地及本市书家多有评述，并

作了一些认定。本人只作下列补充：

从民国时期至今，书坛宿老为，“陈鸣鸾的书法，自明代以来，四百年间，已自成一家，而无其匹”。十多年来，我寻回父亲各种书体（除榜书而外）二十余件；手抄古小字（行楷约六千字）一册；临华山庙碑、临各家书体，以章草为最多。尤其到晚年，家先严的章草书法已经是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

敝人儿时习字，家父常言：“写字之要无他，十字而已”。即命笔四字“使、转、提、顿”；拟形六字“昂头、截足、窄腰”。比之于各种书论，感触良多，戏作打油一绝，以为君子博粲。诗曰：

书坛理论若干条，忘却先贤十字招。

使转还兼提与顿，昂头截足紧中腰。

对于写字，现引用号称东方梵高之陈子庄师哥所述：“少时即听陈步鸾先生言：写字是素养之一项，写字是习静。人一天动时多，要能静，然动中有静。长期写字，能变化人之气质而不自知”。（摘自《石壶画论语要》1987年版，汇编为子庄弟子陈滞东等。兹摘印书影片数段，以为证。）

（3）关于家父的画，在当年至今，画坛的师长们有这样的评价：“陈步鸾的画，有书卷气味”。对家父造诣如何，我这个“羞见翰墨通家，愧言书香门第”之不肖庸才，是无力评述的，有待方家认定吧。

1991年，一个偶然事触动了我。

解放前一位在邻塾读书的余仕华老先生，于土改时捡得很多书帖字画，几经岁月推移，剩下三张小品工笔山水画，材料是绢质的，印章是“桂湖居士”。余先生访到本人住处，亲自将画无偿地送还，当时本人感激零涕之情，难以言表……！自此时起，诱发承传意趣。随后的三年中，访寻回部分家父的诗稿和书画遗作。在世家亲友姐姐们的鼎力支持下，于九四年春节在内江一小搞了为期五天的《汉安五两诗书画展》“五两”即祖孙、父子、兄弟、姊妹、翁婿，并取得成功。

在开展第二天，晏济元师兄请市外事办刘卓鲜来拍摄了一幅家严的写意山水画。

今再引用《石壶画论语要》中陈子庄师哥的话说：

“我的画倘谓有成，实依靠两个条件。首先是老先生们的支持，齐白石、黄宾虹、辜培源、公孙长子、杨沧白、陈步鸾、谢无量诸先生均为我或讲授画理，或谈论书法……”。

“当代画家中颇有道德修养很高，画亦极精，而名不著于世者，余拟暇时作《画人传》以表彰之，以垂不朽，兼示后学，略数之如：……（约 10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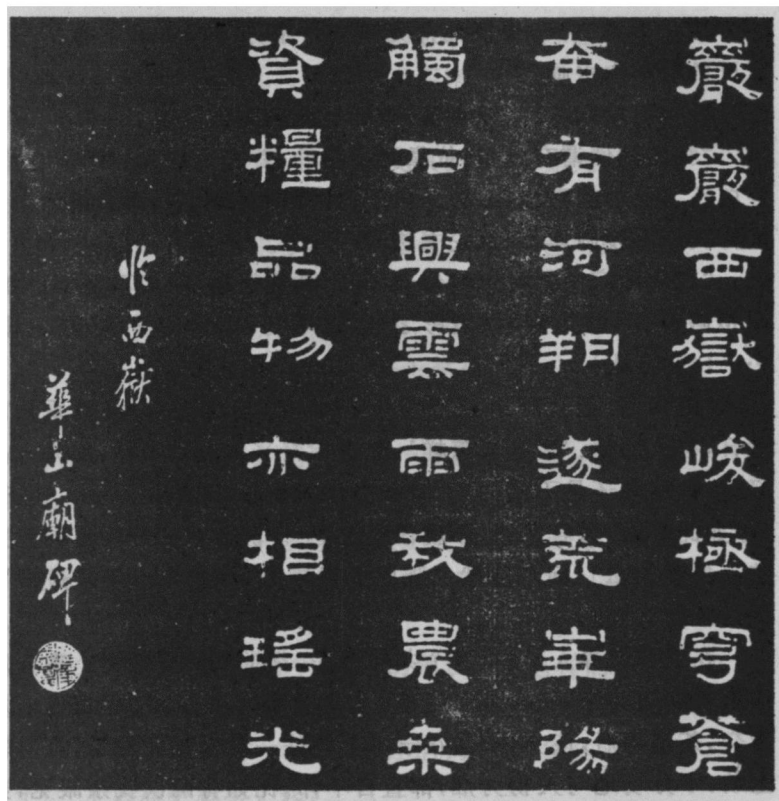
“陈步鸾，经济窘迫，经常打一双赤足，而为人旷大，常垂钓以遣日，有人问他：‘×××怎样’，陈道：‘×××人品不好，如果人品好些，他的画还是不错的’。时欲委他为县长，陈坚拒不受。或曰：‘你如此贫困，为君之计，不就任不对吧’。陈作色曰：‘难道同意去整百姓就对么！’问者嘿然。陈因厌倦应酬，乡居几十年未进城”。（注：末句有误）

在很多文界人士中，有个共同看法，都觉家父脾气怪。本人从幼年长期随父亲一起，就更清楚。他老人平时不多言。但每逢旧友新交，茶余酒后，谈文论艺，在学术上往往一说就没完没了。有时较上劲，不分场地与人物为谁，都直言不讳。比如有两次我亲眼见，当场耳闻，在文人聚会场合他老人家指着一位名书法家说：“你想写好字？二辈子！”家父在日常生活、技艺、社交上，与人不同之处甚多，留待后述。至于家先严属何许人也，让将来文坛人士论定吧。忽然想起前几年写的诗以作结。

诗曰：滚滚沱江不尽流，沧桑演绎永无休。

人材济济相将出，各领风骚竟几秋？

二〇〇一年六月卅日



此为家父临华山碑起首一段，大概于二、三十年代，在与文坛友人游华山时，临送文友（还临有杨淮碑）。一九八七年，敝表侄孙熊友泰走访华山文管处得到证实，并欲收购为馆藏。一九九四年，友泰尊先人遗嘱，无偿送还本人。

注：此件系双钩书体、朱砂填版。

（陈祥杨 供稿）

我对内江县第二次产糖 高峰糖产量作了一次核查

邹作圣

想了解一下内江县第二个产糖高峰 1940 年的产糖量,为了方便,检手边资料翻了翻;不料这些资料有多种说法,使我得不到一个比较肯定的概念。现就这个问题作一次讨论。为了参照有关数据,特将蔗田面积和蔗产量一并讨论。

一、先看一下手边的数字

表一 手边 1940 年糖蔗数字表

面积:万亩 产量:万吨

序号及资料来源	种蔗面积	蔗产量	糖 产 量			备 注
			糖 清	红 糖	合 计	
1、《内江县志》	12. 5	43. 82	5. 823	0. 3025	6. 125	见蔗谱志
	16. 6376	41. 5938	7. 4		7. 4	见大事记
2、《内江糖业史》	12. 5	43. 825				陈栋梁李明生著
3、蓝炯、高慕元文	16. 6375	41. 5937	3. 2303	0. 5131	3. 7434	见《民国时期内江县经济》
4、黄世杰文		43. 825	5. 823	0. 3025	6. 125	(同上)
5、史教法文	12. 5	43. 825				(同上)
6、杨祝康文	16. 6375		4. 9497	0. 8735	5. 823	市文史资料第四辑,注明资料来于黄云门
7、《内江县甘蔗资料汇编》	12. 5	43. 825				第 5 页,注明资料来源于糖业公会和川南糖酒管理局等单位
8、《内江县志·工业志》编写组	16. 6375	41. 5937			3. 7434	内江县文史资料第十一、十二期

注:上述资料产量单位有不用万吨计算的,一律换算为万吨,种蔗面积未以万亩计的,一律换算以万亩为单位。

从〔表一〕可以看到：

1、蔗田面积为两个不同数字：12.5 亩、16. 6375 万亩。《内江县志》两数并见。

2、蔗产量使用 12.5 万亩的所得蔗产量均相同，使用 16. 6375 万亩的，除杨祝康文未列产量外，余者亦相同。《内江县志》也两数并见。

3、糖产量：（包括糖清与红糖，蔗汁制成糖清比制成红糖成分高，但内江产红糖量小，故一并计为糖产总量）有四个不同的数字：6. 125 万吨，7. 4 万吨，3. 7434 万吨，5. 823 万吨。以蔗产量为 43. 825 万吨的五种记载中，有三种未记糖产量，余二种均记为 6. 125 万吨；以蔗产量为 41. 5937 万吨的三种记载中，有两种记糖产量为 3. 7434 万吨，一种记为 7. 4 万吨；另一种是杨祝康未记蔗产量，记糖产量为 5. 823 万吨。《内江县志》糖产量也是两个不同的数字。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1、种蔗面积、蔗产量和糖产量都有很大出入。

2、蔗亩积小的（12.5 万亩）蔗产量却更多（43. 825 万吨），蔗亩积多的（16. 6375 万亩），蔗产量却更少（41. 5937 万吨），蔗亩积同为 16. 6375 万亩的四种记载中，糖产量有三种不同记载（7. 4 万吨、5. 823 万吨、3. 7434 万吨），其中两种记载数将近相差一倍。

为什么这么大的出入？这些数字是怎样得来的？

二、寻找数据根源

初步可以肯定，使用蔗亩积为 12.5 万亩的《内江县甘蔗资料汇编》编写在建国初，比其他三个使用者为早，编者又是专家，据有相当的权威性，其他三个使用者是直接或间接根据这个《资料汇编》而来。

但还有很多问题得不到解答。于是借来内江市档案馆 1984 年

编的《内江蔗糖资料选编》(民国时期)查阅。现将查到的1940年全部有关数据列表于后:

表二 档案资料有关内江县1940年糖蔗数据表

面积:万亩 产量:万吨

序号	页号	种蔗面积 (万亩)	蔗产量 (万吨)	糖产量(万吨)			备 注
				糖 清	红 糖	合 计	
1	概况 10	12.5	43.825			3.7434	非档案中数字,是档案馆认定数字
2	正文 4		41.5928			3.7434	1943年甘蔗试验场业务股复龙泽洲函
3	88	12.5	43.825				制糖公会、川南糖酒管理局等单位提供,载《内江县甘蔗资料汇编》
4	90	16.6375	58.23				1941年杨寿标《四川蔗糖产销调查》,据内江甘蔗试验场直接调前积,间接估算蔗产
5	94—95	16.6375	41.5928				未说明资料来源,列入1938—1942年四川各县蔗、糖产量比较表中
6	96	19.4	19.095				省食工研究所提供资料
7	412			3.2303	0.5131	3.7434	1940年四川农改所甘蔗试验场《四川各地糖房分布状况表》
8	449					3.362	1943年农民银行据中央工业试验所调查所得
9	450					7.4	1943年内江县制糖公会主席李汉文对四川沱江沿县近三年糖产估计,载《西南实业通讯》八卷一期

从上表可以看出:

1、面积

(1) 此表中序号(3)所列建国初制糖公会、川南糖酒管理局等所使用的亩积12.5万亩,是这个数字的唯一使用者,这个数字得到市档案馆的认定,也载于其后不久(1956年)编成的为内江县许多部门以为依据的《内江县甘蔗资料汇编》,陈栋梁李明生

也在《内江糖业史》中引用。

(2) 序号(4)所列种蔗面积 16. 6375 万亩，是 1941 年杨寿标根据甘蔗试验场调查得来刊在《四川糖业产销调查》提供的数字。杨寿标说，这个数据是甘蔗试验场“直接调查”得来；又说参考经校核过的内江县耕地面积数字，蔗田仅占当时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一，“似嫌稍小”，以后的序号(5)采用的这个数字，[表一]中这个亩积的数字都源于此。

(3) 还有序号(6)所列的省食工研究所提供的 19. 4 万亩的数字。

2、蔗产量

(1) 序号(3)蔗产量 43. 825 万吨，是制糖公会、川南糖酒管理局最先使用者，为市档案馆所认定，载于《内江县甘蔗资料汇编》，是内江县各部门使用这个数据(43. 825 或为 43. 82)所本。

(2) 序号(2)蔗产量为 41. 5928 万吨，见于甘蔗试验场业务股 1943 年复龙泽洲函，后又见于序号(5)未注明出处的四川蔗、糖产量比较表中。应为甘蔗试验场首用数据，为内江县各部门用此数据(或为 41. 5937；41. 5938)之本。

(3) 序号(4)所列产量为 58. 23 万吨，来源于杨寿标文，杨说这个“产量系根据亩积(16. 6375 万亩)推算”而来。

(4) 蔗产量还有序号(6)的 19. 095 万吨的数字。

3、糖产量

(1) 糖产量有二家都为 3. 7434 万吨。最早(1940 年)提出这个数字的序号(7)为四川农改所甘蔗试验场(另处作“改良场”即内江甘蔗试验场)。1943 年甘蔗试验场业务股复龙泽洲的函，使用的就是这个数字，为市档案馆所认定。

(2) 序号(8)为农业提供的数字最小 3. 362 万吨，另序号(9)所列数字为这个数字的一倍多，达 7. 4 万吨。

三、试对以上数据作一分析

1、亩积 亩积有三个数据：16. 6375（或 16. 6376）万亩；12. 5 万亩；19. 4 万亩。

（1）19. 4 万亩。系食工研究所提出。无产量参照，而蔗产量仅 19. 095 万吨，每亩产量不足 1 吨，不足信甚明，不予讨论。

（2）16. 6375 万亩是杨寿标在 1941 年《四川蔗糖产销调查》一文中根据甘蔗试验场直接调查得来的。但杨又说：本年耕地面积为 1119 平方公里，合 1678500 市亩。按廿九年（1940）蔗田为 16 余万亩，系甘蔗试验场调查之数字，似嫌太小。因内江农民中，蔗农约占半数，而蔗田面积仅及十分之一，两数相较，不无疑问。”就是说，本年 16 万余亩面积，小于实际。

（3）12. 5 万亩是建国初制糖公会和川南糖酒管理局提出的数字。这个数字是制糖公会有意缩小了的数字。1950 年 5 月成立了包括制糖公会在内的内江县工商联筹会，差不多同时成立了川南糖酒管理局。他们在共同核算建国前糖产量时，糖酒管理局干部不了解情况，主要是听制糖公会的。而制糖公会那时对党的政策不摸底，看到人民政府补征 1949 年公粮，不知 1949 年糖税如何处理（后来的确补 1949 年所得税），因此在核算过去产糖数字时，有意以多报少。1940 年虽然时过已久，但前后数字有相续关系，对已过去年份数字，仍以少为好。本来这些年的有关糖蔗产量，甘蔗试验场已有调查数字（从糖税中推算得来），公会是知道的，为何又要另编一套数字？其原因就在这里。

现在恰好查到杨寿标文中有《最近六年（1935—1940）内江蔗田亩积及甘蔗产量》的数字以与制糖公会和糖酒局数字对照，便可证明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制糖公会、糖酒局与甘蔗场

1935—1940 年亩积产蔗对照表

面积：万亩 产量：万吨

时间	公会、糖酒局数字		杨寿标甘蔗场数字		
	面 积	蔗产量	面 积	蔗产量	
1935 年	11. 53	28. 825	15. 3732	53. 8057	
1936 年	9. 375	23. 4875	12. 5 (43. 75) (7. 9486)	27. 82	甘蔗场上行蔗产数“按定额税收估计”，下行蔗产数“按实际税收估计”
1937 年	11. 104	27. 7877	14. 8056	37. 01	
1938 年	10. 125	25. 3125	13. 5	33. 75	
1939 年	10. 3125	20. 625	13. 75	27. 5	
1940 年	12. 5	43. 825	16. 6375	58. 23	

注：①公会、糖酒局资料载《档案资料》第 88 页，录自《内江县甘蔗资料汇编》中之《内江县历年甘蔗面积产量表》，《汇编》说明资料来源于公会、糖酒局。

②杨寿标引甘蔗场资料载《档案资料》第 90 页，资料来源于甘蔗场：沱江流域蔗糖业调查报告。说明 1935—1937 年蔗产数字按实际税额估计，1938—1940 年按亩积实际调查得来数字估计蔗产量。即按税额得糖产量，又以糖产量的 10 倍推算蔗产量，再以常年或丰歉年蔗产量推算出面积。以亩积推算蔗、糖产量方法亦同。

从上表可以看出，公会、糖酒局的数字，都小于甘蔗场的数字；甘蔗场数字来源有根有据，公会数字则是编造的，有意压低了数字。

附带说明：1936 年、1937 年两年连年大旱，而两者均以蔗亩产 5000 市斤左右估算亩积，均大大脱离实际。

2、蔗产量 蔗产量有四个不同的数字：43. 825（或 43. 82）万吨；58. 23 万吨；41. 5937（或 41. 5938；41. 5928）万吨；19. 095 万吨）。

（1）19. 095 万吨不予讨论，已如上述。

(2) 43. 825 万吨是制糖公会有意大大缩小了的亩积 (12. 5 万亩) 按每亩 7012 市斤编造出来的, 故不可信。

(3) 41. 5937 万吨是甘蔗试验场以亩积 16. 6375 万亩按常年产量 (单产 5000 市斤) 推算出来的。杨寿标认为这个亩积偏小, 本年为丰年估产单产 5000 市斤亦偏小, 故总数亦偏小。

(4) 58. 23 万吨是按 16. 6375 万亩又采用杨寿标本年为丰年单产 “三十五公担” (7000 市斤) 计算得来的 (见《档案资料》第 91 页) 这个数字较前者更接近实际, 但因亩积偏小, 故产量仍偏小。

3、糖产量 糖产量有五个数字: 6. 125 万吨; 7. 4 万吨; 3. 7434 万吨; 5. 823 万吨; 3. 362 万吨。

(1) 3. 362 万吨系农行引中央工业试验所的数字, 数字过小, 又没蔗田亩积和甘蔗产量参照, 不予讨论。

(2) 6. 125 万吨为《内江县志·蔗糖志》和黄世杰刊在《民国时期内江经济》的文章中提出来的。这个数字是糖清 5. 823 万吨与红糖 0. 3025 万吨之和, 糖清数恰为黄云门糖产量 (包括糖清与红糖) 总量, 彼此有无渊源不得而知; 但 6. 125 万吨糖与蔗 43. 825 万吨对照比例关系不协, 故不足信。

(3) 3. 7434 万吨, 使用这个数字的有四家, 为档案馆所认定, 共五家。这个数据是 1940 年甘蔗场提出的, 见于《档案资料》412 页《(1940 年) 四川省各地糖房分布现状表》。表中这年内江县糖清 64606069 市斤, 合计 3. 2303034 万吨, 红糖 10262654 市斤, 合 0. 5131327 万吨, 两数相加为 3. 7434361 万吨。这就是 3. 7434 万吨的出处; 特别为 [表一] 序号 (3) 蓝炯、高慕元文所提数据找到了注脚。但, 如果仔细一算, 又发现 3. 7434 万吨是 16. 6375 万亩蔗田估产每亩产蔗 5000 市斤所得产量的十分之一 (估算为糖产量) 又减去这个得数的十分之一得来的。试看:

$$\frac{5000 \text{ 市斤} \times 16.6375 \text{ 万亩}}{10} - \frac{5000 \text{ 市斤} \times 16.6375 \text{ 万亩}}{10} \div 10$$

$$=4.159375 - 4.159375 \div 10$$

$$=4.159375 - 0.4159375$$

$$=3.7434 \text{ 375 万吨}$$

以亩产估 5000 市斤，得到 41.5937 万吨蔗，内江习惯用“丁对丁”估算法，即以甘蔗产量的十分之一推算为糖清产量，41.5937 万吨蔗折算为 4.15937 万吨糖是对的；但现在再在这个数字中减去其十分之一而得糖产量为 3.7434 万吨，就不对了。这是甘蔗场计算之误，故 3.7434 万吨糖之说是不能成立的。这个来源于 412 页表中的糖清、红糖具体到市斤的数字也属子虚乌有。

(4) 5.823 万吨是黄云门根据甘蔗场调查的亩积为 16.6375 万亩以丰年蔗单产 7000 市斤推算的蔗产总量的十分之一比例推算出的糖产量，是接近实际的数字，但如前所述，这个数字仍偏低。据 [表一] 序号 (5) 黄云门将这个糖总产量按 85% 与 15% 比例分列为糖清 4.9497 万吨，红糖 0.8735 万吨的作法亦可商量。

(5) 7.4 万吨是《内江县志·大事记》和李汉文提出来的。《县志》所记本年蔗产量 41.5938 万吨与 7.4 万吨糖比例关系不协调，但李汉文提出 1940 年糖产量为 7.4 万吨是颇值得参考的。

李汉文是在 1943 年任制糖公会主席时接受《西南实业通讯》记者采访时，谈到“沱江沿县近三年（1940—1942 年）糖产估计概数”时说的这个数字的。这个数字比上述 5.823 万吨都多得多，为什么还值得重视呢？

①对制糖业者李汉文本人来说，把产糖数字多说了对他绝无好处。

②作为制糖公会主席的李汉文来说，他对内江糖业生产的总体情况应该是比其他任何人更清楚，所以他所提供的情况才能引

起《西南实业通讯》杂志所重视。

③李汉文是按实际产量来说的，不是按税额来估算的。应该确定无疑的是以税额推算糖产量是极不准确的。甘蔗场在《沱江流域蔗糖业调查报告》也说糖产量“根据税额估算，照普通情形，照税额（推算）加二哩，可望近于实际数字”。实际远不是“二哩”。据老经营糖坊、漏棚者说，逃税的方法有所谓“夜漏子”、“二次漏”，在“青山簿”（糖坊收蔗登记簿）、上漏数（糖坊交漏棚糖清数）做两本帐，搞牛作耕牛计算，少报开工日期，上漏以多报少（每二个漏钵以 100 市斤糖清计算，实际可多达 120 市斤）等等。漏税数各户做法不一样，在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五分之一即“二哩”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在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更有甚者可达二分之一。一位经营糖坊带漏棚的严姓老人曾谈到他的二分之一的做法是打通税局核算员，将漏棚登记漏糖数的“印簿”换成一本空白“印簿”，填好后交去核定产糖数，发给“售糖手册”，以为扯税票买印花的根据。他做 20 万斤糖清，便只上了 10 万斤糖税。严老先生知道这样搞的有几人；但这是极端保密的，到底有多少，无从知道。

经过分析知道：

亩积中 12.5 万亩是虚构的，16.6375 万亩是较接近实际的。

蔗产量中的 43.825 万吨是制糖公会缩小了的亩积推算的，41.5937 万吨是丰年按常年产量推算的，故二者均不及 58.23 万吨（丰年推算）接近实际。

糖产量中的 6.125 万吨是由蔗 43.825 万吨推知的，而蔗与糖的比例达到 10:1.4，故不足信；3.7434 万吨是甘蔗场计算错了的，也不能成立；5.823 万吨比前者虽然更接近实际但太少；7.4 万吨依我说是非常值得参考的数字。

应该说，[表一]中各单位和个人使用这些数据都是有依据的，而同一年产量存在不同的数据，恐怕也为许多引用者所不知（只

一书中同时有两个不同数据的确系工作疏漏),这就是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通过这次核实工作,使我深深感到不要认为档案中所得到的一切资料,都是可靠的资料,这不仅是因为档案中的资料对某一问题往往有多种说法,须加以鉴别,即使只有一种说法的,也要分析。由此可以说,档案给我们提供了寻找资料的机会,但并不完全直接给我们以放心使用的资料。

建国前内江杂糖糕点业概况

黄江陵

建国前的内江县广植甘蔗,盛产蔗糖,且有水陆交通之利,因而成为全川的糖业贸易中心。糖类食品,产销俱旺,王牌商品是蜜饯。杂糖、糕点的生产规模和销售数量虽然小于蜜饯,但仍具有特色,佳味亦多。对于内江蜜饯,已有不少文章作过叙述,故此处不赘言了。本文拟叙述内江杂糖糕点业的概况,以作为内江糖业史的不宜缺少的一个内容,想来是恰当的。

—

杂糖、糕点是很普遍的食品,不仅内江有,全国各地有,而且外国也有。

糕点是用面、糖、油为主要原料,用蛋品、果仁等为辅料、调味料,经过调制加工和熟制加工而精制成具有一定色、香、味、形的一种营养食品。其调制加工包括擀(gǎn,敢),擢(kē,科)、包、挤等工序;熟制加工包括烤、炸、蒸等方式。这种熟性食品含有较多的蛋白质、脂肪、糖分,营养丰富;而且由糖食店铺制作和出售,人们把它买来就可以品味或充饥,的确方便、实用,自然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用来制作糕点的面,包括麦面、米面、糯

米面、绿豆面等，其中麦面用得最广。

下面以两种糕点为例，说明它们的用料情况和制作过程。

一种是洒其玛。所用的主要原料是麦面、白糖、植物油；辅料是鸡蛋、芝麻、瓜仁、青梅、葡萄干、桂花、苏打粉等。配料的比例应精当（此处不录）。其制作工序如次：

1、调面团。置合格的细面粉于操作台上，围成圈，随即将鸡蛋用清水洗净壳面，磕入容器中，搅打充分后，倒入面圈内。同时加入溶化的苏打液和适量的水，搅拌均匀后再加入面粉。调制成软硬合度的筋性面团。分成大小适度的砣块，用双手揉按之。揉至表面光滑、内部无面节为止。醒发一定时间。

2、切条。把醒发好的面团用擀棒擀成约 0.2 厘米厚的薄片，然后拿刀切成长约 10 厘米、宽约 0.2 厘米的面条。

3、油炸。把菜油倾入铁锅里，煎到急剧沸腾时，把抖掉表层薄粉的面条适量投锅里。炸成黄白色，熟时捞出。

4、熬浆。将优质白糖加入适量的水，倒入锅内。待熬到沸腾时加入桂花水。待再熬到沸腾时舀出，准备灌浆。

5、成型。准备好小料，如将青梅切成片块，葡萄干用清水洗净待用，等等。然后把木框放在操作台四周，向框内撒上一层薄薄的面粉，再垫上一层芝麻，随即将炸好的面条均匀地抖上一层糖浆，倒入框内。用手铺平，表面均匀地撒上果料，压平。压力的大小应适度，不宜压得过紧。厚度约 3.5 厘米，用刀切成 5 厘米长，2.5 厘米宽的长方块。冷却后包块装箱，上柜台出售。

成品应达到这样的要求：①色泽金黄；②块形整齐，刀口正而不偏，不缺角，不损边；③酥松，绵软；④香味纯正，无怪异味。

一种是核桃酥。制作的主料为面粉、白糖、植物油、核桃仁。辅料为桂花、苏打等。配料的比例应精当（具体的比例数此处从略）。其制作工序如次：

1、调面团。把合格的面粉置操作台上，围成圈。将白糖、核桃仁、桂花、苏打粉和适量的水依次投入，搅拌使之溶化后再投放植物油，充分搅拌成乳状后，迅速加入面粉，调制成软硬适度、松散得宜的面团。

2、成型。将调制好的面团压入特制的桃酥模具内，压实挤紧后用刀削平，震动后抖出。估量好距离，摆入烤盘。

3、烘烤。将摆好生坯的烤盘送进炉内，用中等火力烘烤。烤成谷黄色，色泽一样，熟透后出炉。冷却后包装上柜，待顾客购买。

成品应达到的要求是：①表面成深谷黄色，有光泽；底面黄褐色，不焦糊。裂纹处显乳白色。②规格整齐，酥坯不互相粘连。③组织疏松，具有均匀的小蜂窝。④酥脆可口，具有核桃仁、桂花的香味。

从上述二例可知，糕点的配料讲究，制作工艺精细。要成为制作糕点的能手，得靠拜师求教和自己在实践中潜心研究。不同种类的糕点各具特色，其制作工艺有难有易。如制作洒其玛难于制作核桃酥，制作千层酥难于制作绿豆糕，制作芙蓉糕难于制作油果，等等。还有，制作同一种糕点，由不同的工匠主火，在配料的比例或辅料的运用上难免会有些差异。这样的情况决定了成品质量的不一致。例如，上世纪三十年代设于内江城内小东门的杂糖糕点店“天福源”，其东洋果（面制品，属于中点）在全城堪称上乘，其它店的则有些逊色了。又如，“品香”杂糖糕点店的油皮麻饼在全城数第一，其它店的制品就显得差一些了。

建国前内江的糕点有多少个品种？有人说约有五十种，又有人说有六十余种。由于缺乏统计资料，至今尚无确论。

糕点有中外之别。建国前内江绝大多数商家经营的均是中式糕点（简称中点），只有个别商家经营西式糕点（简称西点）。

对于糕点，就暂时说这些。下面讲讲杂糖。

制作杂糖，主要原料不是麦面粉，而且其它粮食或食物。如制作阴米是用酒米作原料，制作谷花是用酒谷为原料，制作苕丝糖是用红苕为原料，等等。

就花色品种而言，建国前内江杂糖不及糕点多，只有阴米、谷花、苕丝、水果糖、花生糖、芝麻糖、麻叶、兰根、花籽糖、麻秆糖、马儿糖、棒棒糖等十多个品种。

就制作工艺而言，制作杂糖的难度一般小于制作糕点。比如制作阴米、谷花、花生糖之类的杂糖，有的摊贩常在街边进行。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

二

内江人制作杂糖糕点始于何时？因缺乏文字记载，至今尚无确定。代代相承的口碑资料称，在明末清初时期，内江城中的人家在年关前（按今日的说法即春节前）普遍制作阴米、谷花、苕丝、苕干、油果子等糖食、按后来的说法，它们属于杂糖之列。新春佳节期间，便拿出来供来宾佐茶、品味。故又称为“茶食”。数量不多，一般每样只端出一小碟。客人告辞时，主人还要赠送一些茶食作为礼品。这反映了内江人的好客雅情。此风尚究竟开始于哪一年呢？则不得而知。当然，这些茶食也供自家享用，还要送些给邻居品尝味儿。制作茶食的人多为家庭主妇。谁家的茶食质佳味美，受到了贵客和毗邻的称赞，就会使制作者感到很荣耀。同任何事物一样，这茶食的制作也必有首创者。由个别人家制作发展到许多人制作，定有一个较长的过程。由此想来，内江杂糖、糕点（比如年糕）的制作很可能是明代中期或早期的事了。后来，家庭煮制蜜饯，并蔚为风尚。这时，内江人款客送礼的主体糖食就由更美味的蜜饯来充当了。但传统糖食并未被蜜饯挤掉，人们新春款客，一般是蜜饯和杂糖糕点并用，且二者常常同作馈赠礼品。据老人们忆述，在清末民初时期，此风俗仍然随处可见。

内江的杂糖、糕点作为市场上的商品，也是较早的事。据享誉多年的蜜饯店“铨源老号”的最后一位主人钟竹溪说，铨源老号的前身铨源号开业于清咸丰乙卯年（1855），它生产和销售的主要糖食是蜜饯，但也生产一些杂糖糕点上柜供顾客选购。铨源号并非内江最早的蜜饯店。比它商龄更老的一些蜜饯店（包括东兴街邱亮臣的字号）也经营杂糖糕点。1923年，铨源号更换招牌为“铨源老号”以后，杂糖糕点也是其所经营的糖食中常有的品类。

内江糖业档案资料表明，在辛亥革命前后，内江的蔗糖生产和贸易进入了一个高峰时期。与此相应，内江杂糖糕点不仅品种有所增加，质量亦有了提高。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成渝公路建成通车，不久又修成川中公路（内江至乐山），使内江县有相当优越的交通条件。往来内江的商旅人数增加，促进了各种贸易的繁荣，作为方便熟制营养食品的杂糖、糕点便供销两旺。抗日战争开始一年多以后，国民党政府迁入四川，重庆成为陪都。大量官员和其亲属群居重庆，常往来于成渝和川中各地；不少省外大学内迁川境，沦陷区的许多同胞逃难巴蜀，这使四川的人口增多。位于成渝中点的内江，战略地位本来重要，而在抗日战争的紧急情况下，它的战略地位就更加重要了。它是川中公路的起点。汽车从川中公路上乐西公路（乐山至西昌），再经川滇公路，滇缅公路到达缅甸的首都仰光，这就是我国当时唯一的国际交通要道。来往的汽车和旅客剧增，使内江的工商业进一步繁荣。旅客们和汽车司机往往要购买一些糖食在路上吃或拿到外地去送礼。从解除饥饿而言，杂糖糕点还优于甜味甚浓的蜜饯。而且优级的杂糖糕点和蜜饯一样，是馈赠的礼品。因此，这一时期杂糖、糕点的供销的确很旺，盛况是空前的。

从三十年代初到建国之前，内江各行业都组织了公会。糖业方面有制糖公会、糖业运销公会、上河糖业运销公会、冰桔公会。每个公会均有理事长、理事主持会务。杂糖糕点经营户参加的是

冰桔公会，因此，这个公会又叫冰桔糖食公会。参加此公会的是县城内和东兴街的业主，初期的会员一百户左右，最多时达到一百二十余户。绝大多数业主都是既经营蜜饯又经营杂糖、糕点，经营单项的甚少。主营蜜饯者，则杂糖、糕点为辅；主营杂糖、糕点者，则蜜饯为辅，将蜜饯与杂糖、糕点并重的店家也有，但家数甚少；但所投入的资金也常不一样多，一般是投于蜜饯的钱多，因为蜜饯的生产成本和售价高于杂糖、糕点。将主营蜜饯的店家与主营杂糖、糕点的店家相比较，一般是前者的资本大于后者。业主一般是将厂、店设于一屋之内，即屋子的后部为厂（作坊），前部作店面，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前店后厂”。分屋设作坊和门市的较少。

主营杂糖、糕点的店家少，大概是十来户或稍多一点。略述之于下：

1、同兴源杂糖糕点店。这是信誉很高的一家杂糖糕点店铺。店址在东坝街，业主郭三扬。店面小，资本亦不多，但善于经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到四十年代中期是其黄金时代。

三扬的手艺从父亲郭南廷学得，善于制作杂糖、糕点，蜜饯也煮得不错。他以经营杂糖、糕点为主，也煮制几种蜜饯作为附带商品上柜台销售。只有桔红、天冬、樱桃、柑砖四种，每样的数量也不多。所制作和销售的杂糖样数也不多，仅有谷花、阴米、苕丝、兰根、麻叶等五种。它们是杂糖中的一个小类一切片货。所做的年糕（也叫黄粑）也很有名。他善买、善做、善卖。他买本地的上等酒谷爆谷花，多用川西平原的小酒米做阴米、兰根等，其它的原料也力求其好。配料齐全，工艺精细，制成的糖食既不散子又不粘牙，具有香、甜、酥、脆四大特点；刀法又好，片子开得整齐，厚度适当，片片均匀。他的杂糖年糕产销两旺。冬季销售最旺。年销售量约十万斤，获利丰厚。大买主多是从成渝两地来内江设号经商的人，他们都喜欢买“同兴源”的杂糖、年糕带

回桑梓度新春佳节。那时，人们称过春节为“过年”，所以“同心源”是内江一家有名的产销年货的商店。

但郭三扬的最大弱点是好赌成性。店柜上赚钱，赌桌上输钱，结果是丰厚的利润化为乌有。1945年，妻子刘氏被气死。失去了内助，生意顿见萧条，不久便关门歇业。

2、德丰祥杂糖糕点店。店址在西门桥。业主宋德祥、宋良臣兄弟。是当时内江规模较大的一家杂糖糕点店。资本三百多石大米。于抗日战争前开业。除于作坊处有门市外，还于师亲茶馆（今沱江剧院附近）旁边设了门市部。产销阴米、谷花、苕丝、兰根、蛋片、蛋条、花生片糖、花生条糖、花生酥、泡果、麻籽糖、白糖糕、芡实糕、软糕、夹心糕、三色糕、油果、绿豆糕、桃片糕、波丝糖等，达三十多个品种。也制作点小锅蜜饯来卖，如桔红、冬条、柑砖等。宋德祥学技艺于名师李祯祥，宋良臣学技艺于名师张德明。兄弟二人既是老板，又是掌火师（也称掌盘师）。

3、品香杂糖糕点店。店址位于南街，即今内江市中区税务局处。店主王靖之。王的哥哥是内江著名的杂糖糕点师傅，较长时间在宜宾帮人，王去那里向哥哥学手艺。学成后也在宜宾帮人，声望渐增，红火时同时当过四家店主的掌火师。他教出的徒弟都好找工作干。回到内江时，名声颇显。长于制作杂糖糕点，也擅长升冰和煮蜜饯，技艺全面。但“品香”店小，资本不丰，经营的杂糖糕点并不多，大概有十多种，但信誉较高。制作的点心最受顾客欢迎，在内江全城第一。生产的洒其玛、油皮麻饼亦是畅销品。

4、天福源杂糖糕点店。店址在小东门。店主张德明，长于制作糕点，系内江的一位名技师。此店的生意不错，但逊于“同兴源”。制作的东洋果质优味美，很受顾客的青睐。

除上述四店外，以经营杂糖、糕点为主的店子还有城内的大华（位于大西街）、太华（位于北街口）、稻香村（位于南街）、三

兴号（位于南街口）、源心永（位于南街口）、德成园、太和（位于交通路）与东兴街的大华、太华等。这些店里也不乏优秀品种，例如三兴号的泡糖、花籽糖特别好；德成园的中秋月饼做得好，销售得多；交通路太和老号的冰桔糕（也叫冰桔红糕）很畅销。还有位于北街的由左洪兴开设的杂糖糕点店（店名待考）制作的酥饼系大受称赞的名品。

以产销蜜饯为主，兼营杂糖、糕点的字号，这里也简介几家：

1、铨源老号。它的前身是开业于咸丰乙卯年（1855年）的铨源号，1923年更牌为“铨源老号”。此店一直以产销蜜饯为主，顺便兼营点杂糖和糕点。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至建国前夕，是它雄视内江全城、享誉遐迩的黄金时代。店主钟文卿既擅长煮蜜饯和升冰，又善制作杂糖和糕点。由于业务繁忙，钟氏一家人无力总揽全店的诸多事务，便雇请技师掌火。店主自身便主要搞管理工作。曾雇请过多位煮蜜饯升冰糖的名师。这些名师大多会做杂糖糕点。但为了升名又升利，店主特雇请著名的杂糖、糕点技师兰贵安师傅来店内掌火。此店生产的苕丝、兰根、阴米、谷花、酥饼、夹心糖等都是高质量的糖食，销售甚畅。

2、协昌糖果蜜饯商号。由王启宇、宋子麟、曾茂修三人合资开设。店址交通路。1939年开业。主要产销蜜饯，欲并驾铨源老号的质量，但终稍逊一筹。其糖果、糕点亦佳。两年之后，即1941年，因三位股东另有重任，遂将店产顶出。

3、协康蜜饯糖果商店。这是将杂糖糕点与蜜饯并重的大店，享誉甚高。店主王庶超。他顶得“协昌糖果蜜饯商号”的店产后，更名为“协康蜜饯糖果商店”，并扩大了规模。将店面由一间扩大为三间。店内店外进行了装饰，榜书横式招牌挂在门墙上端，金碧耀眼，气魄不凡，显示了店主的雄心壮志。店内陈售的商品除蜜饯糖果之外，还带销各色罐筒、名酒和云南火腿等。小食部内的物品亦多种多样，如咖啡、牛奶、各式糕点等。

此店的杂糖糕点的供销规模为全城之冠，品种繁多。值得特别一说的是，王氏将西式糕点引来内江，具有开创之功。出高薪从成都耀华西餐馆请来西点师傅梁世明、蔡文昭主火。二人还传授了技术。生产的奶油蛋糕、咖啡蛋糕等质味俱佳，是上乘糕点。绿豆糕、软糕、洒其玛、桃片糕、夹心糕、苕丝糖、泡果、水果糖等中式糕点和杂糖亦很受称道。协康经营有术，生意繁荣。临近建国时停业。

4、美新。此店主营蜜饯，兼营杂糖糕点。店主周仲良、周竹文。二人均学艺于王靖之。周仲良是师兄，周竹文是师弟。王靖之的技术全面，二周得其亲传，技术皆全面而高明，善于煮蜜饯、升冰、制作杂糖糕点，故“美新”的生意兴旺，信誉颇佳。从杂糖、糕点着眼，二人颇得师传，制作的点心、麻饼、洒其玛、软糕、饼干等皆很受消费者欢迎。顺便提一下，建国后，周竹文是内江最著名的蜜饯师傅之一，在内江县糖食联营社、内江市兴昌糖果厂、国营东风糖果厂、内江地区糖果厂、国营内江市食品厂等单位工作，均负技术指导重任，作出了较突出的贡献。

主营蜜饯兼营杂糖糕点的店家还有许多。但它们所经营的杂糖糕点的品种和质量都难于与上述各店家抗衡。为了行文不拖沓，故不再一一列叙了。一句话，凡主营蜜饯的店家，其柜台上总或多或少陈有杂糖糕点；凡主营杂糖糕点的店家，也总是要或多或少摆些蜜饯出来接待顾客。由此看来，内江杂糖糕点总是与蜜饯业互相依存，孤立存在者实属难见。

还有，内江杂糖糕点名技师，往往都能煮蜜饯和升冰，有的还是高手。如上文已述的郭三扬、宋德祥、宋良臣、王靖之、周竹文等便是这种名技师。它们的一专多能的特点，对于现今的人们具有启迪作用。

上世纪四十年代前后内江的酒精工业

徐智广

今春，有感而作，以《联谊小记，合影旁白》短文，向市中区《文史选》40辑供稿。反映区老政协委员联谊会三组聚会动态、联谊情怀。文中提到四十年代内江酒精工业，引发回忆，不绝如缕，起伏兴衰，教益深刻。爰择部份情节，续作介绍（抗战到建国初期 1938~1952 年）。

崛起高潮

抗日战争时期（公元 1937~1945 年）内江地方（地区、专区、市级）酒精工业，应运而生，拔地崛起。和当年时代背景，地方经济与专业人才，是分不开的。

1、日寇入侵华北、东南相继沦陷，汽油来源枯竭，依赖酒精为汽车燃料，维持大后方交通运输。

2、四川沱江流域，尤其是内江、资中、简阳三县土糖产销重地。副产品“漏水”（工业上称“最终糖蜜”）是酿造酒精最直接又价廉的原料。（当漏水不够用时，则不惜工本溶化红糖或桔糖或加蒸土酒）。

3、大专院校迁川，或在川筹建：如由南京迁至重庆沙坪坝松林坡的前中央大学。1939 年组建于四川乐山的前中央技艺专科学校，汇集了多位国内外知名教授和专家；前中大农化系和前中央技专农产制造科毕业生；一批外省入川的“酒精”行家里手；还有就地创办的省立内江实用职业学校等，输送培育的人才。

发展高潮时（41~42 年左右）内江县（约相当今市中区及东

兴区)有酒精厂二三十家;资中县境和简阳县各六家,大多数为私营民办小厂。真可谓如雨后春笋,高低不一,拔地崛起,产品质量规格,虽不尽划一,但动力酒精,对抗战交通事业,作出了历史贡献。

受篇幅及资料局限,选择四间大型国营单位,分厂简介,综合评价,可以估量当年内江酒精工业水平。

四厂简介

1、四川酒精厂:四川建设的第一座酒精厂,位于内江犍木镇凿坝滩。1938年1月由前资源委员会与四川省建设厅共同投资兴办。前南京中大农化系主任魏岩寿教授率领该系几届毕业学长多人,领导建设,厥功至伟。投产后魏任第一任厂长。受省教育厅委托,就该厂附近创办了省内江职校。1943年中央技专农产制造科三届同学在该厂生产实习,据老伴回忆,当时厂长是施有光教授,总工程师仍是建厂留任的王正朝学长。施厂长当年受聘为沙坪坝中大农化系客座教授,主讲“高级微生物学”,1942年有幸听讲,深受教益。

2、1945年抗战胜利,酒精滞销,工厂停办。其后前资委会将厂转交省建设厅。1947年省厅又售予民办的中川酒精厂(内情不悉)。解放后(1950年)经军管转由川南区糖酒工业管理局统一接管为中川留守厂。

资中酒精厂:规模及装备均居首位的厂,位于资中银山镇。1939年底,前资委会拨款迁建。接收头一年在陕西建设的咸阳酒精厂装备迁川重建。1940年试车,3月投产,迁建工作经广东一批专家,由张季熙领导完成,张任厂长。

1945年抗战胜利,前资委会迁回南京。经决定,于1946年夏,将原四川省境内前资委会下属的资中、简阳、泸县、纳溪、四川、内江、重庆、北泉、广汉九个酒精厂合并,成立资川酒精厂。原

资中厂为总厂，继续生产。1948年筹备搬迁台湾苗栗大湖糖厂旧设备。1949年初，成立四川糖业有限公司及资中糖厂。解放后经军管，归属川南区糖酒工业管理局管辖，糖厂建成，酒精厂改制为车间。

3、简阳酒精厂：生产效率相当于前两厂水平。厂址位于简阳县城与石桥镇之间沱江对岸射洪坝简车口。1941年初由前运输总局委托汽车燃料试验所金贵湜工程师领衔设计建厂，任厂长。1942年正式投产，归属前资委会管理。该厂重要技管骨干，均曾参加过四川酒精厂建设和生产实战（工程师、工务、总务课长等）管理水平及生产效率均较良好，长年生产。厂名随体制变更二次，1946年后为资川酒精厂简阳分厂，1949年易为四川糖业有限公司简阳酒精厂。解放后归属川南区糖酒工业管理局。

我在简阳酒精厂迎接解放，和军代表董平粮及其助手洪范同志协作配合，顺利组织复工和技术改进，相处融洽（参见《内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 P95~100 拙作《1950年简阳酒精厂复工纪实》）。

4、内江酒精厂：原名“军政部第一燃料厂”，1938年始建，1941年投产。原隶属民国军政部交通司管理。抗战胜利后交与前资委会代管，1949年又由民国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接收，更名为内江酒精厂。该厂骨干技术力量有几位是前中央技专农产制造科毕业，在此以前，都曾在资中复兴酒糖厂有实践经验。

解放后归属川南糖管局。1950年初夏，川南行署泸州生产会议期决策：在内江酒精厂基础上，增建真空炼糖车间，借调我赴该厂技术支援，如期建成后，1952年11月8日，厂更名茂市糖厂，原酒精厂纳入车间体制。顺带提一下，建设工作告段落后，我被茂市糖厂继续借用，1953年我被调省内江糖厂筹备处报到，一直未能回到简阳酒精厂，可惜当年存放在我办公桌内的所有技术资料及笔记手稿，几乎失落殆尽，（参见《内江市中区文史资料选

辑》第29辑P19~28拙作副题〈支援茂市糖厂初期建设的回忆〉。

工艺装备

以上四间厂的生产工艺，基本相似，可代表当年酒精工业工艺模式：即冲稀“漏水”，接种酵母，间断发酵，连续蒸馏的程序。工艺流程从试管接种，经过三角瓶到卡氏罐，逐步扩大培养到酵母桶，再进入发酵桶，完成发酵。成熟发酵醪送供蒸馏。三塔连续初溜→除醛→精溜，产出酒精，成品主要规格的含乙醇量95%（从容量计，15℃温度标准）日产量：四川、简阳、内江三厂一千“加仑”以上，资中厂二千“加仑”（如蒸土酒时，产量还可提高）所称“加仑”，系当年使用美制规格，一“加仑”合3.785公升，对水而言，重量相当3.785公斤，对酒精言，比重轻于水，当时折合为3.07公斤，标准铁酒精桶，公称装载容量为50加仑，容易折算。

装备方面，四间厂颇有差异：由咸阳拆迁重建于银山镇，设备原系德国进口，酵母桶及本发酵桶为铁板焊铆，酵母桶前有杀菌锅辅助糖液灭菌，发酵桶为封闭式，外有淋水降温圈管，抑制发酵温度剧升。而其他三厂，酵母桶及发酵桶，只是木质竹箍，难得内江木工，心灵手巧，造出深度、口径达几公尺的大木桶，功不可没，内江酒精厂还有砖石砌筑的发酵池（大半截在地平下），石工也具匠心。

资中厂的蒸馏塔，全部铜材、塔壳未见焊缝或由大口径铜管冲镶。另外还另有铜材无水酒精全套生产装置。内江厂蒸馏塔系铜皮焊造。而四川及简阳两厂，则系生铁翻铸。

资中厂蒸馏室内布置了两套装备（95%度及无水酒精），其蒸馏场房建筑比较壮观。条石嵌砌，从底到顶，上半部石刻巨幅标语对联：“生产动力，巩固国防”落款是“揭阳张季熙题”。（解放后落款已经刮去。）

动力设备：四个厂自备电机发电，主要供生产及生活照明（资中厂部份用于电动离心泵）。锅炉：资中厂为扳柏考克水管式；内江厂为海茵水管式；四川及简阳为兰开夏火管型（卧式双炉胆）。

有两项“独家”操作，趁此略及：

1、简阳酒精厂“分期加醪直接冷却发酵法”：糖液发酵，醪温度升高，木质发酵桶无法控制。简阳厂实践中摸索出冷糖液分次（先试两次，后试三次更恰当）添加，直接降低原先醪温，取得酒精度增加，残糖降低，增产节耗实效。但添加操作前要现场即时算出相关糖度和容积，为此增加了推算程序纪录，较为繁琐，经我推理演绎，列出简化算式，可即时填入计出，熟练后随心默算，使用称便。立即三班推广（当年技术保守，未允外传），从此简阳厂酒精生产效率，赶上资中厂（发酵桶外降温）成绩，乃至时或超越。

2、资中酒精厂间断产过无水酒精：当年轻化工业不发达，无水酒精销量甚少。资中酒精厂无水酒精装备，多时闲置，没有岗位定员。有订货时，才抽人调试，我参与过两次，届时几乎调齐所有轻化技术人员和以前（张季熙厂长时）参加助阵的练习生数人，合力调试，分兵把口，三班轮值或连二班，循序操作，产出合要求无水酒精。按该装备系古典工艺，采用过热蒸汽，熔融含结晶水醋酸钠，使之脱水，吸收酒精中残留水份，再熔脱钠盐中结晶水，再吸出酒精中残留水份，如此周而复始，使普通酒精水份降低而达无水酒精标准。随着石化工业发达，以后脱水法为溶剂共沸法所替代，资中厂该无水酒精装备遂退役靠边拆散。

篇末附录

半个世纪前，在酒精厂工作的年代（简阳厂 1943~1946 年；1949~1950 年）；资中厂（1946~1949 年）；内江厂（1950~1952

年)，经历了内江酒精工业崛起和衰败过程。有幸解放后，内江因地制宜，依靠科技，发展机制糖业，复甦酒精元气，挽回颓势，振兴了糖酒支柱产业，溯本追源，当年内江酒精工业的历史贡献既解决了抗战时期交通运输燃眉之急，又培育和输送轻化工人才参与祖国相关行业（包括台湾糖业）的经济建设。

篇末附录当年沱江流域三个县境酒精厂厂名，只能是大概的，抛砖引玉，欢迎补正漏错。

1、内江县境：四川、蜀丰（第一酿造厂）、大昌（制造厂）、中兴、中川、国防、军政部（第一燃料厂），胜利、成永、同烈、辅仁（化工社）、西川、建华、同春、裕民、茂市（酿造厂）、光轮、蜀川、中国炼糖公司酒精分厂、内江（化学工艺社）、天宫、云蒸、京华、华农炼糖厂附酒精场。

2、资中县境：资中、复兴、沱江（实力）、合作等。

3、简阳县境：简阳、自强（火酒厂）、国富、怡华、建华等。

内江市中区乡镇企业发展检索

李静晔

国家发展乡镇企业战略，适时引进市场机制，推动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无农不稳，无工不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又为促进各个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供了新的思路。

内江市中区的乡镇企业，也是在充分体现上述意义的运行轨迹中发展起来的。

原始发展阶段，可以上溯至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一九五八年，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曾形成大办“公社企业”热潮。市郊农村兴建过一批农具修造和各式加工作坊。如铎厂、油房和各

类加工点等。当时总产值一度比较可观。后来由于政策不断波动，甚至号召把公社和生产大队搞成“清水衙门”，遂导致许多雏型企业纷纷下马停办。其产值也急剧下滑到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的5万元左右。市区七个乡直至一九七七年，总产值也仅有51万元。

这一时期，乡镇企业虽难成气候，但其对工农业生产的积极影响和为民服务的感性认识，却很深入人心。

中期发展阶段。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自“富民政策”开始落实算起，市中区的乡镇企业，才开始经历一段正常发展时间。各类企业伴随着思想的初期解放，如雨后春笋般勃然兴建注册。经营范围由食品加工、建材、机械逐渐扩大到建筑业、商业和系列化服务行业。截止八三年底统计，辖区内各类企业已发展到143个之多，务工人员达7600余人，约占当时乡村劳力总数的15.1%；企业总收入已过2100万元，拥有固定资产原值总数1000万元。另外，各自然生产单位（村社）还自发兴办起了原始股份企业，如土窑砖瓦厂和采石场等，年总收入计40余万元。

为引导乡镇企业健康发展，市区坚持党政领导一体化，管理机构职能化原则，结合形势变化，常设机构先后四易其牌：一九七六年六月，根据上级“关于积极发展农村社队企业”指示，市区政府组建了“社队企业领导小组”；一九七八年六月，又正式成立“内江市社队企业局”一九八四年二月后更名为“内江市乡村企业局”、一九八五年地改市原内江市易名为市中区、“内江市中区乡镇企业管理局。”与此同时，各个镇乡也对口成立“企业办公室”。企业局领导人选，也大多由党员干部担任：如原内江市委副书记罗传德曾兼任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三年时段局长；原市中区政协副主席罗崇富曾任一九八四年至八五年时段局长；已退休副县级党员干部王月新曾任一九九一年至二〇〇一年时段局长等。

各个时期健全的管理机构以及领导班子的优化组合，给予市

中区乡镇企业在生产、经营、安全环保和财务、质量等诸多方面的正规化管理，提供了坚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时至一九八四年，再到二〇〇一年底前的“改制”阶段，是市中区乡镇企业发展的鼎盛期。特别在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乡镇企业在市中区的发展更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领域拓宽“百业兼容”、农业企业兴建势头强劲，工业企业如食品、建材、机械、造纸、纺织、电力等一步一个台阶。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和服务业更是与城区同业平分秋色。

骨干企业初具规模：在企业数量与日俱增的同时，又不断获得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各行业抓住机遇力争提档次上水平，通过人员培训突破技术壁垒，狠抓基建技改等措施，使全区30个厂迅速跻身“规模企业”群体。其产品数量和质优率连续几年翻番和上升。市中区也因此被上级命名和划定为“内江市发展乡镇企业先进区县”、“四川省乡镇企业发达地区”。

综合效益突出喜人。由于长期坚持对产业结构进行合理调整，千方百计吸纳附加值高的行业如医药、电工电器、油脂化工、新型建材等入列，逐渐取代传统产业如造纸、酿酒、制砖等的优势，较好地兑现了“把经济效益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预期。全区农业人口32万，在全区乡企年总产值增幅达一亿多元（人民币）时劳力人均综合指标高达8千余元。在全区工业总产值的份额占到了80%。上缴税金也逐年递增，以一九九八年为例，上交税金为全区总数的18.2%。农民的纯收入也比过去增加了40%还多。

内江市中区的乡镇企业一路拼搏，一路发展，一路创造业绩。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根据国策的整体布置进入到了“改制”转折期，新的历史使命安排各企业在“出售转让、破产重组和继续发展”中经受检验，适者生存良企壮大，并将继续为国家和人民作出新的贡献。

市中区“乡企事业”的领导机构“内江市中区乡镇企业管理

局”，也根据《内委发（2001）42号》及《内市区委发（2001）101号》文件中“不再保留财办、贸易局、乡镇企业局”的总体精神，在文件公布三日起自行撤销。同时把“其职能划归”到内江市中区“经济贸易委员会”。

今后市中区的乡镇企业事宜，悉数交由区经贸委“乡镇企业”具体妥办。

内江刊刻行业的兴衰

李文馥

刊刻，又叫刻字，亦称镌刻、凿匾等工艺。

刊刻，实则包涵（本文专指）镌刻手工印刷木版和雕刻印章（又名治印、篆刻）两门工艺。

刊刻，川渝两地，叫法有异。内江地处中心，分界而偏西。重庆片区叫刻字，四川地区称刊刻。习惯认为，前俗后雅。

刊刻，印章始自春秋时代，书版则源于唐高宗至玄宗年间。历史推进，两艺合一，为刊刻艺人增添了新的内含。

据载，五代后唐时期，毋昭裔为普及提高书刊的印制，带了一批刊刻名匠入蜀，在成都极力倡导雕版成书技术。这就是刊刻工艺在四川的最初兴起。

内江的刊刻工艺源于何时，创举是谁？史长艺微，无从稽考。

三十年代初期，内江刊刻仅有邓树廷、李腾霄、饶泽民、周学瀛、邓永清（随时而增徒弟）等数人。

邓树廷，岳池人，何时来内不详，擅长镌刻书版。他待人谦和，举止文质。在当时刊刻行业中，他是年龄最长者，大家都称他为“老夫子”。解放初期病逝。

李腾霄，名白山，岳池人，何时来内江不详。他功底深厚，技

艺精湛，是“李氏刀子”（师徒流派，行业中人爱讲是那皮刀子的人）的创始人。此人脾气古怪，性情孤高。嗜吸鸦片，进难敷出。艺高命薄，晚景凄凉。解放前病死在吕祖庙洞宾师爷的神龛之下，靠刊刻同仁凑钱买口火板板（旧社会最简便的棺材）安葬。

饶泽民，师从其父（名讳不详），在小东街开设店铺，除主要经营刊刻业务外，还兼营制作纸牌、捆扎纸糊灯笼（当时尚未完全普及手电筒）。火把灯笼，是农村夜间行走照明的主要工具。彩色灯笼，是商家、官绅人家，在婚丧嫁娶，节令年庆时作为装饰、显赫的主要标志。因此，其业兴旺，是刊刻行业中日子过得较为轻松者。

周学瀛，绰号周砂锅，师从李腾霄，早年随父在南街经营“图书阁”手工印刷，后专门从事刊刻工艺。他性格诙谐，平易近人，老少妇孺，白丁雅士，都与他相处甚善。由于中年秃顶，故而得“砂锅”雅号的封赠。他功底扎实，技艺全面，尤其专长楷、隶的正反书写，以及机器印刷的铅钉刻制。当时《内江日报》所需的铅钉、题花、图案等，几乎全由他独家包揽。是“李氏刀子”的得意门人。由于嗜抽大烟，（解放后戒掉）生活清贫，1958年病逝（其详情载1991年《内江市市中区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

邓永清，外号“邓六爪”，自贡人，师从老家赵氏（字号不祥）刀子，早年带其师弟（赵氏之子）赵泽林投身内江，花钱用杉桷、木板在小东街口（临南街右侧）搭建一简易铺面，开设“金石斋”刊刻店（在当时仅饶、邓，及后来的“三联”三家店铺，其他皆是沿街檐边摆摊）。其人技艺如何，不得而知。据行业中人说，从来就没有人看他操刀刻过章。虽然技不示人，但在经营管理方面，却有他的独到之处。抗日战争期间，下江人纷纷内迁，内江的银行、钱庄业也相继得到发展。身居“袍哥五爷”的他，联系了不少刊刻业务。为适应银、钱业财会帐务上的需要，他开发

了“机制橡皮图章”，扩大了经营范围。他长期雇佣工人，利用工匠师傅的技艺，不断收纳学徒，为其生产增强了自己的竞争势力。是刊刻行业中的佼佼者，其日子过得比较富裕。

解放前，刊刻行业有首歌谣：“有儿莫学雕字匠，蜷腰驼背瞎眼光。檐边日晒风寒袭，视弱体虚命不长”。由此可见，只有极穷人家的娃娃，才会送去学刊刻手艺。

“徒弟徒弟，三年奴隶。”旧社会的学徒，是极其悲苦的。徒工拜师（含参师，即另拜第二位老师），得托人引荐，经认领老师同意，然后才正式履行相关的手续。入师门，必须具备三牲〔鸡、鱼、香片子（即猪腹背中段约两公分厚的一刀肉）〕礼信（称茶食，即糕点、糖果等）。如遇老师苛求，还得承办筵席，恭请老师上的上辈、师伯、师叔和师兄。首先从祖师爷（刊刻行业的供奉神——仓颉菩萨，位设饶泽民店内），传艺老师开始，然后从上到下依次磕头跪拜。请介绍人宣读《投师字约》，其大意是，在三年学徒期间，要遵守师规，要听从使唤。〔要懂规矩，要明了礼节，见了长辈来，要起身迎接，不能直呼其名。上桌吃饭，要伺候添饭，不得最后煞果（读过）。〕如有差错，任老师处置。损坏物件，应照值赔偿。生疮害病，由自家承担。过河渡水发生意外和其它自然事故，与师无关。如有赌博、偷盗等不良行为，应由引荐（担保）人负责。三载学艺，不得中途而废。三年出师，还得帮师一载（象征性的给一点工钱）。最后，徒弟、其父母、引荐人签字盖章或按捺手印。

《投师字约》犹如一张卖身契。

在三年学徒期间，住宿师家，随师饮食。没有休息，更无零钱。每逢端阳、中秋、春节必须给老师送礼贺节、拜年。如老师待人宽厚，端阳会放假半天，团年时也会赠一个红包。除煮两顿饭（解放前均习惯吃两餐），摆摊收摊，还得下河挑水（当时无自来水），替师娘打杂干活。甚或（这得看老师、师娘的宽厚、贤惠

程度)倒夜壶,涮马桶,带娃娃,洗衣裤等。剩余时间才由老师吩咐。

头一年,首先学刻“一字板”(在一块刨平的梨木板上,从上到下,从右至左,不断的刻反书一字,这是最基本的启蒙刀法)和学磨凿子、刻刀(得看师从流派,其刀式有一封书和老鹰嘴之分)和切刀。晚上在菜油灯下(只准点一根灯草,不能点两根)切制梨木方形(解放后才兴扁形)私章,或练习书写小楷。第一遍蒙格书写正面。第二遍翻面,依照浸痕练写反字。一般得做到打二更(晚上10时左右)或者到半夜子时。饥肠辘辘,其饿难挨。如遇师家厚道,会饷面条一碗宵夜(旧时称午夜进食)。天不见亮,又得起床生火煮饭。

第二年(老师根据徒弟的接受能力和学习进展情况,可提前和延后),学刻各种质料的图章。行业中习惯爱说,活路有炆、硬两类之分。炆,是梨木黄杨橡皮。硬,指骨角牙石金玉。在实践过程中,除个别顾客较为讲精的,炆硬两类都得学会应付,并逐步掌握填写(即章面上写反体字)各种书体的技能。在关键地方,老师只是点拨而已。这如谚语所说:“师傅引进门,修仙靠个人”。

第三年,有的学了一半(或者更差),有的较为全面,有的可与师相比,个别的成为日后刊刻行业中的顶尖人物。

三年学艺师满,还得办谢师酒,其要求与进师酒大体相似。徒弟跪拜后,老师退还《投师字约》,然后封赠几句勉励和希望的话,这样算是正式成为刊刻行业中的一员。

三年学艺师满,还是帮师一年(不得另帮他人,否则,必受行业挟持)。在二年、三年和帮师一年的三年中,学了一半的,老师收效不多。较为全面的,老师得益不少。可与师相比和个别技艺较高的,老师的收获就颇为丰厚了。

三年学艺期间,如遇老师中途新收师弟,那这位师兄是非常幸运的。他所担负的一切杂务,就得由师弟继续干下去。

三年学艺期间，如遇老师有其他特殊情况，传带徒弟的工作，由他所雇佣的师傅代替，称为“拔师”。老板要给一定的津贴（邓永清就是靠此办法兴家立业，故而他带出了不少的徒子徒孙，成了解放初期划定的“小业主”）。

师傅帮工老板（主要是邓永清，有的只是偶尔帮一次短工），不以每月计算薪水，而是照师傅所做的金额（材料费除开），按四六成比例付给，师傅得六成，老板收四成。利益驱动，随时递增，临到解放后刊刻社前，已逐渐蜕变成了所谓的“倒四六”。颠倒成师傅得四成，老板收六成。这正如俗话所说：“找钱不费力，费力不找钱。”

刊刻行业中有首歌谣：“远看一儒生，近似读书人。砍断山中树，刻绝子孙根。”旧社会有一迷信说法，说于刊刻的人要断子绝孙，因为砍伐了山中的梨树（所谓的梨山老母，祖传用梨木刻章，经实践证明，无其他木料可代替）。说来也怪，解放前确有几个没有后人。

刊刻，虽说社会地位低微，但必竟是“仓颉夫子”（上古黄帝时史官，或称颉皇、皇颉、黄帝史。传其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古文）的门人，与祖国的传统文化艺术有着历史的渊源，它是随着印刷行业的发展而日益壮大起来的。

刊刻，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与印刷行业同属一个工会组织。

刊刻，在经营方面，有一定的文化氛围。如招牌，有林可久、罗新民、廖先志的“三联社”，有邓永清的“金石斋”有罗仲才的“飞鸿堂”，有陈国珍的“精美斋”、“宝珍治印”等。在摊位和店堂，都爱树牌和悬挂对联。其内容是“专刻各种图记，经售章盒印红”或“风斤月斧雕和璧，赤电朱霞显籀文”。或“精雕金石铜牙骨角，专刻梨木黄杨橡皮”。或“铁笔能操宁同刻鹄，金章可琢莫笑雕虫。”等等。故而被人们誉为“文化匠人”。

在整个刊刻人员中，仅二三人读过高小，其余都是初小和文盲。

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刊刻从业人员 20 名。

邓绍林（师从邓永清，后回梓潼镇自营刊刻）、叶汝洲（师从廖先志，后参加国民党青年军）、刘文祥（师从周学瀛，东兴镇自营刊刻，后回乡务农）、刘绍成（师从邓永清，去向不详）、孙礼洪（师从陈国珍，后回乡务农）、许新民（师从陈国珍，后回永兴庙自营刊刻）、李治平（师从张俊卿，后回乡务农）、张树尧（师从饶泽民，后回乡病故）、范久高（师从杨子才，后回乡务农）、罗新民（师从张俊卿，后回白马镇自营刊刻）、罗德文（师从李腾霄，后参加国民党青年军）、赵泽林（师弟从师兄邓永清，后回自贡市自营刊刻）、黄俊才（师从李腾霄，去向不详）、谢自辉（师从李腾霄，后回隆昌县双凤驿自营刊刻）、谢银祥（师从邓树廷，后改营手工印刷）、谢银成（师从邓树廷，去向不详）、雷洪荣（师从邓永清，后回乡病故）、蓝开良（师从周学瀛，去向不详）、蓝海波（师从饶泽民，后参加国民党青年军）、赖孟阳（师从陈国珍，未出师后另谋职业）。这 20 人中，有的回乡、有的参军、有的另谋职业、有的自营刊刻、有的学艺半途而废。

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刊刻摊点、店铺在城区的分布。民族路有汪天福。东坝街有李俊华。南街有王世民、刘祚金、张衡山、吴植楷、吴志彬、邹明久、罗万发、杨子才、杨俊之、周学瀛、姜国庆、黎联陞等共 12 人。小东街有林可久、罗新民、廖先志〔三联社（半边店铺）〕王竹一、邓树廷、邓永清（自搭店铺）、孙绍华、宋明章、李久奎、陈国珍、何福崇、罗仲才、杨子玉、胡崇贤、饶泽民（店铺）、饶俊卿、曾成祥、廖忠昭、黎仲礼等共 19 人。

小东街有马麻子、庆云斋、丹青引等苏裱店，有蜀通、源生昌、仁义永等印刷厂，故而刊刻业在此云集。

1949 年 12 月 6 日，内江解放。

1951年3月，内江县公安局治安股（即后来的第三股）股长张福立，代表政府在钟鼓楼礼堂（今市中区政府内，现已拆除）召开刊刻行业大会。他说（大意），解放后，你们刊刻工人，和其他广大手工业劳动者一样，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对恢复国民经济，以及土地改革、镇反运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刊刻行业协助公安机关，在鉴别印章的真伪方面，识破了不少犯罪分子的阴谋诡计），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你们是特种行业，要按党的政策组织起来。摆脱贫困，走大家共同富裕的道路。

经张股长组织领导，建立了由邓永清、汪天福、李久奎、李俊华、杨子玉、周学瀛、饶泽民（有二三人姓名已忘）等10人组成的筹备小组。

拟定了《内江县城区刊刻社章程》（大意）。

1、按自愿原则（当时邓永清、何福崇雇佣有二、三名工人，收入较多，不愿入社，经张股长反复动员后同意），进行登记。

2、对每个成员的工具、货品和原辅材料，进行盘点、记帐、折价、转为刊刻社集体所有，以后逐步偿还。

3、确定社员入社时应交纳股金，每股金额为五万元（旧人民币值，今五元正），日后年终，按股分红。

4、分配制度，每月营业额，除去上缴税金、交纳工商联管理费、企业公益金、公积金、原材料，工资按甲乙丙丁四个等级分配。

5、建立社员大会制，实行民主选举经理、会计、出纳、保管、工务（管理生产）。只有经理脱产，其余均为兼职。任期一年，可连选连任，但不得超过两届。

6、确定社名为“内江县城区刊刻社”（后改为“内江县互力刊刻社”）。

7、申请内江县工商联办理营业执照（经批准定期为1951年5月1日）。

8、行政上隶属内江县工商联管辖。

9、购置门市部和工作坊（后以四百万元（旧币）向农会买下内江县搬运公司两楼一底和后堂多间（今中央路钟楼饭店上面，中国银行营业所）。

1951年5月1日，内江县城区刊刻社正式成立。（比1952年4月成立的内江市布鞋生产合作社早一年，后主管部门不承认这段历史）

内江县城区刊刻社社员32名。

王竹一（1989年2月病故）、王世民（后调内江市手工业管理局）、邓树廷（卒年不祥）、邓永清（1983年8月病故）、刘祚金（1989年2月病故）、孙绍华（后调内江市木器生产合作社）、汪天福（1975年11月病故）、宋明章（1987年8月病故）、李久奎（现已退休）、李俊华（后调内江新华印刷厂）、张衡山（现已退休）、陈国珍（后调泸州市《川南日报》印刷厂）、吴植楷（后调内江市手工业管理局）、吴志彬（1979年12月病故）、何福崇（后调内江市板箱生产合作社）、邹明久（1957年某月病故）、林可久（后调内江新华印刷厂）、罗万发（1970年3月病故）、罗仲才（后调内江市制伞合作社、内江市竹器合作社、内江市铭牌厂（原刊刻社）、内江市新民印刷厂，历任主任、厂长。）杨子才（1997年7月病故）、杨子玉（后调内江市新民印刷厂）、杨俊之（后调内江市皮鞋生产合作社）、周学瀛（1958年某月病故）、姜国庆（后迁成都市西城区参加运输合作社）、胡崇贤（1987年7月病故）、饶泽民（后离社小东街自营刊刻）、饶俊卿（1991年2月病故）、曾成祥（1980年6月病故）、廖先志（1985年10月病故）、廖忠昭（现已退休）、黎联陞（1988年3月病故）、黎仲礼（现已退休）。

随师入社学工8名。

李懋洋（1994年5月病故）李文馥〔1963年6月，回五星乡务农。1962年3月，调回内江市刊刻合作社（今铭牌厂）〕、李宗

亮（后回隆昌县龙市镇自营刊刻）、张贤武（后回乡务农）、邹明元（后回乡务农）、周鹏程（后调内江糖厂）、敖承宗（后调内江市钟表修配合作社）、廖福洋（后调内江县高桥纸厂）。

第一次社员大会选举出：饶泽民任经理，杨子才任会计（后由罗近吾兼任），廖先志任出纳，饶俊卿任保管，周学瀛任工务（管生产）。

另请金觉官李家清作炊事员。

刊刻社成立后，实行全社供给制（不知是谁倡导的，也许是“学习老大哥经验”那里弄来的），工资按等级发放，食堂集体进餐（除炊事员，正好8乘5桌40人），甚至连水烟也包括在内。真是提前跨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如前所述，后来有关部门不承认这段集体合作的事实）。后为了偿还购房债务，伙食照常，每天每人领取生活费（供养家之用）三千元（今三角正）。

正值百业待兴，恢复国民经济时期，成渝铁路也正在修建之中。经济往来，公务联系以及新企事业厂矿单位的不断建立，都得启用印章（当时尚未试行签字），因此，刊刻业务是非常兴旺的。

“文化工人”的业余文化生活是极其丰富的，除经常学习报纸上党的方针、政策和国际时事，还专门成立了京剧场面（锣鼓）组，由李懋洋〔解放前曾在闻鹤茶楼（今交通路内江市保险公司）任京剧座唱鼓师〕负责指挥练习。川戏围鼓组，由汪天福（人称汪大钹）、黎联陞〔擅长川戏旦角，是内江市（工商联）商余俱乐部的骨干成员〕负责组织联络。逢节假日，傍晚就在街沿边摆上行头坐椅板凳，围坐清唱川剧。除本社的川戏爱好者以外，还得邀请商余俱乐部的成员和川戏团的演员参加。有时应内江市人民广播电台（小东街临南街路口右侧）的邀请，到播音室演出曲艺等节目。社员家有红白喜事，就去捧场凑热闹。

“文化工人”的政治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同全国亿万劳动者一样，翻身当家作了主人。解放初期，汪天福担任民族路段长，

廖先志担任三八街段长。合作化后，李懋洋、曾成祥、罗万发、罗仲才、宋明章、和后来的王学明等，有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都先后相继担任了主任厂长等职务。1962年3月，调回刊刻社的李文馥，在改革开放后，也被选为区、市政协委员、区政协副主席、内江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刊刻社成立后，消除了行业中的不良习气，增强了社员间的友善和团结，极大限度地充分发挥了每个成员的特长和积极性，形成了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刊刻流水作业法”。她充分展示了组织起来的无比优越性，使之成为巴蜀刊刻艺苑中的一朵艳丽奇葩。社会和公安局的人士评价说，看了你们刻的章，见到其他地方（当时的制度是，凡是公章启用，都得交公安局存档备案，公安局并同全国各地有往来）的印鉴，都觉得是假的一样。继后曾有资中的廖永福、威远的张启圣、简阳的蒋辉等前来刊刻社学习、取经。由此可见，内江刊刻行业的技术造诣是坚实而深邃的。终于在整个四川刊刻行业中成为一股强劲有力的实体。

内江刊刻行业，技艺精湛，势力雄厚，充分展示了集体智慧的凝聚。周学瀛工务，熟识诸家，技艺到堂。在整个生产管理上。负责填写各类印章的各式书体，还必须根据每个人的特点、专长和顾客对该件的要求分配工作。这样不仅满足了顾客的要求，增大了对外的影响和知名度，同时充分调动了每个社员的主观能动性。汪天福，投师周学瀛，是李氏刀子的第三代传人。秉承传统，法效师门，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成为周学瀛去世后，填写工作的当然继承人。陈国珍，功底深厚，技艺精绝，在金石书画方面，更有其精道之处。甲骨、籀文、钟鼎、篆，皆挥写自如。石金牙玉，甲籀鼎篆。刀法犀利，古朴苍劲。倍受书画界人士的青睐和赞誉。由于精刻机器印刷的铅钉，入社后不久，即调泸州市《川南日报》印刷厂。

吴植楷、何福崇、林可久、廖先志等刻制橡皮，堪称名师。刘

祚金、张衡山、吴志彬、罗仲才等刻制牛角，可谓巧匠。李久奎、杨子玉、胡崇贤、廖忠昭等刻制梨木、黄杨，算是全卦能手。

李文馥，1962年3月，调回刊刻合作社，先后曾担任会计、铭牌设计制图。1979年始，业余从事篆刻艺术的探索和创作。他克服身患多种疾病，不顾双眼高度近视。面壁十载，孜孜以求，印逾三千余枚。其名入编《中国现代书法界人名辞典》、《中国印学年鉴》、《中国印谱》、《中国民间名人录》、《中国印坛大观》、《中国美术书法界人名名作博览》、《世界名人录》、《中国当代篆刻家辞典》、《中韩书画名家大辞典》、《中韩书画名家精品大典》、《中国二十世纪名人刻字大观》。

刊刻工艺和篆刻艺术，同根合源，分支两流。就其刊刻工艺而言，必须深谙商周秦汉，甲骨鼎彝，真草隶篆，颜柳欧苏等诸多方面文体结构及其艺术特征。具体讲，并不亚于一个书家腹中所容。由于历史遗留的偏见，同宗分族，雅俗分野。故而始有“刻字匠”和“篆刻家”之称。成都著名篆刻家苏园、上海著名篆刻家方介堪（曾为国画大师张大千治印颇多）、北京著名书画篆刻家齐白石，均出自“大匠之门”。

解放前和解放初期有21名，1951年5月参加合作社有32名，随老师进社有8名，嗣后新生力量有19名（从事时间长短不一），合计79名。据此可以看出，内江刊刻行业，人员聚众，技艺过硬。势力雄厚，影响广泛，登上了历史的最高峰。

刊刻。实乃刊刻印章。当今合印章、刻艺于一体称为“篆刻”。

随着现代社会的进展，除了“公章”以外，私人印章的作用，早已被签字所代替。

八十年代初期，据说是云南省昆明市的刊刻同仁，创造发明了不用印泥而自动浸润红色的“原子印章”（圆形公章）。这项创造发明，使印章的制作和应用跨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适应了新

时期的科技发展，取代了手工操作。实现了生产机械化。

1992年，内江市公安局在大东街开设了“原子印章店”，完全取代了内江市铭牌厂刊刻小组的公章刻制。自此，刊刻工人只能刻制私章、杂件和其它印章。

1996年初，上海长江企业发展公司（原上海长江刻字厂），利用激光、机械、微电子、计算机等科技系统，自行设计开发出了“长江CJSG系列电脑印章刻字机”。该机精度高，质量好、生产效率显著。可刻制塑料、橡皮、牛角、有机、储墨垫、黄杨木等非金属材料，配有中文简繁体达30余种，加配扫描仪和长江图矢量化系统，可以制作各种精美图标、徽记。“电脑印章刻字机”的广泛应用，取代了三千六百余年传统刊刻的手工技艺。

1951年9月25日，内江县改为“内江市”。内江县刊刻社也相应的改为“内江市刊刻社”。

1952年6、7月份，为增加营业收入，派出了3支（每组3人）“流动服务组”，分赴内江、资中、仁寿、资阳等场镇。

1952年8月，内江市手工业联合社成立。内江市刊刻社划归手工业联社管辖，改名为“内江市刊刻合作社”。

1952年11月4日，分出8名学工，另自成立“内江市民明刊刻社”，由敖承宗任经理（笔者）1953年6月离社，何时解散不详）。

1953年，中央路店堂、工作坊卖掉，先后迁三八街、水巷子（今运输巷）。

1955年下年，公私合营后，划归内江市饮食服务公司管辖。经批准，工资分为三等九级。

1958年7月，重归内江市手工业联合社管辖。

1958年12月12日，内江市文具生产合作社、内江市刊刻合作社、内江市板箱生产合作社、内江市美术合作社联合组成“内江市美术厂”。

1961年10月，内江市美术厂解散，四个单位恢复原有组织形式，仍称合作社。

1962年8月，内江市手工业管理局（与手工业联合社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成立派出机构“内江市手工业修配服务社专业联合社”，管辖刊刻合作社、电器修配合作社、自行车修配合作社、美术合作社、钟表修配合作社、钢笔眼镜修配合作社、配补鞋修配合作社、综合修配合作社。这8个合作社，由一级管理降为二级管理。

1964年上半年，中共内江市委和中共内江地委接上级通知，市委、地委及下属各部、委的公章须将黄杨木改为铜质。为了保证质量（刻制成批铜质公章还是第一次），提高工效，由主任李懋洋带领刘祚金、汪天福赴重庆市刻字生产合作社学习取经。在学习过程中，发现他们采用照相制版，化剂腐蚀铝板，生产机器铭牌（当时整个四川，只有成渝两家）。汪天福急时返回，换李文馥赓即赴渝，会同刘祚金、李懋洋学习铭牌工艺。

1964年12月，内江市刊刻合作社，改名为“内江市刊刻制版工艺社”。

1966年10月，由“革命领导小组”主任曾成祥带领李文馥等，赴成都市民族金属工艺品生产合作社学习“毛主席像章”制造工艺。

1974年10月，由罗仲才带领李文馥、陈吉芳、陈淑明、邱德良，赴贵州省遵义市工艺美术厂学习（通草）堆画工艺。嗣后，四幅堂屏参加“四川省工艺美术展览”。

1976年1月，内江市刊刻制版工艺社，改名为“内江市铭牌生产合作社”。9月，取消“生产”二字。

1979年1月，内江市铭牌合作社，改名为“内江市铭牌厂”。

自1964年制作铭牌以后，逐渐分流刊刻人员，另自成立“刊刻小组”。

继 1951 年 5 月 1 日后，刊刻人员 19 名。

王学明（后调内江市猪鬃合作社、内江市布鞋生产合作社、复回铭牌厂）、邓昭元（后调内江市猪鬃合作社）、刘杨伟（后调内江市中区商业局）、刘顺良、刘莉（女）、向天利（女）、汪开荣（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李肇萍、吴明英、吴晓玲（女）、杨中一（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罗建忠、周智慧、胡宝玲、胡淑芝（女）、唐明忠、傅顺、黎雅琴、戴国良。

1967 年后刊刻小组成员：1967—1970 年 7 人，1971—1986 年 8—13 人，1987—1992 年 14 人，1993 年—1995 年 8—11 人，1996 年—1998 年 5 人，1999 年 1 人。2000 年 4 月，内江市铭牌厂刊刻小组撤销。

19 人中，调出 3 人，离职 5 人，退休 2 人，内部安排 4 人，离厂自营刊刻（小东街，电脑印章）5 人。

刊刻，技艺深湛，内含丰富。虽属民间手工，确也一生难精。而真正有作为，有成就的刊刻匠人，从古迄今，史载不多。

刊刻，始自商周，源远流长。自有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就有刊刻匠人的镌刻工艺。她伴随着华夏历史，演绎了三千六百余年的文明史。

内江刊刻，创造了汉安文化，在巴蜀大地占据了一席之地，成为专市县刊刻行业中的一颗耀眼明珠。

内江刊刻，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手工艺受到了猛烈冲击。她完成了历史的使命，抵达了历史的终点站。

2002 年 4 月 22 日

笔者后记：1、文中名列均以姓氏笔画为序。2、文中漏记，刊刻社前，何福崇曾在南街开设店铺。3、由于刊刻社几经转折，资料遗失。4、此文承罗仲才师兄、张业军厂长提供资料，谨致谢忱。

说明：

张俊卿，李腾霄二人于建国前病逝。

刘慎行，自贡市刊刻行业中人。林可久，富顺人，在自贡市学艺后来到内江。

赵泽林，自贡市人，其父赵玉书系邓永清老师。赵到内江师兄店上参师帮工一段时间后，即回自贡经营刊刻。

罗新民在白马镇，邓绍林在梓木镇，许新民在永兴庙，谢辉在隆昌县双凤驿，四人均系建国后回自己老家经营刊刻。

黄俊才，家住城区，建国后未参加联营，长期在观音滩一带经营刊刻。

李治平、谢银祥、谢银成、蓝海波、张树尧、罗德文、孙礼洪、赖孟阳等，其中有的学艺未满三年就改学其他，有的学满三年出师后，就改行干了其他工作。

内江餐茶旅业的兴衰

黄心明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座落在内江交通路末尾，与半坡井口相连的地方，有一家大华饭店，餐旅业都设在二楼，不是木梯，是石阶梯，经理姓张，雇有厨师，堂倌、杂工等 10 余人，由于地处偏僻，生意不景气，大约两年后就关门了。招牌仍然保留很长时间。

同一时期，有一家中川浴池旅馆，地址是在日杂公司下面一点（现新修“新华书店”斜对面），经理陈松柏，原内江县田家镇人。当时生意很红火，城市居民和其他业主很少照应，只靠外地经商人员，业务逐渐下滑，不久就关门了。

1930 年初，内江惠民宫庙宇被拆除，开一家“相因旅馆”，经理许政，大约经营二、三年后，殿堂是公家的，由公家接收，改为“民乐旅馆”，由廖超任经理，一致延续到解放以后。

在“文革”时期，为破“四旧”，民乐旅馆改为“红星餐厅”。四人帮打倒后，红星餐厅是“文革”产物，仍然恢复为“民乐餐厅”。当时规模很大，有停车场，有烧开水的锅炉房，有大浴池等。

餐馆由许观灶等人组成。以后是廖富芝，浴池是张国均、夏宇洪等人组成经营。

张、夏二人从事按摩，修脚技术服务，很有名气。“文革”后期，廖超调东兴区人民公社任党委书记。廖调走后，由唐国江书记主持，中间还调换了些人，不很清楚。再以后是魏和裘。当时计划经济过度到市场经济，旅馆业务不变，餐馆改为糖果副食商店，由魏和裘、杨国钦主持。

上世纪 30 年代后期，内江城隍庙对门，现在的百货大楼处，

有一家餐馆“京山饭店”，经理人周之德、郭培根二人经营，业务平常，郭是内江桂湖街人，任职于内江县警察局督察，当时内江经济不发达，二人都是“外行”。转让给小学教师陈玉书，改为“京川饭店”，业务仍然不好，不久就停业了。

同一时期，“京川饭店”扩大门面，改为“新新饭店”内江名人李吉安的女婿王启宇任经理，也是内江上层人物，大约一年多时间，生意仍然不好，又转让给袍哥大爷李柱华经营，楼下设零餐，楼上设包席、旅馆，生意很好，包席不断。三伏热天，用一块长方型木架，钉10来把蒲扇，再绷上一块绿色大绸吊在半空中，找个小孩用绳子拉动，作为大风扇。宴毕给小孩吃顿剩饭，给点小费钱，就算完成包席任务。

李柱华是社会上层人物，又是袍哥大爷，一般流氓、闲杂人员，根本不敢去捣乱，当时社会风气是皮管街。

所谓的皮管街，参加袍哥的人，就叫有“皮”。如果在外面惹事生非，或者打架，或者语言中伤，双方争执不了时，由双方的拜兄出面调解，如那一方输理，当众赔理道歉，开茶钱了事。如果双方不服，只好通过官府按法律解决。

内江城首次雇用女堂倌（女么司）

内江城区大小餐旅馆很多，只有“新新饭店”首次雇用二名“女堂倌”。一个叫王燕秋，另一名叫张惠霞。王身材修长，容貌一般，爱打扮。

江津帮糖商，经常到新新饭店就餐，有一个糖商就把王燕秋瞧起了，二人商定好了，不久王燕秋就嫁给江津帮糖商去了。

40年代中期大约1945年，日本投降前后，南街廖家祠堂的门面，现在是中成药门市对门，有一家“大同饭店”，董事长是江津帮糖商廖璧光，经理是河坝胶行街做牛胶行生意的方子光之次子方度西，在抗日战争时期，方度西当过城东镇联保主任。（以后改

为镇长)他很少来“大同饭店”过问。

“大同饭店”的厨师长甘尚勤，甘是餐厨公会理事。甘尚勤所教的徒弟，有黄福才、邓红枣、李家同，还有陈光明、陈光才弟兄二人。“大同饭店”座落在闹市中心，前来包席的人很多，价格比新新饭店略低一筹，零餐业务也很好。那时内江金融界买卖双方交款是讲“比期”。每月1号，15号为“比期”。

农村糖房、城市较大的交易到比期比款，每值比期大同饭店的生产特别好，楼上楼下都要座满。东坝街的协记饭店和其他的馆子都一样的好。

大同饭店迁至现在的影都对门那个地方营业，业务仍然很好。1949年12月6日内江解放，当时家家商店关门，原因是新人民币与国民党的旧币一时无法折扣，加上城里大部分绅、贾都跑到乡下去了，路上行人都很少，大同饭店亦随之散夥了。

40年代中期南街，现在的中成药店处，与大同饭店斜对门，有一家“桃园饭店”，一年四季都卖腌肉香肠，粉蒸牛肉、肥肠。腌肉、香肠切蒸备好、客人落座吃什么，堂倌马上即能端上桌，又快、又经济实惠。生意很热闹、经理赖焕章。

1940年前后，处于抗日战争紧急关头、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来内江搞“献金运动”，为抗日筹集资金，下榻在文英街“金台旅馆”（现在的养路总段处）。

主要对象是银行、巨绅、士贾、大部都来献金，是当时金台旅馆经理开明绅士李焕章起了带头作用，他献了一股地方。内江曾氏弟兄，钱庄很大，地方很多，所献的金不如李焕章献的多，所以冯将军在金台旅馆内写了10个大字的横标，赞扬李焕章，这十个大字是：

“英雄真受国，豪杰不畏贫”。

又在内江城南街中间上空写了10个大字的横标，

这10个大字是：

“看看曾仲海、学学李焕章”

冯将军不久就到别处去了。

40年代初期，内江文英街口有一家茶旅馆，生意很好，招牌叫“天府公寓”经理人不详。与康宁旅馆两隔壁、旅馆大部份住的运货汽车司机、茶馆饮茶者大部份是社会闲杂人员。

意诚社的人很多，都是些阿飞、天棒、地痞、流氓、卖黄鱼，都是些无法无天之辈，晚上旅馆住的司机多，编“黄鱼”的各个房间找司机，问明车到什么地方后，卖“黄鱼”的人就来找乘客，从中得钱，这就叫做编“黄鱼”。（当时客车很少）

40年代中期，文英街相邻公安分局侧面，有一家“龙江饭店”是安岳县张天喜弟兄二人开的，那些编“黄鱼”的，或者其他阿飞、天棒等人，经常关照龙江饭店就餐，比如说，吃了30元钱，给10元或者20元，如果黄鱼卖得少，收入也就少。吃了就记帐。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意做不走了，赊欠帐的人太多，有知情者给张天喜指点迷津，那些欠帐的，大部份是“意诚社”人，何不找个熟朋友介绍到“意诚社”去，不久算达到了目的。根据张天喜的年龄给张安了个“五排”。从此大伙就更亲热了。左一个张五爷，右一个张五哥，兄弟今天生意不好，手头紧，随便吃点便饭，改日与你拜兄送来。

就这样硬是把一个龙江饭店吃垮了，弟兄二人还是回安岳去了。

大约30年代前后，南街中段小东街口交汇处，有一“广居茶楼”，经理不详，三楼上买茶、饮茶者都是些知识文化人，有唱清音的，敲盘子的，等等在此卖唱，生意十分红火，可是到抗战前就关门了。

40年代前后，大西街文昌宫里，一边是县粮食管理处，一边是城西镇办公室、镇长熊永清、副镇长谢思存、科员林肇基、沈永炎、雷建勋、五人合伙开了家“思清茶社”。作为他们休闲的地

方，茶馆生意很好。小西街及大西街的绸缎帮、百货帮，每天早上都要在思清茶馆轮流吃早茶，后堂摆麻将、扑克及“诗条子”。还挂了一块“江声俱乐部”的牌子，每周座唱一次川剧，专业川剧团的演员、音乐组都要来捧场，著名鼓师何声扬等都要来参与。大约二年后，思清茶馆交与熊永清的三儿子熊梓云。熊梓云与隆学渊合伙，改为“云龙茶社”。还是开赌场及诗条子等。

同一时期对门有家“爱群茶社”，也挂牌为“爱群俱乐部”。每周座唱川剧，座堂二鼓指挥是魏明伦的父亲魏楷儒。

小西街口对面、大西街阴家巷交汇处有仁字袍哥金玉公开的“金玉茶社”。现在口腔医院侧面是谢副镇长开的“茗香茶社”。

河坝街老禹庙对门、仁字袍哥久成公开的“久成茶社”。饮茶者决大部份是船老大，其它就是拉船的，在此揽生意，四、五间店面都要满座。

上面谈到内江新新饭店，解放以后，大约 1950 年，大小股东分伙，每个股东分得的家俱、餐俱，另找门路。由罗纪熙任经理的“精新饭店”。地址在市总工会下面一点，另一家由陈炳森任经理的“又新饭店”。地址在文英街口天府公寓。股东 10 人，每人集资 2 万元（约合现在 20 元）。每个股东都有一定的技术：有白案、服务员、厨工等，不足的工种，由亲友好介绍补足。

1951 年，三反、五反运动，反偷税漏税自查补报。全市各行各业资本家都集中到工商联学习。当时工商联主任委员，我记得是阴钧陶。以后是李绍中、刘石夷、高平章。（工商联主任委员，谁先谁后我记不很准确）。

大约是全市公私合营后，工商联主任委员李绍中被选为内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绍中的企业是搞猪鬃厂的私营企业。

资本家在工商联集中学习期间，大家一致认为工商业者没有前途。听了传达报告，资本家李绍中被选为副市长，大家松了一口气，谁说没有前途？

大约在1959年前后大跃进时期，副市长李绍中，饮食服务公司经理陈问田二人划为“右派”。结束了李绍中、陈问田二人的政治生涯。

资本家通过三反、五反、偷税漏税、自查补报以后，尝到了苦头。会议结束后，争先聘请“会计”建立发货票注帐制度。当时又新饭店聘请工商联业务股股长肖瑞光兼任又新饭店“会计”，后因工作忙又增加刘光明为助理“会计”。收款、开票、座柜由劳方经理黄心明担任。厨师邓红枣、张维金等人参与财会工作。

1952年元月，内江税务局、征收股胡股长（女）。来店通知，并给了一本筵席捐收款凭证、由开票收款人黄心明代征。凡顾客一次性吃上3.00元钱的，按15%征收筵席税。

直到1952年12月31日，新民主主义时期结束。胡股长又来店通知，新民主主义时期结束了，筵席捐税也就结束了。

1956年二季度时，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公私合营”高潮。大型工厂、私营企业，通过三反、五反运动学习，要参与对私改造，首先要自愿申请。又新饭店经对私改造工作组审议，决定由“又新饭店”为主体，合并几家小饭店和茶旅业。即西门桥“合鸿饭店”（经理刘国民）、东坝街“协记饭店”（经理许仲方）、“清真食堂”（经理苏才亮）、北街“味中美”面店（经理钟福祥）、“康宁旅馆”（经理杨海清）、“菁莪旅馆（经理伍次威）。伍是内江五老七贤伍心言的侄子）、市总工会下面一点的“和平茶馆”（经理张建高）。“又新饭店”（资方经理陈炳森、劳方经理黄心明），合并时的口号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搞好企业为宗旨。

以上公私合营后，清真食堂经理苏才亮，又新饭店经理黄心明二人是劳方经理。其余各店的经理是资方经理，又称资方代理人。

1957年元月，公私合营以后，政府考虑到诺大的合营企业，没有国家工作人员不行，先后派驻公方代表。

内江首次派驻公方代表三人：

第一位公方代表是市商业局干部池正德（余农治的外甥），派驻第一酿造厂，与高平章的信源酿造厂合并，在民族路、信源酿造厂正式办公。

第二位公方代表旦国辅，派驻牌楼坝煤建公司，是税务局干部。

第三位公方代表门必成是市商业局干部，派驻又新饭店。（后改为公方管理员），在东坝街协记饭店楼上办公。

又新饭店公私合营后，1958年三季度时，奉市商业局通知，在又新饭店各个店抽调有一定技术的工人去支援西昌搞餐旅业建设，有味中美陈举良，协记饭店邓佐元，又新饭店熊绍甫、罗吉海。大约三年多时间。1961年自然灾害时期，参加西昌支援搞建设的人员，全部调回内江，在原店上班。

支援西昌的陈某家属，与公方管理员门乱搞两性关系，被群众发觉后，市商业局派员经过半年多时间核查，情况属实，经局里研究，给予公方管理员门××开除公职，永远不能在商业部门任职的处分。

1959年大跃进时期，市商业局派转业军官进驻又新饭店，建立党支部，张文君为支部书记，商业局干部张新成为副书记，管理业务及人事安排。

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张文君书记，张新成副书记先后调走，由转业海军军官宋绍云为支部书记。大约一年后，市商业局研究决定：文英街口又新饭店所有人员，全部调下面几个店。又新饭店就撤销了。

所有餐馆旅馆全部转为国营，行政、业务等事务，由内江市饮食服务公司管理。

当又新饭店撤消后，由黄福才与张仲文在原址合办“培训餐厅”。培训川菜厨师。

直到街道拓宽，房屋被拆后，培训餐厅，亦随终止培训。

30年代后期，内江中川浴池对面，（现在新华书店处），有一家“复兴旅馆”，经理人是王学畦的父亲，父子二人经营的。因业务不好，不久就关门了。

40年代初，民乐对门一家“万成旅馆”，经理刘万成，与民乐相对，抵不过民乐，约二年后、负债关门。

我在又新饭店工作时，有一位工作人员，叫张谓之，他幼年时，在交通路一带做水果生意，他对交通路的餐茶、旅馆很熟悉，他提供了部分有价值的补充材料，在此特致谢意。

内江警方侦破陈再涉黑团伙案

曾晓平

内江市市中区公安分局在“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成功侦破以陈再为首的涉黑犯罪团伙，是内江市“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以《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组织罪”刑事拘留，又被检察机关以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罪”批准逮捕的第一个涉黑犯罪团伙，将长期独霸内江水果批发市场，进行强行交易、敲诈勒索、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犯罪活动的犯罪团伙一举打掉。

2001年1月4日，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内江市公安局局长陈荣华收到一封署名“正义”的群众来信，反映内江东站长水果批发市场存在欺行霸市，强迫交易等严重问题，立即作出批示，要求市中区公安分局迅速展开调查。

1月6日，市中区公安分局局长李若木指派4名精干侦查员秘密开展调查，收集证据。他们跟随水果商贩一同进货，频繁来往于水果商贩之间，寻找线索。经过30多天的秘密调查，初步核实，以陈再为首的犯罪团伙依托内江火车站兴德利贸易公司东站长果品经营部，利用暴力、威胁、恐吓等手段，有组织地进行强迫商品交易、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聚众扰乱交通秩序、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长期作恶，欺压群众，疯狂聚敛钱财，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生活秩序。

随后，市中区公安分局局长李若木将调查核实的情况向陈荣华作了汇报，陈荣华听取了线索查证情况的汇报后指出，这是一起性质恶劣、犯罪手段残忍、涉及多种犯罪、特征明显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应立即立案开展侦查。市中区区委书记、区人

大主任李必胜、区委副书记、区长袁玉庄和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李忠辉同志多次听取了公安分局的工作汇报，鼓励大家要打出成效，打出声威。

代号为“314”的专案组成立，市公安局局长陈荣华为组长，市中区公安分局局长李若木、副局长毛挺为副组长，市中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大队长谢德才、副大队长胡沙嘉、刑警大队长孙文为领导小组成员，一场彻底摧毁蟠龙坝水果市场黑恶势力的战斗悄悄铺开。

专案组核实查明，该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人员达11人，团伙分工明确，组织严密，涉嫌犯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组织罪、强迫商品交易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敲诈勒索罪、窝藏、包庇罪、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寻衅滋事罪和贪污税款罪等九种犯罪。专家组决定迅速缉捕犯罪嫌疑人，一场代号为“猪鹰”的特别行动悄悄开始了。

3月15日下午5时许，分局刑警大队重案中队侦察员将正在水果市场外一住宅内赌博的犯罪嫌疑人刘俊德秘密抓获。经过10余小时的布控追踪，当晚10时，专案组成员蒋毅、牟来清、邓成平和胡向荣赶到大洲广场河边，将刚下船的陈再抓获。当晚，蒋毅、牟来清、覃云德、李学军四名干警又赶到蟠龙坝水果市场招待所将犯罪嫌疑人邓少东抓获，并收缴了大量的聚敛钱财的物证、书证。经过对陈再、邓少东的连夜审讯，获悉犯罪嫌疑人邓延武住在市中区天津街“德克士”炸鸡楼上，3月16日早上7时左右，干警们不顾几十小时未休息的疲劳与辛苦，急速赶到天津街，将还在睡觉的邓延武抓获归案。

3月24日，专案组获悉刘旭桂、周永江逃至重庆永川市，公安分局经侦大队长谢德才带领郑毅、伍伟、牟来清、李学军赶到永川，连夜开展工作，至25日凌晨3时，获得刘、周有可能在川东农贸市场的情报，专案组蹲点守候。3月29日晚，专案组得到

可靠情报，刘、周已逃至璧山县，藏匿在丁家镇一亲戚家，此时，天下起了大雨，原本就崎岖的山路特别难走，经侦大队中队长郑毅跌倒摔伤了肋骨仍然咬牙参加行动。他们连夜走了六七里泥泞小路，在周永江的老表家将刘旭桂、周永江擒获。

4月16日，官忠义在水果市场被擒。4月19日，余友元骑着“两轮”，在蟠龙坝出现。干警左国飞乘上其“两轮”，郑毅开车紧跟其后，行至分局经侦大队门口将余友元擒获。

至此，陈再涉黑犯罪团伙11名成员除一人死亡，一人此前被捕、张勇逃跑外，8名主要成员全部被捉拿归案。

据悉，1994年，陈再看到内江东站水果批发市场有利可图，便网罗犯罪嫌疑人刘旭桂、邓延武、周永江、秦科元等人，密谋策划，虚报资金，登记注册，成立“内江火车站兴德利贸易公司车站果品经营部”。陈再为经理，负责全面工作。周永江在铁路方面熟悉，任副经理，邓延武任经营部财务经理。刘旭桂、秦科元在水果市场上混的时间长，便任经营部业务经理，负责收取外地客商的代购代销费。刘俊德、张平久与社会上的地痞、恶势力团伙来往密切，便充当该团伙的打手，有事就由两人出面“摆平”。

该经营部建有十分严密的内部规章制度，议事制度，分配制度。至此，该团伙的组织机构已经建立，人员分工十分具体、明确、章程、制度十分完善。机构建立起来了，为了在水果市场站住脚，占领地盘，该团伙开始实施一系列的暴力方式抢占地盘，以利发展壮大。他们一方面用暴力、威胁、恐吓等方式垄断水果行业的搬运业务，强行收费，在水果市场内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殴打他人，树立淫威。另一方面他们又用暴力手段与其他在水果市场活动的违法犯罪人员进行争斗，将其驱逐出市场，占领了地盘，将内江水果批发业务垄断在其经营部内。在水果市场站稳脚后，他们就实施强迫水果交易，非法收取治安费、搬运费、租金费、进出大门费、代购代销费，疯狂聚敛钱财，仅就1998年至2000年

4 月的三年时间内，就非法聚敛 150 多万元。利用市中区国税局牌楼国税分局协税员的身份，大肆贪污国家税款，并用疯狂聚敛的钱财和贪污来的税款，修建市场办公营业用房 60 余间，购置豪宅，打造营业船只，为该团伙的继续发展、称霸一方，为非作恶奠定经济和物质基础。至此，该团伙已经形成一个有组织、有领导、结构严密、分工明确，有一定物质和经济基础，并疯狂实施各种犯罪活动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

续谈 1950 年内江县三区征粮剿匪 重点乡——凤鸣乡的“雷五爷”

严茂修

市中区政协《文史资料》(37 辑) 张家俊先生撰写的《难忘的岁月》副标题：忆在内江县三区的征粮剿匪斗争。第 52 页提到的凤鸣乡场外，雷家大院子的“雷五爷”，当工作队走进院内，见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戴着眼镜神气十足，目中无人似地端坐在书房看书，一派士绅、地主、清共委员的傲气。

雷五爷究竟何许人？

内江县西区白马镇境内石坳口柑子园，清武举雷仙帆，共生三子，大儿雷光全是把捏骨相——守财奴。早逝。三儿雷烈光随父雷仙帆住家石坳口，业糖房漏棚，好色好赌，家业逐渐衰落凋零。五儿雷龙光嗣仙帆长兄雷大春之子为子，住家凤鸣乡（原名鸡公店）外三里处，张家寺下高粱冲。幼时读书能诗文。后赴延安抗大，没毕业没入党，弃学回家操父业。经营糖房漏棚，是西区白马镇境内响当当的糖业巨头。三六九逢场到白马镇看糖市行情，是银钱业互争代办收交的头号人物。在内江是制糖公会执、监两会委员，与主席李汉文谈心摆龙门阵十分火热，不到下班时

间不回家。每年的蔗糖评价会，李汉文坐镇会场，他就助李坐镇，实为“二号人物”，他提案多，圈圈多。常因评价使日程推进受阻。他在内江县城里，家住中国旅行社（交通路）内的后堂小院，担任雷氏宗祠族长。有一次，他帖请制糖公会主席李汉文及县田粮管理局局长贺修敬、宪兵十二团团长吴志勋来家商谈民国十四、十五年（丙子、丁丑岁）天旱重灾，省田管处发还人民征粮货币（银元七十万元），此时，恰逢易元明县长调任，他就暂时未领未交。商谈中，吴志勋说，内江要发展必须优先开发人才，可办一所糖业大学，资金不足，现可先将此款存入糖业开办的“鑫丰钱庄”，生息储存备用，后来，每年的息金，无凭无据的就交给吴贺二人。而雷乃是“鑫丰钱庄”的董事股东之一，当然参与瓜分。全入了他们的腰包。解放后，雷潜回凤鸣乡，作了地主、绅士，法网难逃，后被镇压，张家俊先生文中所指的“雷五爷”就是这个“雷五爷”。

官简贤、田光灿二老相继辞世

文史委员会

官老简贤：内江文教战线老前辈，历任中学教师、校长。资深、学博、诗文皆佳。待人平易，颇享赞誉。历任我《市中区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委。笔耕不辍，常有精当文史文章面世。身健，寿近期颐，于二〇〇二年元月元日上午九时安祥寿终，享年98岁。特此示哀，并刊挽联，以慰英灵。

田老光灿：供职于内江市民政局，擅长诗文任《沱风》诗刊编委。熟谙内江掌故、民俗民风、地名衍变。年复年为我《市中区文史资料》撰稿，抱病卧床仍握笔不懈。由于长期气管炎疾缠身，不幸于2001年11月2日20时45分辞世，享年71岁。为此致哀，并录挽联以慰。

官简贤老人自挽联

（官老晚年，自知人生有此一别。坦然自作挽联云）

俯仰一楼间，想从前浪荡江湖，见多少名场过客，尽成泡影。
到如今宽闲并享，吾心良已足；

结交千载上，忆往昔浮沉人海，弄什么公案文书，都是虚华。
望来世福慧双修，此外复何求。

敬悼掘老

众里失追陪，难忘相于巷陌，娓娓述说井间轶闻，任桑柘影斜，畅怀人散；

期颐可摸索，何乃急蹈天台，匆匆了却尘寰羁念，令庭阁梦

冷，万里风悲。

邹作圣敬挽

简贤夫子千古

天竟丧斯文，廿年只恨识荆晚；
我犹钦典范，三晤难忘收益多。

愚晚泸州罗锦文敬挽

我移居内江凡二十年，但与当地人士甚少交往。后读德润先生华章，始知有朝阳茶馆此一绝妙去处。每逢周三，汉安物望如官简贤先生等，咸雅集于此，说文论道，领一方风骚，令人仰慕之至，于是欣然前往拜识。简贤先生年近期颐，思维敏捷，学养精深。当即以拙联若干面呈求教，获益良多。惜乎！与先生缘仅三面，如今竟驾鹤西归矣。

挽官简贤先生

惜乎，当初未识贤翁瞻简素；
乐也，时下常听茶友忆官家。

杨方德敬挽

悼官简贤老师

自谦称拙老，博学阅历深。
桃李满天下，朝阳^①最高龄。

诗联载《沧风》，文史说甜城。
聆教获益多，摸百^②同留影。

溘然乘鹤去，斯文少一人。

何泽龙敬悼

注：①“朝阳”指每周三“文化会餐”之茶馆

②“摸百”指官老上98岁，近100岁矣！

悼简贤夫子高龄仙游暨罗公友君中年辞世

敬德尊者美孝行，无何公友后学伤早逝；
为文立世宗飘逸，有庆简贤先生享颐年。

洪若敬挽

（官简贤，人称拙老。以九七高龄溘然长逝。罗君公友商界学子也，父亡事母孝，尤对里中老年学耆官简贤、朱英、张勾石、李问昭、刘北岳诸长辈，常相侍从，关注起居，惜中年早丧，并此同挽！）

挽田光灿诗友

力倾学会功在枌榆倚重方殷顿赋鹤骖君诟忍；
诗誉吟坛文昭史志宏图未竟惊闻噩耗我犹疑。

内江市诗词楹联学会同人 官福光执笔

悼田光灿挚友

一死竟吞声，那忍朋哭友，戚哭亲，子哭爹，妻哭良人，冷
帷孤灯，临风痛洒伤心泪；

千秋成永诀，岂忘生同庚，幼同学，长同事，情同骨肉，青
风黑塞，奠酒难招故旧魂。

张起荪为邓潜源代拟联 敬挽

悼念田光灿同志

经年抱病苦撑支，心血煎熬著史诗。
倏报三秋伤永诀，那堪千古失良知。

文坛悲恸文星殒，风雨失声风日悲。
我入黔山栖息久，蜀天遥望痛哀思。

张克纯于贵阳

悲悼田光灿挚友

(今晨接光灿子电话得知，其父已于2001年11月2日晚九时离世矣。嗚呼！光灿仅小我四日，余因足病不能行，无能前往探望，却先我而去也。今又不能告别，岂不悲乎！)

朝来噩耗忽惊心，双眼模糊泪湿襟。
友第七旬悲早逝，故朋多载恨迟寻。
文章白壁原无垢，意气青萍久已深。
同厄龙蛇遭恶运，缘何先我去冥岑。

兄弟情深岁月牵，大洲庠序谊相连。
同庚同月成知己，共校共衙如有缘。
传播文明多尽责，宏扬国粹更捐钱。
忽闻殒谢终天憾，欠我手书心怅然。

邓潜源哀挽

挽光灿先生

光年流逝惜超寿考；
灿烂耀辉永驻心田。

杨方德挽

挽田光灿先生

品德伴梅香，尤重夕阳精翰墨；

音容离世杳，顿惊旧雨碎肝肠。

黄江陵敬挽

痛悼严茂修先生

文史委员会

在本辑资料编辑告毕、呈交审批时，忽闻常年为我《文史资料》撰稿的严茂修老先生（亦是我社会人士学习组组长）于2002年7月29日凌晨溘然离世（享年89岁）惜来不及文字相吊，唯此短讣示哀。

2002.8.2

更 正

本《文史资料》第39辑

(一) P130 倒数十一行，吴贻芳的《婉容词》，“吴贻芳”应为“吴芳吉”。

(二) P132 八行，四百“北”国子，应为四百“兆”国子。

(三) P144 三行，11月7日应为11月17日；P150 倒数一行，12月21日，应为12月31日。

(四) P169 十一行，魏“凯”儒，应为魏楷儒。

(五) P192 十一行，清音《刘胡兰就义》系选材，误为陈绍州创编。

(六) P192 倒九行，花鼓《保证实现四十条》系选材，误为陈绍州创编。

特此更正，并向作者、读者致歉。

编者 2002. 秋



一、我《文史资料》(39辑)中“朱老总与厨师黄福才”一文，被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的《纵横》选用。(载2002年7月号)

另外，在我《文史资料》其他选辑中，有部分文章，亦被有关报刊选用。

二、“莫道水浅无龙起，喜看民医腾巨星”一文，被北京《健康生活报》选用。

三、“张圣奘‘悬壶’”一文被《四川政协报》选用(载2002年2月28日三版)

四、“淡笔浓情的抗日画展”一文，被《四川政协报》选用。(载2002年3月12日三版)

五、“张大千诗多是何时”，一文，被《四川政协报》选用。(载2002年5月21日三版)

六、“换戒指”一文，被《龙门阵》刊物选用(载2002年7期)。

七、“陈书舫内江轶事”一文，被《四川政协报》选用。(载2002年8月24日三版)

八、“黄炎培留在内江的诗”一文，被北京《人民政协报》选用。(载2002年8月30日三版)

九、“冯玉祥的《内江人颂》”一文，被北京《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选用。(载2002年9月27日“春秋周刊”三版)

编 者

金華 十一月二日 壬子 吳思

美在為陰陽學投著稿一年，有
徐陳梁之協助，是項有利的集
件。不過這還有有人信出列支的表
見之書信，並能夠許只落實製作
有力的人士之中有力。此外近行的計劃
否別再加考慮。

我的意見，同家學中的許多，去
廣之明矣。編如，高在學序加重我學序出。
可以參考或高在學同家學一慧集
國公司，產生電，不經性協商，為升生功視
了我書的方業，進行交換，表兄城市。

其主為條件，由法學司之必，近古
外書，高多戰學序出，所有和整用，包極
學，所出的，延行，各往，近，的，或，家，之，通，和
優，佳，書，整，用，全，部，如，位，分，包，干，整，包，如
仙，品，的，領，佳，全，部，如，位，分，包，干，整，包，如
分，配，的，辦，法，如，此，例，之，為，此，之，作，者，不，在
理，任，何，支，付，費用，的，負，担，特，提，提，度，致。

至於文物商店，去國度領，仍由作者
出國度之情況，自法，不同，性，能，和，意
我，都，不，一，樣。去，者，之，成，為，有，法，不，知，是，否
以，為，可，行。去，者，之，成，為，有，法，不，知，是，否

吳思

吳思元再取一用哥

(張麟傑稿)

本辑编审:钟道洪

责任编辑:王德润

封面题署:晏济元

封面设计:田世华

封面摄影:林大如

校 对:王 况 蒋政伦 王 旗



内江市市中区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内江市市中区委员会
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教育印刷厂 印刷

四川省内江阳光电脑印务中心 照排

字数:16万字 印数:1000册

2002年10月

图书准印证:内市新(2002)字第81号